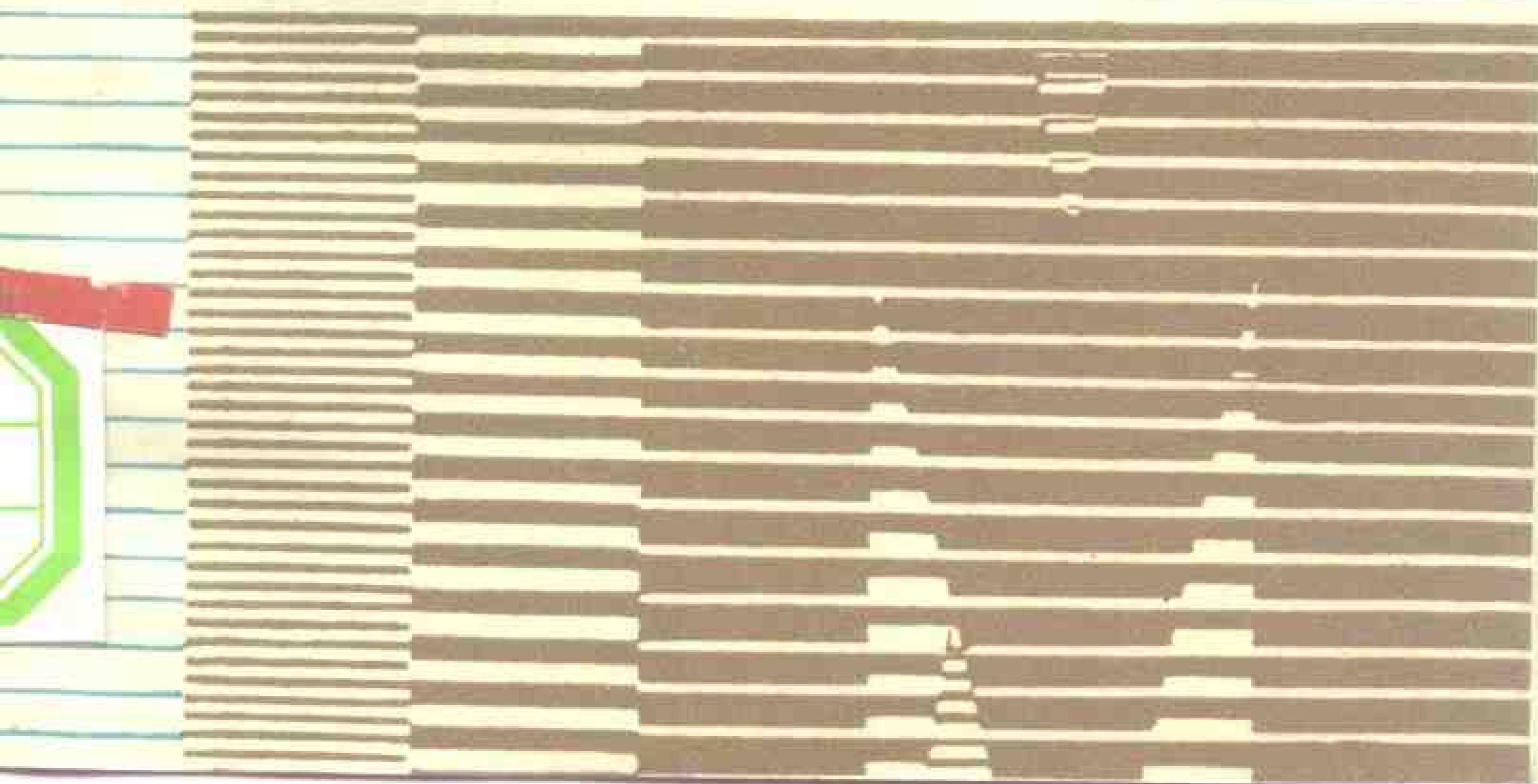
MAKESI ZHU YI ZHE XUE SHI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北京出版社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本卷主编　林　利　张念丰　余源培

第五卷



内 容 提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5卷，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论了1917年至1953年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发展。其中包括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哲学思考，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功过是非，布哈林、德波林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运用和争论。本卷对若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努力从翔实的材料出发，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回答。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五卷）
MAKESIZHUYI ZHEXUESHI (DIWUJUAN)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本卷主编　林　利　张念丰　余源培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480000字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200-02666-2
B·46　定价：22.00元（平）


国防大学 2 062 3077 3

编者的话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转变为实践，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生产力比较落后、封建包袱比较沉重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的，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不得不摸索前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寻求一条适应苏联国内外条件的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斯大林逝世的三十多年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应该说是有相当成就的，否则无法解释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无法解释苏联在二次大战前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工业大国的事实，然而也不可否认这条道路是非常曲折和坎坷的。列宁在世时走过的道路是如此，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所走的道路更是充满了挫折、失误和严重的错误。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发展反映为理论上的曲折发展，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折发展，本卷的任务就是全面地再现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社会主义实践相互作用下的发展历程，并对列宁以及斯大林、布哈林、德波林和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作出一定的评论，借以汲取这一阶段中的哲学上的经验和教训。

本卷初稿曾邀请有关专家评审，他们就结构、内容，特别是有关人物、著作、思想的评价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修改稿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对本卷提出书面意见的专家有：郭国勋、张维久、徐荣庆、李凯林、卢之超、姜长斌、易杰雄、王东、贾泽林。在这里我们再次向上述专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卷各章的作者是：第一章，林利、余源培；第二章，余源

E630/12

培；第三章，雷永生；第四章，刘艳慧、余源培；第五章，张念丰；第六章，郑新桐；第七章，唐源昌、夏剑豸。王育民曾参加本卷写作大纲的拟定。陈长根为本卷第一、二、三、四章的撰写作了大量资料搜集和翻译的工作。本卷在作者反复修改的基础上由林利、张念丰、余源培统稿和定稿，最后由黄楠森、庄福龄、林利审定。

由于作者水平的限制，加之理论界对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意见分歧较大，本卷难免有若干偏颇或失误，希望理论界和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本卷主编

1994 年 11 月

总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一门其他科学一样，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的萌芽、产生、形成、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人物、著作和思想摆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其含义、意义、是非得失和历史地位。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我国哲学界十多年来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编写就是这些活动中的一个项目。

本书的编写是1983年作为我国六五计划中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科研重点项目之一确定下来的，1986年又列入七五计划。全书编写人员55人，全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哲学工作者，都努力把编写过程同教学过程，科研过程密切结合起来。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规律，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科学性和战斗性统一，逻辑和历史统一，观点和材料统一，使本书对我国四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占有翔实而丰富的历史资料，一切论断均有充分材料作根据，同时，经过鉴别，充分吸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使本书能达到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对每一本重要的哲学著作和每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都做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价，恰当地估计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

从而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反对形而上学的非历史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

四、以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但也给予他们的战友、学生和专业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应有的地位和足够的篇幅，特别是对当代哲学家的思想应给以充分的重视。

五、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为主，但对其他部分如自然辩证法、军事辩证法、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哲学史思想等也视各个哲学家思想的不同情况给予适当的介绍和评价。

本书共八卷，八卷的顺序与时间的顺序不完全一致，这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特色。八卷内容可以分为四部分：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一、二、三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战友和学生的思想），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第四、五卷），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第六、七卷），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国外的研究和发展（第八卷）。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40周年，决定1989年先出版第六、七卷，其他各卷按顺序随后陆续出版。此外，还将出版与正文配套的资料八卷。

目　录

第一章　十月革命后社会历史概况和哲学发展线索（1917—1953 年）……………………（1）

第一节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1）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1）

二、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的胜利 ……………（4）

三、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道路是永存的 ………………………（8）

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12）

一、社会历史状况及其对哲学提出的要求 ……………………（12）

二、新时期哲学发展的分期和基本特征 ………………………（19）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27）

一、研究的现实意义 ……………………………………………（27）

二、研究的方法论 ………………………………………………（30）

简短的结论…………………………………………………………（33）

第二章　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1917 年 11 月—1920 年 12 月） ……（34）

第一节　列宁总结历史新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34）

一、列宁从实际出发对过渡时期学说的发展 …………………（35）

二、列宁对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科学分析 …………………（38）

三、批判考茨基，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46）

四、指出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开拓社会主义运动辩证法研究的新篇章 ………………………………………………（53）

第二节　列宁从哲学高度对“左倾”错误的批判………（60）

一、围绕布列斯特和约争论中列宁阐述的哲学思想 …………（60）

二、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 ……………………………………………… (63)
三、提出两种制度和平相处的思想 ………………………… (72)
四、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 (75)
第三节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88)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评价 ……………… (88)
二、列宁对“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哲学批判 ………………………… (98)
三、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 (110)
第四节 由战争向和平转折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120)
一、实现转折的客观依据 ……………………………… (121)
二、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 ……………………………… (125)
三、工会问题的争议中列宁的哲学思想 ………………… (144)
简短的结论…………………………………………………… (160)
第三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1921—1922年底） ………………………… (161)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思想轨迹……………… (161)
一、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 (162)
二、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轨迹 ……………………………… (169)
第二节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 (173)
一、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 ………… (173)
二、过渡时期所有制的复杂结构 ………………………… (175)
三、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 (178)
四、小农经济及其改造问题 ……………………………… (183)
第三节 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商品、市场的关系…………………………………………… (185)
一、从《哥达纲领批判》到“战时共产主义” ………………… (186)
二、伟大的转折：列宁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联系 ……… (190)

三、列宁论社会主义计划与商品、市场的辩证关系 …………（197）
第四节　列宁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200）
一、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努力争取自身生存的条件 …………（200）
二、要善于将苏维埃政权和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结合起来 …（205）
三、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 ………（209）
第五节　列宁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辩证法…………（211）
一、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 ……（211）
二、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创造性 …………（214）
三、前进与后退、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辩证法 ………（220）
简短的结论…………（227）
第四章　列宁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1922—1924 年 1 月） …………（229）
第一节　列宁的哲学遗嘱：在经济转轨时期战斗唯物主义的迫切意义…………（229）
一、《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的历史背景 …………（230）
二、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共产党外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 …（235）
三、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237）
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科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 …………（240）
五、注意概括当代科学成就和新的历史经验，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研究 …………（247）
六、重视新道德的建设，培养、造就一代新人…………（249）
第二节　列宁病中口授文章和书信中的哲学思想………（253）
一、对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反思 …………（254）
二、反思的主题和指导思想 …………（260）
第三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266）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构想的思想轨迹 …………（266）
二、列宁新构想的基本特征 …………（269）
三、经济建设的构想 …………（273）

四、文化建设的构想 …………………………………………………… (276)
五、政治建设的构想 …………………………………………………… (279)
六、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 (285)
简短的结论 ……………………………………………………………… (285)
第五章 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战线的论争(1924—1936年) ……………………… (288)
第一节 苏联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概况 ……………………………… (288)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普及 ………………………… (289)
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 …………………………………………… (291)
三、对黑格尔、斯宾诺莎等哲学思想的研究 ………………………… (298)
四、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问题 …………………… (300)
第二节 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 (302)
一、围绕列宁主义的定义、思想来源、基本原则的争论 …………… (302)
二、围绕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的争论 …………………………… (307)
第三节 布哈林哲学思想及对其平衡论的批判 ……………………… (316)
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 (317)
二、苏联哲学界对布哈林平衡论的批判 ……………………………… (326)
三、关于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几个理论观点的批判 …………………… (330)
第四节 苏联20年代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的论争 …………………… (337)
一、机械论者学派及其哲学观点 ……………………………………… (337)
二、辩证论者和机械论者的争论 ……………………………………… (341)
三、批判机械论者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 (350)
第五节 30年代米丁、尤金等与德波林学派的论争 ………………………………………… (354)
一、德波林及其哲学思想 ……………………………………………… (355)
二、米丁、尤金等与德波林学派的论战 ……………………………… (362)
三、30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的积极意义及消极后果 ………………… (372)
简短的结论 ……………………………………………………………… (378)
第六章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

苏联哲学（1936—1945 年） ………………………… (380)
第一节　联共（布）中央对哲学研究的不适当干预…… (381)
一、批判德波林学派一再升级 ………………………… (381)
二、下令改写《哲学史》第 3 卷 ……………………… (385)
第二节　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389)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撰写、
发表和反映 ……………………………………… (390)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历史地位……… (395)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问世前后的
苏联哲学 ………………………………………… (415)
第三节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哲学问题……………… (423)
一、关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学说在新时期的
方法论意义 ……………………………………… (424)
二、关于苏联社会发展动力 ………………………… (438)
三、关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总思路 ……………… (448)
四、从思想理论上反对法西斯主义 ………………… (458)
简短的结论……………………………………………… (468)
第七章　战后时期的苏联哲学……………………… (469)
第一节　1945—1953 年苏联哲学发展概况 ………… (469)
第二节　1947 年苏联哲学讨论会 …………………… (473)
一、哲学讨论会的概况 ……………………………… (473)
二、关于哲学史的对象 ……………………………… (478)
三、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 …………………………… (482)
四、关于批判与继承问题 …………………………… (486)
五、哲学讨论会的影响及其后果 …………………… (493)
第三节　1950 年语言学问题讨论和斯大林的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 (497)
一、关于语言学问题讨论的一般情况 ……………… (497)
二、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 …… (499)
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506)

四、关于质变的两种形式 …………………………………… (508)
第四节 1951年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512)
一、关于经济学问题讨论的一般情况 ………………………… (512)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 (516)
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 (524)
四、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 (528)
简短的结论……………………………………………………… (531)

第一章　十月革命后社会历史概况和哲学发展线索

（1917—1953年）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巡洋舰攻击冬宫的隆隆炮声，震撼了整个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被直接用于指导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和社会。这种地位的根本改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是列宁最为注意的事情，也是他作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领导苏联人民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留下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深刻的社会革命。人类历史上已往经历的革命，都是从一种剥削制度过渡到另

一种剥削制度。十月革命则完全不同，它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1]，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2]。

十月革命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它在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开拓了社会主义的基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共处和竞争的世界新格局。它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后方，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并改变了这些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使其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转变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伟大胜利，证实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正确，从而宣告了以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破产。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原先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绕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它在现时代最富生命力的意义在于：在人类现代史上第一次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途径。

现代化作为一个全面的社会发展过程，泛指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变革。它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鉴于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志士仁人曾努力向西方学习，企图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成功；一些西方学者更是把"现代化"等同于"欧化"和"西化"，企图把资本主义"文明"强加给全人类，旨在维护自身的全球霸权。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下同），第303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它基本上只适应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些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排它性”。它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世界市场，主要是通过海外殖民侵略和掠夺实现的；它注定不会允许所有大的民族和国家都同时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从19世纪末开始，自身也不断暴露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从自我肯定走向自我否定，逐渐失去其楷模的魅力。这就迫切需要开辟出一条现代化的新路。

列宁这样描写过俄国人民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在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1] 将马克思主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实际，以及俄国的国情相结合，列宁致力于探索和解决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如何走向文明、富强，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为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落后国家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质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2]。因为只有推翻旧制度的反动统治，才能解放生产力。这种革命的第一步是反对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则在条件成熟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强调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2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①] 列宁的这一思想揭示了现时代落后国家革命和建设的辩证关系,开辟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的胜利

对于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评价,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俄国工人阶级也远不能掌握政权,假若谁在无产阶级没有准备好以前过早地夺取政权,把"政权强加给它",只能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②]。考茨基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认为俄国经济落后,俄国硬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个注定要夭折的"早产儿"[③]。托洛茨基也鼓吹他的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宣称俄国革命只有在同西欧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把革命转移到整个欧洲去,否则,革命的俄国就休想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这场争论是世界性的争论,归结起来就是:十月革命是一种"错误"、一场"悲剧",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对问题的科学回答,必须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入手。这就必须依赖于唯物辩证法。

列宁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意义和地位。他给予唯物辩证法的评价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④]、"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⑤]。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②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2—466页。
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66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页。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难看出，列宁抛弃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坚持和创造性运用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法的大师。他们在探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规律时，从来就十分谨慎地防止过分夸大自己在西欧发现的历史进程的意义，要求根据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具体性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屡次明确地强调，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如果人们一定要把他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如果“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因此，他们既考察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又考察了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可以追溯到 50 年代起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一直到 70 年代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和古代社会史笔记及有关通信。

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曾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里发生，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美、法、德国同时发生。[2]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和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都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发生”的论据。这一结论曾经左右着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列宁在 1905 年革命时，也曾同样预计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要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起进行。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列宁依然没有摆脱“同时胜利”的传统公式。

列宁认识上的转变发生在 1915 年。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第一次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思想。他指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30 页。

2 参见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

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 一年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思想。并且明确地宣布："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②] 在这里，列宁规定了"一国胜利"理论的确切内容：既指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在一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胜利地夺取政权，又指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够保持住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尤其重视从哲学的高度进一步论证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他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反对教条主义，要求在革命时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十月革命是和帝国主义时代俄国的具体特点联系在一起的，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它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列宁把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加以比较，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各先进国家中开始，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垄断资产阶级可能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培养工人贵族，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从而使得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受到阻碍。而俄国的情况则不同，它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点，从而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在资产阶级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上，俄国资产阶级特别软弱和落后，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特别成熟，并且成功地在民主革命中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权，加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因此，"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比先进国家容易得多。"① 当然，列宁也不同意布哈林这样的极端看法，即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从最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制度开始的。"列宁纠正道："不对；是从'比较弱的'体系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什么也办不成的。"②

依据唯物辩证法，列宁论述了历史发展中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列宁严肃批判了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学究气"和对历史发展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③ 列宁的这一论述，肯定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一般规律，但这种一般规律不会处处以"纯粹的一般"表现出来；历史发展不是简单、机械、单纯的进化，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民族特点，可以使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出现某种跳越性的表现。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古代日尔曼人的蛮人部落在征服罗马之后，没有经过完整的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美国没有经过典型的

---

① 《列宁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版（下同），第 37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60 卷，第 317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90 页。

封建社会而进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没有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充分显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中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客观辩证法打破了第二国际"盲目模仿"西欧社会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过程简单地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为俄国及其它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道路是永存的

今天，由列宁缔造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苏联的解体，如同本世纪初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样，都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把十月革命当作犯有"原罪"而加以谴责，说什么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一种"唐·吉柯德式的行为"，因此必然导致苏联解体。西方资产阶级甚至拍手赞赏，认为这不是"悲剧"，而是一场"喜剧"。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苏联的解体，历史又一次证明，一种新制度的成长和成熟，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曲折反复的历程。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这种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前进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挫折和失败。列宁说过："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①] 正如同不能把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崩溃归咎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同样也不能从苏联的解体怀疑和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苏联的解体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根据。

十月革命所处的整个世界历史时代，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4页。

俄国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导致了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历史的辩证法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正确，并且从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课题。

十月革命以后，从世界范围来看，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等许多国家相继取得胜利，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十月革命同时也展开了俄国历史的新画卷：从粉碎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到取得苏德战争生死搏斗的胜利；20至30年代，苏联用了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一百年走过的路程，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任何人都无法否定这些历史事实。

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提出了历史的新课题：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它的实质是怎样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遵照"历史的启示"和"历史的辩证法"。但是，由此也继承了遗留下来的落后生产力，这是人们所不能自由选择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的矛盾：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列宁曾反复告诫说，俄国革命将是"开始容易，继续困难"，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回顾社会主义的历程，从乌托邦的荒原到科学的境界，从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近四百年。其间为了使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继之，为了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都曾有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验，出现过挫折和低潮，然后才最后得到解

---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

决。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苏联的解体不是根源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是根据于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解决的不完全成功。

当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列宁就明确提出了二位一体的任务：改造社会，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组织好经济建设，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他认为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高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2] 但是，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解决这个任务不仅尤为重要，而且特别艰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全靠执政党在实践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情势和本国国情作出科学的认识和判断。

列宁十月革命后对落后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过几种构想，目的是建立起一种生气勃勃的、充满生机和活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晚年他选择了新经济政策，不是废除商品贸易，而是实行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政策，把同农民建立正常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关键。列宁逝世之后，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探索的实践没有能很好地继续下去。到了30年代，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斯大林逐步建立起来的是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领导和国家统一计划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确曾带来了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有缺陷的。但是，随着世界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随着经济

---

1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发展规模扩大，经济结构复杂化，发展目标多元化，人民生活要求提高，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在的弊端便不断地显露出来，僵化的体制便束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阻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围绕着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任务，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过成功的时候，也充满曲折和坎坷。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2] 苏联的解体首先有其政治原因，执政党领导层的蜕变，导致"和平演变"。但历史的基因是经济，它长期没有把经济搞好，又没有正确地进行改革，它的体制是僵化的，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就写成了《法兰西内战》一书，深刻地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3] 现在，苏联虽然解体了，但同样可以坚信，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是永存的。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总结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4] 中国人民从来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十月革命的继

---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9 页。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8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677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383 页。

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创造性坚持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道路，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总结中国自身的经验，通过对变化了的世界情势的科学认识的产物。这个理论第一次初步系统地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一、社会历史状况及其对哲学提出的要求

在新的国际条件和俄国的特殊国情下，如何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的国家，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后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列宁以及其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研究，都是在探索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过程中发展的。

革命首先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胜利进军时期”[1]，布尔什维克党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从政治、经济上打击和粉碎反动阶级的反抗，建立和健全苏维埃国家机关。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在城市用“赤卫队”进攻资本，实现工业、银行、对外贸易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列宁有效地将政治改造和经济改造结合起来，从而克服了巴黎公社的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就是它在运用自己的武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时不够坚决；其二，就是无产阶级中途停顿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列宁在实践中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随着“夺取俄国”这一任务的初步完成，列宁提出应当及时地把注意力转向“管理俄国”，即从“用武力镇压剥削者的主要任

---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3页。

务过渡到管理这一主要任务"[1]。为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3月同德帝国主义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围绕着这个和约的签订，列宁同托洛茨基以及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斗争。这场斗争，从世界观上来说，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从政治上来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斗争。列宁在这场斗争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阐明了具体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列宁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拟定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环节的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和方针。

但是，列宁的经济建设计划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从1918年夏到1920年底，苏维埃政权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进行了三年多艰苦的革命战争。这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空前尖锐的时期。考茨基抛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也先后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势下，列宁十分自然地把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阶级斗争提到首位。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著作中，深刻地驳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等人的错误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极有价值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时期，苏维埃政府把全国的经济和政治纳入战时的轨道，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企图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消灭货币，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有其实际的原因，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政策不可能是一项发展生产力的政策。

---

1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6页。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随着第二国际的破产，1919年3月，列宁组织建立了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共产国际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同时，又面临刚露头的“左”倾思潮的危险。他们自称为“原则上的反对派”。希望走革命的道路，但却犯了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为了帮助各国共产党克服“左派幼稚病”，列宁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工作，并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1920年4、5月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篇文章中，列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详尽地剖析了“左派幼稚病”的症状、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途径，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加了新的内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20年底，由于苏维埃俄国胜利地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干涉，使得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暂时的、相对的均势。列宁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失时机地立即实现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从战争、军事战线转移到经济建设战线。1920年12月，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问题，并且讨论了实现全国电气化的宏伟规划。列宁把这个计划看作是“第二个党纲”，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是，转折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托洛茨基等人的干扰，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进行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列宁先后发表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重要著作。列宁明确指出，党和托洛茨基的分歧是在历史新时期如何对待群众、掌握群众和联系群众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一系列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的错误。列宁批评布哈林的折中主义，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列宁还批判了“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错误主张和派别活动，批判了他们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是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经验教训的产物，是更加深入认识俄国国情的产物。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由于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不够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采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不能用军事和“冲击”的办法，而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过渡办法”，采取“新的迂回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新的丰富和发展，它对小农占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议问题，成为列宁理论研究的中心，写下了《青年团的任务》、《论粮食税》、《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重要著作，从哲学理论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努力发展生产力，对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的辩证法，对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等问题，都作出了重要的阐述。

从 1922 年 12 月 23 日到 1923 年 1 月 4 日这一段时间内，列宁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几篇论文，以及《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信件。这些文章后来被人们称为列宁“遗嘱”。从广义上讲，这些论文和信件几乎涉及到列宁所关心的一切重大问题，提出了今后应当遵循的路线和政策。但其精神实质是一个中心，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不能保持住社会主义的航道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些著作中，列宁根据变化了的国际革命形势，总结十月革命以来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整体上规划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其中充满着深刻的哲理，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挥。

正当列宁循着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逝世。列宁逝世后，俄共（布）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本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作为执政党，必须提出如何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此，党内在由于极端贫困而在经济恢复时期发生的困难面前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是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

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是一个根本性质的争论。当时季诺维也夫断言："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1]。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认为在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会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和冲突，而"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2] 他们都认为，经济和技术落后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从1925年开始，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新的世界革命的高潮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难以盼望。在这种情势下，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斯大林从哲学上进行分析，认为苏联面临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3]。由此，斯大林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

① 见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② 《托洛茨基言论》（上），第17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1、101页。

胜利”作为两个问题加以区分，给予不同的回答，肯定了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可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终于建成。

怎样看待新经济政策，这是党内争论的又一问题。1924 年 5 月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就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新经济政策只是克服经济困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加米涅夫也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单纯的让步和退却，是一种必须随时加以警惕和遏制的临时政策。联共十四大否决了这种关于新经济政策仅仅意味着退却的观点，并开始了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进攻，即挤垮资本主义。接着在十五大上，便直接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认为弱小的、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不能保障工业化。

从 1928 年下半年起，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将其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向资本主义进攻，大规模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政策。当时经济形势紧张，粮食收购减少，出现财政赤字。斯大林把困难归咎于有政治阴谋的富农，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布哈林则认为危机首先由于主观原因引起：没有及时储备日用工业品，没有发挥税收作用，不能平衡农村货币的增长量。他坚决维护新经济政策，谴责过火行为，并主张把市场正常化提到首位，把集体化放在第二位考虑。于是，由于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具体政策上，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展开了争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在许多方面是比较符合俄国国情的，具有合理性。他强调由于俄国大量存在着小农经济，科学技术落后，因此，俄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起来的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由此，布哈林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特点将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要集中注意力解决农民问题，吸引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布哈

林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实施，有赖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国内的稳定环境。然而当时苏联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这样，建设速度就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斯大林与布哈林相反，他特别强调建设速度，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如果放慢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就意味着灭亡。争论以斯大林方案的胜利而告终。布哈林和斯大林争论的性质，总的来说是属于怎样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斯大林把它看成敌我矛盾，则是完全错误的。

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用行政命令或变相暴力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重工业的飞跃发展形成一个管理经济的行政命令的完整的集中体制，代价是轻工业的停滞。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宣布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已经取得完全胜利，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的剥削阶级消灭了，剩下的是新的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宪法，这就意味着把业已形成的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以立法手续固定下来。接着，斯大林发表了伴随社会主义的发展前进阶级斗争愈益激烈的言论。这违反了宪法草案中关于阶级结构的论述，导致国内肃反的严重扩大化。1938年9月，斯大林又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思想上将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固定下来。他把历史上生产关系的类型归结为"基本上适合"、"不可调合的矛盾"和"完全适合"三种类型，作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的片面结论，导致了思想上的僵化和实际工作中的被动。

1941年到1945年的卫国战争，对人类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卫国战争后，苏联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了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斯。在历史新时期，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也出现了矛盾和变化。斯大林感觉到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完全依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苏联社会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如不正视矛盾，不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就有可能阻碍苏联社会的前进。1950 年 5 月，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特点，承认苏联社会存在矛盾，并发挥了唯物辩证法飞跃形式多样性的原理。1952 年，斯大林又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著作，批评了那种混淆社会主义政府法令、法律与客观规律的错误观点，严肃地指出，不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就是否认科学，否认科学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就会走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使我们陷身在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在这两部著作中，斯大林对过去涉及不多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作了探讨。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也有矛盾，但二者“完全适合”的字样却没有完全放弃。他在批评马尔错误观点的同时，却又错误地认定旧上层建筑随着旧经济基础的消灭而立即消失。但应当说，斯大林晚年得出以上的认识，是对自身实践经验的一种初步总结和反思。但是，斯大林晚年的这种新的探索，伴随的却是越来越严重的个人迷信，因而在实践中继续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不可能提出对僵化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新时期哲学发展的分期和基本特征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传播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分期。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这种分期既应当考虑到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又应当考虑到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位重要人物相互区别的活动和理论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从革命实践的阶段性考察，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 1936 年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这是一

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从俄国的国情出发，探索落后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即从1936年到1953年，这是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主要任务是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规律和道路。但是，应当看到这两个阶段又是相互联接的，列宁的有关思想和理论不仅对俄国过渡时期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一方面主观上想坚持列宁主义，另一方面他对列宁主义实质的理解带有片面性；斯大林的思想和理论虽然是对列宁主义的直接继承，二者却是有区别的，斯大林对列宁主义虽坚持了某些正确的东西，也加进了错误的成分。

充分考虑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传播和发展的复杂性，为了既反映出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转折，又体现出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要求，本卷将1917年至1953年苏联的哲学发展分成以下六个时期进行阐述：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即从1917年11月至1920年12月；新经济政策实行初期列宁的哲学思想，即从1921年初至1922年1月；列宁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即从1922年至1924年1月；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哲学及其论争，即从1924年至193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苏联哲学，即从1936年至1945年；战后时期的苏联哲学，即从1945年至1953年。

这个时期苏联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第一，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18年5月，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科学院的决议草案中就确定了建立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任务。这个中心逐渐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级科学研究所，并把一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波克罗夫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克鲁普斯卡娅、雷斯涅尔、斯切克洛夫等）集中在自己

的周围。1920 年 12 月 8 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定，在列宁的指示下开始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遗稿和专用藏书。1921 年 1 月，遵照列宁的倡议，又把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梁赞诺夫任院长。研究院的出版刊物《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汇编》和《马克思年谱》，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哲学著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曾问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自然辩证法》的原稿，落到了伯恩施坦手里。苏维埃政府不惜用重金购得原稿，并第一次向世人公开发表。梁赞诺夫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发表所写的序言，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及《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部分所写的序言，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卷上、下分册所写的序言，都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实际材料，作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尽管远非所有的评价都是正确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最初由伊・伊・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主编，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奥里明斯基、沃罗夫斯基等人参加编辑的全集，原定 28 卷。从 1918 年至 1922 年出版了第三、四、五、六卷，没能出齐。1923 年开始出新的全集，到 1924 年出版了第一、二、十、十一卷。这几卷所刊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以俄文出现的。由于发现了许多新材料，这个版本没有能继续下去。1924 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尽快用俄文和其他文字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部全集于 1928 年开始用俄文出版，包括二十九卷，共三十六册。该版本于 1948 年出齐。从 1927 年开始，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国际版（MEGA 版），预定出四十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当时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杂志，如《无产阶级革命》（创刊于 1921 年）、《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创刊于 1922

年)、《共产主义者手册》(创刊于1921年)、《社会主义学院通报》(创刊于1922年)、《红色文库》(创刊于1922年)等。1918年广泛开展了马克思诞生一百周年和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1933年开展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形成史和发展史的研究,不断推向新的水平。梅林、拉法格等人的有关回忆录和著作也得到出版,并且陆续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先驱者(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著作和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

学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十分注意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和传播问题结合起来。1920年至1922年结合马克思晚年同俄国民粹派的通信,探讨了俄国村社问题。1929年至1931年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推进了对恩格斯晚年哲学思想的研究。

早在1921年,列宁的主要著作就以单行本的形式相当大量地出版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建立列宁研究院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有机的继承性。1920年至1926年出版了《列宁全集》的第一版,共二十卷(二十六册)。以后又由列宁研究院相继编辑出版新的版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俄文第四版。此外,遵照列宁要求哲学教授们要通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阐述,并善于将这种知识传授给学员的指示,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选集,从1923年至1927年,出版了二十四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

第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

列宁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

抗。"[1]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俄国官方"教授"依旧在哲学领域积极活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弗·谢·索洛维约夫的神秘宗教学派；尼·亚·别尔嘉也夫、列·米·洛帕廷的直觉主义；彼·罗夫哥罗德采夫的新康德主义；格·施佩特、伊林的新黑格尔主义，此外还有东正教学派和实证主义、人格主义等哲学。他们在彼得格勒主持了"彼得堡哲学协会"和"自由哲学协会"，在莫斯科成立了"自由宗教哲学学院"和"科学活动家联盟"等组织，进行唯心主义宣传和具有强烈政治目的的宗教活动。他们还出版了哲学年鉴《思想和语言》和《思想》杂志，将批判矛头指向"俄国的共产主义"及其哲学基础。在1921年以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一步抬头，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尤·弗·克柳尼科夫等人在布拉格出版了《路标转换》文集，以后又在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杂志，露骨地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和宗教神秘主义，指望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党内的波格丹诺夫继续坚持马赫主义的哲学观点，出版了《组织形态学》、《新鲜经验的哲学》等著作，鼓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列宁1922年3月发表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明确规定了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纲领，提出共产党员哲学家和非共产党员哲学工作者应当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哲学工作者应该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批判唯心主义，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推进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在列宁的倡导和组织下，集中了一批有丰富革命经验的理论工作者，如被列宁高度评价为"科学问题、一般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的义务顾问（和领导者）"的米·波克罗夫斯基，被看作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以及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涅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9页。

夫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阿多拉茨基、梁赞诺夫等人；争取了一批革命前未曾站在布尔什维克立场，但对哲学颇有素养的学者，如柳·阿克雪里罗德、阿·德波林、波·哥列夫、阿·马尔廷诺夫、谢·谢姆柯夫斯基等人；并且还培养了一批新的年青学者，如Г·亚历山大罗夫、Н·查斯捷凯尔、Л·伊利切夫、Ф·康斯坦丁诺夫、М·米丁、П·尤金等。

针对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思想家企图利用苏维埃文化教育机关宣传唯心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情况，列宁带头并组织一批理论工作者到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列宁作出了“关于普通科目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内容，只能由共产党员来确定”[①]的指示。1921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其《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定中，要求“党应当千方百计地扩大和深入展开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要求十分重视以马克思精神来研究教育和教学法问题，并明确提出“在最近期间，党应当特别严重地注意社会生活中那些最容易成为受反苏维埃党派影响的场所和组织”，例如高等学院、中小学校、工会（特别是非产业工人工会）、文化教育组织、出版社等等，党应当掌握这些“制高点”。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要努力发展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以便能够有组织地实行‘战斗的唯物主义’和全部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路线。为此，组织了有关教材和专著的编写。从2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成为苏联各高等院校的专门课程和研究对象。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图以简洁的语言通俗而又比较系统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支持下，马克思主义

---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26页。

哲学研究理论队伍得到空前的扩大，并取得一批可喜的成果；30年代起逐渐发展起来的教条主义和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苏维埃政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政权上的保证和支持。经过不长时期的培育，30年代的苏联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成果。在哲学理论原理研究方面有西洛科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些著作对中国哲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遵循列宁关于要研究《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的指示，苏联学者写出了一批研究论文和著作；A·列昂节夫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角度对《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БЭ·贝霍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及其伪造者》一书中，首次正确地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部分数学手稿的发表，直接推动了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奇、M·A·利弗希茨和ф·П·希列尔等人还对马克思的美学观点作了极有意义的探讨。德波林出版了《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伊里奇的辩证法》、《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等专著；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等专著。尽管这些研究成果中的观点不都是正确的，但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同时产生并逐渐蔓延。这在1924年秋关于“托洛斯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论争中，已初露端倪，随着斯大林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之风同行。在1924年至1936年发生了几次苏联哲学大论争（对布哈林理论观点的批判、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的论争、德波林学派与米丁·尤金等的论争），斯大林对德波林学派的谴责，开始了以行政的手段从政治上对学术问题加以直接的干预，把学术理论问题等同于阶级斗争中的政治问题，对学术的民主讨论起了窒息的作用。特别是1938年11月，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

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更是严重。《教程》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被当作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顶峰”。从此，在苏联逐渐形成带有浓烈教条气息的斯大林哲学模式。刊载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刊物，如《马克思主义年鉴》、《马克思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纷纷停刊；专题学术著作和论文日趋缩减，而注释和赞颂斯大林哲学观点的作品却大大增加。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都起了消极的作用。

第四，从指导思想上看，执政党及其领袖在对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是不断解决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的认识矛盾的过程。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学说从理论进入历史实现的时代，从无产阶级的纲领转入实践领域，成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活生生的创造性事业。因此，列宁着重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①] 新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要求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列宁认为，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复杂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特别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他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不可能知道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不可能给国情迥然不同的各个国家提供详尽的、现成的一般公式。因此需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告诫全党不要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尽量少争论名词，多研究新的生活的事实；理论应当随着实践前进，不要面向过去，而要注重解决无产阶级不断面临的新的任务。十月革命后，列宁有过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曲折，有过错误的设想。但他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勇于实践，正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不固守书本，不拘于某种模式，不文过饰非，他总是冷静的思考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而果断地纠正错误，从而较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思考，为了辩证地解决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列宁特别强调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①]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教条，而要致力于解决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的联系。列宁在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第一次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②] 列宁在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各种右的思潮的同时，特别注意克服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的倾向。

斯大林主观上也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认为：“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③]但是，斯大林在强调列宁主义的国际普遍意义时，思维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没有正确反映出列宁主义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客观上导致把他所理解的列宁主义当作某种固定的模式，助长了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

一、研究的现实意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的历史新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页。

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最集中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实践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在全新的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给人类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和途径，那么，可以说，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则是把社会主义从科学变成了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变成人类整个历史运动的最重要的部分，深深地渗透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它不断地变成历史，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自人类有史以来，还未曾有一种哲学有如此之高的实践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还未曾有一个时期如此深入地活跃在现实的历史之中，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设新社会的广阔舞台上实现自己和扩展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着建设新世界和人的全面解放的神圣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落脚点，“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①。评价、考察和研究十月革命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应当把握住主流，诉诸于社会实践。苏联和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根据这些基本理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 70 多年的实践中，已初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为保障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创造了基本条件。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时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 6.9%，到 80 年代，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 80%以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支持和促进了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所有这些成绩，是在相对于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673 页。

主义的三四百年历史来说只是短暂的时间里取得的，是在革命前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处在经济实力上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取得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初期尚有缺陷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的。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命运，我们不能离开上述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生命力是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展示密切统一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兴起，以及它在一些国家所遭到的挫折，使人们增强了对十月革命后苏联这一段历史的兴趣。这是历史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的今天是从她的昨天发展而来的。突破旧的模式的束缚，探索和选择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改革的直接起因。这种旧的模式主要形成于斯大林时期，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时苏联之所以采取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主观的原因，但也同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侵略的危险日益增长的国际环境有关。事实上，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因此，感情用事地对这段历史进行全盘否定，甚至以此丑化社会主义，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某些人极力散布：改革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中国失败了；改革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实现资本主义。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活生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事业成长了，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颠覆，才使得旧模式的弊端逐渐从潜在状态越来越清楚的暴露出来，才带来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导致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成为现时代的主题，从而越来越显示出改革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的历史，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今天，为了顺利完成历史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任务，认真学

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后这段社会主义成长史，其意义是：第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学习列宁能够按照俄国的实际情况，根据实践来制定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道路和步骤的开拓精神。在开创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大胆地突破理论上的框框，提出一系列新的设想、理论和课题。第二，这一段历史对于社会主义改革具有发生学上的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七年，提出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构想，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比较集中地反映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构想，从中可以找出各种矛盾、各种发展路线的萌芽。后来，主要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30到50年代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客观、科学地分析这种体制形成的原因，揭示出它的基本特征和历史演变，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具有借鉴的意义。第三，这个时期在苏联发生的诸种政治和理论争论，原则上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革少走弯路，有利于我们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两个根本问题。

二、研究的方法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哲学著作不多，因而对十月革命后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兴趣不浓，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应该怎样看呢？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了《国家与革命》，当时他已经拟定了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大纲。但是，除了题目以外，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他。列宁说：“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

'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①] 列宁确实是重视实践，十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复杂的斗争、艰巨的任务，也确实"妨碍"了列宁研究哲学。但是，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人民"做出革命经验"，变理论为实践的时候，真正做到了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把具体方针、政策中的原则性争论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并十分注重总结新鲜经验来丰富和发展理论。列宁这个时期的著作虽然大量都是阐明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但无不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当然，由于列宁逝世过早，许多新鲜经验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升华为哲学理论。这方面的工作有待人们去进行。至于斯大林，尽管他有错误，有些甚至是原则性的错误，他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不是轻易就能抹煞的，恰恰相反，需要的是认真地研究。

充分肯定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传播和发展，决不意味着要求将这一时期列宁的理论和实践看作是完全成熟的、定型的、直线发展的。列宁曾经形象而确切地把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比喻为"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②]。既然如此，失误、挫折、为了达到目的地而后退或改变途径，就几乎难以避免。列宁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就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提出了"间接过渡"的设想，并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间接过渡的主要途径；十四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时期，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的是"直接过渡"的做法；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7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94、595页。

1921年春，列宁对"直接过渡"作出冷静反思，重新制定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间接过渡"的建设蓝图。对于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能将其简单化，不能对每个阶段的实践或理论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也就是要进行历史地考察，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对于斯大林，也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才能全面的、客观的、科学的作出分析，并从错误中得出正确的经验教训来。

总之，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受物质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从许多方面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许多问题与我国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关系极为密切。但是，应当指出，这段时期的研究确实也存在特殊的困难：第一，十月革命后苏联形势变化比较复杂，列宁及其后继者的思想也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变化，放弃一些思想，提出一些思想，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要从这种变化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把握住思想的基本脉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二，这段时期，列宁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服务于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其思想是具有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方面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地域的局限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列宁主义的普遍意义，它是帝国主义时代实践着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和摆正这个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避免走极端，需要人们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第三，列宁逝世过早，许多问题在他那里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继承列宁思想的同时，确实也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不少片面、错误的东西，并形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如何科学分析列宁思想和斯大林思想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的分歧还是

比较大的。这些问题都应该研究清楚，相信通过深入的研究，也一定能逐步得出科学的认识来。

简短的结论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辟了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途径。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的胜利，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苏联的解体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根据，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道路是永存的。十月革命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成为无产阶级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实践中得到空前的发展。列宁围绕着落后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斯大林对列宁哲学思想加进了自己的东西，其中有不少错误的成分。30 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教条主义和学术领域中的政治批判运动，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及国际上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挫折，要求人们深化对这一阶段苏联哲学思想的研究，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种研究应当遵循历史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戒形而上学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第二章　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1917 年 11 月—1920 年 12 月）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八年里，列宁在实践中对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探索和研究过渡时期问题。明确地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并且努力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揭示这种过渡时期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许多新哲学概括。这些理论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在曲折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充满着试验性和创造性。

第一节　列宁总结历史新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

过渡时期的理论首先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列宁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创立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列宁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这里相互统一的核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过渡时期理论有一个形成过程，本书前三卷有详细介绍。

一、列宁从实际出发对过渡时期学说的发展

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理论上直接渊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上来自对帝国主义时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新社会初步建设经验的总结。要想懂得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必须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演变。

早在 1899 年，列宁就明确宣布："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表明了"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①]。从这时起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列宁面临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个时期在列宁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主要是用来表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后的未来的新社会，即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这个术语的涵义，在当时更多地常常并不仅限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即在整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涵义上使用。这时列宁并没有对共产主义形态的两个阶段作出严格的区分。相反，在社会主义的含义被第二国际严重歪曲的情况下，在论述未来社会时，列宁有时更喜欢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特点所致。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十分相像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迫近，列宁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1915 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第一次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国家，甚至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且不一定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列宁很注意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明确加以区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国家，而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将意味着一切国家的彻底消亡。1917 年，列宁更加关注对国家与

---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02 页。

革命问题的研究，也更加重视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8月至9月，列宁写成《国家与革命》，基本上保留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把它的高级阶段称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他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性，及其本质和任务。列宁认为，这种国家存在的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时期。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列宁就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考察、研究和把握本国的特点和国情上。1918年1月，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同志们，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隔着一个长久的、比较困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是大私有制还是小私有制，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不言而喻，在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点。"② 3月，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已经明确地提出："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③。10月，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列宁再次强调，对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及其发展的特殊道路"④。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列宁深化了马克思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3、25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2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2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642页。

的过渡时期的学说，具体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理论。过渡时期特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即指从资本主义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改变和阶级基本消灭以前的一段历史时期。

列宁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论，其理论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其现实依据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这类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列宁揭示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又考察了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就俄国国情而言，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相对落后，这些特点使得本来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加艰巨，“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但对欧洲来说未必是必须的”①。列宁多次把落后的俄国和先进的欧洲加以比较，认为“在欧洲发动革命是无比困难的，而在我国却十分容易，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在我国却比在欧洲要困难得多。”② 在谈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要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期就愈长。”③ 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建立在如下这样一条历史规律上：“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④ 除此之外，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还同一国革命胜利后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一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但是对待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的态度相当慎重。他说：“在彻底摧毁资本主义

---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8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3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4页。

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真正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是否能轻易地或迟或速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①] 这里说明，列宁是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这也是列宁提出过渡时期新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如若把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加以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实践尚未提上现实日程的历史背景下，肯定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列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在帝国主义时代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也有一个过渡时期。它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特别是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更是这样。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过渡时期理论是一致的，都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这一任务，都十分强调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都是用彻底的发展论和唯物史观考察未来社会发展。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他使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在历史新时期更加现实化和具体化，更加突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揭示了现时代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辩证法，成为俄共（布）制定十月革命后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成为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轴，并且对于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列宁对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科学分析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步实践中，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对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科学分析，阐述了有关过渡时期学说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79页。

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 规定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

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主要是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列宁把这个时期看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十分重视用历史主义的原则，考察这一时期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它的发展趋势怎样，从而确定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任务。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指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1] 这就明确了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它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始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结束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它是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革命转变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完成时期。这种过渡状态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革命，是新的生产方式、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逐步形成，并战胜旧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过程，其间充满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过渡时期的这种"飞跃"，"是指全世界历史的转变关头，并且这种飞跃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2]。列宁用"社会主义的胜利"来表示过渡时期的大体结束。这种胜利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综合结果，不仅仅指经济，而且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这种胜利主要是指国内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即使得被推翻的剥削者"任何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尝试都不能得逞"[3]。这种"社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8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3页。

会主义的胜利”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列宁多次指出，从防止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外部力量和武装入侵复辟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当作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指的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改造和粉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一切反抗，而且包含着努力发展生产力这一内在的要求。因为列宁认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 因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同一定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把苏维埃俄国同毗邻着的帝国主义德国相比较，认为这两个国家如同“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③]，分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两个方面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德国的生产力发展，具备了经济、生产、科学文化条件；另一方面是俄国，具备了政治条件，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只有把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完整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标志着过渡时期的开始。列宁的整个实践和理论活动都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苏联直到 1936 年才告结束。因此，列宁在 1918 年，而后又在 1921 年都重复指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④]

（二）从经济分析入手，提出过渡时期经济改造的任务

根据唯物史观，在任何社会中正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3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6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08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04 页。

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 而在经济关系中生产关系的变革又是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叫做“最深的秘密”，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列宁对过渡时期的分析，首先也是从这一问题入手的。

对于过渡时期的经济，列宁 1918 年 5 月就指出：“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接着他就对俄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指出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 第二年，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又把这些经济成分进一步概括为三种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与这些经济形式相适应的“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3]。基于这种分析，过渡时期在经济领域中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小农经济，建立对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过渡时期的经济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特殊性，也即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区别。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40—541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85 页。

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①]。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和发展。第二，“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消极的或破坏的工作。而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则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或资产者来完成的。”“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要进行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②]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原则区别，决定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过渡时期的经济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是从“剥夺剥夺者”开始的。采取什么方式剥夺剥夺者呢？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如果通过赎买的方法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移到自己手里，那将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③]。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采取的措施是比较谨慎的。1917 年 11 月 14 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工人监督条例》，列宁把工人监督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列宁曾经设想对“文明”资本家实行赎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他认为“应该做到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54—455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94—49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15 页。

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① 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在国际资本的支持下不愿意接受赎买，他们怠工，搞破坏，拿起枪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办法，只能采用暴力剥夺的方法强行没收资本，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基础。

对农业逐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经济改造的又一重要方面，是解决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大课题。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农村，仍然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列宁在指出对农业之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时，特别强调，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采取剥夺的方法，因为广大的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对农业的这种社会主义改造也不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而必须采取一系列的过渡办法。列宁坚决反对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对待农民，主张必须遵循自觉自愿、典型示范和国家资助的原则。他说："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要想用某种快速的办法，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那是完全荒谬的。我们十分清楚，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谨慎的逐步的办法，只能靠成功的实际例子来证明，因为农民非常实际，固守老一套的经营方法，要使他们进行某种重大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② 因此，直到1920年底，列宁还认为由于经济条件十分落后，"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仍然"必须依靠个体农民"③。1923年列宁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肯定，合作社这种既照顾到小农的个人利益，而又灵活的形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9—5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60—361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77页。

式，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但是，要实行合作社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业水平，因此“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1]

（三）提出阶级定义，解剖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

“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2]。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由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基本的经济成分是三种：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与这些经济成分相适应的，过渡时期存在着三种基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3]。基本的两个阶级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之间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贯穿整个过渡时期。列宁总结俄国的经验，深刻地指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就消灭的。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剥削者“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4]。他们必然要利用这些“优势”，为恢复他们被夺走的“天堂”而斗争。其次，“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5] 资产阶级是一种国际性的力量，只要国际帝国主义还存在着，在一国中失去政权的剥削者总是可以指望从国际资本中获得广泛有力的支持，包括武装干涉，也包括企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瓦解苏维埃政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9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54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权”的阴谋。再者，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的存在，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基础。在工人阶级内部、党和国家机关职员中间，会有一些人在资产阶级的腐蚀面前动摇，甚至蜕化变质。由于以上原因，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依然是尖锐、复杂的，剥削者依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

列宁十月革命后不止一次地使用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1] 这一公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消灭阶级的任务提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程上来。阶级的产生在历史上是自发的过程，而阶级的消灭却是人们按照客观历史规律自觉进行实践的结果。为了给消灭阶级这一历史任务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必须首先科学的回答：究竟什么是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指出必须从经济关系来确定阶级。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给“阶级”作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 列宁的阶级定义不仅把阶级划分的标准规定为经济地位，而且进一步把这种地位归结为四个方面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这就全面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本质。它从根本上粉碎了资产阶级主观社会学离开经济侈谈阶级的主张；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离开改变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达到消灭阶级的主观幻想；揭示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阶级对立的客观基础，对修正主义宣扬的阶级调合理论是一种

---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有力的批判。

列宁的阶级定义是如何消灭阶级的理论依据。他说："'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一目的的意义。"[①]列宁从对阶级关系的对立性质的分析出发，把通常所说的阶级，主要理解为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为了完成消灭阶级这一任务，首先必须推翻地主、资本家这些剥削阶级；继之要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斗争，也就是为消灭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有赖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的辩证过程。他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②]列宁在这里区分了消灭剥削阶级和完全消灭阶级这样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从经济上剥夺剥夺者，改变私有制生产关系，这是消灭阶级的首要前提；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最终消灭任何阶级的保证。

三、批判考茨基，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考茨基主义者的杂志——《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上，刊登了考茨基的一篇题为《是民主呢还是专政》的文章，借谈"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借谈"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号召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向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同年11月20日他在给库·艾斯奈尔的信中强调了这本小册子的原则上的重要性。考茨基写道："我打算在理论上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争论。我认为，今天这是公开考察布尔什维主义的唯一可能的形式。"[1] 列宁在9月20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写信说："考茨基的无耻谰言、胡说八道和庸俗不堪的机会主义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对于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不作任何斗争呢？"列宁请他"收集考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文章"，如果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一出版，"请务必寄来（专门寄给我）"[2]。这里所说的小册子，指的就是考茨基1918年8月抛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后，立即利用在哥尔克养病期间，着手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为了尽快地占领理论阵地，列宁在本书脱稿以前，以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0月11日《真理报》上。《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于11月10日写成，12月在莫斯科出版。这是继《国家与革命》之后，又一本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理论著作。同一时期列宁的有关文章还有：《论"民主"和专政》、《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论无产阶级专政》、《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论国家》等。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正文共八章。前三章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批判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第四、五、六章，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揭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规律，驳斥考茨基对苏维埃政权的诬蔑；第七、八章，阐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工农联盟等问题，论证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必然

---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NL60/65Bl，148。

② 《列宁全集》第48卷，第354、355页。

性。本书内容十分丰富，但贯穿全书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质。考茨基散布谣言和诡辩，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偶尔说过的“一个词”，而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这个词儿。[1] 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确凿事实，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而作出的科学结论。考茨基“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2] 这样，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盛行的时候，列宁明确恢复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质地位。这是一个历史功绩。《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发表不久，1918年12月，列宁又利用《国家与革命》的再版机会，增添了新的一节，即第二章第三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

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首先辩证地阐明了革命暴力问题。考茨基说什么“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3] 列宁揭露说，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状态，是

---

①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63年，第24、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0页。

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中译本，第25页。

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1]

针对考茨基的歪曲，列宁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2]专政是有阶级性的。专政的必要标志是暴力。没有暴力任何一种专政既不能成立，也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暴力手段，是针对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说的。当考茨基带着书呆子的博学精神和少女的天真态度问道：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对资产阶级专政？列宁回答说：“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了使反动派恐惧”，“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3]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列宁肯定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但是决不能简单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暴力等同起来。就在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同时，列宁在其它文章中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历史作用时，还有一系列的重要观点。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列宁写道：“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绝对必要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前的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4]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国家机器的管理经济、组织生产的职能。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单靠暴力和强制是不够的，唯有组织好生产，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保持得住。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列宁在肯定革命暴力的同时，又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9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638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852页。

纪律性。"[1] 鉴于俄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列宁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又是"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2]。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种联盟是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的根本保证。没有工农联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对农民需要进行教育和改造，但是决不允许采取任何强制手段剥夺农民，"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3] 那种把暴力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内容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列宁的思想。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阐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专政和民主的辩证关系问题，揭穿了考茨基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理论混乱和诡辩。

列宁批判考茨基用"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来抹煞民主和专政的阶级性。列宁说："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的论调，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4]列宁对考茨基颂扬备至的资产阶级民主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6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90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

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1] 资产阶级民主绝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全民的民主"和"纯粹的民主"。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会感受到事实上的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另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的限制和诡计。"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2] 资产阶级民主正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考茨基又说什么"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3]。攻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民主"，是"个人独裁"。他断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矛盾只是在于，布尔什维克拥护专政的方法，而孟什维克则拥护民主的方法。因些考茨基直截了当地建议，为了挽救俄国革命应当以"民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针对考茨基抽象地把民主和专政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谬论，列宁强调了民主的具体性，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他指出："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虚假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4]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5] 另一方面却保护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它是对剥削阶级的

---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62页。
③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出版社，第24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2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642页。

专政和对劳动群众的民主的辩证统一体。考茨基还抽象地谈论“一般多数”和“一般少数”，认为被剥削者的“多数”不应当对剥削者“少数”实行专政。列宁指出，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不是什么多数和少数，而是阶级对立的关系，二者不可能实行平等。

如果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是强调专政，忽视民主，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列宁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性。列宁批判考茨基的谬论，同时也痛斥那种认为“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主张“十分荒谬，十分胡涂”。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2]，这种理论和行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根据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列宁在1918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3]由于这种间接管理，列宁认为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国家内部产生官僚主义。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农民的、又是大伤了元气的国家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斗争”[4]。总之，

---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71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9页。

④ 《列宁全集》第50卷，第333页。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本质上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型民主，但它本身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的发展、完善过程。

考茨基主义是一股国际思潮。为此，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附录中，列宁又评论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刚出版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指出他同考茨基一样都坚持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为什么会堕落成无产阶级的叛徒呢？列宁指出："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一本立足于新实践，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著作。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揭露了"中派"考茨基的变节行为，从思想上武装了当时的左派，为第三国际的诞生创造了思想前提。

四、指出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开拓社会主义运动辩证法研究的新篇章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和核心。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对这一规律作出了详尽的阐述。十月革命后列宁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探讨人类历史新纪元所面临的新矛盾，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俄国的诸多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给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矛盾学说的内容。

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面临着哪些矛盾？这些矛盾又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呢？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即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1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体系的矛盾和斗争，本质上是敌对性质的，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于人类新时代。解决这种矛盾不能搞"强行推动"世界革命，更不可能一蹴即成；斗争的方式也不仅是战争，而且包括在经济领域内解决，这就要靠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在1921年曾说过："现在，我们是通过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发生我们的主要影响。……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1] 基于这种分析，列宁在理论上作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能而且必须和平共处的新结论。和平共处不是取消或熄灭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对于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的国内矛盾，列宁尤其进行了精心的研究。他一方面对右倾思潮进行斗争，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内仍然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表现为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和资产阶级（包括富农）之间的"谁战胜谁"的斗争，其特点是斗争着的对立势力、对立阶级本质是敌对性的，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互相抵触、不可调和的。另一方面，列宁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工农之间以及劳动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当1920年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被击溃之后，列宁更是重视研究社会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当时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日趋不满，并在一些地区逐渐演变为骚乱和暴动，工农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情况下，列宁有针对性地把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加以原则的区分。

1920年5月，布哈林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问世。那时正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达到顶点的时候。布哈林原想把它当作研究"从资本主义体系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过程"的两卷本中的第一卷，但第二卷后来并没有写成。布哈林在书中第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41—542页。

三章《资本主义的崩溃》中写道："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但是，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阶级对抗，则到处都在不断地进行。因而，资本主义结构是一元论的对抗或是对抗的一元论。"在这里布哈林明显地将矛盾和对抗相混淆。列宁针对这种理论上的错误，不是根据学理主义的演绎推演，而是根据对社会新鲜经验的哲学总结，出于对建设新社会的实际需要，写下了这样一段重要的批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把矛盾分析的方法运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立的社会，他们主要任务和贡献表现为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对抗性，从中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因此，理所当然的他们重视剥削阶级和被削阶级之间的对抗矛盾，强调"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②] 并且预示说，"只有在没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③] 列宁在历史新条件下，将矛盾和对抗加以区别，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加以区别，这既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又指明了作为矛盾类型之一的对抗在历史上具有的非永恒性，矛盾的普遍性决不意味着矛盾的类型和形式的唯一性。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性矛盾的消失将是一个过程。那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想法是天真的，那种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都等同于对抗性矛盾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就为研究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指明了方向，为研究社会主义运动辩证法开拓了理论的新篇章。

从理论上分清矛盾和对抗，这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

① 《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特殊的实践意义。在俄国农民占85%，如何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策，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国家的最高原则工农联盟问题。托洛茨基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内容之一就是将工农矛盾对抗化。他们把农民只看作私有者，看不到农民同时又是劳动者，并由此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完全趋向反动，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农民和工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产生对抗"。因此，托洛茨基主张用"剥夺"和"强制"的办法，使农民这一"落后的排尾向排头看齐"，即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另一些人区别于托洛茨基的主张，则认为农民只是劳动者，忽视农民私有者的一面，认为在过渡时期工人和农民之间没有矛盾，农民（甚至包括富农）能够完全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反对了这两种错误的主张，他对农民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是私有者这种矛盾的本性作了辩证分析，指出这些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溶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①] 列宁又将对抗和矛盾相区别，指出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原则上是对抗的，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原则上是非对抗性的，两个阶级基本的切身利益是一致的。解决工农矛盾的方法不是使矛盾达于极限，变成两极对抗、彼此激烈冲突，进而用暴力方法消灭其中的一方，而应当采取和平的、示范的、说服教育的、非暴力的方法。列宁的这些思想孕育着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这一学说后来为毛泽东同志所创立。

十月革命后，由于列宁区分了对抗和矛盾，并且重视对非对抗性矛盾的研究，这就涉及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不同性质矛盾中的作用问题。一般来说，对抗性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列宁一生都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阶级合作论"，强调矛盾斗争性在这类矛盾中的作用。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90页。

另一方面，就非对抗性矛盾来说，列宁重视同一性的作用，提出了“有意识地把对立的方面结合起来”的思想。1920年，列宁总结苏维埃建设的初步经验就曾指出：“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①

就工农关系来说，为了解决其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列宁一直在实践中重视寻求工农之间的结合点。为此，在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列宁及时地提出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② 这个结合点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指导下的市场和商品经济。当然毫无疑问，工农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斗争性也是始终起作用的。问题在于这种斗争性必须服从工农联盟的最高原则，这就应当十分重视同一性的作用，重视两者之间的结合和统一。这是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

在制定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列宁倡导去研究“如何进行结合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的实际经验”③。这一方面列宁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为了强调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的积极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善于“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板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7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12页。

来"[①]。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讲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时，列宁指出：新的劳动组织要求"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②]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③]为此，列宁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④]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期间，列宁还大胆地认为可能而且必须把"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⑤]列宁还批判了托洛茨基把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割裂开来的错误，指出不能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而在消费方面仍对工人实行平均制，强调"要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⑥]。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密切联系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列宁还考察了从旧质向新质过渡的性质和形式的多样化。针对社会改良主义者考茨基等人，列宁明确指出：实现由资产阶级国家向无产阶级国家的"过渡"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运用革命的暴力对付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抗。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运用暴力手段，通过"爆发"方式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2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
④ 《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⑤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1－212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页。

并不是旧质向新质过渡的唯一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是一项“日常的”、“长期的”、“艰巨的”、“循序渐进的”创造性工作。

社会主义建设是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前提的。在革命高潮时期，必须用“有力的词句”去鼓动，用“慷慨激昂的演讲”去动员，必须采取“义无反顾”的果断行动，为的是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去夺取胜利”。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沿袭这种方法。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的坚韧性，更不懂得革命转入建设，由于斗争内容的改变必须相应改变原有的形式和手段。他们盲目崇尚“爆发式飞跃”，企图继续用军事手段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切问题。他们自命不凡地说，“我们并不是那些歌颂‘机关’工作、实用主义和渐进精神的人。”列宁回答说：“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在革命者中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口号，甚至可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号。十分明显，当革命者的任务是摧毁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时候，他们应当以否定和嘲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口号”，但是，现在进入大规模的建设时期，“求实际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的主要的口号。”[①] 列宁认为，搞好经济管理，提高科学文化，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反对官僚主义，这些任务比夺取政权困难千百倍，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能急躁，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前进”，如果“谁对这一工作‘感觉乏味’，‘没有兴趣’，‘不能理解’，嗤之以鼻，或惊慌失措，或沉溺于大谈什么缺乏‘过去的兴奋’和‘过去的热情’等等，那最好是‘解除他的工作’，让他告退，使他不致造成危害，因为他不愿意或者不善于考虑当前斗争阶段的特点。”[②] 直到列宁逝世前，他在病中仍然反复叮嘱：在经济建设和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14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115 页。

等等一概不相信。"[1]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反对盲目跃进，反对喋喋不休的空谈，把对共产主义的赤胆忠心和科学的求实精神有机统一起来。

第二节 列宁从哲学高度对"左倾"错误的批判

十月革命后，随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在共产国际内出现的"左派"幼稚病已经构成现实的危害；而在当时的俄国，在小资产者阶层人口比无产阶级人口占有莫大优势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则成为一个很大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列宁十分重视对"左派"错误的批判，并在这个过程中从多方面论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

一、围绕布列斯特和约争论中列宁阐述的哲学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时，列宁非常明确地认为，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平是最主要的。为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发出停止世界战争，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1917 年 11 月 20 日，俄德双方派出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谈判。德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围绕着要不要缔结单独的对德和约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了三派意见：以列宁为首主张立即签订和约；托洛茨基提出"不战不和"方案，即"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拒绝签订和约"；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强烈主张中断和约谈判，向德国宣布革命战争。如列宁所说，"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危机之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78－379 页。

一。"[1]列宁经过深入细致的说理斗争，最终得到党内多数的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3月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表现了列宁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统一，表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的卓越的历史洞察力。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历史的发展为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争论作出了裁决，真理在列宁一边。1918年10月德国发生革命，德帝国主义宣布投降。1918年11月13日，布列斯特和约就被宣布废除，从条约的签订到废除，前后只有八个月的时间，列宁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时机。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表现的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哲学上就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列宁认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策略时，如果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事实，那将是"最危险的错误"。列宁主张接受德国屈辱性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政策的制定，不能"适合那班专门追求外表漂亮和色彩鲜艳的人的癖性"，而必须根据"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2]从阶级力量的对比来看，为了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和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极需一个喘息的机会，应当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直接搏斗；再从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来看，广大农民充满厌战情绪，俄国大多数士兵都"疲惫不堪和精疲力尽"，要整顿和建立一支能够战斗的工农军队需要时间。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拒绝布列斯特和约，"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特别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而特别富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6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11页。

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左派’却看不见这‘关键’"[1]。

"左派"反对签订和约的企图，是在"推行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不应当"想方设法保全工人和农民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现在这块残缺不全的领土上的成果"，"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他们声称"俄国革命或者是为国际革命所拯救，或者是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因此他们怀着一种俄国革命政权难以存在的失望心情，主张同德国进行神圣的战争，去支持欧洲革命，去推动世界革命。列宁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侥幸的心理，虽然列宁也认为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有赖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但是他强调指出："当我们根据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并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应该注意到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2]。因此，"如果企图先断定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不会在最近半年内（或类似这样短的时间内）爆发，然后再制定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策略，那就错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断定的，所以一切类似的企图在客观上都是盲目的赌注。"[3]

布哈林等人以"左"的言词说，签订和约就是"放弃共产主义原则的全线投降"。他们把布尔什维克指出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口号讥讽成卑鄙的"护国主义者"。列宁指出，这种夸夸其谈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4]"祖国"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3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9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410—411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536页。

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保卫这样的祖国，那就是“正当的和‘神圣的’”。通过对问题的具体分析，列宁明确宣布：“我们是1917年10月25日以后的护国派。”①

要善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列宁在1920年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第一次在很大的范围里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② 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以便“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社会主义。”③

二、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

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即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夺取政权，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建设。但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反对将工作重心转向建设。他们宣称：“只有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后，生活的物质建设才会成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59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为首要的任务。”[①]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在各先进国家内的胜利，同微不足道的小农结成联盟在一个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是毫无希望的事情。”[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于1918年4月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第一篇全面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文章，初步提出了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

（一）全力抓住主要环节，从“夺取俄国”过渡到“管理俄国”

在列宁看来，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分阶段进行的复杂的发展过程，因此，他强调：“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③]。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条，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

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通过对革命发展的正确总结，列宁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思想，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穷人，从剥削者手中夺过来交给劳动者。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④]“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任务的：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⑤]列宁称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在此之前，从说服人民群众夺取政

① 《共产主义者》杂志1918年第2期第11页，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第4页。
② 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1930年第11版，第417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6页。
⑤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22—123页。

权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是主要任务，现在组织经济则变成了主要任务；过去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向资本家进攻，现在应当“暂停”一下，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列宁指出，“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点。”[1]

“左派”抓不住主要环节，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认识落后于实践。布哈林为了反对组织任务和经济任务，1918年4月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评论，通篇大谈什么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器，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这些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的事情，而对于无产阶级面临的组织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却只字不提。列宁意味深长地说：评论是称赞我的，但是“这个评论的性质暴露了一个很可悲和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观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2] 对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明天的任务，保持沉默。列宁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不应该向后看，而要向前看。

列宁认为，管理和组织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实质就是“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3]，也即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把这叫做“组织任务”，用意在于区别暴力夺取政权和剥夺剥夺者。对于组织任务，列宁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像“左派”主张的那样采取“高呼乌拉”和“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那他必然会彻底破产”[4]。组织任务决不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2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7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6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6页。

意味着放弃向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改变斗争方式，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①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高度重视管理和组织任务，是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创造性捍卫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唯物史观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一定的社会制度同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相联系，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同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相联系，这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基础。因此，列宁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② 列宁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应当解决的双重的或两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③ 这两方面的任务，缺一不可。当着第一个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之后，第二个任务将成为长期的最主要的任务，其核心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2页。

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

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明确区别了如下两个既相互联系又各具不同性质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工农群众能够夺取政权，这是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什么样的物质基础上能够完全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另一个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列宁指出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在于一定的革命形势（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出现。俄国虽然生产力不如西欧发展，但它是整个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2] 列宁因此称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是"套中人"。对于第二个问题，列宁极其鲜明地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3] 列宁认为，为了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夺取政权是前提，还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努力发展生产力。如果"纵容那些唱高调的人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表面上'格外'革命，但要从事那种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4] 这里批评的就是布哈林这样的"左派"。

列宁头脑十分清醒，他懂得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社会矛盾在于政治和经济的"不相适应"。这表现在："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化程度方面，在'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0—551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4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1页。

西欧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① 列宁把苏维埃俄国同当时毗邻着的帝国主义德国相比较，认为，不应当"期待历史会平衡、宁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 1918 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开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 1918 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② 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完整的社会主义"。出路就在于千方百计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采取科学进步的生产管理方法。列宁在论述这些条件时，区分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社会生产的社会化"这样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并且用"国有化"来代替"社会化"。他们主张"立即颁布法令对全部工业生产实行普遍国有化"，"生产的最后的钥匙也应当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资产阶级一丝一线，甚至私人财物都应当剥夺干净"，提出"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算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③列宁予以驳斥，他反对把"社会化"等同于"国有化"，指出在"国有化"问题上是"没收"问题，态度可以是坚决的或者不坚决的，"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可以只有一个'坚决性'，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就不能没有这种才能。"④ 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是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建立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便绝对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5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45 页。
③ 《共产主义者》杂志 1918 年第 3 期，第 18 页、第 4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39 页。

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同样重大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1]

（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

对于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论述过的问题，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有一个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帝国主义经济的考察。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强调：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这种垄断现象在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战争的需要，正逐渐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和垄断组织相互结合，由国家来监督和指导全国的经济生活。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两重性，即它不仅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反动，而且体现了生产的全面的社会化和组织性，标志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靠进一步。1917 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更加注意把握社会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得出了如下的重要结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2]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对某些支配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大企业和经济部门，剥夺资本家，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到了 1918 年 4 月，列宁把组织和管理任务提到第一位，为此他提出对资本家应当"停止一下"进攻，从直接剥夺剥夺者过渡到组织计算和监督。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列宁再度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如列宁后来所规定的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99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64 页。

那样，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应当给以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①] 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依靠国家所有制经济，通过财政、政治、组织等手段调节、计划、限制的私人资本主义。

“左派共产主义者”对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张提出猛烈的非难，按照他们的说法，党内出现了右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而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就是有使苏维埃俄国“演进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的危险[②]。布哈林写了《现代经济的几个基本概念》一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因此，不能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原则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列宁批评布哈林的根本错误是“无视俄国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俄国经济的过渡性质，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③] “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抗拒国家的任何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④] 正是出于对俄国国情的这种认识，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俄国的出路，如果有了它，俄国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比较容易。因为国家资本主义要求集中，要求精确，要求有领导，要求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求社会主义。而苏维埃俄国缺少的正是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27页。
②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3卷，第539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1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1页。

些东西。在列宁看来，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现代有效而集中的工业，有了它，俄国就有了“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因此，列宁甚至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有了国家资本主义，俄国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①]“左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充当小资产阶级落后的自发势力的俘虏。

列宁批评“左派”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教条习气。他们以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借口，对列宁的主张横加指责。列宁指出：这些人“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去看旧书本。可是旧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一本书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②]

列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提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③] 马克思说过：在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进入社会实践的时代，新的实践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创新。

列宁的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在历史上第一次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实施的时间不长，但其意义十分重大。这个时期列宁的思想在探索中发展，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就这个方案本身而言，也具有矛盾的性质。一方面，列宁的设想出于一个总的目标，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起“一个使千百万人在

---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23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26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98 页。

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1]，这里包含着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实施办法上，列宁又提出了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过渡措施，这又体现了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当然，这个时候列宁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以上矛盾的两方面，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演变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三、提出两种制度和平相处的思想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反映的是这样一种情绪：低估、忽视、甚至放弃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急于要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硬拼，决一死战。他们主张通过战争"强行推动"世界革命。列宁在批判这种错误主张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相处的思想。

关于两种制度相处的问题，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2]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3] 在列宁看来，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

---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但资本主义仍然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世界上将出现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

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建立之后，面对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究竟应该怎么办？列宁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决一死战的主张，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①。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为了阐明两种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处的必然性，列宁还进一步说明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互相对立的，但是革命不能输出，更不能靠武力输出。列宁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通过战争“强行推动革命”的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要看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如何。”② 而不是按照定单和协议来进行的。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实行共处政策。苏维埃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想恢复经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而且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列宁强调，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③。第三，两种社会制度共处的现实可能性，还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列宁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联系、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54页。

缔结经济条约和政治条约的必要性，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生存在一个地球上，那么，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当然，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处，决不意味着矛盾和斗争的消失。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存在和发展，对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它们总是要想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时机，来反对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列宁总是强调，不能“十分天真地”认为“资产阶级会用盘子把和平端过来”，而是要通过有理、有节的斗争才能争取到的。而且，在这个和平共处的时期内，“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①] 列宁总是告诫苏维埃国家和人民，在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之前，必须警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性。列宁强调要学会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他说：“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哪怕是最糟糕的、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②] 为了达到和平相处、巩固社会主义的目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而且应当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某些协议，可以在对等原则下作出让步。但是，绝不能接受侮辱性条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的历史证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社会制度共存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而且应当争取和平共处；但是，如果因此而忽略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就会在国际舞台的斗争中陷入被动的地位。

---

①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12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70 页。

四、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十月革命引起的革命高潮在世界继续发展。革命的发展要求成立新的国际。列宁亲自领导了筹建新国际的工作。1919 年 3 月 2 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 21 个国家的 35 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 52 名。共产国际成立之后，列宁继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迫切问题进行研究，揭露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派分子和“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运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的根本问题。

列宁认为，当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危险来自社会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列宁称他们为被资产阶级所收买的“社会主义的叛徒”和“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代理人”。总结德国和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血的经验教训，列宁深刻地指出：“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①]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着重批判了考茨基关于“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超阶级的虚伪论据，指出：“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②]。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右倾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同时，对革命队伍内部产生的“左倾”思潮也展开了批评。这种“左倾”思潮的主要代表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英国社会主义联盟，意大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29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718 页。

利的“抵制派”共产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瑞士的海尔格派共产党，荷兰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等。他们自称为“原则上的反对派”，希望革命，却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思想，犯了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这表现为：希望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拒绝将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反对“议会迷”，却提出反对参加任何议会斗争的主张；反对旧工会的官僚主义，竟然提出退出旧工会，用“清一色”革命工会取代它；不满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叛卖性妥协，却提出反对一切妥协，要径直走向共产主义；不满第二国际变了质的政党和领袖，竟然提出“打倒领袖”、“取消政党”的要求。这股思潮虽然还刚刚露头，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已经构成现实的危险，因为他们妨碍各国共产党争取群众和解决面临的任务。

列宁还在1919年底就考虑批评“左派”共产党人。他发往哥本哈根的致马·马·李维诺夫的电报（1919年12月28日）证明了这一点。他要求收集和寄来关于“左派”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文件、决议和小册子。[①]1920年1月4日列宁在给格·瓦·契切林的便条中对李维诺夫寄来的马马虎虎随便挑选的材料表示极为失望，并就收集和寄送“西方社会主义”书籍提出一系列具体的要求和建议。[②]这两个材料证明，列宁已经下决心要在收集确凿材料的坚实基础上进行写作，对“左派”错误进行批评。1920年春天，列宁写了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论妥协》，初步阐明了共产党的科学的策略思想。在此基础上，4至5月列宁写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它是列宁为即将于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而撰写的。该书除于1920年6月用俄文出版外，接着还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出版。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49卷，第197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49卷，第205—206页。

列宁对"左派"错误的批判，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这本著作中发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战略和策略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列宁为该书提出的任务是："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现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实行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1] 因此列宁最初给这一著作起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之尝试》。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国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正是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即被列宁批判的共产国际内部的一种"左倾"思潮。这股思潮的创始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都曾分别参加或参予领导了本国的革命斗争，但先后都失败了。原因首先是因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罪恶。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相对抗，表现出革命的要求。但这些自称的"新左派"从一开始就患上了幼稚病。1920年6月，继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读了卢卡奇在《共产主义》杂志第六期上的《论议会制问题》的文章，列宁写了《〈共产主义〉》一文，批评卢卡奇这些人患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2]。因此，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追根溯源，应当从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批评开始。

（一）列宁剖析"左派"共产主义的根源

列宁认为，"左派"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而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类型的社会阶层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3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289页。

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1]“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2]。无产阶级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努力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纳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轨道。

“左派”共产主义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西欧工人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动。右倾机会主义搞叛卖性的妥协和议会道路，部分群众对这种改良主义的愤怒不满，极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产生策略上的片面性和“左倾。”因此，列宁写道：“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3] 这就要求科学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在注意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防止“左”右摇摆。出于这种考虑，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并不仅仅限于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在书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主张。

列宁还认为“左派共产主义”产生的又一根源，是理论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应当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鉴于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把对“左派”错误的批评，非常注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使得本书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

（二）揭示革命的基本规律

“左派”信任革命的愿望和激情，似乎只要有一批革命者想干，革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并且很快取得胜利。列宁批驳了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页—18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

种主张，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1]。它要求在“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2] 只有这样，才善于决定革命阶段的内容（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分析阶级力量的配置（各基本阶级，其中包括领导阶级，中间阶级），提出该阶段的任务和相应动作（进攻或退却），采取与该阶段相应的斗争形式和方法（群众的和议会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和平的和非和平的，等等），从而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依据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列宁指出仔细地确定革命的战机至关重要。列宁写道：“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3] 列宁的这一论述，为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战略中正确估计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是否成熟指明了方向。

确定斗争形式和方法是共产党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极其注意这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和生动活泼的，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斗争形式。因此列宁号召，第一，“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4]；第二，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内容。“从国际共产主

---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3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19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39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49 页。

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持久，这样有力，这样强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终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①] 第三，"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②]。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要经过长期的锻炼，要善于坚持原则性，同时又"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不问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不区别革命的低潮时期与高潮时期，学究主义地拒绝一切合法斗争。为此列宁声明："不善于把不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④]

（三）论述革命道路的曲折性

"左派"的一个特征就是冒险主义。他们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根据，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认为"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为此，他们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反对进行任何形式的议会斗争，把革命发展的道路设想得笔直又笔直，把革命发展的条件设想得纯粹又纯粹。针对这种幼稚病，列宁揭示了革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论述了革命与妥协，前进与后退的辩证关系。

早在1919年4月撰写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列宁就明确指出："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⑤] 无产阶级在进行这样的事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9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5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0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812页。

业，"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1] 列宁强调，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事业时，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革命实践中进行必要妥协辩证地结合起来。

列宁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他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当然，在政治上决不总像这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容易分辨，但是革命家必须在实际斗争中学会这种本领。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般地承认容许妥协或者"不作任何妥协"，就会把机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划清，这是很荒谬的，因为"这些人还不懂得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可变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2]。

列宁对革命道路曲折的论述，后来发展成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改良的看法。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改良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因此，必须反对用改良取代革命的改良主义。但是，列宁作为辩证法的大师，他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4页。

新的内容。"[①] 列宁要求人们冷静地思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检查一下"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应该善于在什么条件下按革命方式行动，以及应该善于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②]，即改良的方法。基于这一看法，1921 年列宁明确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③]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

（四）对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理论批判

"左派"的又一病症是无政府主义。具体表现为否认纪律的重要性，不善于联系最广大的群众，不懂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针对这些表现，列宁一一作出了理论上的分析和批判。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这个党具有"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这也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④]。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国际资本的进攻，面对大量存在的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⑤]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检验加强的呢？列宁总结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指出："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8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74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74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81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01 页。

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①]

“左派”无政府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不懂得和不善于联系最广大的群众并得到他们的真正的拥护。“左派”否定工人阶级参加议会活动的任何必要性，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在反动的工会里进行工作，而要建立新的纯粹革命的工人组织。列宁说：“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②] 因为，如果共产党人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那就必然把那些落后的工人群众推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由此列宁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原则：“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③]“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④]

“左派”的无政府主义还表现在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虚构出所谓“领袖专政”和“群众专政”的对立。他们自称是“群众专政”的拥护者，认为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进而提出“打倒领袖”、“取消政党”的主张。针对上述错误思潮，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上明确阐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辩证关系。他写道：“‘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费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81－18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08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09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13 页。

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如果不善于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便不配拥有这个称号。

（五）阐述历史发展中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法

“左派”幼稚病的再一个特征是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将十月革命的经验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让人们思考：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考茨基等人认为，十月革命只是“出现在落后俄国的偶然事件”，“不能期待历史的重演”，当然对先进的欧洲也是没有指导意义的，针对这种右的倾向，列宁指出，尽管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有很大区别，但是特殊之中具有普遍性，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十月革命“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②]

但是，列宁也反对教条主义的“左”的倾向。这些人只会依样画葫芦机械地照抄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不懂得它的实质，更不懂得要把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列宁强调指出，十月革命的普遍的国际意义是“按最狭义来说的”，而不是按“广义来说的”[③]。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是指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8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8页。

它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指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如果把俄国的全部做法都来个机械照搬，按照一个尺寸和固定的程序制造出一个模式的社会主义，那就是思想懒汉，是犯了“一种极大的错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求指导思想上的统一，但决不取消民族差别和统一前提下的多样性。它要求“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国家的差别”。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自己的革命任务时，“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1]在这方面必须反对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完全雷同，需要的是革命的创造精神。列宁在领导共产国际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注意反对教条主义。1922年底，他在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再次对国际通过的“决议的俄国味道太浓”提出了批评，指出如果把俄国的经验“像神像一样地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得不到什么的”[2]。

列宁特别关心东方革命。他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但是，列宁十分肯定地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必定是具有自己的特点。“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3]“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1]因此，列宁谆谆嘱托东方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2]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法原理，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六）提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列宁在反对"左派"幼稚病中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3]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论和方法论和重要贡献，体现了唯物论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在列宁的毕生活动中，上述观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虽然明确提出是在 1920 年，但这一原理的最主要的内在要求早在 1905 年时就已揭示，这就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4]。世界上一切客观的、现实的存在物本质上都是具体的，都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同其他事物相互制约，成为许多复杂规定和关系的总和。如果真理是抽象的，则它就是不真的。机会主义者总是喜欢抽象地议论问题，或从先验的原则出发，或搞纯粹的逻辑演绎，或把片面的因素当作根据，或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9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04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90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507 页。

割裂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或企求从某种固定不变的公式中寻找对问题的现成答案，或把某种认识当作超时空的绝对不变的教条，如此等等，而不愿意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右的或“左”的错误。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原理，列宁历来也都反对囫囵吞枣地加以把握，反对教条主义。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左派”的批评，差不多每一篇文章都贯穿着真理具体性的论断。1918 年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就是列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典范。共产国际中的“左派”幼稚病患者，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表现出思想方法的“死板”和“僵化”。针对他们的教条习气，列宁又进一步论述了真理和错误的转化。恩格斯早就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之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①]约·狄慈根也指出：“对正确与谬误的对立抱有极其夸大的观念是多么幼稚。”[②]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左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常常企求包治百病的丹方，喜欢讲“过火”话，做“过头事”。许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正确性的观点和办法，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谬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机械套用真理，背离从实际出发的要求。针对他们的教条习气，列宁深刻地指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相对的，可变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人的认识只要多走一步，哪怕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99 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377 页。

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就告诉人们，确定真理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是掌握、运用和深化真理的必要条件，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根本要求。

第三节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1919年秋，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向苏维埃政权举行武装进攻。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获得的和平喘息时期就告终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工农劳动群众，进行了三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使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巍然屹立。在这个时期，列宁撰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著作中丰富的哲学思想，在上面两节已作论述。本节主要阐述这一时期以战争为主题的列宁的哲学思想，包括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程中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探索，还要论及列宁领导的对“军事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哲学斗争。关于列宁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将阐述民族问题。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评价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指的是在战争环境中，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一种带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充分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逐步采取的，本身就带有探索的性质，面并非一种固定的模式。这表现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是形成在这一政策的实施之初，直到1921年4月当列宁对这一政策进行历史反思时，才最初

在《“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中使用[①]，后来又在《论粮食税》这本著名的著作中作了更加完整的表述[②]。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迫于战争和经济破坏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逐步采取和实行的。就其客观原因而言，以下两方面是主要的：第一，旧俄国的沙皇统治，加上连年的战争，使整个俄国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1918年1月粮食部门只完成粮食计划采购量的21．8%，2、3两月采购到的粮食只占计划的36．5%，4月份为14．1%，5月份为12．2%。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1月份只及计划供应的7．1%，2、3两月是16%，4月只有6．1%，5月份只能供应计划的5．7%。整个俄国的“国内状况危急到了极点”，“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即粮食问题上，对劳动者的统治，即对工人国家、对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决战。”[③]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首先就是从粮食垄断专卖发展到余粮收集的。第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爆发以后，苏维埃国家的处境更加艰难。战争初期，外国帝国主义和白卫分子就侵占了3/4的国土。在很长的时期内，国家失去了顿涅茨的煤，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南方和乌拉尔的金属，土耳其斯坦的棉花，西伯利亚、库班和乌克兰的粮食。工业原料和燃料极度匮乏，约有40%的工厂不得不停工待料。为了适应这种战争局面，赢得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政策是一种非常的政策和措施。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从粮食垄断专卖到余粮收集制。鉴于饥荒的出现和粮食状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374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16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560页。

况的极端严重，1918年5月人民委员会发出由列宁签署的粮食专卖法令，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征购和供应粮食的非常权力，派出工人征粮队到农村征收粮食。但是征购来的粮食远远不能解决国家粮食供应的困难。为此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出了征收农产品实物税的法令，规定必须在交纳实物税后的粮食才能按国定价格出售或收购。这个法令的实质是对农民中不同阶层征收不同的实物税来取代建立在对"农民一视同仁"基础上的货币税，因为，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拥有较多的粮食储备。然而征收实物税也未能解决粮食问题。在经过上述措施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产粮省份收集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规定"为满足国家需求所必要的全部粮食和谷物饲料，摊派给各产粮省份向居民征收。"这个法令的显著特点是：不是根据农民实际需要的情况计算余粮标准，而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分配征收的数字，因此征收的往往不仅是余粮而且包括农民的一部分口粮；以前对余粮征收时，还拿出一部分工业品作为抵偿，而现在常常是无代价的，既无工业品抵偿，而付出的纸币又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又进一步发布《关于采购食品》的决定，除对基本食品（粮食、砂糖、茶叶、食盐等）实行国家垄断，严禁私人贸易外，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大规模收购其他重要产品，似乎涉及到一切农副产品。苏维埃政权在发布以上两个法令时，并没有对这一政策作出明确的概括，直到1919年11月18日列宁在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时才明确地把这一非常政策称之为"余粮收集制"。①

2. 加快工业国有化步伐，建立高度集中的一长制的管理体制。至1918年底，工业国有化已基本完成。随后又颁布法令，规定凡有机械动力而雇工5人以上，或无机械动力而雇工10人以上的小工业均收归国有。到1920年底，国有化企业猛增到37226家。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310－311页。

工农国防委员会对国家经济实行总领导，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进行直接管理，它将各工业部门划归有关总局。总局不仅计划生产、分配产品，而且直接领导企业，掌管财政拨款及原料采购。总局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它的一切指令企业必须无条件地完成。1918年底，全俄共设总局18个，1920年底增加到52个。这种经济体制当时叫做管理总局体制。

3.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鉴于劳动力的不足，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非劳动者的劳动手册》法令，规定一切非劳动者必须参加一定的公益劳动，并登记在册，凭此才能迁移和获得口粮。1918年12月又公布了《劳动法典》，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劳动义务制。1920年1月20日人民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普遍的劳动动员制度具备了国家法律的形式。凡逃避义务劳动，擅离职守，故意破坏劳动工具，组织工作粗心大意等等都属犯罪，可送人民法庭治罪。

4. 取消自由贸易，经济关系实物化。由于采取战时的非常经济措施，继粮食实行专卖之后对生活必需品也禁止私人买卖，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和实物配给制。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居民组织各种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供应》的法令，5天之后又发布《关于对某些食品和日用品贸易的国家垄断》的决定，基本上以国营和消费合作社代替了私人贸易。1919年3月1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在各地设立统一的分配机构——消费公社。每个公民均为公社社员，到一个指定分配点登记注册，才能得到一份配给的食品和日用品。1920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撤消人民银行》的法令，11月11日又通过了《关于取消若干货币结算》的法令。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根本特征，就是企图在战争的环境下运用军事的办法来解决十分困难的经济问题，并实现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匈牙利学者拉兹洛·萨穆利给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作

了如下的概括：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的直接权力；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劳动力的“军事化”；经济活动（生产、贸易、分配）的高度集中管理；分配中的阶级原则和社会原则，平均主义占统治地位；经济生活“实物化”，废除商品和货币关系；建设和管理社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暴力，即国家的强制。①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评价

如何评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论的问题。某些西方学者断言：“战时共产主义”是“推广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计划，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要途径”。由此出发，他们把列宁后来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失败产物”。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一直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唯一可行的和长期的经济政策，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斯大林比较重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忽视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主所体现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我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曾一度被“左”的思潮所颂扬，将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许多论断当作否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斥责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产阶级的理论根据，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意义。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兴起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非列宁主义的，只有否定它，才能维护和发展列宁主义。

其实，列宁本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这种科学评价是充满辩证法的。学习列宁的这些论述，也就成为学习列宁哲学思想的一个部分。

列宁最早是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

① 参见萨穆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章。

出评价的。他在讲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收集制时写道："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内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给我国的剥削者撑腰）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一事实也表明，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紧接着，列宁又写道："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合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①

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没有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评价这个政策的功和过。他严格区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作为"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实行的一种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红军和城市工人最低限度的供应。这对于战胜困难，赢得战争的胜利，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起了积极作用，是一种功劳。但是，列宁强调的是"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即如果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一种"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则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一项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意义仅在于，在战争特殊的环境下能够搜集到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物品并将它们平均地进行分配的一种经济形式。当战争结束，发展经济成为主要任务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决不能沿袭"战时共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

产主义政策”，而必须及时地用新经济政策加以代替。

在分清“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什么具体问题上的“功”和“过”之后，列宁又进一步剖析了实行这一政策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而且把重点放在分析主观原因上。这是因为，随着战争的大体结束，随着经济建设任务的突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完成其历史任务，它的弊端则明显地暴露出来。但是，实现这个转变是困难的。这是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这一套，在观念上恰巧和人们头脑中的某种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相吻合，因而被人们当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简捷道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确有主观上的原因，即反映了人们（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领袖人物在内）急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如列宁所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 列宁没有文过饰非，没有推诿，而是主动承担了这方面的责任。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体现的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农民问题和商品、货币问题。列宁所说的“我们犯了错误”，指的也就是这两个问题，即认识脱离了俄国的具体国情。

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无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前面已经论及，总的来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的态度是十分谨慎和认真的，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列宁对农民的看法确有偏颇。他和俄共（布）就农民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和小商品经济经营者这些特点，把他们从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予以防范和打击，因而忽视了农民的实际利益。列宁反复强调，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他说："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小规模的、盘根错节地遍布于各地的资产阶级剥削，即小私有者，小私有者和小业主的整个生活方式、习惯和情绪。"[①]"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②] 因此，当"剥夺剥夺者"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列宁从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出发，认为他们必定是"资本家的拥护者"，甚至认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③]。正是基于上述的估计，列宁认为农民每一次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粮食，都是在恢复商品经济，也就是在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列宁在制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时，才试图取消市场，采取余粮收集制，将居民的供应和分配全部纳入国家统一领导的消费合作社。

与农民问题息息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消灭"商品和货币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资本的作用时曾认为："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④]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基本持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1908 年又明确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⑤] 十月革命之后，虽然列宁在一些论述中也提出，俄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377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86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4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397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111 页。

国仍然存在多种经济，因此不能立即消灭货币。[1] 但是，总的思想是认为，“货币是昨天剥削制度的残余”，向社会主义过渡最终就是要消灭货币的存在。因此，列宁在为俄共（布）七大拟定的党纲草案中提出，“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建立有钱一定要存入银行的制度等等。”[2] 这些思想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得到充分的实现。那时把商品和货币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废除和禁止，经济关系实物化。

正是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和商品、货币存在着偏激的看法，所以不“适应无产阶级的经济任务”。1920 年底到 1921 年春，当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被基本粉碎之后，农民就对这一政策产生普遍的不满，并且产生了普遍的农民暴动的现象。列宁对此感到非常的沉痛，他毅然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三）从历史的远景看问题，热情支持新生事物

1918 年—1920 年的卫国战争充满着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巨大热诚，以及劳动人民保卫祖国的英雄主义精神。这集中体现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高瞻远瞩，以敏锐的洞察力热情地歌颂这一新生事物，从 1919 年到 1920 年先后写下了《伟大的创举》、《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多篇著作，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3]

列宁还从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分析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中的劳动是有定额、有报酬的劳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12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769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3 页。

动。"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需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经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① 列宁指出，虽然在社会主义还远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但是，"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星期六义务劳动体现的正是共产主义劳动的萌芽。因此，列宁认为，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十分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应该了解这一点），它对清除混进党来的分子和抵制党在腐朽资本主义环境中所受的影响是有意义的。"②

资产阶级及其"舆论"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冷嘲热讽地称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小花盆里栽大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理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对此，列宁从哲学上反驳道，要透过现象，"从实质上去观察问题"，要从历史的远景看问题。并且指出："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③ 列宁指出，这班人的根本错误是"不善于了解历史的远景。"④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事物在开始时总是幼小的、不完善的，成长道路总是曲折的，但是它们富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4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4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388页。

有强大的生命力，未来是属于它们的。不管如何艰难曲折，新生事物一定要代替旧事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革命者应该小心地照顾从碎片下生长起来的新生事物的幼芽。

要正确对待革命进程中的错误。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新生事物，布尔什维克党（包括其领袖）和俄国人民都缺乏经验，在前进的过程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形象而确切地把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比为“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①] 既然如此，失误、挫折，为了达到目的地而后退或改变途径，就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在这样崭新、伟大和艰难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策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惊慌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②] 因此，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

二、列宁对“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哲学批判

“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都是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对派集团。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特点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内外政策密切相联系，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列宁在对这些政治派别进行斗争时，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知识分子和专家问题，以及官僚主义等问题。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94、59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

（一）对“军事反对派”的批评

“军事反对派”是围绕红军建设问题出现的“左”的派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先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由于战争的急剧升级，红军指挥人员奇缺，这就不得不吸收相当数量的旧俄军事专家和军官，派他们担任各级指挥任务。与此同时俄共（布）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对这些旧军官进行政治上的监督。当时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的托洛茨基，确有对军队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干部不够尊重的情况，这就更加引发了党内一部分人对吸收旧军事专家的方针的怀疑和抵触。1919 年 3 月俄共（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反对派推举斯米尔诺夫在会上宣读了反对派的纲领。其主要观点是：维护军队中原来的志愿兵制和军官选举制，留恋军队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否认在红军中加强集中制和执行铁的纪律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在军队中“恢复专制农奴制度”；反对在红军中广泛吸收沙俄时代的军事专家，特别反对由他们担任军事指挥职务。会上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以及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中，从理论上批评了“军事反对派”的错误主张，着重谈了专家问题。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社会主义可以由另外的人来建设，可以先培养一批优秀的、纯洁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人，然后再由这些人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嘲笑这种主张是“玩木偶戏，这是酸小姐拿社会主义消遣取乐，而不是严肃的政治。”道理就在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科学、技术和文化。资本主义把科学和文化只给予少数人，培养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专家。“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我们要立刻用资本主义昨天留下来可供我们今天用的那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马上就着手建设，而不是用——说句笑话——将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资产阶级专家，此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们没有别的砖

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建设”。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一些资产阶级专家会进行反抗，甚至破坏新社会的建设。但是，列宁坚信，“我们能够用这些砖头、用这些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能够靠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专家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①

列宁进一步提出，仅靠暴力摧毁资本主义，粉碎地主、资本家的反抗，这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半任务，另一半任务则是建设。“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②而这些科学、技术、艺术却掌握在专家手中。这就尖锐地提出了如何使用资产阶级专家的任务。列宁反复一再强调：“在这里、单靠暴力是行不通的。在暴力胜利以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除了暴力还要有组织，有纪律，有威望，使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服从自己并参加自己的工作！”“以为单靠暴力就能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中组织新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这是“胡说”，是一种“愚蠢的想法”。③

（二）对“民主集中派”的批评

“民主集中派”大约产生于1919年初。1月15日，奥新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新任务》一文，表达了“民主集中派”的一些基本观点。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等人公开自称“反对派”。在1920年3月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派”充当了主要反对派的角色，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委员制和一长制的提纲》，标志着这个反对派的正式形成。因为他们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讲话中都大谈特谈“民主集中制”，所以开始是人们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0页。

戏称，随后他们也就自称为"民主集中派"。

"民主集中派"鲜明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并把它引向反对"官僚制度"。他们认为，官僚主义已成为腐蚀党和苏维埃躯体的"溃病"，成为影响工人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的主要的"障碍"。应当说，提出这一问题是十分有价值的。不仅如此，"民主集中派"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东西，如认为："过分的权力集中"，"就一定会导致政策中个人手段的发展，官僚主义"；要注意吸取"各资产阶级国家的经验"，找到人民群众监督党和苏维埃工作的途径；反对"过分地扩大军事化的概念"，以"军事化为幌子""助长官僚主义"；克服"中央脱离地方、中央企图对地方管得很死"等等。他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的主张，如：反对以党代政，主张党政分工；反对"按照条条"建立苏维埃机构；主张在苏维埃组织和工厂里普遍实行委员制，反对一长制；主张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反对军事机关干预民事机关；反对用"军事化"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等等，都是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某些弊病，确实也是执政党必须正确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民主集中派"的理论是错误的，列宁批评他们仅仅是原则性地、抽象地、绝对地提出问题。这表现在：他们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把只能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的直接民主，企图立即就在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还相当落后的俄国马上实行；把在一般情况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搬用到战时的环境中来。如果说，"民主集中派"的某些政治主张从远期目标和和平建设时期来说有其合理的成分，那么，在当时苏维埃俄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提出的主张则又带有明显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痕迹。列宁同样重视反对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但是，列宁认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需要几十年时间。因为，官僚主义在俄国有它的经济根源，这就是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和文盲的存在，工农业之间缺乏流转和联系。列

宁明白地指明："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纲领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①] 在这种只能实行"间接民主"，而不能立即实行"直接民主"的情况下，官僚主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根除。因此，反对官僚主义不能只靠纲领，也不能靠"赶走"和"割肿瘤"，必须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但是，"民主集中派"却只是热衷于"政治民主"，对发展生产不感兴趣。他们一方面激烈地反对政治上的集中原则和严格的纪律；另一方面对于发展生产又主张"左"的政策，要求对生产资料实现"最坚决的社会化"，"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完全打倒资产阶级"，推行彻底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民主集中派"理论上的另一个错误是割裂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鼓吹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他们口头上大谈特谈民主集中制，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他们"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懂得集中制原则。"[②] 表现为极力贬低集中，不作分析地称其为"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最倒霉的民主集中制"；同时又无原则地颂扬所谓排斥集中的民主，主张"一切权力归地方"。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本身就包含着无产阶级民主原则，是一种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只讲集中，不讲民主，会导致官僚主义的集中；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然而，奥新斯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提出："为了规定我们可能实行的民主制的形式和限度，首先必须把'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民主'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并且指责列宁"混淆"了"社会主义民主制的两

①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15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97 页。

个方面。"[1] 奥新斯基这样作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抽掉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基础，而对集中制大加鞭答；否认无产阶级民主的集中要求，而把这样的民主混同于无政府主义。因此，他主张把"民主集中制"改为"民主制"。这一要求反映在党内，目的是为了争得进行反对派分裂活动的合法地位。

"民主集中派"的主张，始终充斥着一种"反专家"精神。恩格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时曾指出，权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民主集中派"重蹈巴枯宁的错误，他们坚决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他们攻击必要的集中是"机器般的服从"，指责必要的纪律是把群众"当作盲目的工具，当作被送往屠宰场的'愚昧无知的牲畜'"。[2] 与这种主张相反，列宁明确指出："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3] 列宁还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泰罗制为例，指出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又是工厂生产管理上的成功的科学成就，是一种比较完善的监督和计算。因此，"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4] 但是，奥新斯基却极力反对，他认为"泰罗制""只有当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是稳定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行，这种制度纯粹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三）对"工人反对派"的斗争

"工人反对派"是1919—1922年间俄共（布）党内一个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亚·加·施略普

① 奥新斯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需要什么》。
② 奥新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副报告》。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1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

尼柯夫、亚·米·柯伦泰、谢·巴·梅德捷也夫、尤·赫·卢托维诺夫、尤·康·米洛诺夫等人。1919年初，其纲领开始形成。这些人以工人的代表自居，攻击"党的上层蜕化变质"，说党的领导"脱离工人群众"，"对无产阶级的创造力量估计不足"等等。所以，开始是人们戏称，随后他们也就自称为"工人反对派"。

"工人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的工会领导人。他们在进行派别活动时，常常标榜自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行事"。柯伦泰在《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中甚至这样写道："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武器，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通向工人阶级胜利的捷径，减少前进途中的痛苦，并且更快地实现新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这个武器就是唯物史观"。紧接着，他就指责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不运用这个武器"，"而是打算把这个武器抛在一边"，因而"走上了一条阻塞了的、弯弯曲曲的盲目试验的道路"[①]。针对这一特点，列宁在批评"工人反对派"时，十分重视从理论上指出他们的错误主张是对唯物史观的背离。

"工人反对派"的第一个主要错误是搞无政府工团主义。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并且要实行苏维埃国家"工会化"，即要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服从工会。他们的理由是：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官僚主义的化身，只有工会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他们认为："决不能用工人阶级专政这块形式上的招牌来代替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的伟大的创造力。"[②] 并且把整个争论归结为"一个根本问题"："谁将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创造力？是由被活生生的纽带用工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纯粹的阶级机关即产业工会去抓建设工作呢，还是把这样一件工作交给脱离直接的活生生的工业活动而且成分复杂的苏维埃机器去做呢？""工人反对

① 柯伦泰：《工人反对派》。

② 柯伦泰：《工人反对派》。

派”认为“只能是前者即工人的集体，而不是官僚主义的、社会成分复杂的官吏的集体。”因为“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束缚工人阶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翅膀”。[①]

列宁肯定“工人反对派”“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有功劳”，并且说：“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②]。另一方面又严肃地指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带有明显的工团主义倾向”，“这种工团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提供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材料”。[③] 列宁根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经验，反复论证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④]

“工人反对派”在各种纲领和文件中一再重复强调：“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列宁指出，他们的这种主张“所依据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因为“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背了要明确地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提纲中所“表现出来的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说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⑤] 对于

---

① 柯伦泰：《工人反对派》。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8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1—12 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85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85 页。

这一批评，施略普尼柯夫拒不接受，他反驳说："生产者"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这个词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使用得相当多，而恩格斯是这个词的创造者。"[①] 接着，他援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一段话："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②]。施略普尼柯夫自认为这一反驳很有力量，但恰恰反映出他们对这段话的不理解。列宁正确地指出："用恩格斯关于生产者的联合的论断"来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而且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就可以肯定，恩格斯讲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俄国目前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我们目前在实践上还不能实现恩格斯的话。先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以后的事。"[③] 企图在阶级还存在的情况下就取消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工人反对派"无政府工团主义实质之所在。

"工人反对派"的第二个主要错误，就是鼓吹马哈伊斯基主义。这是一种排斥和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潮。波兰的社会主义者马哈伊斯基及其追随者洛津斯基在19世纪和末20世纪初出版的《脑力工人》和《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等著作中，提出一种"理论"，认为知识分子是靠工人劳动养活的寄生阶级，并且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欺骗等等。"工人反对派"拣起马哈伊斯基主义的货色，极力排斥和反对知识分子。1919年3月，施略普尼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做《论专家》。他把专家的使用和"依靠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对立起来，戏称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如同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讲

① 施略普尼柯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第89—90页。

的那样，“皮匠师傅烤馅饼，馅饼师傅缝皮鞋——一事无成”，“这些人只能成为新制度的掘墓人，而决不可能成为新制度的建设者。”“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可以把无产阶级制度的建设委托给出身于另一个世界的专家，这是毫无根据的。”[①] 柯伦泰在《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中认为，依靠专家还是依靠工人的首创精神，“实质上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历史观点”，他断言专家“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世界的人，而且是互相敌对的”，他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吸引知识分子参加建设的做法，“越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轨道”[②]。

到底是谁越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轨道”？列宁读了柯伦泰《工人反对派》小册子的全文，并且用文字和记号在原书上作了大量批注，一针见血地指出，柯伦泰主张的是“马哈伊斯基主义”。列宁对“工人反对派”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号召同工人反对派（上层）的工团主义和马哈伊斯基主义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思想斗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知识分子是个历史范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主要产生于社会管理与统治的需要，因而从总体上说，它是剥削阶级的一个部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科学知识越来越深地渗入生产过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知识分子内部的构成都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劳动属之于生产劳动。他们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一是从雇佣劳动的角度。他们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③] 二是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马克思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

---

① 施略普尼柯夫：《论专家》。

② 柯伦泰：《工人反对派》。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做管理者、工程师、工艺师等等的工作，有的人做监督者的工作，有的人做直接手工劳动者的工作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愈来愈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负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劳动者的概念下。"[1] 根据这种科学的分析，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2] 只要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正是"工人反对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把知识分子提到极高地位来认识和处理。列宁从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我们需要比从前多得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3] 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具体分析，指出"有教养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4]。列宁认为只有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才应当像对待资本家一样"从严"处理，而从事簿记、监督、登记、计数和核算等实际工作的职员，"他们本身大多数是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列宁在批判"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错误时，多次强调："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要'无情地反对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以为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就能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5] 列宁把那种"反对专家的精神"，称作是"一种极愚

---

① 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315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4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页。

昧的精神"[1]。列宁明确要求："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2] 1920年底，列宁提出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吸收了两百多个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参加工作。当时"工人反对派"的主要成员就散布议论说，"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中都是资产阶级专家而很少有工人共产党员。列宁斩钉截铁地说："危险的正是这种意见纷纭，因为这表明人们不善于工作，表明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凌驾于真正事业之上。""随随便便地纠正数百个优秀专家的工作，用一些庸俗的笑话来回避问题，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自傲，——难道这不是可耻的行为吗？"[3]"研究是学者的事情。既然我们这里本已不是谈一般原则，而是谈实际经验，那末，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4]

鉴于"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要求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自由的论调甚嚣尘上，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和《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其中指出："'工人反对派'以及他们类似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领导路线"。大会决定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解散不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9页。
[2]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6页。
[3] 《列宁选集》第4卷，第473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第476页。

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一切派别集团。

三、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列宁一生都十分关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由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掠夺，促进了民族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沙皇俄国是一个民族关系十分复杂的国家，有“民族牢狱”之称。这就使得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成为世界政治和俄国革命中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本卷之所以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集中在十月革命后加以论述，乃是出自这样一种思考：从国际上看，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从而开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从俄国历史发展看，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得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可能从实践的现实性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正确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其成果就是1922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正式成立。

（一）批判所谓“民族文化自治”，阐明民族自决权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奥托·鲍威尔（1882—1938）和卡尔·伦纳（1870—1950）是提出“民族文化自治”民族纲领的主要理论家。在鲍威尔所写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伦纳所写的《民族问题》中，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的说明。他们认为，民族构成的基础是某一人群所具有的共同的“性格”和“文化”，与他们经济和政治生活全然无关。在他们看来，“民族是自治的个人的联盟”，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1]；“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的全部总和”[2]。这种理论离开唯物主义历史观，唯心主义地把文化放在民族问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民族纠纷产生的关键就是各

[1] 伦纳：《民族问题》，公益出版社1909年版，第15、43页。

[2] 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镰刀出版社1909年版，第139页。

民族在文化上的不平等；解决民族问题的药方就是实行民族的"文化自治"，把分散各地的具有"共同文化"和"共同性格"的人，不问其是否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居住地域，一律根据自报民族归宿，"共同组成"一个固定的民族。这一理论在俄国一度很有影响，崩得派分子、取消派分子、乌克兰的机会主义分子等都曾大肆宣传民族文化自治。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与鲍威尔等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对立是：历史经济论同心理学理论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对民族运动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研究中寻求解决民族矛盾的答案，鲍威尔等人则主张纯粹的心理民族理论。"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错误，首先是漠视和抹煞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孤立的民族问题，任何民族从来就分裂为彼此对抗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1] 一种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另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鲍威尔等人鼓吹"民族文化自治"，其实质就是掩盖和粉饰现代社会中阶级对抗的事实，就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狭隘私利冒充为全民族的共同利益，奉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其次，"民族文化自治"鼓吹民族的孤立性，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违背。列宁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他指出："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

1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31页。

义社会转化。"[1] 由此，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两个客观的历史趋向，既应该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又不能变成为民族主义辩护。"民族文化自治"却奉行隔离一切民族的做法，巩固民族壁垒，加深民族鸿沟，这种主张逆历史潮流而动。

列宁批判"民族文化自治"论，全面阐明了民族自决权问题。列宁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2] 承认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有助于这些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承认沙皇俄国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有利于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助于消除民族的不信任、猜疑和仇视。承认民族自决权，是否会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时就连罗莎·卢森堡、布哈林等左派也把二者等同起来。列宁澄清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权学说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界限。列宁指出，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如果否认遭受本民族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实际上就是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对弱小民族实行压迫和剥削的特权，从而帮助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地承认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压迫民族中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实质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与民族在自愿基础上的融合是对立的统一。历史的辩证法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3]

（二）制定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完整理论

---

[1]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9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第509页。
[3]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8页。

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煽动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下，伯恩施坦、海德门、谢德曼等社会民主党中的右派，公然赞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中派”考茨基口头上也谴责殖民主义的兼并政策，但他提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新的政策，缔结“和平”条约，于是就会“在资本主义内部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也就会自行消灭。有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如卢森堡等人，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也犯有错误。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了，民族自决权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把民族自决权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认为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尽管社会民主党内的右、中、左在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漠视。列宁指出，从思想方法上找原因，他们的目光只看到过去的西欧，“而没有投向东方，投向亚洲、非洲，没有投向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或终将兴起的殖民地。”[1] 因此，他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这样或那样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割裂开来；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与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割裂开来；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问题割裂开来。

列宁从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入手，从世界范围内考察了新历史阶段上的民族问题，得出如下重要论断：在帝国主义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少数的帝国主义国家体系，其中每个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因而出现了一个“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现象：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2] 这是列宁制定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完整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贯穿于列宁的整个思想。由于列宁科学地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出压迫民族和被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20页。

压迫民族，而且把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归结于帝国主义，这样就把殖民地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大大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其由原来局部的国内问题扩大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并且直接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与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使之成为总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言行一致地、切切实实地支持和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还作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发聋振聩的论断，认为世界正处在亚洲革命风暴“反转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他高兴地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①。

（三）研究问题的几个重要哲学方法论原则

列宁在批判各种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潮时，并不限于就事论事，而是十分注意从哲学方法论入手进行分析，给人以启迪，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真理是具体的，要防止囫囵吞枣地把握真理。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古斯达夫·爱尔威（1871—1944）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歪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散布“任何祖国都只是资产阶级的奶牛”；“祖国是统治阶级的祖国，与无产阶级无关”。据他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因为马克思本人就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列宁一方面肯定了爱尔威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某种批判，但列宁认为，就整体而言，爱尔威所宣扬的只是一种“半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列宁指出，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历史情况出发，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列宁对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进行了科学的解释，指出马克思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1页。

这句名言的原意是说，各国无产者的经济状况是国际的，他们的阶级敌人和解放条件也是国际性的，因此，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重要。为了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工人无祖国”这一原理的精神实质，列宁强调务必把它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联系起来考察。例如，还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而恩格斯也曾在1859年和1891年两次号召德国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战争，抗击侵略者，保卫祖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头脑不清呢？不是的”，问题在于“祖国这个概念要历史地看待。……关于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原理不可能……在一切条件下都同样适用。”[1] 列宁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它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 如果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抓着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片言只语，把个别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体系中割裂开来，当作“一般原理”和“一般的死板的公式硬套”，那就注定要“陷入了抽象议论和反历史观点的泥坑。”

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任何现象都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卢森堡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任何的民族运动和民族战争。他为这个论点辩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被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以后也会由于触犯帝国主义列强或联盟之一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对这一“理由”进行了哲学上的剖析。列宁指出：“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

① 《列宁全集》第47卷，第464--4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7卷，第464页。

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1] 例如，法国大革命在战争初期是民族战争，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其它国家时，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由此，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2] 列宁预见：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有可能引起交战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此列宁制定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

为了弄清楚复杂的社会问题，决不能玩弄实例。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学者或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研究民族问题的方法上，通常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缺乏历史观点和具体分析。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一般民族”的词句下，玩弄实例。针对这种错误的方法，列宁深刻地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3] 因为实例只表示客观事物的某些现象方面，或者是个别的情况。信手拿来的或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

者戴着有色眼镜挑选出来的实例，不能说明社会现象的本质、整体和规律。任何实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同一事物的其它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多方面的联系。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上去把握，才能真正符合“观察的客观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

制定民族纲领，必须切合本国的国情。列宁屡屡强调，如果谈到某一国家的具体的民族问题纲领，那就一定要充分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基于这样的分析，列宁还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特定条件下落后民族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设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过的。马克思在讨论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曾有过“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①]，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考虑。恩格斯也曾认为，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每个民族国家的特点，处于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国家或者刚刚踏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有可能“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困难和斗争。”[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遭到第二国际殖民地问题“理论权威”的攻击。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更是断言：“无论在什么地方，人类通过资本主义的痛苦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殖民地也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在那儿人们也不可能从荒野中跳入社会主义。”[③] 唯有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形成的特定国际条件下，只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牢牢掌握住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这一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③ 大卫：《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到共产主义。"[1]

（四）列宁为苏维埃政权制定新的民族政策

在十月武装起义同时召开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明确宣布苏维埃政权保障俄国境内各民族都拥有真正的民族自决权。11月2日（俄历）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11月20日，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布苏维埃政权将全力维护俄国各族人民的权利，并宣布完全废除沙皇政府签订的、又被临时政府确认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参与瓜分土耳其和波斯，承认波兰的独立和自决的权利，并先后承认了波兰的独立、乌克兰的独立，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独立。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俄国各民族之间新型的相互关系固定下来。

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存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5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们都与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缔结条约，形成军事、经济上的同盟。除此之外，还有参加俄罗斯联邦的鞑靼、吉尔吉斯等19个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统一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列宁亲自过问了俄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处理，领导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列宁认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便不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列宁又十分强调在实现各民族的统一时，必须采取完全自愿的原则，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暴力。从俄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列宁认为实行联邦制是适当可行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

的。在列宁的倡议下，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确认联邦制是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联盟的普遍形式。

在各苏维埃共和国酝酿成立苏联这一联合整体的过程中，发生了格鲁吉亚问题。1922年8月，成立了以斯大林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并由斯大林起草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各独立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按照这个草案的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也就是说，由俄罗斯联邦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去领导和管理其他自治共和国。这一草案带有明显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受到大多数民族国家，特别是格鲁吉亚的强烈反对，但是专门委员会仍以多数票通过了"自治化"方案。列宁是在哥尔克村养病的时候看到这一草案的，当即表示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他建议方案第一条中"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为"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并指出："依我看，问题极端重要。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①]

根据列宁的建议，斯大林表示愿意修改方案。但修改后的新的草案提出由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结成联邦。这就是说，新草案以"南高架索共和国联邦"代替原先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三个高加索的民族国家，这三个国家必须先联合成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然后才能同俄罗斯等结成联盟。以穆迪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因为要求他们也像乌克兰、白俄罗斯那样作为平等的独立共和国联合成为苏联，而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并受到党纪处分。穆迪瓦尼等人不服，不断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申诉。列宁当时病重，对格鲁吉亚问题深感忧虑和不安。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13页。

1922年12月30、31日，列宁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阐述了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批评了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泽等人在处理格鲁吉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大俄罗斯主义。列宁强调，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因此，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列宁指出，大民族即从前的压迫民族对少数民族要"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① 列宁认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是一件大事，不仅对苏维埃国家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不久的将来会登上历史舞台的几亿亚洲人民都是极其重要的。

第四节 由战争向和平转折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1921年，由于苏维埃俄国胜利地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军的武装叛乱，这就使得俄国人民争取到了一个十分难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列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失时机地向全党提出："目前政治形势的全部关键，就是我们正处在转折的过渡时期，正处在有着某些曲折的从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② 然而，转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俄国一度出现了政治形势动荡和喀琅施塔得兵变。流亡国外的路标转换派，欣喜若狂地期望俄国革命向右演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82页。

变。无产阶级文化派指责列宁"不懂文化革命"，攻击布尔什维克党是"附合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敌人"。党内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则挑起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议，力图影响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渡过转折这一过渡时期，就成为列宁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本节将主要阐述转折的客观依据，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以及围绕工会问题争论等问题上列宁丰富的哲学思想。

一、实现转折的客观依据

对于似乎是突然来到的重大转折，当时许多人都缺乏思想准备。一些人仍然迷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的军事手段，并把它加以扩大，变成长远的、经常性的措施。柯伦泰指责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充满机会主义气味"，"有可能使资产阶级重新站稳脚根，在俄国实现复辟。"[①] 施略普尼柯夫攻击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人"屁股坐得离我们革命的司机——无产阶级太远了"[②]。托洛茨基也持这种观点。另一些人则把转折看作是"标志着一个长期的无产阶级热月政变"，是"牺牲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靠拢"，例如路标转换派就是这样看的。党内更多的人是不能理解转折的必要性和实质，表现出茫然不知所措。其实，这一转折决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变化了的客观形势作出科学分析的产物，而且从根本上体现了列宁的一些根本的理论原则。

第一，要从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战争的胜利在俄国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一个被饥饿和严寒折磨得奄奄待毙的无产阶级国家锻炼得更加坚强。那么，创造奇

---

① 柯伦泰：《工人反对派》。

② 施略普尼柯夫：《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政权报告时的发言》。

迹的原因何在呢？“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摆脱了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够创造真正的奇迹。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实践证明：革命战争如果真正是由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的，是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①] 归根到底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在于它的阶级本质，在于它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权。

但是，国内战争一结束，长期遭受战乱的俄国人民，就强烈地要求安定的生活。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的极度破坏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存在的偏差，使得国内局势变得紧张起来。特别是广大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逐渐演变为普遍的骚乱和暴动。坦波夫省一个红军战士在信中甚至这样写道：“农民的情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在我们县不很快根绝这类现象（指征收余粮时滥用职权—引者注），那就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②] 1921 年 2 月，芬兰湾上的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农民的这种不满。虽然苏维埃政权派红军平息了兵变，但这一“晴雨表”反映的农民中的严重不满情绪表明，如果再不改变余粮收集制，工农联盟行将破裂。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从中吸取了重大的政治教训，认定必须适时地改变各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第二，认准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努力发展生产力。

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的占主导地位的一贯思想。既使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也没有忘记这一点。1919 年 6 月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重申他屡次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97 页。

② 参见《列宁的国务活动》，第 50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1] 因此，列宁总是千方百计地为争取那怕是暂时的和平而努力，以便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例如，1920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倡议，开始制定全俄电气化计划，但是没有多久，协约国就开始了一轮新的进攻。

1920 年末 1921 年初的俄国，苏维埃政权虽然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干涉，但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战争使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就总的生产水平而言俄国倒退了几十年：1920 年煤炭产量为 870 万吨，只相等于 1898 年的水平；生铁冶炼量为 11.6 万吨，比 1862 年减少一半；棉织品产量只相等于 1857 年的水平。1920 年的工业生产只相等于战前的 1/7。成千上万工厂的停工和倒闭，还造成工人阶级队伍的涣散，工人成分的改变和工人人数的锐减。例如 1913 年大企业中的工人有 240 万人，1920 年只有 132 万人。农业的状况亦十分严重。谷物和技术作物的播种面积缩小、土地耕种粗糙。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棉花、麻类、甜菜、烟草等技术作物的产量缩减了好几倍，大小牲畜头数也急剧减少。广大农民生活十分艰苦，工业品和必需生活品奇缺。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就具有首要的政治意义。

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列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大工业，有了这个基础，无产阶级才会不丧失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只有恢复和发展大生产，以农民生活上、经济上需要的工业品来交换粮食，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需要牢固的经济基础，如果不把国家经济转到现代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回到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面临世界资本主义的威胁，列宁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

---

[1]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9 页。

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列宁非常坚决果断地实现从军事战线向经济战线的转移，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①

第三，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新估计。

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虽然批判过布哈林等人所主张的欧洲革命马上就要爆发的主张，毅然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但是总的来说列宁对国际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当时确实出现过匈牙利和德国等国的革命，列宁曾据此认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期不远，"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② 然而，随着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相继失败，列宁重新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势作出了新的估计，认为不能期望欧洲在近期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并获得巩固的胜利，"现在，我们是通过自己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发生我们的主要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的、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以取得胜利。"③ 这仍然是一场斗争，各种反动势力"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正在戒备着呢！"④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73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541—542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3页。

二、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

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政治活动的重要部分。它是围绕着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建设和发展科学文化这个中心进行的，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创造性地论述了对待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化队伍的建设问题，从而成为选择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里程碑。

（一）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活动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指的是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它建立于 1917 年 9 月，1932 年解散。十月革命后，由于广大工人群众迫切需要科学文化，它迅速成为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组织，在全俄各地的组织最多时达 1381 个，参加各种活动的人数达 40 万人，有自己的工人文化宫、文化团体、大学，定期出版《无产阶级文化》、《未来》、《汽笛》等近 20 种刊物，并拥有好几个出版社。成立初期，它对推动苏维埃文化的建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列宁对它亦是爱护和支持的。但是，由于它的主要理论家和领导人——亚·波格丹诺夫、瓦·普利特涅夫、彼得别杰夫——波梁斯基、帕·别萨利科、凯尔任采夫等人推行一条错误的路线，使这个组织逐渐蜕变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派别。它波及国外，在英国、德国、捷克等国也都相继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20 年 5 月，在莫斯科甚至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

波格丹诺夫早在“前进派”活动时期就开始鼓吹建立所谓的“无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科学”、“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文化”，认为旧的文化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包含着危险性”。1909 年，他在意大利喀普里党校期间以及后来在卡普洛尼亚城为工人创办的学校里，都一直宣传他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又先后出版《组织形态学》、《组织科学

纲要》等著作，将“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他被公认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家，甚至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讲习班中，“普遍组织科学”被宣布为教学的必修科目。

列宁很早就注意波格丹诺夫的理论观点，并不时给予严肃的批评。1908年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波格丹诺夫鼓吹的马赫主义哲学——经验一元论进行了批判。1910年3月，列宁在《政治家的短评》一文中指出：“所谓‘无产阶级哲学’其实指的就是马赫主义”；而关于“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文化”的词句“正是用来掩饰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1]。1919年5月6日，列宁在给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词里，鲜明地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某些领导人“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做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拾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2]但是，由于国内战争的原因，列宁没有可能花更多的精力去抓文化工作。直到1920年秋天，国内战争行将结束，随着党的中心任务逐渐转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也突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派”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矛盾也就逐渐尖锐化，列宁为此也更加重视对“无产阶级文化派”错误的批判。

1920年10月，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指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去大会上讲话，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但是，卢那察尔斯基的讲话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列宁看了报道后亲自起草了决议草案，严肃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企图，如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坚决反对“把教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45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817页。

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的错误主张。同一时期，列宁还发表了《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其中也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派"拒绝一切文化遗产的荒唐主张。1920年12月1日，俄共中央根据列宁多次批评的精神，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把资产阶级哲学观点（马赫主义）塞给工人。而在艺术领域里，他们则给工人培养了一种荒唐的、变态的趣味（未来主义）。"[1] 决议宣布，布尔什维克党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批评，并要求取消对他们的批评。12月8日，党中央驳回了这一要求。但是，他们受到布哈林的支持。俄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列宁起草的决议时，布哈林给列宁写了一张便条，认为"'获得'整个资产阶级文化，而不破坏它，正像'获得'资产阶级国家……一样不可能。"1922年11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要求在协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清除小资产阶级市侩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毒害，在思想上对一切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波格丹诺夫等）赝品代替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企图进行反击。"[2] 1922年9月27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新任主席普列特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在思想战线上》，说什么"在革命后的第五个年头，意识形态问题上升到首要地位"，"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本身"要求"进攻资产阶级科学"，"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文章指责列宁"附和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敌人"，"不大考虑文化问题"。普列特涅夫认为，"要把现有的全部力量投到战斗

---

①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见《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33—134页。

② 参见《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第137页。

中去"，进行一场所谓的"文化革命"。[1]

列宁在病中读到普列特涅夫的奇文，用铅笔在边上作了许多重要的批示，严厉批评《真理报》为什么要刊登"这类昏话"。在列宁的具体指导下，克鲁普斯卡娅、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雅可夫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先后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俄共（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雅可夫列夫的文章《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该文是同列宁作了五次谈话以后写出来的，得到列宁的审阅和赞同。文章明确提出，这场争论"是对待科学的两种相反态度的对立"。

（二）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伪造和玩弄

"无产阶级文化派"把自己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抽象地看这并非错误。问题在于他们认为"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2] 从而把无产阶级文化视作某种类似化学反应剂的东西，它只能靠专门"精选的力量"在与世隔绝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实验室"中获得。这就导致虚无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包括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虚无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他们在"科学社会主义化"的总口号下，要求"全面对抗资产阶级文化"，煽动无产阶级像信教的人对待异教一样，"斩断与过去文化的一切联系"。弗·基里洛夫在全俄代表大会的发言中硬说，"我们不需要"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并在《我们》一诗中宣称："我们极度激动不安，'你们是扼杀美的刽子手'！——让他们去喊叫。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的绘画，毁掉博物馆，踩烂艺术的花朵……"[3]。在一股疯狂激情的支配下，有人提出使用

---

① 《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第67—81页。

② 普列特涅夫：《在思想战线上》。

③ 《未来》，1918年俄文版，第2期，第4页。

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情，需要把它挖掉，重新建筑“无产阶级铁路”；有人说俄罗斯的语言充满“贵族”和“奥勃洛摩夫”精神，应“炸毁它”，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语言”；有人甚至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否定资产阶级的体育”，“按无产阶级的方式”进行体育比赛。列宁愤怒谴责这类“昏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可是在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1]

首先，“无产阶级文化派”在“科学社会主义化”的口号下，不仅把阶级特征机械地扩大到整个艺术和文化，而且还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混为一谈，把自然科学、技术连同过去的文化都认为属于非无产阶级的现象，要求对它们加以拒绝和破坏。在普列特涅夫的文章中写道：“科学的社会主义化则包括它的本质、方法、形式和规模。我们的任务是使科学的内容和方法同社会主义生产对科学提出来的那些要求相一致。”[2]

对于这种要求把自然科学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抛弃的主张，列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干的一件大“蠢事”。亚·雅可夫列夫在《论“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长篇文章中，按照列宁的指示精神写道，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化”的问题，是一种“无望的，有害的混乱”。因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忽视了“科学要同技术及国家的经济相联系的问题”。雅可夫列夫着重指出，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它的发展直接与生产力相联系。尽管阶级的世界观会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阶级利益会制约自然科学成果的应用，但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也不会直接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我们反对喋喋不休的空话，而主张必须掌握一切和生产直接有关的资产阶级科学，因为掌握这些科学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经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60卷，第463页。

② 普列特涅夫：《在思想战线上》。

济"[1]。娜·克鲁普斯卡娅也撰文指出，"不能过于肤浅地理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既包括道德和艺术，也包括科学"。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有关科学问题，复杂得多"。"精密科学是以许多世纪人类掌握大自然力量的经验为基础的。这些科学的材料受到经验的检验，每日每刻都由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过去许多世纪相比，它们能赋予人们巨大的控制自然的力量。如果抛弃这些科学成就，那真是既可笑又野蛮。"[2]

其次，"无产阶级文化派"机械地把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混同起来，不懂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的辩证法。普列特涅夫等人认为，"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有着相应的不同的'认识方式'"，因此，经济基础的破坏，必然要求消灭旧的文化，进行"革命的突破"。[3]他们武断地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这样在生产中所发生的变革与科学中发生的变革之间划上等号的观点，是歪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例如，普列特涅夫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引用了马克思著名的原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会或快或慢地变化。"列宁在马克思著作的这段引文中关于上层建筑改变的速度（"或快或慢地"）的词下面划了两条线；在谈到上层建筑是一个庞大的现象，同经济基础是不能等同视之（"整个庞大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词句下面也划上了一条线。当普列特涅夫提出使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即不仅使法律政治，而且使科学、艺术和整个文化"社会主义化"，对它进行改造，即破坏和"建立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时，列宁在文章的页边上写道："紊乱不

1　亚·雅可夫列夫：《论"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2　娜·克鲁普斯卡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3　《关于纲领问题·科学问题提纲》。

清"[1]。

列宁早就对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进行批判。1908 年，列宁读了弗·舒利亚季科夫的《西欧哲学（从笛卡尔到马赫）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作者在这本书里安排了这样两组等式："组织者＝资本家＝精神＝唯心主义"；"被组织者＝工人＝物质＝唯物主义"。该书把全部西欧哲学归结为保护资产阶级的"私利和意愿"，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西欧哲学决不可能被无产阶级"当作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否则，就会陷入机会主义"。列宁指出："整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例证。它对各个时期、各种社会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不作具体的分析，只讲关于'组织者'的空话，只作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对比。"[2]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诸种形式虽然都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它们反映的内容不同，反映的方式各异，特别是同社会经济基础的密切程度是很不一样的，并且都有自身的特殊的发展规律。依照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的次序，一个比一个稍远些，间接的程度更大些。政治法律思想直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道德随之变化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本身的传统和习惯；艺术、宗教、哲学则需通过中间环节才能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因此，决不能把生产中发生的变革、经济基础发生的变革，与文化艺术中发生的变革直接划上等号，也不能从生产方式中简单地得出文化艺术的规律，不能把领导生产的方式机械地搬来作为领导建设新文化的方法。

亚·雅可夫列夫在文章中写道，不仅必须区分像法、艺术、科学、道德这些意识形态的不同部分的特点，而且还必须看到它们与基础、生产方式和社会变革相互关系的特殊性。不可能要求在进行革命的时候，立即要求在艺术和科学中发生急剧的变革，或

---

1 《列宁论文学和艺术》（[illegible]），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社，第 768、773 页。

2 《列宁全集》第 55 卷，第 464 页。

者企图采取社会变革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变革。在这一段时期，卢那察尔斯基也撰文支持列宁的观点，他反对那些叫嚷“搞文化上的十月革命”的人，以为可以在某个吉日良辰，同夺取冬宫一样来“攻克科学院或大剧院，以及按照无产阶级的出身在那里安排新人。”他嘲讽了这种思想，即无产阶级“一只脚踏进去之后，便能产生无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艺术。”卢那察尔斯基指出，文化领域里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突变；在这里只能加紧地去掌握过去的文化所创造的健康成分，“慢慢地、有计划的建设新的大厦”[①]。

“无产阶级文化派”用庸俗社会学的论点看待文化，导致他们企图直接从物质生产过程的技术中归结出无产阶级艺术的特点，倡导粗俗的、简单化的、形式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波格丹诺夫说：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实际原则的研究，不是基于“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和武装斗争的理论”，而是根据“机器生产的劳动技术”[②]。波格丹诺夫宣扬，达到“全人类”的途径是：无产阶级与机器之间“充满崇高精神的统一”和“均匀的集体意识”的协调教育。这种教育的基础是“在完成集体生产过程中劳动感受的根本一致性。”[③]普列特涅夫也宣称：“我们的斗争，争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斗争，正是以无产阶级与机器之间的完整坚强的统一为基础的。”[④]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家们根据这种观点来评判文艺作品的阶级性，认为只有拿铁锤的工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反过来说，只要是工人创作的，就一定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理论，列宁批注四个字：“一派胡言！”克鲁普斯卡娅也批评说：“艺术作品并不因为其创作者是无产者出

① 卢那察尔斯基：《再论文化问题》。
② 《无产阶级文化》杂志，1919年俄文第9--10期，第50页。
③ 波格丹诺夫：《集体主义哲学概论》，1909年俄文版，第117页。
④ 《熔铁炉》，1919年，俄文第4期，第30页。

身，就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因为它渗透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不是每一个无产者都很自觉，也不是每一个都体现无产阶级心理、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渗透了小市民的思想意识，有些无产者同无产阶级的理想、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坚毅精神格格不入。”[1]

再次，“无产阶级文化派”否认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否认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他们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不要任何继承。”根据“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念，每一个阶级的文化都是严格独立的，都是封闭在本阶级内部的，它不可能为其它阶级的代表所理解，也不可能被他们所利用。因此，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吸收资产阶级文化是一种不堪救药的倒退”[2]。他们主张在空地上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

这种观点看起来很“革命”，但如果真的照此去做，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就根本无法进行。事实上，每一时代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都同过去时代的思想成果有着这样那样的或多或少的联系。每一时代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在认识和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时，都要批判地吸收前人所创造的有价值的成果和思想材料，从而才能把社会的科学文化向前推进一步。这是社会意识发展的一条规律，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先进阶级，她理应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继承者。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批判。1920 年，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

---

[1] 娜·克鲁普斯卡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2] 《无产阶级文化》，1921 年俄文版第 20—21 期，第 51 页。

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1]10月，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再次强调："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 列宁特别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粗野的、不文明的、一半是文盲的、贫穷的国家，谁如果真正是要为无产阶级文化而努力，就应该善于争取资产阶级的文化。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使资产阶级文化的优秀成果变为广大群众的财富。

当时和列宁一起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的还有俄国其它的理论家。任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司司长的瓦·勃留索夫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当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代替时，我们能从过去吸取一些对今天有益的东西。我们看到，我们的文化若能从过去的文化中汲取全部精华时，一般来说，它将成为丰富的文化。这样，彻底摧毁旧文化和重新创造新文化的企图往往延缓人类的发展史。"他举例说，罗马文化曾被摧毁，而日耳曼人摧毁旧东西后，还是不得不重新再到罗马人那里去请教。因此，"无产阶级文化的成就取决于新世界能从旧世界汲取多少精华。"[3] 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348页。

③ 瓦·勃留索夫：《致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贺词》，载《文学问题》，俄文1958年第1期。

卢那察尔斯基尽管态度曾有所动摇，但也撰文批评了“庸俗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分子”，反对给全部旧文化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而加以抛弃。他反复地说明：“无产阶级应当从他们的几代祖先耕耘过的土壤里汲取全部养料。”[①]“在这一领域里，不曾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隔离的状态。”[②] 卢那察尔斯基称“无产阶级文化派”是“昙花一现的臆造者”。

再次，“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上犯有严重的宗派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新文化的建设只能依靠纯粹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把广大的劳动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排除在新文化的建设队伍之外。

普列特涅夫断言，“只有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列宁在“自己的”下面划了两道横线，并在旁边写道：“可是农民呢？”普列特涅夫认为：“革命的轮船只有用‘我们’的力量，用阶级团结的力量才能够建造起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农民、资产者、知识分子是格格不入的。”列宁在这段奇文的边上问道：“而造船者的％呢？”。苏维埃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工人阶级及其家属在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十五。普列特涅夫主张，“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任务，只有靠无产阶级出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等才能加以解决”，列宁在批注时写着：“十足的杜撰。”[③]

宗派主义的错误，首先表现在排斥农民。瓦·波梁斯基认为：“按社会本性的实质来看，专政的同盟者（指农民）无法理解工人阶级新的精神文化。他们总是处处打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阶级烙印”[④]。其次是拒绝知识分子，普列特涅夫“大胆地断言”：“绝大

---

① 卢那察尔斯基：《工人阶级的文化任务》。

② 《戏剧通报》1920年，第51期，第3页。

③ 列宁：《对普列特涅夫〈在战线上〉一文的批注》，见《列宁论文学》（二）。

④ 瓦·波梁斯基：《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旗帜下》。

多数的艺术家，即使他们在形式上入了党，按他们的艺术思想体系来说，也仍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者"①；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知识分子是不会理解的，……上帝注定他们装一脑子浆糊，我们的任务就是清除它。"② 这些主张充满了一种"左"的偏激成见，他们不懂得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同盟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并且根本否认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宗派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十月革命以前，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成立当初，宣布为"独立"的工人文化协会，不受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国民教育部的管辖，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十月革命以后，他们以布尔什维克党受到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为理由，声称党不懂得文化革命，继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无产阶级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在充分主动的条件下才能发展"③，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俄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信中指出："十月革命改变了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依然是'独立的'，但现在这已经是不受苏维埃政府管辖的'独立'。"④ 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作为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而存在。当时身为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曾一度错误地支持这种"独立"和"自治"立场。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从而挫败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企图。

---

① 普列特涅夫：《在思想战线上》。
② 普列特涅夫：《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右手和左手》。
③ 瓦·波梁斯基：《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旗帜下》。
④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三）"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哲学基础：马赫主义的组织形态学

"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虚无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主张，在哲学上的"根据"就是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的组织形态学。把马赫主义推崇为"无产阶级的哲学"，并且依据这种哲学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是波格丹诺夫一贯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对他的批评亦是不间断的。早在 1905 年革命失败之后，列宁就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波格丹诺夫 1909 年脱离布尔什维克派以后，就组织了"前进派"。1910 年列宁对"前进派"的立场作了如下的评价：'前进'集团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研究所谓'无产阶级哲学'和'无产阶级文化'等等任务，实际上"正是统统用来掩饰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1]。"前进派"垮台后，波格丹诺夫转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继续宣传自己的观点。1913 年波格丹诺夫发表了《组织形态学》的第一篇概要——《意识形态》。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首先在 1918 年《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艺术与工人阶级》、《论艺术遗产》、《无产阶级的艺术批评》等。接着又出版了好几部专著和论文集：《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科学》（即《组织形态学》第 1、2 册）、《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思想体系科学简明教程》、《生动经验的哲学》、《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经验一元论——未来的科学》等等，更加自觉地、系统地为"无产阶级文化"提供哲学基础，明确地提出了"组织形态学"。

列宁十月革命后尽管日理万机，仍然十分重视哲学理论。1920 年 9 月，针对"波格丹诺夫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的普遍流行，列宁决定重新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

---

[1]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245 页。

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1] 作为这本著作第二版的附录，刊登了弗·伊·涅夫斯基的文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僵化的反动派的哲学》。这篇批判波格丹诺夫哲学观点的文章，是根据列宁的建议和受列宁的委托而写的。起初列宁自己打算写评论波格丹诺夫作品的文章，特别是评论他的有关"无产阶级文化"的著作，为此列宁曾要求帮助他收集一些必要的资料。但是，列宁由于抽不出时间而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因此就把这一项任务委托涅夫斯基去完成，与此同时，列宁亲自领导起草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信中提出协会的领导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把资产阶级哲学观点（马赫主义）塞给工人。"[2] 并且正式解除了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担任的职务。

波格丹诺夫在十月革命后依然把整个世界归结为要素（感觉）。他在《生动经验的哲学》中写道："我们认为现实世界或经验世界是具有生动内容、具有构成这种内容的全部努力和阻力总和的人类集体的实践。"[3] 波格丹诺夫不承认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在他看来，"物质是能动性的阻力"；物质"不是别的，而是'集体劳动的努力'的阻力"。"人把自己的劳动——经验得以无限地发展的场所叫做自然界"；"在我们看来，宇宙是组织起来的能动性的不尽的洪流"；"世界的图景就是要素的组织形式的连绵不断的系列，这些形式在斗争和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它们以往既无开端，将来也无终结。"[4] 按照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人类经验的组织分为三类：人类通过技术，组织外部自然界；通过经验，使社会组织起来；通过意识形态，把社会经验组织起来。总之，他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5页。

② 《列宁论文学和艺术》，197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86页。

③ 波格丹诺夫：《生动经验的哲学》俄文版，第214页。

④ 波格丹诺夫：《生动经验的哲学》第55、44、240、241页。

认为科学文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人们有组织的集体经验，是组织社会生活的工具。他给组织形态下的定义是，即"关于组织自然界的一切要素，实践和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一般学问"，是"应当把人类的组织起来的经验系统化、科学化"的科学。

波格丹诺夫不但用"经验"、"要素"批判唯物主义，而且用"组织"、"结构"批判马克思的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所继承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有害的"。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考虑到"能动性的阻力"，没有考虑到"组织起来的过程"。波格丹诺夫说："如果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辩证法是通过对立倾向的斗争道路的、组织起来的过程。这和马克思的理解是否一致呢？显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讲的是发展，而不是组织起来的过程。"[1]

波格丹诺夫倡导的组织形态学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人类在其全部活动中，即在劳动和思维中，把那些由不同种类的要素构成的各种复合当作自己的对象。"[2] 第二，复合和要素是相关的概念，复合是一种分解为要素的东西，而要素是一些联合为复合的东西；阻力和能动性同样也是相关的概念，"阻力也是能动性，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能动性，即和另一种能动性是对立的能动性。并且因为世界或宇宙不外是"要素的组织形态的连绵不断的系列"，是"组织起来的能动性的不尽的洪流"[3]。所以组织形态学包罗一切科学的材料，是一门"绝无仅有的科学，它不仅应当直接制定自己的方法，而且也应当研究这些方法，使之统一，因此组织形态学是集科学之大成。"[4] 第三，这种集科学之大成的科学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呢？"为了转入组织形态学这个领域，必须撇开

---

① 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俄文版，第189页。
② 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第29页。
③ 波格丹诺夫：《生动经验的哲学》，第240、241页。
④ 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38页。

要素的具体的生理学性质，而代之以无关重要的符号，并且用抽象的公式来表示要素的联系。我们要拿这种公式同其他得出的公式比较，并通过这种方法作出组织形态学的概括，即提供关于组织的形式和类型的概念。"[1] 第四，"万能的"、能"适用于无数不同的场合"的方法，就是选择原则。选择的机制是广泛的，选择有保守和进步之分。"进步的选择改变复合的结构"，"保守的选择趋向静止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典型是稳定的均衡"。"积极的选择使复合的结构改变成更加不同的要素并且具有更加复杂的内部相互关系。消极的选择使复合的结构改变成更加相同的要素具有不大复杂的联系。"[2] 总之，选择是基本的普遍的机制，可以用它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第五，从基本的选择机制，又引申出侵入规律。波格丹诺夫首先提出了"有价值的联系"的概念。这是"我们关于组织起来的组合的思维形式"。但是由于在复合之间不可能经常建立这种有价值的联系，所以作为中介的复合，即这种侵入本身就成为必要的了。什么是侵入规律？波格丹诺夫堆砌了几十个时髦的术语，说来说去的大意是：物理世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物质是能动性的阻力，能动性就是阻力，而阻力也就是能动性，"不侵入是方向相反的能动性的互相破坏。"[3] 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是组织这些或那些能动性，组织这些或那些阻力。

用组织形态的理论来看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问题的建设，波格丹诺夫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的一种"组织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全俄会议上，根据波格丹诺夫的建议作出了《无产阶级与艺术》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就是："艺术通过活生生的形象和手段，不仅在认识领域，而且也在情感和志向的领域组

① 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39页。
② 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第1册，俄文版，第64、107、108页。
③ 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第2册，俄文版，第14页。

织社会经验。"[1] 创立无产阶级文化，就是要"通过新的形式改造和统一人类的全部经验。"[2] 波格丹诺夫不是把科学文化看成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能动的反映，不是把社会意识形态看成是对社会存在的历史的、具体的反映，而是看成组织经验的手段，而所谓经验就是人的主观感觉。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波格丹诺夫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问题。波格丹诺夫的下列哲学观点，直接支配着"无产阶级文化派"。第一，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波格丹诺夫说："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3]。第二，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波格丹诺夫不懂得相对与绝对的辩证法，用认识的相对性排斥认识的绝对性。第三，主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等同。他指责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已经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了"；必须加以修正。他认为："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等同的。"[4]

对真理客观性的否认，使得波格丹诺夫只是把科学文化看作是某一阶级"组织经验"的手段，其中并不包括任何客观的认识过程，没有丝毫客观真理可言。随着某一阶级的消灭，由这个阶级的经验所组织成的科学文化也就随之应当消灭。过去时代的科学文化、意识形态都是奴隶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经验"的"集合"，无产阶级自己的"经验"同历史上各个统治阶级的"经验"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将人类以往的一切"旧文

---

① 《无产阶级文化》月刊，1918年第5期。
② 瓦·波梁斯基：《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旗帜下》。
③ 波格丹诺夫：《经验一元论》第3卷，序言第4、9页。
④ 波格丹诺夫：《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的发展》，第37、51页。

化”、“旧科学”统统抛弃，创造出由无产阶级的“纯粹经验”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化”。而当波格丹诺夫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时，就必然使自己陷入绝对的怀疑论，陷入主观主义。这些哲学主张表现在科学文化上，就是虚无主义和宗派主义。波格丹诺夫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加以等同，在否认作为客观现实的社会存在时，一方面导致否认社会意识各种形态的历史的、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则试图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论证精神文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的直接依从性，否认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取消社会意识形态的自身的发展规律，把意识形态极其简单地归属于生产力。

波格丹诺夫忽视文化艺术的真实的社会内容，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组织形态的体系”，于是便着力去构想把人类以外的“僵死成分”和人类心理上的“感情的综合”协调起来的原则和结构。波格丹诺夫写道：“‘精神’创造的任何产物（科学、理论、诗歌、法律标准或道德标准）都有自己的结构，都是履行各种不同职能的被肢解的各部分总和，它们相互补充：‘它们的组织形态原则也就是每个生理机体的原则’”[1]。这种主张造成“无产阶级文化派”在艺术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倾向。

波格丹诺夫直接地把社会意识归从于技术和生产力，这是庸俗社会学的做法。从更根本的的层次上分析，波格丹诺夫又把技术与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看成都是“心理”对“物理”影响的结果，这则是历史唯心论。列宁批评波格丹诺夫把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相提并论，把社会生活转向人们的心理生活，运用生物学与生理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列宁指出：“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2]

① 波格丹诺夫：《组织形态学》，1922年俄文版，第2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5页。

"无产阶级文化派"把创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当作是改造社会的最强大的手段。在波格丹诺夫看来，这种文化是无产阶级与机器之间"充满崇高精神的统一"，它的基础是"在完成集体生产过程中劳动感受的根本一致性。"在这个过程中，机械技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创造出相同的集体，在这种集体里"组织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对立现象会消失。[1] 普列特涅夫则提出："而我们的斗争，争取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斗争，正是以无产阶级与机器之间的完整坚强的统一为基础的。"[2] 这些主张既有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又歪曲了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实践活动的实质。

近年来，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一些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人们对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又发生了新的兴趣，提出了新的评价。一些学者在论及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渊源时，常常提到波格丹诺夫和他的著作。人们认为，在这些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与波格丹诺夫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把他推崇为关于管理和联系的科学的奠基人。这里确实存在着术语上的近似："组织形态学"——关于结构的科学；"控制论"——关于管理的科学。人们强调组织形态学的非哲学性质，认为波格丹诺夫强调组织科学能够起"概括的方法论"的作用，是把世界变成"有组织的整体"的方法。这些看法，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评价，或许是有价值的，但是，波格丹诺夫的"组织科学"的抽象原则，在他那里与具体科学无关，是一些应当从外面"加进"具体知识领域里去的东西，这种看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至于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以及依据这一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根本主张，就其哲学倾向来说则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

① 波格丹诺夫：《集体主义哲学概论》，俄文版，1909 年版，第 117 页。

② 普列特涅夫：《加斯捷夫与维尔哈伦》，载《熔铁炉》杂志，1919 年第 4 期。

三、工会问题的争议中列宁的哲学思想

转折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正当俄共（布）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战争转到和平建设的时候，党内经历了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3月，持续了4个月之久。在这场争论中，列宁从哲学上首创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理论，论证了工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阐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这些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一）争论的过程和列宁的主要著作

这场争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托洛茨基挑起争论。随着国家从战争转向建设，1920年11月初俄共（布）召开了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主题是工会应当改变战时实行的军事化领导方法，扩大工人民主，托洛茨基提出反对意见，宣称工会面临“最深刻的内部危机”，主张工会迅速实现国家化和劳动军事化；要求按各个工业部门把经济机关同工会合并，执行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为此，他建议对工会进行“整刷”，把善于“拧紧螺钉”的人放到工会领导岗位上，保证工会的军事化，变成强制性的国家机关。这篇演说引起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等人的强烈反对，双方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在紧接着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提纲草案”：《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继续坚持“整刷”政策。这个提纲被否决，全会决定把工会问题提交一个专门委员会在小范围内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不赞成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诉诸广泛的讨论。但是，托洛茨基拒绝在该委员会工作，坚持要把他的意见在党报上公布。

第二阶段：争论公开化。1920年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决定把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评论。同日，在一次群众性集会上，托洛茨基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并公开发表了

这个纲领性的小册子。在这个会上托姆斯基也作了副报告。这就成为公开化的启端。在这种形势下，12 月 30 日，列宁在专门为评论工会问题而召开的俄共（布）党员联席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的讲话，参加了争论。布哈林等人在这个时候也组织了“缓冲集团”，客观上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1921 年 1 月 12 日，俄共中央全会决定，可以而且必须完全自由地进行争论，任何组织和派别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第三阶段：全党围绕工会的不同纲领进行争论。从 1 月中旬开始党内先后有八个派别提出关于工会问题的不同纲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等人共同签署的《十人纲领》，还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等人的“缓冲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诺根派、梁赞诺夫派、伊格纳托夫派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各种相似的观点开始合并，到三月初，只剩下三个纲领，即以列宁、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十人纲领》、《托洛茨基——布哈林联合纲领》、“工人反对派纲领”。在这期间，列宁的有关著作有：《党内危机》、《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并且于 1921 年 1 月 25 日写成重要的著作《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

第四阶段：争论的结束。1921 年 3 月 8 日至 16 日，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关于工会问题，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的拥护者作报告，托洛茨基代表《托——布联合纲领》派作报告，施略普尼柯夫代表“工人反对派”作报告。各派都另外推派两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开展辩论，并进行表决。结果 336 票拥护《十人纲领》，50 票拥护《托——布联合纲领》，“工人反对派”得 18 票。会上通过了以《十人纲领》为基础起草的《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以列宁为代表的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中的正确主张终于取得胜利。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和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

决议；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综观这场争论，托洛茨基主要在两方面犯有错误。首先，托洛茨基不顾大局挑起争论，并坚持使其扩大到全党的争论。虽然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允许的，但是客观上这却分散了党对当时最迫切的恢复经济任务的注意力，被迫把许多精力放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上。其次，托洛茨基在争论中提出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和"工会军事化"的主张，都带有强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左"的倾向，不符合党的中心工作转移的要求。在工会问题上争论的实质，列宁把它归结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①]

（二）首创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理论，论述工会的性质和作用

评价列宁在关于工会问题争论中的理论贡献，过去人们都认为是正确论述了工会的性质和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针对托洛茨基的错误主张，列宁认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②] 但是，列宁在作出这一科学结论时，还有更深的考虑，即他讨论的要害问题是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③]。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学说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首创的。列宁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④]，也不能包括广大的农民。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思想混乱"正是在这里。因此，要真正了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4页。

解这一场争论的实质，必须懂得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学说。这一学说的提出是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新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列宁在国家学说上的思想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学说的提出，有它深刻的理论基础。列宁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如下重要原理："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①] 出于这种最基本的考虑，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需要工会这样的"齿轮"和"蓄水池"，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愿实行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培养、造就、发现和提拔有组织才能的工农代表人物，让他们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和组织生产的领导工作。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决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中去，用强制的方法来对待群众。列宁认为，说服的方法应当是群众工作的基础，应当是作为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之一的工会的活动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学说的提法，体现了列宁在探索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科学文化还不发达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途径的思想变化。

变化之一：从人民管理国家的直接民主到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间接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明确

---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39页。

主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应该实行巴黎公社式的、直接依靠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他们总结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 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巴黎公社原则，实质上是实行人民自治的原则，是无产阶级直接民主的原则。公社意味着“真正的自治”，“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②]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一段时期，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采取何种政治管理形式，起初一直是从直接民主的角度考虑的。他肯定了十月革命前诞生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指出其阶级意义就是直接政权。在这种国家里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就是要“让群众自下至上地直接参加整个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③]。让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的机构。”[④] 与这一想法联系在一起，列宁认为，这个国家的管理成员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⑤]。为了发展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列宁曾论述了“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的思想，并且在工厂企业实施了工人监督和工人自治的措施。

但是，从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建设的发展过程来看，列宁的“继续巴黎公社道路”的直接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并未能深入持久地实践下去。大约从 1918 年夏天开始，俄国的政治管理形式就逐渐转移到了间接民主的轨道。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国内战争的爆发，需要一整套高度集中的战时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82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7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83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5 页。

其二，更重要的原因是俄国经济、文化状况比较落后，尤其是文化发展更加落后。在沙皇时代的旧俄国，成年居民中75%左右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由于文化水平太低，缺少管理经济、政治的专门训练，很难直接参加管理国家。列宁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者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根本不是法律妨碍了这一点，……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①]由于认识上的这一变化，从1918年中期以后，列宁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就逐渐走上了由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代表劳动人民实行管理的间接民主制道路。1919年3月的俄共（布）八大明确提出：要"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②]。这就是说，必须由党来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管理国家。与此同时则实行干部委派制，代替干部选举制。

变化之二：从工会"国家化"到工会"共产主义学校"论的转变。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这一认识上的重大变化，使列宁的国家管理思想更加符合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社会实际情况，从而产生列宁对工会这一最大群众组织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认识。1918年3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提出："工会正在成为并且应当成为国家的组织"[③]，甚至到1919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仍然提出，工会"应该在政治上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4—78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5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46页。

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工会必定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任务必定要完全转到工会的手里。”[1] 但此后列宁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1920年底发生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列宁明确提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应该成为把党和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应该成为国家政权的“蓄水池”。工会的职能主要不是管理，而是“学习管理”，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是“共产主义的学校”[2]。

工会是“站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传动装置”，这是什么意思呢？列宁解释说：“党是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而这个先锋队就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要实现这些职能，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也是新型的特别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那唯一能够领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级的群众。”[3] 那么，说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又指什么意思呢？列宁又解释说，这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共产党来实现的，它“不可能由包括这整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4]，更不可能包括劳动农民。一方面是“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5]；另一方面是这种专政又不能离开它的阶级基础，并“引带”农民。这就使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2、43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40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3—404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4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4页。

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复杂体系，“形成了一系列的齿轮”。在这中间，工会就是把先锋队和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以及这个阶级所联盟的农民，联系起来的“传动装置”，同时也就成为苏维埃政权的“蓄水池”，从中得到支持和力量。

托洛茨基在“整刷”口号下，要求把工会变成国家机关；又在“生产民主”的口号下，要求把工会变成生产管理的机关。列宁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现实的俄国不可能立即实行直接民主。列宁列举了当时的统计数字，大约有900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生产。即使把这个数目再增加十倍、甚至一百倍，能够“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同总数六百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①]，如果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比，那就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列宁强调，在国家的领域可以实行强制，对工会则不行。“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在这一领域内，特殊而主要的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②] 针对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十分严肃地指出：“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人口中只占很少数的情况下。”[③] 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主张行事，就必然会造成分裂无产阶级，分裂无产阶级政党和它们的群众，分裂苏维埃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的严重后果。

变化之三：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半年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感到官僚主义这个祸害。因为当时正处于自上而下地摧毁旧的官僚机构。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在1919年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2页。

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在新的党章里就率直地指出："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已部分地复活起来"，必须唤起人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到了1920年职工工会问题争论时，列宁对官僚主义这个祸害看得就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由于人们还不能都直接参加国家管理，而必须由少数人代表人民群众管理国家，这就有可能使某些干部蜕化变质，成为官僚主义者。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①，"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需要几十年的时间"③。

鉴于官僚主义的存在，列宁认为必须有工会这样的组织来"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④。从俄国当时过渡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列宁指出："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⑤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国家机器，只有通过工会联系群众，获得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才有可能杜绝毒害党和苏维埃的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总之，列宁在工会问题争论中的最大的理论贡献是，首创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理论，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也即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列宁的基本观点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4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47页。
④ ⑤《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页。

是：(1)"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是由党、苏维埃机关、工会等组成的"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2)党是这个体系中的领导力量。"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工会机构来实现的。(3)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必须有工会这样的"传动装置"。"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4)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苏维埃执行着国家职能。党的全部工作"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5)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它是"站在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它不是国家组织，却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起着联系先锋队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联系作用。(6)除了工会以外，还需要创造一些联系群众的机构，如"非党工农代表会议"等，"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满足群众的需要，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材来担任管理国家的职能"。列宁的这些思想尽管还是初步的，不完善的，但却为后人探讨无产阶级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留下了开拓性的意见。

(三) 论述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提出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

列宁在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争论中，精辟地论述了政治同经济的辩证关系。托洛茨基责难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是"从经济上"看问题。布哈林则全力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努力把双方的观点"统一起来"。列宁认为，这里存在着惊人的理论错误。"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①]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列宁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列宁指出，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①]

那么，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包括哪些呢？1921年初，经过工会问题的争论，列宁把政治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关系：“(1)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本阶级群众。(2)无产阶级对农民。(3)无产阶级（和农民）对资产阶级”[②]。这三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列宁讲政治占首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放在首位。例如，列宁在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这里所讲的“政治”，就不是直接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而是指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它的群众。列宁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灭亡)。”[③] 在以后的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列宁把“政治”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对农民的关系上，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利益，不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同样遭到失败。

列宁说政治占首位，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政治占首位和实际工作中把什么任务放在首位，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要求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从政治上正确地观察和处理问题，保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列宁认为，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完成两方面的历史任务，并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提到首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应当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放在一切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79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

工作的首位。而当这个任务大体上解决之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1]，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1920年冬，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列宁就曾强调，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他要求“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2] 并且批评那种使政治脱离经济的唯心史观，指出只有“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像是脱离经济的。”[3] 事实上，列宁反复批评托洛茨基，指出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提出错误的“整刷”工会的纲领，挑起争论，大搞派别活动，这样做的后果是干扰了当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布哈林自称是“辩证论者”，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布哈林哲学上的错误就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因此，列宁认为，如果“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4]。

布哈林在争论中说：“我认为绝对必要的——在这里被称做‘缓冲派’或缓冲派思想的东西，其理论实质就在这里——并且在我看来完全无可争辩的，就是无论政治因素也好，经济因素也好，都不能丢掉。”他又说：“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同志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不正确或第二个不正确，因为这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在“缓冲”集团提出的纲领的第六条中也写道：“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5] 针对布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⑤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451页。

哈林的这些议论，列宁指出："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①

布哈林的"逻辑"根据，是形式逻辑或者经验逻辑的论点，而不是马克思的辩证逻辑的观点。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证明。布哈林在争论的发言中说："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这样，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这样，谁就应当受到诅咒。'"②布哈林想以此说明，工会既是"管理机关"、又是"共产主义学校"；既需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又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只有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才能克服片面化，才是全面性的认识。

针对布哈林的这个比喻，列宁也通俗地解释了折衷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来压纸，可以用来装捉到的蝴蝶。玻璃杯可以作为带有雕刻或图画的艺术品。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②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452页。

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洞，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末，就是杯子底上有洞，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因此，列宁指出："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①]

批评了布哈林的折衷主义理论，列宁进而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他写道："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②]。列宁在提出这些观点之后说："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就目前的问题来说这已经够了。"[③]

根据列宁的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这里所说的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就是辩证思维的根本要求。辩证思维的特点是从对象的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中，从其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整体上、本质上完整地认识对象。

---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5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53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54 页。

它运用具体概念来把握具体真理。这种思维既不同于那种将对象看作是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也不同于那种把思维形式看作是既成的、确定的形式逻辑。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评价说："这不多的几行字，是列宁多年研究哲学问题，经常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经常'请教'马克思所得的结晶。这几行字扼要地指出了研究各种现象时应当作为行动指导的全部本质的东西。"[1] 这同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中的研究一脉相承，具有"总结性"的意义。

辩证逻辑的四点基本要求，从实质上来说是为了正确解决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从而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列宁认为，首先要坚持全面性的要求和发展的观点。客观对象总是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有着多样的属性和关系，只有坚持全面性，用发展的观点认识事物，才能防止片面、错误和思想僵化。但是，这种全面性和发展的观点同折衷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折衷主义貌似辩证法，它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的并列起来，无原则地把根本对立的立场、理论和路线机械地凑合在一起，其结果是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们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2]

辩证逻辑的第三个要求，坚持的是实践第一的观点。实践是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纽带"，不仅具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

---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48--349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88 页。

理的标准，既是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又是人的认识“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的标准”[1]。人的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因此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辩证的，既具有“确定性”的一面，又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既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实践检验真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因此，列宁要求学会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这样既可以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作斗争，又能防止把人的知识变成“绝对”，把人的认识变成恶劣的教条。列宁强调的是，不应当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社会实践，而应当把它看做是一个有结构、分层次的动态的体系。实践检验真理不是一次的、单一的活动，而是不断反复的、带有全面性的、不断发展的活动。正是在人的全部实践中体现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

辩证逻辑的第四点要求，可以看做是前三点的综合要求，即列宁反复强调的不能抽象地对待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个原理在列宁的毕生实践和理论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体现了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离开这一要求，就必然陷入“左”的或右的错误。违背、忽视或者遗忘真理的具体性，其表现是多样的：从先验的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搞纯粹的逻辑演绎，企求从一般的定义中寻求问题的现成答案；不懂得真理的全面性，不会从整体上看问题；不会把事物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把片面的规定性看成是独立自存的；不了解真理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导致真理变成谬误；不懂得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不懂得真理是不断发展的，把真理看成是僵死的静止，等等。在强调真理的具体性时，列宁总是同时指出，不能把它同无原则性混为一谈，决不应

---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第239页。

当歪曲真理的具体性，把它当作一种混世的庸俗手段，用来为错误辩护。

简短的结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泉源。列宁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始终围绕着探讨在落后的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的主题，是在与“左”的右的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对新鲜的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的结晶。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新条件下的运用，又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个时候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丰富多采的，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开拓精神进行哲学研究，大胆探索，善于思考，毫无教条习气。列宁的多方面的哲学理论，连同他的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将鼓舞人们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前进。

第三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1921—1922年底）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俄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实践与原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至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传统模式的空想性质逐渐暴露。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伟大气魄和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探索俄国的社会主义特殊道路，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社会主义在苏俄大地上的顺利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以及一系列经济思想处处闪耀着哲学光芒。列宁无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上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思想轨迹

列宁既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实践中他总是能及时地捕捉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思想及党的政策，使观念和政策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在本章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这点更为突出：社会历史出现重大转折，列宁的思想也在急剧地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有失误，但更有极为丰富精彩的创造。

一、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

（一）国内战争结束后的严重危机

1920年11月，红军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傀儡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从而结束了国内战争。这样，便出现了一种相对的、暂时的均势，“这种均势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①。于是，苏俄也就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列宁指出，现在“我们不仅有了喘息时机，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生存下去。”②

为了使苏维埃政权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去，布尔什维克必须面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而当时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在1921年的春天，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异常严重的危机。

这种危机首先表现在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上。在国内战争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结成了联盟，尽管分得土地的喜悦、对苏维埃政权的信赖支持着他们忍受牺牲，但是，他们的这种忍受是有限度的。战争的后期，农民中的不满以至反抗已经愈来愈多，奥格涅茨省的一个农民在给列宁的信中说：“与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强盗的战争已经三年了，这就需要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和忍受极度的困苦，而这一切给我们带来新的沉重的负担，一会儿动员马匹，一会儿动员耕牛，各种各样的劳役，无休止地征收余粮，等等，我们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一切重担困苦，但1920年对余粮征收额的增加是我们无力负担的，农村缺少鞋子、衣服和家庭必需的

---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4页。

工业品。"[1] 在农村中，瞒产和私藏、黑市贸易和消极怠工现象愈益严重，生产积极性也愈益降低。与战前的1913年相比，1921年播种面积减少了2000万亩，1920年的粮食产量仅为1913年的45%。农民的不满在一些地方以至酿成相当普遍的暴动。中央和地方都收到了大批农民的信件、申诉和请求书，反映在战争结束的条件下征收余粮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列宁把这些农民信件看作农民情绪的最好的"晴雨表"，促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农民危机，不然苏维埃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

其次，严重的危机表现在经济上。1921年初出现的经济危机，是直接由于连年战争和粮食、燃料短缺造成的。成千上万个工厂停工，其中包括许多大企业。就总的生产水平而言，俄国倒退了几十年：1920年煤炭产量为870万吨，只相等于1898年的水平；生铁冶炼量为11.6万吨，比1862年减少一半；棉织品产量只相等于1857年水平。1920年的工业生产只相等于战前的1/7。交通运输业陷于瘫痪。总之，生产力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随着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许多工人不得不自谋生路，正如列宁所说，工人阶级正在失去自己的阶级性，这是非常危险的。他指出："由于我们可悲的现实情况，无产者不得不采取非无产阶级的、同大工业没有联系的、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的谋生方式，不得不通过盗窃公共财物或在公有工厂中干私活来获得产品，然后拿这些产品去交换农产品——这就是我们经济上的主要危险，威胁着整个苏维埃制度生存的主要危险。"因为只有巩固的、团结的工人阶级才是苏维埃制度生存的根基，而现在"这个根基却正在消失"[2]。

---

① （苏）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48--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05页。

第三，严重危机表现在政治上。1921年3月，芬兰湾上的喀朗施塔得要塞的水兵发生武装暴动。反革命叛乱的头目打出“贸易自由、党派自由、选举自由”的旗号，提出“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纲领，引诱农民出身的水兵参与暴动。为了防止兵变蔓延，苏维埃政府在尽力避免流血无望的情况下，派红军平息兵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从兵变中吸取重要的政治教训：士兵的情绪从本质上反映了广大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强烈不满，为此，必须改变现行的各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废止和新经济政策的逐步实行

面对严重的危机，1920年底列宁就开始作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接见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及其代表团，审阅大批的信件，为俄共（布）的政策转变作了重要准备。列宁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摘记了从非党农民会议上听到的意见，其中喀山省的农民说：“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完。”[①]彼得格勒省农民说：“我们那里发生过把手枪对着人家太阳穴这样的强制行为。人们很气愤。”吉尔吉斯的农民说：“粮食收集得像扫帚扫过一样干净。一点也没剩。”[②]列宁把这些意见转发给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要求人们重视农民的情绪和要求。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列宁和俄共（布）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新举措，最根本的就是逐步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适应于新情况的经济政策。

还是在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在列宁的直接关心下，《真理报》就展开了关于经济政策特别是粮食政策问题的讨论。1921年2月17日《真理报》刊登了米·罗哥夫和彼·索罗金的第一篇文章：《是征集制，还是税收制》，文章建议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99页。

“为了加强农民经济，为了提高农民经济的生产率，余粮收集制这种由国家收集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应由实物税来代替。”[①] 列宁在接见坦波夫省农民代表时指出：“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我请求他们清醒过来并帮助自己的政权。”[②]

1921 年 3 月 8 日——16 日举行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列宁特别强调和平环境下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首先要发展农业，只有农业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和生产资料，工业才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发展农业，则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改变党的经济政策，废止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即苏维埃政府以粮食税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得一部分余粮，剩下的余粮则由农民自己支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卖。3 月 21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七天以后，苏维埃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 1921 年——1922 年的实物税额为 2. 4 亿普特，比实行余粮收集制时少征购 2 亿普特。具体说来，粮食降低 43. 3%，油料籽降低 50%，肉类降低 74. 5%，亚麻纤维降低 93. 3%。实物税法律的制定与贯彻，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这个法令给农村带来了安定，满足了中农的要求，给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量。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后，列宁在 1921 年 5 月发表了著名的《论粮食税》一文，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意义，尽管此时他还没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一术语（这一术语是列宁在俄共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首

---

① 《列宁的国务活动》，第 92 页。
② 《列宁的国务活动》，第 109 页。

次使用的)。同时，这篇文章不仅论述了新经济政策的战略依据，而且更深更广地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对新经济政策的诸多方面加以确定，从而使新经济政策更加完备。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以及其在苏维埃条件下的形式等等的规定，用租让制的办法，将一些有利于加速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厂矿、企业、油田、森林等等，按照一定条件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用租赁制的办法，国家把一部分中小企业出租给私人或合作社经营，这些内容使新经济政策成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收到了成效，1921 年度农业虽因遇到灾荒而歉收，但仍征得实物税 1．62 亿普特，通过商品交换的办法采购到 0．6 亿普特，第一年就取得好的成效。1922——1923 年度国家获得的粮食就上升为 4．3 亿普特，其它农产品的国家采购量也有较大增长。工人阶级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工人不断脱离本阶级的现象中止了。熟练工人回到了工厂。大工业开始活跃起来，国家的经济逐渐摆脱破坏状态。国际关系也得到了相当的改善，苏维埃俄国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举行了贸易谈判、租让谈判，签订了一些贸易协定，甚至被邀请参加热那亚会议。这些都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成果。

（三）总结经验，停止“退却”

1922 年 3 月 27 日——4 月 2 日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对一年来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进行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在会上，列宁正式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一再加以阐述。

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人们往往忽视新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并不善于加以抑制。于是，出现了随意扩大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危险：一些人甚至党内的某些高级干部一再地提出对资本主义成分再作让步、放弃对外贸易垄断等等建议，提出从新经济政策向所谓“最新的经济政策”过渡的主张。列宁批评了这种主张。他特别强调

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主要命脉之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保证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独立，保证本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然进行了很长时间。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党内也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格·瓦·契切林在致列宁的信中，建议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进一步的让步，甚至建议列宁退出共产国际。他还提出，为了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最好实行思想上的让步，同意对苏俄的宪法进行某些修改，以便让寄生阶级在苏维埃中有代表权。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建议，把几乎整个库兹涅茨克矿区和乌拉尔煤矿区、顿巴斯、许多条铁路等都租让给外国资本家。

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回到资本主义去”的希望，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不停地对此加以鼓吹。与此同时，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阵营中，复辟的希望也不平常地燃烧起来。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报》，巴黎的《路标转换》杂志以及在彼得堡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都直言不讳地说，新经济政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将向资本主义投降。他们提出了给私人经营以广大活动地盘的“慢慢驶向”资本主义的具体纲领，还有人建议，不要“禁止私人主动性”进入大工业，恢复土地私有制，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放弃计划经济，向外国资本屈膝。

针对国内外、党内外这种严重情况，列宁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原则性。他在“十一”大的报告中指出“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所有白卫分子都兴高采烈地说‘啊哈！你们退却了！’我们说：你们兴高采烈吧，你们以此自我安慰吧。只要我们的敌人不采取实际行动，而是在自我安慰，这对我们是有利的。”① 他强调“我们向资本家作让步这种意义上的退却已经结束”，他希望党代表大会“以俄国领导党的名义正式宣告：我们现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9页。

在可以停止我们在经济上的退却了。够了。我们不再后退了，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展开和部署我们的力量。”[①] 根据列宁的思想，“十一”大作出了如下的决议：“代表大会确认：党所认为的必须向私人资本主义所做的让步，应以过去一年内实行和规定的所有措施为限。因而，代表大会认为退却已经结束，当前的任务是重新配置党的力量，以保证切实贯彻党的政策。”[②]

所谓“停止退却”，并非放弃原来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列宁指出，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③] 所谓停止退却是为“退却”确定一个准确的界限，对新经济政策作出更为规范的规定。为此，列宁在1922年发表的大量文章、讲话中，不但深入地总结了新经济政策的必然性，而且总结了新经济政策的新鲜经验，阐发了新经济政策的定义、实质、作用，明确了新经济政策的确切内容和界限。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全面支持地方的主动精神，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④] 在1922年11月，列宁答复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⑤] 他一再强调这是由俄国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必须采取的特殊方式、方法，只有经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然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分册，第150—151页。（以下简称《苏共决议汇编》）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1页。
④ 《列宁文稿》第4卷，第70页。
⑤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63页。

而，这种对小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让步和退却应有一个限度，不能无限制地退却，越过合理的退却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就不可能最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

列宁提出“停止退却”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停止退却之后，党和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考查工作人员是否适当并检验决议和指令的实际执行情况上。他强调说：“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① 列宁多次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既有政权，又有各种资源，所缺少的就是文化，就是经营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② 突出的矛盾是大多数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文化水平低，不会管理。列宁认为，执政的共产党人能不能学会领导好经济工作，这些同私人资本主义竞赛的一场考试，是俄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举行的一场严格的考试。取得这场考试的合格，是不能靠“进攻”的办法的，而必须老老实实的学习。

二、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轨迹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全神贯注地探索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努力丰富、充实和修正这个政策，而且不断地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使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为了全面了解列宁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有必要回顾一下在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列宁过去的思考。

俄国是个落后的国家，它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肯定有许多独特之处。应该说，列宁早就意识到，革命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1918 年他在《关于俄国现时经济》一书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63 页。

中曾分析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列举了俄国在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 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 私人资本主义；(4) 国家资本主义；(5) 社会主义。并指出，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不同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这种特点决定了俄国在革命后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应先搞国家资本主义，以此为“中介”和“桥梁”，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当时设想，利用这个“中介”可以迅速地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垄断制，实现国家对生产和分配的直接、全部的组织与控制，从而比较快地实现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时列宁的设想有两个根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模式，另一则是俄国国情。他提出的目标虽然大体上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模式，但是根据俄国的国情，不能像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直接地过渡，而要通过“中介”和“桥梁”间接地又较为迅速地过渡。

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时期，苏维埃政权被迫实行行之有效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是这时列宁却产生了强化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在1919年初写就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他提出要“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

品”；“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①] 在这里，已经把“战时共产主义”看作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步骤。后来，他回顾这一时期的政策时曾概括地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②]

国内战争结束后，国内矛盾尖锐起来，严酷的现实使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能是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措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政策。1921 年初列宁在《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中首次提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低粮食税额、扩大农民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1921 年 3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在以后的许多讲话和论著中，列宁不断地愈益深刻地阐述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及其必要性、迫切性，逐步形成了包括改变粮食政策，给农民以经济流转自由，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使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对外开放，实行租让制，利用外国的资本、设备和技术力量发展本国的大工业；发展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的新的联盟等一系列具体政策的完整的新经济政策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必经之路，向全党提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正确执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执行的政策。”[③] 1921 年春天，经过缜密思考，列宁又根据俄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和面临的经济现实，反复论证，对新经济政策作进一步的改变，即从国家资本主义再退

①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88—9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18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327 页。

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列宁指出了新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1] 即把市场问题看作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之一。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具体实践，也是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探索。实施一年后，列宁又及时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这种总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确定新经济政策的内容界限，另一方面是确定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作用。

就前一方面来说，列宁在1922年宣布"停止退却"的意思是，过去苏维埃政权在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方面，跑得太远了；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政权从原来政策的退却；这种退却是正确的，但又不是无止境的退却。退却不能放弃最终目的，而且受目的的制约。所以列宁在为党的十一大所起草的报告提纲中说："对我们来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家减去向新经济政策作出的让步外，所'取得的'东西已经够了。"[2] 列宁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政策：

(α) 国家掌握土地

(β) 也掌握生产资料方面的一切命脉（运输业等）

(γ) 在小生产领域中实行自由贸易

(δ)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吸收私人资本（租让和合营公司）[3]

前两项是无产阶级国家"占有"的，不能无原则的退却；后两项则是"让步"给新经济政策的东西。列宁确定这一限度是为了反对任意解释新经济政策和任意扩大新经济政策的内涵。

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内涵，列宁更加精确地阐明了它的实质和

---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1页。

② 《列宁文稿》第4卷，第419页。

③ 参阅《列宁全集》第43卷，第427页。

意义。他指出："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① 新经济政策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目标，却根本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②

第二节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

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问题成堆，千头万绪，众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好像一团乱麻。然而，列宁是个杰出的辩证法家，极其注重和善于把握错综复杂的矛盾之网上的中心纽结。他明确地意识到经济建设即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并相应地改造生产关系，就是这个网上的中心纽结。

一、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

马克思早就指出经济领域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对于指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的和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③。这一经济基础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它必然通过改造社会来促进社会的大发展。

但是，这一根本任务的解决需要有一系列的前提。它包括相关的三重任务。列宁 1918 年说："任何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7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6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155 页。

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第二个任务也大体解决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1] 而所谓管理国家，“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的经济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搞好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2]

但是，只是在1920年11月彻底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之后，苏俄才真正开始了和平建设时期。这时，列宁不失时机地要求全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提前十年摆脱现在所处的悲惨境地和所忍受的饥寒。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任务，就会葬送一切。”[3] 对于革命政党来说，暴力只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它是新的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的前提，然而，新的社会制度能否巩固，从根本上说需要依靠经济建设。人民虽然能够忍受战争时期的牺牲，却不能长期忍受和平时期的饥寒。更不用说“我们现在落后于而且还将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就会被打败。”[4] 列宁明确地宣告：“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5]“目前政治形势的全部关键，就是我们正处在转折时期即过渡时期，正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54—155页。
② 《列宁文稿》第3卷，第47—4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42页。
④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40页。
⑤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37页。

处在有着某些曲折的、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期。"[1] 这也就是新时期里最大的政治任务，因此，一切都应以此为中心。列宁还特别提到，"应该注意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不仅把注意力转到生产宣传上去，而且把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组织起来"[2]。

可见，列宁认为，无论从唯物史观原理的指导意义上，还是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应该成为全部工作的重心。

二、过渡时期所有制的复杂结构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展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原有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离不开生产关系的改造。必须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建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新的生产方式。如果没有生产关系的改造，不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仍旧保留旧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而新的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则是所有制问题。那么，在新的社会里，所有制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在俄国这样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能否迅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设想呢？这是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迫切问题。

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实现的，它的胜利证明了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列宁很早就看到革命成功后改造旧的经济基础这一任务的艰巨性，还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就说过："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

---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141页。

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1] 后来他又曾说：“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忍不拔。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2] 尤其是在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之后，列宁更从实践中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时他更加实际地考虑了革命行动（夺取政权）及革命以后的政权行为在改革所有制方面所能达到的限度。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经常爱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明确地想到这个‘我们’究竟是指谁”，“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3] 因此，必须考虑俄国的现实生产力水平，从此出发，确定苏俄过渡时期的所有制结构，而不能一味从原则出发，不顾条件地强行将各种所有制形式迅速社会主义化。这样，在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多种经济结构并存的时期。后来，列宁曾称这种结构为“多层次经济形式”。

革命前的俄国就是一个多层次经济结构的国家。革命后，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是剥夺了大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生产资料，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过，这并不能立刻改变小农国家的根本特点。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大工业大部分处于半停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发展经济，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并允许小生产的存在和在一定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23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15—217 页。

程度上的发展。这样，过渡时期在改造原有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不是单一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结构，而是多层次的复合体，即包括了社会主义经济、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中小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复合体。其中，社会主义是全新的具有主体地位的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国家监督制约的资本主义，是小生产与社会主义的桥梁和中介，它也是新出现的经济结构；中小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小商品生产则是旧的经济结构中原已存在的，然而建国后情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农村。由于地主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之被剥夺，另一方面无地的农民也没有了，中农力量大大增强。这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前后相比较，小生产的经济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上升。

这种特殊的多层次经济复合结构，特别是小农经济占了国民经济的优势地位，使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自己的特点。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需要采用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1] 经济结构的多层次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它又和生产力一起决定了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既然俄国的情况是如此特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有如此大的差距，那么自然就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只有走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所谓间接的道路，核心内容就是指使非社会主义经济结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

---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50—51页。

主义。

三、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列宁指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①

国家资本主义，过去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列宁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允许国家资本主义存在，这在当时是极具创造性的思想，也是党内许多人所不理解甚至反对的。实践证明，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精辟见解，不仅是灵活的，而且是切合俄国实际的。列宁语重心长地告诫俄共（布）的党员和干部说："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② 国家资本主义当然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但它可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桥梁、中介、"前阶"。

这里，摆在列宁面前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区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不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这也是使许多人困惑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搞国家资本主义，从理论上与实践上能够允许吗？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国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6页。

家独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是由作为集体资本家的国家来监督和调节的，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根本不同，它是由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这是落后国家在革命成功后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列宁用以下的概括语言回答人们的疑问，他说："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大不相同，即在我们这里代表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取得农民完全信任的无产阶级。"[①]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论粮食税》的提纲中说："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可怕，而是符合我们愿望的。"[②] 在像苏俄这样的小农国家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也"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③]，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脉。在这样的前提下，苏维埃政权可以与国家资本主义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根本改造散漫的小生产的自发性、落后性、非社会性，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和最终胜利。在 1922 年的一封信中，针对布哈林等人的不同意见，列宁再次肯定："'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根据我的看法（为此我曾几次同布哈林争论），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术语，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术语，它可以迫使那些因循守旧的共产党员明白，新经济政策是在认真地贯彻执行。"[④]

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有多种形式，列宁认为，其中"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⑤] 就是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根据这种合同，资本家有权支配一定数量的东西，如原料、矿山、油田、矿石。……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9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38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21 页。
④ 《列宁文稿》第 10 卷，第 35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13 页。

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①] 由于国内的大资本家已被剥夺，所以这项政策主要是面向外国资本家掌握的，租让期限一般为20年以上。列宁解释说："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②] 针对一些人的疑问，列宁强调要从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是维持一个被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从而使敌人无法建立反对我们的联盟，使他们难以实行自己的政策，使他们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因为我们一旦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足惧的。"[③] 他认为，现在必须这样说，鉴于苏维埃政权因经济破坏和落后而面临垮台的巨大危险，只能这样提出任务：借助联合外国资本赶上去。

把一部分矿山、土地、森林、油田等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可能赚去200%、500%甚至2000%的利润。对此，列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由于世界革命还没有到来，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能使我们的技术赶上现代水平。"[⑤] 从眼前来说，要作出一定的牺牲以满足资本家的贪欲，但从长远来说，却能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达到现代水平，使工人阶级受到现代化的训练，掌握先进技术，培养出现代管理人才，从而巩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3页。
③ ④《列宁全集》第40卷，第117－118、376页。
⑤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8页。

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也就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使资本主义消灭苏维埃国家的意图化为泡影。所以，作出暂时的牺牲，是值得的。

与租让制相似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租借制”。所谓租借制是指苏维埃政府将国有的一些企业、森林、矿山等租给国内的私人资本家或合作社经营，签订共同遵守的合同，租借企业的期限最长为6年，到期收回企业。

当然，对于上述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加以适当控制，不能放任自流，要加强管理与监督，使之不超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列宁说：“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1]。

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是合作社。列宁认为，这种小业主的合作制是把由于余粮出卖自由而引发的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好形式。通过它，国家可以实现对自由贸易的监督；通过它，可以实现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通过它，还可以将小农经济逐渐引向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合作社的基础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它包括“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个小业主”[2]。它与租让不同，“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一旦获得成功，却能包括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根深蒂固的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4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4页。

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彻底铲除。""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①]

合作社为什么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呢？列宁解释说，尽管它之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是"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和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②]，但它的确也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因为"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事情也只能是这样。"[③] 这一论述表明，列宁认为把小业主归入合作社制的资本主义轨道以后，国家就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④]。它还可以成为国家联系千百万居民的桥梁。

国家资本主义的第四种形式是代购代销。"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⑤] 这种形式的实质不仅是利用商业资本家的资金，而且是利用他们的经营手段和商业经验。

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利用的经济形式，它的提出和实施是列宁的伟大创造。虽然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种种因素，租让制和租借制在俄国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截止1925年4月，工业企业中有91份租让合同生效，但在整个工业生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3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3—2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4页。
⑤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5页。

产中所占的比重不足1%。租借企业的产值也只占工业总产值的3%左右。但是历史实践越来越证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开创和启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小农经济及其改造问题

在上一世纪，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着小农经济，所以，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设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时，都曾考虑过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886年1月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说："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①] 在1894年的《法德农民问题》中他又说："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②]

小农经济终究要过渡到现代化的大农业，是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一个现代化工业占绝对优势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小农经济的改造问题的严重性不同，改造方式不同，完成改造所需的时间也不同。对于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为之提供足够的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以及肥料、农药等必需品；另一方面，农民在文化上极端落后，从认识上与心理上习惯于小农经济的劳作方式与生活方式，不可能很快地接受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由于农民是劳动者，对他们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必须经过示范，一步步地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在小农经济改造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

社会主义经济以前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期里，如何对待小农经济，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就成为苏维埃国家面临的一个严肃问题。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实行余粮收集制，当时农民忍受着巨大的牺牲。当国内战争结束后，工农矛盾，农民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矛盾便尖锐起来，这再次说明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不能操之过急。因而列宁便果断地中止了这种政策，制定并推行新经济政策。所谓新经济政策，其实它的主体就是对待小农经济的政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在这个过渡时期，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会采取从经济上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当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只要小还是小农，就必须保证小农经济有一定的流转体系，否则小农便不能生存。我认为这个问题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①] 因此就需要一方面给他们以经营自由，一定的周转自由，使其能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产和流通，另一方面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和产品。

这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必须正确处理小农所占有的余粮、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问题，正确处理小农之间的产品交换问题。列宁最初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来实现这种交换。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中规定：允许公民同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交换、买卖，既可在市场上、集市上进行这些活动，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开设小摊，或在室内商场进行买卖。合作社是实行产品交换的主要机构，经营用于产品交换的储备。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合同把进行交换的物资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在国家监督下执行这一任务。[②] 这种规定尽管允许小农自主经营

---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3－24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20—121页。

和自由周转，但这种自由的基础是工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后来在实践中，列宁又修改了这种设想与规定，提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内，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市场，通过商业，同农民经济建立联系。在列宁这一思想指导下，俄共（布）十一大（1921年12月）通过了如下决议："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①至此，列宁已经明确，从宏观上来说，工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应该在市场和货币流通也就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则应用经济手段面非行政手段对之进行调节。

当然，小农经济也不可能永远凝固不变，从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来说，仍然要对之进行改造。即使从近期来说，也要逐步地积极进行各种试验，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在这方面，列宁也有许多重要思想，这包括：建立生产资料完全由国家占有的、统一组织劳动、统一组织分配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由于在经济落后、缺乏先进技术设备的情况下，前种形式往往生产率不高，经济效益差，所以列宁不主张急于推行，而更注重后一种形式。

第三节 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商品、市场的关系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经济计划与商品、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列宁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这种转折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新的立足点，也给社会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37页。

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这些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贵财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从《哥达纲领批判》到“战时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生产和交换完全按照统一的经济计划进行。这是未来的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逐步消灭分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社会，所以，在未来社会的集体生产中，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个人所创造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换得的不是某种特殊的商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①] 这样，商品与货币便不再存在了，“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②]

1857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再次阐明上述思想。在这里，他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低级阶段尽管由于脱胎于资本主义而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的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7页。

余印记，然而，“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① 整个社会统一计划生产，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既然生产者不再交换自己的产品，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价值，个人劳动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社会根据个人劳动直接进行分配，当然就无需再进行商品生产了。

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全面研究，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以认为未来社会（包括初级阶段）要用完全的计划经济代替商品经济，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他们认为，商品生产是以私有制和由此而来的劳动划分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劳动的这种划分，这样，商品生产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私人劳动不复存在，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任何个人的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第二，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的必然表现，它必定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未来的社会必须避免这种灾难。第三，现代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从客观上要求整个社会的经济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公有制的建立为实行这种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社会保证，因为它消除了人们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从而可以使整个社会超越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一个总的生产和管理单位，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管理，每个人也从“分裂的个人”变成真正的“社会的个人”，进行直接生产和直接分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观点，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现实运动的分析中得出的，而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确是由于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而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对他们未来社会的设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要求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实现，预见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预料到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会具有积极作用，预料到会出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货币关系，那是不实际的。理论有待实践来检验、来修正、来发展。这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当然受到《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的强烈影响。直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基本上是按照"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的公式和"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式论述和设计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的。

1902 年，列宁在为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制定的第一个纲领草案中，提出以"产品生产"代替"商品生产"。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① 正因为如此，他在革命前就提出"消灭商品经济"的目标。比如，他曾说："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消灭商品经济。"② 甚至断言："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③ 按照这一观点，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再生产运动将取消"交换"这一环节，以直接分配取代之。

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列宁认为应采取谨慎的但

---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7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111 页。

又是坚定的步骤来逐渐实现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取代。在《苏维埃的当前任务》中仍然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明确地说，"正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才为组织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兽与兽之间的竞赛提供可能。"[①]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加速了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的进程。列宁在1918年受党的委托所起草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提出的战略任务是：第一，"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代替贸易"，为此，要"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即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引者），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把整个生产和分配严格地集中起来，只在各合作社之间进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从而代替交换和流通这个中间环节。只有这样，才能"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②] 第二，尽管"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货币是"剥削者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可以被用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所以"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③] 在此基础上，"依靠银行的国有化，俄国共产党将竭力实行一系列办法，来扩大非现金结算的范围和准备取消货币"，并进而消灭银行。[④] 综观列宁这一时期的思想，可以认为，尽管他对俄国的落后经济状况有所了解，尽管他认为俄国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但由于受《哥达纲领批判》的模式的影响，他仍然认为，过渡时期就是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的进程，只有消灭了这些，才能实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第90—91页。
④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47页。

现社会主义。

二、伟大的转折：列宁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联系

实践是人类最好的老师，然而，只有尊重实践的人，才能从那里学到真理。列宁就是这样的人。国内战争结束，他逐渐认识到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妥，及时地改变了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看法，从不再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进而认识到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存在着必然联系，直至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结构之一。正是由于这样，他才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商品的共性与个性：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的客观依据

现实生活提出的紧迫问题，使列宁改变了过去“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看法，而去研究商品的共性与个性，对商品经济进行再认识。这种探讨使他明确了商品经济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它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相联系。

首先，列宁认为，商品生产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就其现实存在来说，不存在抽象的商品生产，它总是和一定的经济形态相联系。从历史上看，可以与简单再生产的经济形态相联系，也可以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联系。基于这样的辩证认识，列宁认为，只把商品生产看作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是不对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存在和以往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商品生产。1921 年 5 月，在他所起草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中说：“同农民的商品交换”，这是“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商品交换是对工农业相互关系是否正常的检验，是建立能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货币制度的基础。现在，所有经济委员会和所有经济建设机关，都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1] 这段话包含着列

---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67—268 页。

宁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与货币问题的新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基础，因为工业与农业之间既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为了满足工人（城市）和农民（乡村）的物质需要，就必须进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就必须具有衡量二者比价关系的标准，这就是价值，以便进行等价交换。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要"建立比较正确的货币制度的基础"，也就是指的符合价值的规定，即以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为基础的等价交换原则，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原则，才能实现工农业产品之间的等价交换，才能使双方的利益得到保证。从这里可以看到，列宁已经放弃了消灭货币的社会目标，而是重新把货币当作商品流通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谋求建立正确的和稳定的货币制度，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流通的正常进行。

第二，商品、商品经济所以和社会主义有联系，其客观的重要根据就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这两大生产的基本部门不仅存在着社会分工，而且这种分工和不同的所有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业部门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而农业则是汪洋大海般的小私有制。对后者不能剥夺，而改造这种私有制，还需要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存在的必然性。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才能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的产品相互交换的问题，才能建立正确的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巩固工农之间的联盟。列宁指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①] 这样，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且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27页。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上，列宁认识上的突破，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不是一蹴即成的。1921 年春夏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列宁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总结，放弃直接过渡的想法，改变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计划，提出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但这时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没有直接同商业的作用联系起来，而只是退到了“商品交换”。此时，原有理论上的许多混乱仍然未能澄清。1921 年秋冬至 1922 年，是认识的第二阶段。1921 年 10 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① 实践表明不通过商业的商品交换是行不通的，只是这时，市场、商业的问题才从理论和实践上突出地提了出来。在这个报告的提纲中，列宁还写道：“我们知道，看到，说过：需要向‘德国人’‘学习’，需要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② 只是这时，列宁才实现了认识上的新突破，他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学说的实质才最终地表述出来。他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学习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关系，学会做经济工作。他说：“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③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运动过程的特点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2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50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193 页。

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可以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然而，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呈现出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因为这是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的商品运动。这一点，列宁是一贯强调的，最系统的表述是他在1921年给布哈林写的一个便条：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着

物质基础 { 工厂
铁路
对外贸易

结果：它手中掌握着商品储备和商品的成批运送（铁路运送）。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怎样处理这些商品储备？

把它们卖给

(α) 工人和职员以换取货币，或者不是货币而是换取他们的劳动。

(β) 农民以换取粮食。

怎么卖？通过谁？

通过代销人（＝商人），付给他佣金。

尤其要重视合作社（努力使每一个居民都加入合作社）。

为什么这不可能？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①

从这里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运动过程和苏俄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第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牢牢占据着商品运动过程的主导地位，因为它掌握着工业品的生产权、运输权、对外贸易垄断权、批发权、相当部分的零售权。只有一部分产品通过代售者，这部分虽然是非社会主义经济，但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二，社会主义的商品运动过程既反

① 《列宁全集》第50卷，第205－206页。

映了工业和农业两大基本部门、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也反映了工业内部的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列宁现在已经不仅认为工农业之间由于所有制不同必须通过商品流通手段来进行交换，而且认为在国营经济中的分配也必须通过商品流通的手段来进行。这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与商品经济的必然联系。第三，这样，商品流通领域就不但不是社会主义所排斥的，而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及商品经济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且有其新的特点，所以，列宁才提出改造旧的商业经济，建立“完全适应有保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商业经济”的任务。[①] 这里所说的“商业经济”当然可以作狭义的了解，但是，众所周知，主要职能为商品流通的商业经济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以，商业经济反映的决不仅是商业领域的状况，而是整个商品经济的状况。列宁的这一要求说明他已经不是把商品经济看作是暂时存在的经济形式，而是把它看作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形式。

（三）稳定货币的重要作用

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离不开货币。W—G—W 的公式是任何商品经济都必然遵行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也不例外。过去、在列宁设想消灭商品经济时，消灭货币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他转变了对商品经济的看法，确认社会主义下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时，便顺理成章地提出建立稳定的货币制度问题。

1922 年 11 月，列宁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们指出，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中，当时“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优秀力量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任务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

① 参阅《列宁文稿》第 10 卷，第 150—151 页。

那时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经济放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并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①] 在这里，列宁把稳定货币的作用估价得非常之高，甚至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正常发展的坚固基础。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②] 这就是说，只有使卢布保持长期的稳定，才能防止通货膨胀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恶性的冲击，才能避免不法分子利用货币的不稳定进行各种投机活动，扰乱金融。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商品生产的正常进行，保证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得以如数实现。

（四）社会主义企业必须"按商业化原则办事"

1921 年 7 月 8 日，列宁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拨出一万金卢布作为奖金，奖给一批按商业原则办得出色的企业、部门、机关。"[③] 这里所说的"按商业原则办得出色"是指根据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需要改善经营，实行经济核算，并有效地克服亏损现象。接着，在一系列的文件中，列宁一再重申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并于同年 11 月前后，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提要，题目就是《按商业化原则办事》。1922 年 3 月，在为俄共（布）十一大起草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决议中，把"商业原则"列入党代会的正式文件。在这里，列宁说："国营企业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④] 之所以要实行商业化原则，是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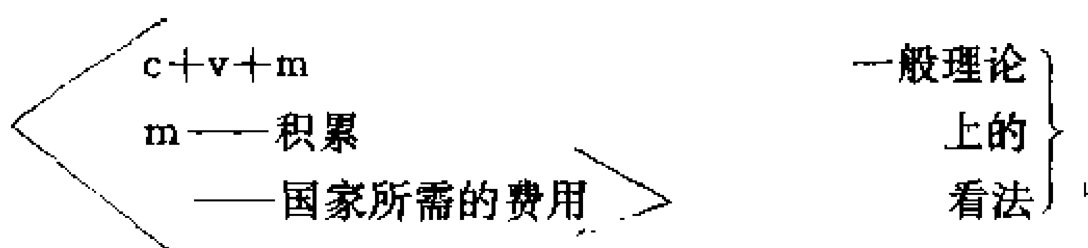
---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7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8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70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2 卷，366—367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366—367 页。

所谓商业化原则，就是指企业面向市场，按市场需要进行生产，实行经济核算，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在企业之间实行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的竞争等等。这实质上是要求社会主义经济生活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

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生活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呢？此时列宁已经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在一篇文章的提要中写道：

应当收支平衡



这段话表明，列宁利用《资本论》中阐述的劳动价值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认为，从一般理论来看，社会主义的产品的价值也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即物化劳动消耗（c）+活劳动消耗（v）+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因此，社会积累的源泉也是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社会再生产之进行，必然依赖于社会总价值的运动，依赖于两大部类的产品的运动，以求达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平衡和统一。他要求全党都要用这样的观点去观察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从而科学地进行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价值规律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它既在资本主义社会起作用，也在社会主义社会起作用。当然，在不同的社会里，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国家的。

① 《列宁文稿》第4卷，第288页。

三、列宁论社会主义计划与商品、市场的辩证关系

既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实行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即实行商品经济，那么，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商品、市场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列宁在这个时期极为关注和认真研究的又一重大问题。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是用计划经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的，它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既可消灭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避免各种危机和浪费，又可实现对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劳动者报酬的合理分配。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前，列宁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明确地强调要"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1]。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于计划经济的内容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比如，要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使之达到平衡。这里所说的平衡，既包括生产和需要的平衡，又包括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再比如，制定经济计划的科学化问题，提出要组织专家委员会对俄国自然生产力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注意计划工作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和改造各个部门，使生产力结构和布局中逐步趋向合理；等等。

当列宁认识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之后，并没有抛弃经济计划的重要思想，而是努力探索它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市场的关系，力图将二者协调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在俄国的具体条件下，经济计划与商品、市场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相区别，又相结合，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只有辩证地看待与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健康顺利地发展。具体说来，二者的辩证关系有以

---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

下的表现：

第一，经济计划是“总布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是实现计划的“途径”。

1921年11月16日，列宁在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说：“我觉得，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有必要作些补充。我认为，最好把应作的补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阐明新经济政策的地位、意义及其在总布局中的作用）插到某些章节里去。几乎每一章都可以（而且我认为应该）增加一两页，说明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行实现这个计划的途径。”①

这段话讲得非常明确，它说明，在苏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经济计划是必要的，是总布局，总的战略规定，商品生产和交换要在这个总布局中运动、发展，也就是受经济计划的规定、指导、调节，而不是自发地、无政府状态地运行。经济计划对商品和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具有关键作用的一环。

同时，商品和市场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可有可无的，它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不可或缺的。为了实现宏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必须通过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舍此而企图走社会的直接生产和直接分配的道路是不能成功的。

可见，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十分明显：经济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总体战略，但是，为了实现它，却不能依靠从上到下的层层计划来完成，而要依靠与经济计划不同的途径、机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看来是矛盾的，然而这种矛盾却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只有经济计划与商品、市场相协调，才能使国民经济计划落到实处。

列宁一再要求人们警惕计划的“官僚主义化”。他指出，经济

---

① 《列宁文稿》第9卷，第782页。

计划虽然关涉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总布局，虽然商品和市场必须受它的调控，但它绝不可“高高在上”，搞任意性，一定要避免主观盲目性。如果那样的话，计划就要落空，就会成为“官僚主义化”的计划。列宁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国家经济计划工作官僚主义化。这是莫大的危险。……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① 离开具体的商品经济现实，排斥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而订出的经济计划，只是一纸空文。如果硬要照了去做，就会给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文件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是不能臆断地、用理论的或官僚主义的方法拟定的。”② 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克服“官僚主义化”的措施，如“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③ 计划工作和计划机关经常“适应市场情况和市场关系”；国家“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总管理委员会的行政手段已经为机动灵活的经济手段所代替”④，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协调是经济计划科学制定和得以实现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经济计划便会成为官僚主义的空想。

列宁的上述思想是极富创造性的，对后人具有重要的启示。当然，由于实践的短暂和整个国内外客观条件的制约，列宁还不可能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继承列宁的思想，正在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实践。

---

① 《列宁全集》第50卷，第130页。
②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59页。
③ 同上书，第137页。
④ 同上书，第259—261页。

第四节 列宁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政权，不论从国际上来说，还是从国内来说，都与资本主义处于极为复杂的关系之中。在国际上，它像一个孤岛，四周则是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在国内，又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买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采取正确的策略对待国内外的资本主义，就成为极重要又极敏感的问题，而正确策略的确定又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的科学解决。

一、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努力争取自身生存的条件

列宁根据20世纪初的世界和俄国形势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在主要文明国家共同胜利的旧的论断，在理论上与实践上证明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这是他的伟大创造。同时，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就国家关系来说，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采取怎样的国际策略呢？

（一）国际形势的特点

列宁认为，策略必须依据现实情况确定。1921年3月他明确指出，国际革命并不是如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既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低潮，原来预期的世界革命高潮没能到来，那么获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只能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为了进行这种基础性的建设事业，就必须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国内战争的胜利，出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当然，所谓均势，也只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我认为，仅仅是在军事斗争方面国际形势中出现了某种均势。”“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相对的均势，一种

极不稳定的均势。”[1] 因为所谓均势并不是说苏俄的力量与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同等强大，“我们很清楚，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比我们共和国强大得多，完全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他们才无法继续对我们进行战争。”[2]正因如此，列宁认为目前的均势可能从两方面被打破：或者“在这些国家里迟早会突然发生暴动、大的战斗和革命”，或者帝国主义在国内形势比较稳定时对苏俄进行“新的侵略尝试”[3]。这就决定了均势的不稳定性。

尽管这种均势具有不稳定性，但它“毕竟是确定无疑，不容置辩的均势”[4]。它表明，在一定的时期里，无论苏维埃共和国和国际资产阶级，谁也不可能消灭谁，而只能共处于一个地球之上，这就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总的特点。列宁说．“这就是国际形势的本质”[5]。

(二)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所应采取的国际策略

国际形势的均势决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苏维埃共和国当然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因为国际资产阶级总是想尽可能地使用军事手段直接消灭无产阶级的共和国，所以，列宁强调：“我们的政策应遵循的第一条戒律，从我们政府一年来的活动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训，全体工人农民都应当好好领会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我们要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6]要对国际资产阶级中的“主战派”和“侵略集团的头子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努力防止战争的发生。利用一切可能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维护和平环境。列宁说：“今后我们将用一切力量

---

① ②《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38—3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39 页。
④ ⑤⑥《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325 页。

来维护和平”。①

另一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要对国际社会采取正确的策略，不能闭关自守，不能拒绝往来，而应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争取打破政治上的孤立状态，并参与国际经济联系。这是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成果所必须的。特别是要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就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以至人才，而这些东西的取得往往要以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为前提和保障条件。列宁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如果“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② 因此，列宁坚决批驳那种拒绝与资本主义国家来往的“左”的思想，积极创造条件，甚至作出某些让步，以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政治经济联系呢？列宁回答这个问题说：“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③ 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同我们分不开了。”④ 特别是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体系市场急剧缩小，逼迫它们不得不设法使苏俄回到世界经济体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我们是商人，现在缺少俄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必须与俄国谈判并达成协议。列宁敏锐地抓住这些新的动向，指出“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既然存在这种利益，那么，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很可能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32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31页。

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1] 在这里，列宁的思想极为清晰：在和平时期，国与国之间，即使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最重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关系仍然是经济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找到合作之点，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

在列宁这一原则思想指导下，苏维埃共和国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主动创造条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1921 年 10 月 28 日，苏维埃政府照会英、法、意、美和日本，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在欧洲建立和平和经济合作问题。1922 年 1 月，协约国各国在法国戛纳召开最高级会议，正式决定近期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有苏俄参加的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并向苏俄发出正式邀请。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国际策略的伟大胜利。更有意义的是，在戛纳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规定：一些国家不能干涉另一些国家的所有制、经济生活和管理方式；每一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制度。列宁认为，这一规定实质上是"承认两种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即私有制同目前只有在俄罗斯联邦实现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平等"，因而"不得不承认前一种所有制同后一种所有制平等地达成协议的必然性。"[2]

当然，在实行和平共处的国际策略过程中，充满了复杂的斗争。以戛纳会议和热那亚会议为例：戛纳会议虽然承认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原则，但又同时规定，只有苏俄偿还过去的所有外债并取消国有化法令，西方国家才能承认苏维埃俄国并与它签订经济合同。列宁尖锐地指出："俄国需要同资产阶级国家做生意。另一方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很清楚，没有俄国，欧洲的经济生活就不可能调整好。"双方是互相需要的，这是事实。"那些打算在热那亚向俄国代表团提出屈辱性条件的人是大错特错了。俄国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7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89—190 页。

不允许别人像对待战败国那样对待自己。”① 对于任何无理要求都要坚决抵制，为此，甚至“根本不要害怕破裂”②，而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反对偿还旧俄外债的无理要求，列宁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国内战争期间外国武装干涉给苏维埃俄国造成的损失。经过仔细调查，外国武装干涉给苏俄造成的损失达 390 亿金卢布，而旧俄所欠外债总数为 185 亿金卢布。苏俄据此向帝国主义国家的无理要求提出反要求。

当然，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真正实现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为了实现这种和平，首先，要坚持平等原则。列宁指示苏俄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要“尖锐地提出为维护和平而相互承担义务的问题”③，“只是在立即取得极其优惠的贷款的条件下，只有无条件地坚持在两种所有制之间签订平等的条约，我们才同意作出部分让步。”④ 其次，为了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要对西方资产阶级进行分析，区分那些好战分子和“和平主义者”，对好战分子要进行斗争，孤立他们，同时，“作为商人支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另一阵营即资产阶级阵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算在内）中的和平主义者”，列宁诙谐地说：“这既毒辣，又‘和善’，有助于分化敌人。”⑤参加热那亚会议前后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表现了革命原则性和革命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表现了对国际领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深刻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的高明策略。他的这些策略思想成为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问题的指针。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56 页。
② ③《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64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65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4 页。

二、要善于将苏维埃政权和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结合起来

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等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不厌其烦地教导全党，只有将苏维埃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快地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不仅表现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博大胸怀，而且体现了他对现实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

（一）观察问题的视角

列宁从来就极为重视唯物辩证法，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他对待任何事物都是认真地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把它当作僵死的，没有矛盾的，铁板一块的东西。他认为，观察问题必须从辩证法出发，保证“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对具体事物来说，就是要研究“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合。”[①] 在考察苏维埃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的分析就充分地体现了革命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在对这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完全立足于具体分析的认识基地上。这样来看资本主义，就可知道，它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集合物。它既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制度和现实力量，压迫国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实力量，同时又是占有了先进生产力，从而具有高度的劳动生产率、高度文明和很强的经济实力的制度和现实力量。只有全面地把握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各自的总体结构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列宁所要求的“全部总和”；只有在此“总和”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它们的关系，制定正确的策略，不仅抵制资本主义反

① 《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0 页。

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和活动，而且善于将苏维埃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结合起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

（二）在经济结构上苏维埃政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

在经济结构上，资本主义有没有先进的东西？苏维埃政权能否在经济结构上与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相结合，这是一个既严肃又敏感的问题。

抽象地讲，社会主义在一切方面包括经济结构应当都高于资本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因为它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时，现实情况就复杂多了。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多种经济结构并存，小生产占了优势，生产力水平低下。以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与资本主义相比，列宁非常清醒地指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除了一小部分比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先进的成分之外，还有大量的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的成分，所以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总体上来谈论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而得出完全实际的新认识。

列宁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①] 具体地全面地分析，可以知道，“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②] 在苏维埃俄国当时的情况下，小生产依然是占优势的经济结构，“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7页。

径、方法和方式。”[1]

在这里，列宁的思想很清楚：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不能使小生产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实现过渡，因此，就不能从抽象的脱离实际的“一般原理”出发，一概排斥资本主义，而要善于利用它。利用，就是既要发挥它的作用，又不能使之自由发展，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与它的正确结合问题，这里所谓的结合，就是列宁所说的“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2]。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由苏维埃国家监督、计划控制下的资本主义。这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结构意义上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有设计来说，是一种退却，但是其目的正在于更好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因而列宁说这是通过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3]。

形而上学者不懂得这种辩证法，有些人只“‘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4]，只去争议字眼，只讲抽象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完全无视苏维埃俄国的具体现实，对这样的思想僵化者，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抨击说：应当把一切手段都利用起来，“目的是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5]

（三）在技术、组织管理、资金等方面苏维埃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的结合

---

①②《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7页。
③《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1页。
④《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1页。
⑤《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0—221页。

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它在生产力诸要素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为了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列宁尖锐地提出能否“借助联合外国资本赶上去”[①]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租让等手段，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等，才能更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说：“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我个人都认为租让是必要的……对我们来说，同其他先进国家的国家托拉斯实行这种联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国的危机十分深重，没有外国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只输入设备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用更广泛的方式把企业租给最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租出四分之一巴库，四分之一格罗兹尼，以及四分之一我们最好的森林资源，这样来保证我们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②]。

苏维埃政权与这些东西相结合，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些东西主要是与生产力本身相联系，而与生产力的占有无直接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基本上是可拿来就用的。当然，资本家不会让你随便用，你要付出代价．代价有时还是十分昂贵的。列宁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能使我们的技术赶上现代水平”[③]。特别是在苏维埃政权无法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来克服战争及经济破坏造成的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经验等来恢复大生产，以便使无产阶级保持自己的阶级性。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甚至说：“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干其他一些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遭受破坏的情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8页。

况下必然存在的‘活计’。”[1] 从这些方面来看，苏维埃政权与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相结合，尽管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也是值得的。

列宁的实践说明，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别国人民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以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是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原先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振国兴邦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苏维埃政权与资本主义的某种联合。这种联合往往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再存在什么斗争了。国内外敌对分子还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噪：布尔什维克向资本主义投降了！列宁敏锐地看到这种现象的危险性，并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不断提醒人们：联合并不是放弃了长远的奋斗目标；联合也并非不存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

首先，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向资本主义投降，而是为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正如本章前而所阐述的，列宁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从利用资本主义来说，无非是为了在国家控制下、监督下发展共和国的经济，无论从工业、农业，还是从商业来说，最终都将发展苏俄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此，列宁主张对于资本主义作出某种让步，但绝不会任其自流，形成无政府状态。

其次，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必然包含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列宁并没把新经济政策看作阶级和平的政策，他很明确地说：“租让并不意味着阶级间的和平的到来。租让是阶级间战争的继续。”[2] 他要求“把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租让制同苏维埃观点结合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18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80 页。

起来”，“这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的形式变了，但它仍然是一场斗争。所有的承租人仍然是资本家，他们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则应当尽量利用他们的贪婪。”[①]他要布尔什维克们明白：“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②]“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③] 列宁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领域中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摆脱苏维埃政权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如果发展起来，就将逐渐争取农民，占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以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因此，他提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④] 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将资本主义严格地限制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规范之内，要求它们认真对待国家的法律和所签的合同，要“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⑤]只有将资本主义限制在这个范围内，才能使它对整体的发展不起破坏作用，而起促进作用，从而保证社会主义能够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6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8页。
⑤ 《列宁全集》第42卷，第428页。

最后，列宁认为，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关键在于农民。他认为，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① 这还是因为农民占了俄国居民的大多数，同时农民的生产方式——小生产又是一种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形式，它可能跟着社会主义走，也可能跟着资本主义走，因而在过渡时期争夺农民便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阶级力量必然进行的经常的复杂斗争。

第五节　列宁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探索俄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由此，列宁对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同时，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不论从静态的组合还是从动态的发展，都呈现出十分丰富的辩证特征，也给人们提出了深刻的辩证法问题，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由此，列宁又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一、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

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无论进行革命，还是进行建设，遇到的问题都是崭新的，都不能完全依靠过去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去解决，而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只有在按照俄国国情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才能顺利地完成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所以，列宁特别尊重实践，认为只有实践才能赋

---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9页。

予理论以活力，才能发展理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活生生的，具有指导实践能力的理论。还是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①]因此，必须根据实践用新方式提出问题，不然的话，“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②]。正是基于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科学认识，列宁才能打破传统的观念的束缚，得出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的结论，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

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更加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以及它的不断修正、完善和丰富，完全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时时追踪实践的步伐，倾听实践的呼声，并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解决。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时期，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在列宁的活动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头脑中当然也是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的公式”的。比如，在《国家与革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问题在于，列宁没有把这些理论当作僵化的教条，而是当作仍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发展的东西，认为理论的生命力存在于实践之中，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所以从始至终都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俄国的革命实践、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当实践证明某些原理不适用时，又毫不犹疑地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加以扬弃和修正。当实践证明俄国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分配个人消费品时，列宁首先提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9页。

出工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问题，允许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贸易自由。这时他明确地说："我们不应当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①] 当实践进一步突破产品交换时，他又不失时机地改变了原有的提法，用商品交换替代产品交换，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及市场问题提到突出的地位，指出"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②] 因此，"我们决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而应利用商业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立即活跃我们这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③]这时，列宁已经认识到，在俄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这样，当然也就不能消灭货币，而要坚决地过渡到货币形式的交换制度。从前后的对比中，人们可以看到，列宁的思想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尊重实践的结果。列宁曾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一本谈到新经济政策，"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④] 所谓自己找出路，就是在实践中探索俄国特殊的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9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4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50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第83页。

道路。

为了在实践中得到科学的认识，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既然马克思没有给也不可能给俄国共产党人指出适合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对原有的传统理论进行突破。这时，争论字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列宁告诫人们说："少争论些字眼吧。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毛病还非常大。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践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①] 实际经验是从实践中获得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才能逐渐获得与客体相符合的主观认识，从而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从而获得实践上的成功。因此，列宁说："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②]

尊重实践，必须尊重群众。列宁制定方针、政策和任务历来是从实际出发，为群众着想的。他指出，在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③] 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赤贫和饥饿，改善生活，因此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商业。因此，列宁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认为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④]

二、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创造性

尊重实践，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并不等于毫无主体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9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47—348页。

创造性的随机应付。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作用，因而是全部认识的基础。但是，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决不能消极地迁就客体，而要根据一定的目的积极地改造客体。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深入客体本质，取得对它的深刻认识，并且制定相应的理论与政策，采取科学的手段改造客体，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深刻地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①] 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正是依据主客体的这种辩证关系进行创造性工作的。

（一）既尊重实践，又超越实践

既然在实践中人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理论，同时又不是单纯的对实践的随机应付，那么，他就既要尊重实践，又要超越当前的实践，力求提出具有预见性的理论，提出赋有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政策体系，以便指导实践。这是主体在改造客体过程中的创造性的重要体现。列宁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创造性。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的提出和完善，对于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如农民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工会问题、商业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官僚主义问题等的分析与对策，无不体现了列宁理论上的创造性和具体政策上的现实可行性。在这里，以官僚主义问题为例来阐明列宁的这一特点。

1919 年 3 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发出警告：官僚主义正"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②]，到了 1921 年，他又说，我们对官僚主义"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③] 实践告诉人们，官僚主义现象在蔓延，官僚主义日趋

① 《哲学笔记》，第 238、23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408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18 页。

严重，危害很大。实践暴露了官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实践不可能自发地提供对官僚主义现象的深刻分析，也没有提出如何反对和防止它的方法，这些都需要人们超越实践去创造出来。列宁极为重视这个问题，他不仅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存在及其严重性，而且深入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必然性，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官僚主义在"我们这里"有其产生的经济根源，即"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①] 因此，"应当大胆承认这一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②]。在这里，列宁不是简单地对待官僚主义现象，而是运用理论和深刻的洞察力，对苏俄的官僚主义进行剖析，将其与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状况紧密结合起来，将它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及现实境况下来研究，使人们更深刻地看到它的危害性及存在的长期性，从而科学地对待它，提出恰当的对策。

(二) 既尊重经验，又超越经验

经验包括人在实践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改造客体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成果。在实践中，人的头脑总是积淀着以往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新的实践中往往起着影响作用。对待以往的经验，列宁是很重视的。但是他也看到经验具有滞后性。经验本身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稳定性的一面，又有将现实凝固的一面。而且，由于经验具有浓重的感性特征，只能片面地包含规律性、必然性认识。所以，人们要深切了解经验的这些特点，注意不被其所局限，密切注视活生生的现实运动。当现实发生变化特别是较大变化时，要超越以往的经验，更新认识，适应新情况，创造新鲜经验。当国内战争结果特别是广大农民对经济政策表现强烈不满时，列宁敏锐地抓住现实的新变化，提醒全党以往的经验已经过时了，必

① ②《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8、219页。

须调查研究，积累新的经验。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对新形势的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1921 年 2 月，列宁在指出这一新的转折时，曾说："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奇迹。如果在 1917 年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能同全世界打三年仗，战争的结束会使两百万俄国地主、资本家及其子女逃亡国外，而我们却会赢得胜利，那我们每个人都会不相信的。然而出现了奇迹，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中产生了一种抗击地主和资本家进攻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威胁到强大的资本主义。"然而，"正因为在这方面出现了奇迹，我们忽略了作长远打算。结果我们大家都弄得非常狼狈。"这里就是指的国内战争结束时所出现的危机。所以，列宁说："这次的党代表大会要早一点举行，因为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总结这个新的经验。"而"不能拿老的一套来对待经济工作"。[①]

经验的滞后性是经常发生的，不仅在"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时期是如此，而且在基本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方针以及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是如此。比如，从产品交换发展到货币流通的过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21 年 10 月，他尖锐地指出："现实生活使商品交换（实指产品交换一引者）失败了，以买卖取代了它。"[②] 当时的问题是："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③] 这一年的冬天，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新经验，又把原来的政策往前推进一大步："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现实，即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变成了事实"[④]。由"最近的试验所取得的成果"已充分证明"商品交换作为一种制度已经不适应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奉献给我

① 《列宁全集》第 40 卷，第 367—36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50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506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36 页。

们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现金交易"①。列宁就是这样敏锐地发现现实中的新情况，要求人们不要固守旧的经验，而要根据新情况，超越旧的经验，创造新的经验，以适应新的转变。

正是由于列宁时时注意运用辩证法的发展观去看待现实，看待经验，所以才能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经验，使新经济政策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理论和政策体系。

关心新经验的创造，也就必然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其所积累的经验。他曾极力呼吁："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模范的地方工作，哪怕是很小范围内的地方工作，往往比中央许多部门的国家工作具有更重要的全国性意义。"② 地方工作，直接面向群众，直接面向实践，最能了解生活脉络，最能直接总结群众的新经验，因此，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

（三）将一般与个别有机地结合起来

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创造性还特别表现于，将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有机地结合起来。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在客观上是密不可分的，世界上任何具体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体，正如列宁所说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③ 但是，在人的思想中却可以将二者分开，以便有利于深入事物的本质。当然，在分别研究之后，还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认识的复杂性，存在着割裂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危险性。当人们在头脑中复制客观图象时，这种割裂的危险尚不显明，一旦人们投入实践，这种割裂将造成严重失误。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3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21 页。

③ 《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01 页。

因此，列宁要求用辩证的观点科学地理解二者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探索俄国这种半文明国家的社会主义特殊道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就显得更加尖锐。从思想上说，"左"的和右的倾向都因为不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是将二者割裂开来，所以不能找到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列宁对此则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是存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①] 世界各民族或迟或早总要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一般规律。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只是存在于、体现于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之中，它在现实中一定是和各个不同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形式、过程、速度、特点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列宁要求在进行具体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充分发挥革命政党的创造性，将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有机地结合起来。列宁认为，甚至苏俄境内各共和国的具体情况也有很大差异，它们在具体的建设道路上也各有特殊性，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抽象的普遍道路去取代。他曾告诫高加索的共产党员们：要"懂得他们的情况的特殊性，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懂得决不可以照搬我们的策略，而必须经过周密思考改变策略，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0页。

条件。"[①] 他分析说，这些地区与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但"却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②] 由此出发就能知道，"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对于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俄罗斯联邦的特点。这就是必须懂得和善于实行的、跟我们的策略不同的策略。"[③]

在这里，列宁的思想是极为清晰的，即必须善于将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要将这二者有机地相结合，这需要实践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而决不能靠一般的抽象原理去发号施令，做依靠上级指示过日子的思想懒汉，也不能囿于个别地区的特殊情况，变成随机应付的实用主义者。真正在实践中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需有踏实的工作作风，又需要有极高的智慧。在这方面，列宁就是一个光辉的典范。

三、前进与后退、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辩证法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错综复杂，在它面前，人们往往眼花缭乱，思想困惑，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只有像列宁那样，善于分析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并且以之为根据，相应地得出主观的辩证认识，才能在变化万千的世界中游刃有余。

（一）前进与后退的辩证关系

前进与后退是对立统一的，无后退就无所谓前进，反之亦然。这种辩证关系本是极普遍的存在。但是，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人们却往往只希望前进而不愿意后退，这也是列宁在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1922 年 3 月列宁曾经分析过这种情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8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8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85 页。

况，他说："退却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在他们几年来习惯于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周围的各国革命家一心向往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他们中间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像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① 过去，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许多人就不理解并指责列宁的退却策略，现在，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又有许多人不理解列宁的退却策略而对之进行指责。为此，列宁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向全党解释前进与后退的辩证关系。

当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过程的主旋律是前进，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世界上事物发展的道路从来就是曲折的，加上在异常复杂的实践过程中，必要的退却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列宁用攀登高山来打比方："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这种后退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看起来似乎离目标也愈来愈远，但是，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沿着这条路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接地再次向前走，往上爬，登上山顶。"② 这一比喻说明，原定的道路不能再走了，只有寻找"绕行"的路。当然，退却，绕行，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前进，为了登上山顶。但是，目前退却却是绝对必须的。当进攻已不可能时，必须及时由前进转入退却，这是革命者必须具备的灵活性。列宁说："如果一支军队已经确信不能用强攻方式拿下要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447—448页。

塞，但仍然表示不同意撤出旧阵地，不去占领新阵地，不改用新方法来完成任务，那么对于这样的军队应当说：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些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或有过也是例外。"[①] 谁不懂得前进与退却的辩证法，谁就只能失败。列宁认为，在不利的情况下，只有有秩序的后退，才能更好地前进。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如此，他说，"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②]

既然退却是为了巩固前进所取得的成果，是为了更好地前进，那么，退却必然会有限度，它受到前进的目标的制约，不能成为无目标无限度的退却。登山不成，退却下山，从此永不攀登，就成了消极的退却，成为逃跑主义。列宁要求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要"准确地规定退却的限度"[③]。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退却是在什么问题、什么领域、什么程度上的退却，列宁当时强调在国家政权以及国家掌握的经济命脉上不能退却，退却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在国家与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关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问题上的退却。二是退却有其要达到的目的，一旦达到这个目的，退却也就达到了限度。正因为如此，列宁在 1922 年 3 月才公开宣布停止退却。具体说来列宁这时所指的退却限度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市场和商业成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基础。不能再越过这些往后退，那样就会放弃阵地，以至投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当然对于退却的限度应有正确的理解，不能把列宁所说的停止退却理解为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甚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3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9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88 页。

至重新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直接与间接的辩证关系

在探索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和前进与后退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直接与间接的关系问题。当初，如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沿着“战时共产主义”道路一直走下去，那就是直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后来，列宁和俄共改变了原来的路线，从“战时共产主义”后退了，改变到新经济政策，也就改变了直接过渡的道路，走了间接过渡的道路。表面看来，直接过渡的道路的“革命”性质极为明显，而间接过渡的道路则好像是泯灭了革命性质走了回头路，所以为许多人所不理解，“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悲泣、颓丧和不满”[①]，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甚至为布尔什维克“放弃”社会主义而拍手叫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列宁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乃木将军攻克旅顺口的事件为例进行说明。他说：“使我对这个例子感兴趣的主要一点，就是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使这位著名的日本统帅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了一些时日，正是这种办法完成了攻克要塞的任务”。“显而易见，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直接强攻的战术是错误的”。列宁认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国革命在解决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在这方面，十分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②] 这也就是直接“强攻”和间接“围攻”两个阶段。当现实生活证明直接过渡的道路行不通时，列宁果断地停止直接过渡，承认这种“强攻”的失败，并立即组织退却，转而采取迂回曲折的

---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17—219页。

间接过渡的道路，他的这种高度的革命灵活性中包含着对直接与间接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

在列宁看来，直接与间接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直接与间接都是相对而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个系统的实践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无论直接过渡还是间接过渡，都是相对于实践目标而言的。实践目标将直接与间接两条道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目标的一致性，即使在间接过渡阶段也决不能忘掉实践的目标。其次，在任何一个复杂的实践工程中，不可能将直接与间接绝然分开，因为实践工程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才能逐渐接近并趋于一致。为了了解客体的具体情况，了解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效应，主体往往首先采取直接实现目标的“强攻”办法。因此，即使这一阶段主体不能实现目标，遭到了失败，也仍然积累了对客体的认识，积累了对主客体双方力量对比以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迂回曲折的“围攻”方法提供了依据。在这一时刻，“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因而重要的在于“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列宁要求对失败“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从而“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① 在这样的过程中，“直接”往往成为“间接”的先导。

当然，在实践中究竟采取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归根到底取决于客观情况。就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来说，列宁认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6页。

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①] 只有采取间接过渡的办法。

（三）革命与改良的辩证关系

列宁明确地宣布新经济政策是“新事物”，但是这种新事物比起以往的革命（指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来，却是“改良主义的”[②]。在革命者听来，这话属于奇谈怪论之类，于是招来了“疑虑”，招来了责难，认为是放弃革命了。于是，列宁不得不对改良和革命的辩证关系详加阐述。

首先，列宁从理论上确定革命与改良的意义及二者的关系。他说：“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③] 而改良则是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就是说，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是对旧事物的改革，二者的区别在于方式不同。新经济政策所以是改良的，就是因为它“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④]

列宁对改良及改良主义的阐述已经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改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策略的基础，而“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现在，“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

① 《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7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44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45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2 卷，第 245 页。

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①]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证明，改良不仅是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而且是在落后的国家里改造旧的经济基础的基本方式，也就是列宁说的“逐渐地改造旧事物”的方式。

革命与改良是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所必须交替使用的策略。针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情况，列宁特别警告说：“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失败）。”[②]正确地把握时间、情况、活动领域，采取正确的改革方式，这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能够非常冷静地分析时间、地点、条件，从而正确决策。列宁深切地了解经济建设与政治革命、军事斗争有严格的区别，他也深切了解俄国的经济基础与西欧先进国家的经济基础的巨大差别，这些决定了俄国在革命成功后必须采取改良的方式。他强调全党一定要懂得在革命胜利后，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中所出现的新东西，从而用正确方式进行处理。

---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46页。

简 短 的 结 论

1921—1922 年是苏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关键性转变。这一转变是适应客观的社会历史状况的要求的，是与俄国的实际国情相符合的。它的实现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的具体情况的紧密结合，有赖于列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高深的哲学素养。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创造，它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第一次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列宁在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诸如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小生产的特点及其改造；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自由贸易和市场；国家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工农联盟；国家政权在建设中的作用；等等。这些也是列宁所直接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列宁无暇撰写专门的哲学作品。然而，列宁在解决诸多现实的经济及政治问题时，不仅出色地运用了他深刻的哲学思想，而且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解决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从而在一系列问题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概括地说，列宁在这一时期从以下这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结构问题；国家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创造性特征；前进与后退、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

辩证关系。正是由于列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才使他能及时把握客观形势的变化，适时地实现重大转变。因此，列宁在这一时期所提出并开始系统化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具有十分扎实的哲学基础，它从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四章　列宁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1922—1924 年 1 月）

列宁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①] 这就要求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索解决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历史新课题。为此，列宁晚期在健康不佳的情况下，撰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发展和检验了以往的理论，初步指明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政治建设的道路。所有这些理论和思想在当代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节　列宁的哲学遗嘱：在经济转轨时期战斗唯物主义的迫切意义

从 1921 年春开始，随着苏维埃俄国胜利地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列宁不失时机地实现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从军事战线转移到经济战线，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转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列宁在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密

①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406 页。

切注意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认为，解决历史提出的新课题，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否则，实际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新时期都十分重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列宁的倡议下，建立了各种研究机构；创办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杂志和党的杂志；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着手组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被人们看作是“列宁的哲学遗嘱”。它以犀利的笔锋、鲜明的旗帜，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流派的毫不调和的战斗精神。这篇论文是列宁对十月革命后哲学领域斗争的某种深刻的总结。它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纲领，论述了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一、《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的历史背景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的发表，正值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势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使得思想领域中的斗争激烈起来。针对这种状况，列宁着手抓思想理论建设。本文写于1922年3月12日，载于1922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主办的哲学和社会经济理论刊物。1922年1月创刊。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该刊为月刊，1933—1935年改为双月刊。1923—1930年末由阿·莫·德波林（自1926年起任主编）等人组成的编委会主持。1931年1月25日根据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议改组，由马·勃·米丁任主编。1944年由英·特·约夫楚克任主编。同年，按斯大林的指示停刊。该杂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至40年代苏联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变化，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刊物。1931年以前，杂志在捍卫唯物主义辩证法、反

对机械论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1931 年后，它在整理列宁哲学遗产、研究政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也反映出苏联 30—40 年代理论思想僵化的倾向。

这份新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一问世，就受到了列宁的关切和重视。列宁在这本杂志上写作和发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和直接动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形势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在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 3 期是为俄共（布）第 11 次代表大会（1922 年 3 月 27 日—4 月 2 日）的召开而出版的，显然，列宁在第 3 期上发表这篇论文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哲学战线一直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从 1921 年春开始，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全国广泛地推行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和发展经济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国家健康地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实行新经济政策，农民按国家规定交售一定的粮食税外，可以出售多余的产品。允许自由贸易、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等，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搞活经济，克服困难和危机，巩固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这对发展经济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由于经济上转向国家指导下的自由贸易、商业买卖和货币流通，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也随之活跃，各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趁机抬头，并且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思想和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剧烈起来。一些反对者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向资本主义投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某些“工人反对派”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情绪。一些外国报刊也竭力歪曲新经济政策，形形色色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大肆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这种状况必然会在哲学领域反映出来。彼得格勒的“哲学协会”、莫斯科的“精神文化学院”这些唯心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

堡垒，1917年——1918年曾一度停止活动，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唯心主义力图保持自己的影响，这些组织又重新复活。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杂志，如《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思想》、《俄罗斯思想》、《思想和语言年鉴》等等，公开散布唯心主义观点和宗教神秘主义。列宁在文章中提到的《经济学家》杂志当时也很活跃，该杂志的编辑是一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原来的企业主，他们利用这个杂志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露骨地攻击苏维埃制度。

“路标转换派”是这个时期颇具影响的一个思想政治派别，因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路标转换》文集而得名。他们承认反苏维埃武装斗争已经彻底失败，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在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上转换路标，充分利用新经济政策这个有利时机，复兴俄国工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尤·弗·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亚·弗·博勃里舍夫一普希金、尤·尼·波捷欣等人。路标转换派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为此，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并曾协助一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返回俄国。路标转换派中确有不少人愿意真心诚意地和苏维埃政权一起工作，有的后来成为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活动家。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1922年8月4—7日）在《关于反苏维埃的党派的决议》中正确指出：“所谓路标转换派迄今起了而且还有可能起客观的进步作用。这一派别过去和现在都团结着那些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同它一起复兴祖国的侨民和俄国知识分子集团。就这一点来说，路标转换派过去和现在都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路标转换派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也是很强烈的，路标转换派分子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样希望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

上也会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等等。”[1]列宁也指出：“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2]

列宁的这篇论文也是针对十月革命后宗教唯心主义在苏维埃俄国有相当大影响的现实情况而写的。例如，罗·尤·维波尔于1918年写的《基督教起源》，书中声称要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去建立他自己的“学说”。列宁在论文中提到的社会革命党人皮·亚·索罗金，在彼得堡大学校庆大会上居然公开号召青年人“以信仰宗教的态度对待生活”，帮助俄国“摆脱黑暗无底的死亡之谷，重新走上生活和历史的光明大道”。谢·尼·布尔加柯夫等人公开叫喊“要使宗教征服社会主义”，谢·柳·弗兰克等为“宗教神秘主义的复兴”而欢欣鼓舞。所有这些都说明思想理论战线斗争的激烈程度。

列宁以高度的智慧和极大的精力去解决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也没有忽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他清楚地分析了苏维埃俄国当时思想领域中斗争的新形势，并亲自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1921年8月在给Г·И·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中，列宁剖析了“出版自由”的口号。他指出，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这个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进步性；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制造舆论来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处于全世界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俄国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政治组织和进行反动宣传的自由，因此这是一个政治错误。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规定，应将色情和宗教内容的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分册，第237－2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93页。

书籍剔除，送去造纸。《对电影事业的指示》规定放映的影片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纲领性的文件，列宁写作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列宁写此文的直接动因是对《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2期合刊的两篇文章引起了注意。这就是托洛茨基写的发刊词和阿·季米里亚捷夫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合刊在编辑部的说明中，对这份杂志的任务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说明，并认为国内已经开始“暂时的平静”，应当用来“充实知识”。托洛茨基的文章虽然指出：“我们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前进。”“团结在我们杂志周围的并不都是共产党员，然而共同的哲学世界观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想成为只是从远处观察和研究我国社会思想发展过程、社会和阶级力量与倾向斗争情况的研究工作者，我们是战士，我们的杂志是为争取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斗争的杂志”。“在敌人阵营日益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早该展开战斗唯物主义的旗帜。”但是对于该杂志的具体任务却谈得过分抽象，缺乏现实性。这就构成了列宁写作的直接原因。在这篇论文的开头，列宁就表明要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刊词和托洛茨基文章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规定得更确切一些”[①]。列宁采用“战斗唯物主义”这一概念，针对的是路标转换派和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无党性原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性为依据的党性原则。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不仅对新的哲学杂志的工作内容和任务作出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试图回答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概括地说，就是组织好两个联盟：一个是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共产党外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另一个是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努力回答现实社会发展和自然科学发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3页。

展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宣传无神论，重视新道德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研究。

二、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共产党外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

列宁认为，党与非党的联盟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强调指出："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①] 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中需要党员与非党员的联盟。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同样需要党内唯物主义者和党外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是单靠共产党员哲学家就能取胜的，必须同一切拥护唯物主义的人结成联盟，以便尽可能地扩大战斗唯物主义的阵线。因为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特别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年代，具有哲学教养的共产党员更是如此。如果拒绝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就是使自己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陷入宗派主义的孤立，就会犯极大的政治错误。

列宁指出，这种与党外唯物主义者结成的联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俄国先进社会思想的主要思潮中，具有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从而为结成这个联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 19 世纪中叶，俄国出现了一批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家，如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反对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俄国不仅过去有一批唯物主义者，而且现在有、将来还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3 页。

会出现一批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因而，列宁把其视为联盟的重要基础，并明确地把结成这种联盟当作当时共产党人的绝对任务。

要与共产党外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是为了共同反对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哲学偏见。列宁强调指出："无论如何，我们俄国还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还会有——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而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有教养社会'的种种哲学偏见，是我们不可推委的责任。"[①] 列宁认为约·狄慈根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看法，即哲学唯心主义与宗教有神论有联系的观点。唯心主义是"科学的僧侣主义"，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唯心主义的哲学教授实际上大多数是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然而，俄国那些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却很不喜欢用狄慈根所作的评价来考察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列宁指出，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共产党外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偏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而不管他们是以官方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②] 自我标榜，都要坚决反对。

总之，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还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列宁都反对先锋队孤军作战。战斗唯物主义与共产党外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在这种合作过程中，既要坚持原则，贯彻自己彻底的路线；又要善于团结和争取党外的唯物主义者，从而加强共产党员同他们的密切联系，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完成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各项任务的根本保证。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5 页。

三、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列宁指出："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① "必须更多地注意这个联盟。"② 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必要的。

这是因为，一方面，战斗唯物主义只有正确地回答现代自然科学革命中，提出的哲学方面的各种新问题，才会具有战斗性，才能真正坚持和推进唯物主义。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态。如果唯物主义脱离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丧失其生命力和战斗力。列宁强调指出："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这一工作"③。还在 20 年代末苏联就已出现哲学研究脱离具体的自然科学的倾向。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企图在所谓"纯哲学"的范围内，不研究最新自然科学在蓬勃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丰富材料来进一步全面发展唯物辩证法这个重要课题。列宁继恩格斯之后注意到，自然科学中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产生了改变唯物主义形式的结果。崭新的发现不仅由于它们开辟了新的、迄今未知的物质世界存在层次而引起科学的革命变革，它们还暴露出新的方法论上的困难，向思维提出新的课题，因而科学中的真正革命也是科学思维中的变革。

从 19 世纪下半期起，自然科学上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如电子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8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8 页。

论、量子论、放射性元素、原子结构理论、相对论，等等，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哲学概括，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的急剧变革中，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往往歪曲地利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最新成就”替资产阶级及其偏见效劳，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攻。面临这种情况，战斗唯物主义者若不能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将会失去唯物主义的战斗性，失去迎战唯心主义的能力。辩证唯物主义者只有不断研究总结、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才能深入揭露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识根源，并深入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列宁指出：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①]。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家应该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才会有坚实可靠的哲学论据。列宁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②] 列宁向自然科学工作者指出，为了同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偷运反动哲学的种种表现作坚决的斗争，正确把握科学发展的进程与结果，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③] “不这样做，大自然科学家在作哲学结论和概括时，就会和以前一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自然科学进步神速，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革的时期，这使得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④] 自然科学家大多数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即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倾向。正由于此，战斗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9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9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0 页。

是可能的。列宁指出，自然科学家“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的哲学倾向。”[①] 但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往往缺乏坚定性和自觉性，因而经不起唯心主义的进攻。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列宁指出：“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这一论断已为无数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证明。自然科学家在进行研究工作，特别是对自己的科学成就做结论时，总是受一定的哲学指导的，不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会受别的哲学的指导。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一种趋势，就是一些大自然科学家很重视哲学的研究。他们不仅自己试图解决科学研究中出现的哲学方法论问题，而且还自觉地向哲学“求教”。例如，海森堡对古希腊哲学、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都很感兴趣；爱因斯坦常常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以往哲学家的思想，保·朗之万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等等。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尖锐的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科学家要真正走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道路常常是艰难曲折的。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自然科学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必须认真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总之，实现战斗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在合作过程中，既能使哲学家掌握自然科学领域的具体科学论据，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能帮助自然科学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繁荣自然科学的研究，从而会有力地推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

---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页。

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科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尤其在欧洲、在俄国，宗教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俄国由于沙皇农奴制的长期的反动统治，宗教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俄国，宗教势力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理论思想战线上宣传无神论、批判宗教唯心主义的任务相当突出。

俄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全国主要宗教有：俄罗斯东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犹太教和佛教。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也较多，占全国总人口将近一半。各宗教团体为培养神职人员创办了各级神学院和宗教教育机构。宗教中心出版各种神学著作、祈祷文、宗教杂志、教历等书刊，其中东正教的期刊就有六种之多。宗教和民族关系密切。在苏联108个少数民族中，一般都有传统的民族宗教。传统宗教与民族意识结合紧密，各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经常以宗教形式进行抗争，造成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十月革命后，宗教还日益向青少年渗透，混在宗教界中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思想家往往利用宗教，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干涉苏联内政，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因此，宗教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同时成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存在也具有历史必然性。宗教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它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消灭时，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还有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主要社会原因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群众生活水平不高，有些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就给宗教存在留下立足之地；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等还不时地袭击着人们，使一些人感到无能为力，惶恐不安，而求助于神或归之于命运；社会主义

制度还不够完善，民主制度和法制建设不够健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还不同程度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许多社会问题还难以完全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些都成为宗教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还有其认识根源：一方面是因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形成一种相当强大的习惯势力和社会力量，具有保守性、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还不够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问题，暂时得不到科学的证明，因而使人们易于接受宗教的影响。宗教还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外国宗教势力十分强大，它们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宗教渗透，向宗教界施加影响，这是宗教长期存在的外部原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列宁深人地了解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并认真地阅读了当时一些分析宗教的书籍，其中有阿·德雷夫斯《基督神话》和厄·辛克莱《宗教的利润》、罗·尤·维彼尔《基督教的起源》等等。列宁认为，这些书籍过于偏重理论，写得不通俗，不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其中还有不少庸俗的东西，和自然科学的联系也很差，揭示宗教的社会根源不够。某些负责同志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时，只把信仰自由理解为传播宗教观点的自由，忘记了开展无神论宣传。尤其在农村居民中，这一工作做得更差些。个别地方的工作人员，对教徒采取粗暴态度，企图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禁止教会活动等方式来铲除宗教。

列宁针对苏维埃俄国的这种状况，于 1918 年初领导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并倡导创办一份通俗的周报——《无神论者》，专门供广大农民阅读。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圣经是怎样一本书》，先作为短篇文章，在该周报上连续发表，后来又辑印成单行本，前后重版十次，在苏联农村中发生了较大的影响。1921 年 6 月党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在群众

中加强无神论宣传。列宁工作非常繁忙，他就动员有理论修养的老布尔什维克编写无神论著作。斯切潘诺夫著的《上帝的起源》就是在列宁指导下写成的。1922年3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战斗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①] 联系列宁以前的有关论述，现将其中有关宗教与社会主义关系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观点和政策概述如下：

第一，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列宁科学地阐述了"宣布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和团结信教的劳动群众的原则。他指出："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②]"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③] 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完全分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④]，"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⑤] 同时，列宁又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⑥]"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⑦] 这些

---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32页。
③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32页。
④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32页。
⑤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32页。
⑥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32页。
⑦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页。

原则都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社会主义时期制定宗教政策时所必须依据的。

宗教信仰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党和国家之所以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对宗教问题采取慎重态度，宗教信仰对广大人民来说，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世界观问题，只能用思想教育、书刊宣传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解决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通过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办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简单地禁止。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也符合宗教本身客观的发展规律。这对于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团结、对于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维护世界和平，等等，都有重大意义。

第二，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必须服从党的基本任务的原则。他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①] 而在阶级社会里，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根源，即资本盲目势力对群众的控制。所以，同宗教作斗争，"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②] 列宁多次提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该使反宗教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1页。

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1]。“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2] 在这里，列宁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有关宗教的各种问题时，必须服从和有利于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个事业，千万不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要地位，以分散真正的革命斗争。

第三，要防止和批判宗教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倾向。列宁在总结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布朗基派流亡者及杜林在宗教问题上的“左”倾观点时，明确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取缔或禁止宗教，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只能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列宁又总结恩格斯在反对宗教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观点的经验，明确指出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根本不同，并在原则上肯定了无产阶级应当宣传无神论。列宁特别指出，如果说西欧由于有资产阶级反教权主义斗争而转移了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因此，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争采取某种“冷漠”态度，而俄国情况就不同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在思想上领导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斗争，其中就包括反对各种宗教思想的斗争。当然，列宁是伟大的辩证法家，他在肯定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的同时，又指出无神论宣传只是与宗教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不可把与宗教的斗争仅仅“归结为”无神论宣传，要把这种宣传与亿万群众反对现代宗教的社会根源——资本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

第四，把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与宣传无神论结合起来。列宁强调指出：“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2页。

要的"[1]。"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2]

政策上允许信仰宗教自由，思想上又强调自觉地批判宗教。从表面看来是不相容的两回事，然而，用辩证思维方法来思考，就会作出合理的解释。宗教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强制手段解决得了的，它不仅不能达到教育群众正确对待宗教的目的，反而会加深和助长宗教偏见。只有在信教自由的环境中，才可能通过无神论的教育来启发群众的觉悟。所以，既保障群众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又有对群众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是对待宗教问题的正确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列宁认为，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是反对哲学上反动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在俄国"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贫困和愚昧"[3]。我们在反对宗教唯心主义和宣传无神论过程中，也应当同这个祸根作斗争。列宁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科学无神论，强调科学无神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揭露了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蒙昧主义的密切联系。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宗教及其一切形式的哲学论据进行斗争时，应当把无神论的宣传同争取改善工农的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要把无神论的宣传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宗教唯心主义抗争，要仔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为了从理论上有效地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列宁指出，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文献是不够的，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提供给人民群众，将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页。

列宁特别强调要充分重视和运用18世纪战斗的无神论的重要文献，他特别指出要翻译出版和传播18世纪法国的启蒙著作和无神论的主张，如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等。在列宁看来，尽管在18世纪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科学的幼稚之处，那是可以加以删节和附以评介的，重要的是应该看到这些作品的价值。列宁指出："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①]。列宁意味深长地指出，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比起写得枯燥无味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作品要有益得多。在这里列宁明确说明了，在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宣传中，应当批判地继承旧无神论和旧唯物论的遗产。列宁指出，要纠正一些人对18世纪战斗的无神论著作的不正确认识。他说，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叶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可是至今还没有做这件事。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空谈家们对文化遗产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

总之，针对当时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形势，列宁指出，战斗唯物主义者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是加强对广大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使之逐步从宗教蒙昧中解放出来。这种宣传还应当注意文字和语言的生动活泼，用科学与事实去说服群众，一定要克服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习气，克服各种简单化的做法。他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应该用较多的篇幅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评介有关的著作，纠正国家机关和宣传机关在这方面工作中的大量缺点。所有这些，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6页。

五、注意概括当代科学成就和新的历史经验，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研究

列宁还指出，战斗唯物主义者，要概括当代科学成就和新的社会历史经验，继续探索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列宁毕生都十分重视辩证法的研究，把辩证法视作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当作是这个学说的活的灵魂。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他又总结了数十年来宣传、研究辩证法的历史经验，把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指出在社会历史和自然科学发生激烈变革的时代，为了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战斗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都必须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辩证的唯物主义者。

为了深入研究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列宁再次提出了研究优秀的哲学遗产的重要性，要求战斗唯物主义者，利用哲学思想史在这方面提供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强调指出，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必须研究哲学史，在哲学史中，特别突出黑格尔辩证法。应当对黑格尔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因为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的辩证法思想的总汇，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直接理论来源。如果忽略或越过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难以深入理解和把握的。所以，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研究、批判和继承，并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而就此告终，而是要不断地深入研究。

列宁改造黑格尔哲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多次反复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列宁登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独立进行哲学活动三十来年，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付出了长期、艰苦、细致的劳动。列宁直接研读黑格尔著作，不晚于1899年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列宁后来在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卡尔·马克思》、批判社会沙文主义的论文的过程中，多次集中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笔记》的主要部分是黑格尔著作

的摘录。

十月革命后，列宁日理万机、政务繁杂，他仍然从百忙之中，不只一次抽空浏览了黑格尔《逻辑学》。根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1923年的10月中旬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自己的办公室中，整理笔记本，挑了三卷黑格尔的书，把它们随身带回哥尔克村。这是列宁一生中可能最后一次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尽管列宁一生对黑格尔的哲学有极其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但是，列宁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宏大志向，并没有结束这一艰巨的哲学工程。正因为如此，他热切地希望战斗唯物主义者"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①]。列宁不仅指出了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而且就如何研究的问题，指出了基本方向和具体方法。他写道："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②] 这就是说，研究唯物辩证法，应该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榜样，用唯物主义观点来改造、理解和阐明黑格尔辩证法，并继续发展唯物辩证法，把它用于当代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用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这意味着要用革命和科学的态度，去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和历史上的各种优秀文化遗产。列宁指出："这样来研究、理解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9—30页。

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1] 列宁还提议，在战斗唯物主义者中，形成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这样的组织，以此来推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研究。后来，德波林和阿多拉茨基等人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却被斯大林所忽视。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是一篇战斗的哲学檄文。列宁为战斗唯物主义者提出的基本任务，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俄国新的历史时期哲学研究的特点和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对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纲领性的意义。

六、重视新道德的建设，培养、造就一代新人

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道德，在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培养一代新人，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十分重视的问题。1920 年 10 月 2 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这一科学概念。他指出，共产主义"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2]。"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道德"[3]。无产阶级的道德就是共产主义道德，它不是凭空创造和产生出来的，它是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和道德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的必然发展结果，它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成果。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也必须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建立在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之上的。

---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305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305 页。

列宁明确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1] 换句话说，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和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事业，既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建设，也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建设。它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常常责备无产阶级不讲道德，共产主义抛弃一切道德。列宁反驳说，企图在现代社会里寻找超阶级、超历史的道德，在理论上是虚伪的。他说："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否定道德，否定品德？是在资产阶级所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申出来的。"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2] 这完全是一种"天赋道德"的唯心主义观点。无产阶级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服务于共产主义事业，它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3]

列宁阐明了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不仅在于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要废除一切私有制；彻底消灭阶级和剥削。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在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大力培植、发扬共产主义的道德，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的一代新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旗帜鲜明地提倡和发扬共产主义道德，用以战胜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使人们从千百年来的传统习惯、心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激发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度热情。

---

①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30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30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332 页。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列宁写道："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①]。这就明确指明了，"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是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根本对立的道德原则。

"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是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良好的道德关系，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一种通俗表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里，由于存在着剥削和压迫，对立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形成"人对人是狼"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道德领域，就产生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总是把剥削者个人的利益摆在一切之上，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只不过是个人达到私利的手段，从而把"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奉为天经地义。无产阶级奉行的共产主义道德，它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要求，这样的道德原则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得到普遍贯彻。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人与社会构成一种全新的关系，形成"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道德关系。当然，要普遍形成这种道德关系还需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长期努力。列宁号召人们要坚决改变"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私有制、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的常规，倡导集体主义；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要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相信人，尊重人的尊严，关怀人的个性，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克服对人民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以致冷酷无情的利己态度、官僚主义和老爷派头。列宁坚信，随着新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也在改变着人本身，改变着人们的性格、习惯、觉悟水平和道德品质，而这些，正是共产主义社会必定要建成的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第100页。

重要保证。

列宁特别重视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要求把青年培养成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他说："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①]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反对旧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习惯和心理；这种教育只有同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要树立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榜样、模范，以此作为典型带动教育、训练和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工作。列宁还强调指出，教育、训练和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只有以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头脑使共产主义道德与人类文明相结合。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特征。

列宁高度重视发挥共产党员在共产主义道德建设中的楷模作用。他肯定了共产党员发起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创举。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要求共产党员要善于把革命胆略、革命热忱与经济建设、经济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共产党员必须重新学习，学习自己不熟悉不懂得的经济工作。共产党员应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党的严格的纪律，成为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列宁着重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党要顺利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异己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党员清除出党。

在探讨社会主义的家庭道德基础时，列宁特别强调必须严肃地对待两性关系和婚姻，必须同歧视妇女的旧传统作斗争。他指出，资产阶级宣扬的紊乱的两性关系是同苏维埃人的健康道德不相容的。列宁强调性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关系到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战略性的重大问题，青年在恋爱上须克己自律。

关于妇女解放问题，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02—303页。

分。他明确提出："必须着重强调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必须认真分析妇女作为人和社会成员的地位同生产工具私有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牢靠地与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划清界线。这样也就奠定一个基础，使我们把妇女问题当作社会问题、工人问题的一部分来看待，从而也就可以把妇女问题跟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牢牢地联系起来。"[①] 这就要求吸引妇女参加政治生活，实现政治解放；然后吸引妇女参加经济建议，摆脱"家庭的奴役"。在吸收妇女参加革命斗争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她们的政治觉悟，也改变了她们的非政治、非社会的、落后的心理，逐渐摆脱落后的传统、习惯的影响，提高了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

十月革命胜利后，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平等得到法律的保护。列宁指出，妇女解放更为重要和更为困难的是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使妇女摆脱"家庭的奴役"，从而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他指出："只要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②] 要多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二节　列宁病中口授文章和书信中的哲学思想

列宁在病重期间，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口授了五篇论文：《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论合作社》（1月4日至6日）、《论我国革命》（1月16日和17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1月23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3月2日）：列宁

① 引自蔡特金：《笔记摘抄》，《回忆列宁》第5卷，第48—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92页。

还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口授了三封信:《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23日)、《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12月27日)、《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2月30日)。这组重要的历史文献是他一生最后的文章和书信，也被人们看作是"列宁的遗嘱"，充满着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了列宁对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和整体构想。

一、对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反思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已经五年。由于被刺受伤和工作过分劳累，严重地损害了列宁的健康，1922年5月他第一次中风，不得不一度休养。但他很快又投入了繁重的工作。12月中旬列宁第二次中风，从12月16日起，病情剧烈发作。在此后的几天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意识到病情正在发展，因此他说必须抓紧工作，'不要为病痛弄得措手不及'"[①]，因而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为党留下"我们的工作、政策、策略、战略等等的总计划"[②]。尽管身患重病，但列宁思想明晰，依然保持罕见的意志力和乐观主义。每次口授都拟有大纲，虽然医生每天只允许他口授半小时左右，但五篇论文和三封信构成一个整体，相互呼应、补充，结出了列宁对社会主义事业深思熟虑的思想硕果。

列宁的这些文章和书信，充满着历史的现实感，体现了他对苏维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深刻关切。列宁毕生都认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重要。同时在实践中每走一步，他又特别重视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病中的列宁被迫离开日理万机的工作，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反而"因祸得福"，能

---

① 福齐也娃:《列宁生活片断》，湖北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16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

够"'从旁'观察"，冷静、全面、深刻地对十月革命后所走过的路，对成功和曲折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进行理论上的升华，进而从战略的高度建构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蓝图。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这石破天惊之语，集中反映了列宁对在小农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检查和反思。列宁在这里强调"整个看法"的"根本改变"，概括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之后从"夺取俄国"到"管理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是整个社会主义基本观念的重大转折，是对社会主义在实践发展中的再认识和再思索。这种根本改变的内涵异常丰富，主要表现在：

（一）社会主义不存在固定的模式，必须从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

应当说列宁在他的毕生实践中，都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但是，当列宁领导俄国劳动人民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的时候，他也碰到了一般和特殊、理论和实践矛盾的困扰。在《国家与革命》中，他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设想，大体上仍是以《哥达纲领批判》为理论框架的；后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除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则是没有充分根据地企图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直接按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

列宁对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从指导思想上看，就是不断解决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这对认识矛盾的过程。到了晚年，列宁越来越接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近辩证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这不是逻辑演绎，而是历史反思的结晶。列宁在其著作中越来越强调，要把俄国的现实国情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不能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的纲领，而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922年11月下旬，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讲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说）的结尾谆谆教导："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①] 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又指出，决不能用"纯粹一般"的眼光来看待俄国革命和建设，因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②] 这一理论思维上的全新境界，是列宁晚期社会主义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俄国实行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要走"迂回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就可以把生产资料全部变为国家财产，商品和货币随之消除，而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列宁十月革命后也曾经试图走这条直接过渡的道路，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其典型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但是，在实践中"直接过渡"行不通。1922年11月，列宁在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一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690页。

意孤行，“就有灭亡的危险”[1]。在列宁最后完成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再次重申：“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2] 这就必须采取间接过渡的办法，要经过许多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办法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合作社等等。之所以要这样做，因为俄国生产力落后，广泛存在着宗法制度和小生产，这就决定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困难性和曲折性，不可能走直径。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变，标志着列宁对俄国国情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标志着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一次重要飞跃。

（三）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不能长期放在政治斗争，应当转到和平组织经济和文化建设

十月革命后，列宁清楚地认识到，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的尖锐矛盾是：“提出并已开始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与物质和文化贫困的脱节。”[3] 出路就在于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力，从“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入手，朝着建设“完整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努力。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从事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渡过，客观上要求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作为工作的重心，无形之中在党内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一观点被简单地加以移植和发挥，似乎应当始终把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摆在首位，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

列宁在他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认为，改变以往这种观念至关重要。他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61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710 页。
③ 《列宁文稿》第 4 卷，第 422 页。

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①] 这里所说的文化工作是广义的，包括经济建设在内。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变革，体现了列宁立足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对社会主义实质认识的升华。社会主义的希望在哪里？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②]

（四）农民不应被看成是打击的对象，而应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占俄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当作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主要障碍而予以打击。列宁那时也曾认为，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必然是"资本家的拥护者"，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他针对农民所经营的是小生产而提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③]。"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④] 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必然导致实践中严重地损害广大农民的利益。列宁后来承认，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他为这种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感到痛心。重新作出对农民的科学认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前提。

事实上，资本主义并非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小商品经济的简单继续和直接发展。它由以产生的前提，一是劳动者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遇到彻底的被剥夺，劳动力成为商品；二是大量货币转化为资本，使资本家有可能购买这些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价值。即使在旧俄国时代，如果汪洋大海般存在的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都在大批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么俄国资本主义早就应当十分发达了。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十月革命以后，农村已经均衡化了，急剧地分化为富农和无地农民的过程已经缓和了，整个地说来，农民已经达到中农的地位，农民的小生产已经从属和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农民发挥其经济上的主动性，不仅不会损害社会主义，相反会促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基于这样认识上的转变，列宁认为在落后的俄国要走出一条现实的社会主义道路，再也不能把农民当作打击对象，在国家支配主要的大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情况下，必须遵循"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列宁为此强调："要知道这一点又是主要的。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组织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而使所有小农都能参加这项建设，又是一回事。"①

（五）商品和货币不应当看成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商品货币经济的作用

这一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是具有根本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内，基本持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经济，把货币的权力等同于资本的权力。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的思想仍然认为，商品和货币是昨天剥削制度的残余。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页。

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践上把商品和货币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废除和禁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改变和深化了列宁的认识。1921年春夏，列宁一方面承认要给农民以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另一方面依旧把商品贸易混同于资本主义，仍然想废除货币，把产品交换制宣布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实质性的转变是在1921年秋冬至1922年。这是由于主观的意识和行政命令终究拗不过客观经济规律，产品交换制在实践中行不通。1921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商品交换就意味着商品的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就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采取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政策。这时列宁已经把同农民建立正常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关键，看成是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关键。他在《论合作制》这篇文章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非但不能遏止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相反，还必须使广大农民学会从“按亚洲方式作买卖”转变到“按欧洲方式作买卖”，“要作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整个时代”。①

二、反思的主题和指导思想

学习和研究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主题和指导思想。这个主题就是像俄国这样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通过“特殊的”方法和形式通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解决这个主题要依靠实践，哲学上的指导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列宁对这一主题和指导思想的集中论述是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该文可以看作是列宁晚期书信和文章中的哲学篇、理论篇。

就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来说，每一时期都有其主题。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

题解决得不好，社会主义就难以前进，甚至遭到曲折和挫折；主题解决得好，社会主义就欣欣向荣。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主题是如何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此他们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终于使社会主义走出空想的徘徊境地。接下来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为了解决这一主题，经历了欧洲 1848 年革命的失败，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 1905 年俄国革命的失败，社会主义运动几度陷入低潮。在列宁的领导下，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成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这是列宁的第一个伟大贡献，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的制度。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却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提上历史日程。从这时起，社会主义面临的主题就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通向和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毕生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对解决这一主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这两大贡献使列宁成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思想巨人，是全部列宁主义的思想制高点。

关于第一个贡献，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都是极力反对的。俄国的机会主义者维尼克·苏汉诺夫也是反对的。他 1903 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17 年参加孟什维克，俄国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编辑之一。他在 1918－1921 年间写了七卷《革命札记》，以回忆形式逐日逐月记述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宣扬孟什维克的观点。他指责列宁“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宣扬落后的俄国不可能在西方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代表微弱少数的无产阶级和雇农苏维埃不能反对多数的意志和利益而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他的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1922 年底和 1923 年初，列宁在病中阅读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三、四卷，接着在 1923 年 1 月 16 日和 17 日

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篇重要文章，对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英雄们"的论调作了批驳。

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和苏汉诺夫的主要论据是："俄国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如何看待这一条论据呢？列宁没有抽象地否定，而是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他指出，这一论点"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是"无可争辩的"，"不用说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①]。生产力水平低，无产阶级不占居民人口的多数，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到20世纪初，这还是一条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原理。1894年恩格斯在谈到意大利革命前景时指出，意大利大工业很不发达，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村人口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社会党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恩格斯指出，意大利的情况有如马克思1867年讲到德国时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②]。这样一种看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竞争时期是有道理的，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同样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是大家公认的。

那么，列宁为什么又要斥责苏汉诺夫等人呢？因为这些人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把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的这条论据，变成"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变成"考茨基式的教科书"。"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③] 列宁指出，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8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页。

命，“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因此，这样的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考茨基和苏汉诺夫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把西欧和平时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当作不可改变的“模范”，“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当作评判俄国革命的试金石，这种教条主义的“学究气”，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这涉及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历史规律并不表现为“纯粹的一般”，历史进程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1877年，马克思在写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 后来，他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三个草稿中进一步具体地设想：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苏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②]，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③]，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前途，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列宁深知，随着世界历史的进化，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不可能是与世界隔绝的，它愈来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过程的自觉把握，尤其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和转折时期。列宁考察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条件，明确提出了“一国胜利”的新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十月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现实，而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在于揭示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只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①]，然后才有可能追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列宁的这一思想揭示了现代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辩证法，开辟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途径。

如果从哲学世界观上分析，列宁指出，苏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②] 如此明确地确定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列宁的一个贡献。早在1910年，他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中就指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不是当作行动的指南，“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③]。1913年，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1883年通信集》作了摘录，他认为：“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④] 列宁对辩证法的特别重视和精深研究，为他出色地解剖时代，得心应手地揭示和解决历史的问题，提供了最锐利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首先，列宁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⑤] 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3页。
④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6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因此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却使得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之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更多的新的东西。这就要求不能够削足适履，不能把西欧各国的革命当作固定不变的道路，而必须更多地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出来的特殊性。

其次，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革命与建设的辩证法。列宁针对那种"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观点，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1]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确实需要文明，这是俄国所缺少的。但是，列宁认为，在俄国首先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这就是通过革命，驱逐地主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其核心就是努力发展生产力。落后国家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同样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书本出发。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充分肯定和坚持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这一大前提下，通过比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从俄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进行探索，终于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使得他的思想趋于成熟，为后人进一步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第三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

第二个贡献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论述。

列宁的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是他一生反复实践、长期探索的理论结晶。对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反思，不是列宁思考的目的。他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对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目的是力图从俄国的现实情况和历史经验教训出发，设计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这是一个“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构想，是列宁对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后沉思和初步回答。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构想的思想轨迹

探索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列宁实践和理论活动的中心课题。在探索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模式，更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列宁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提出的总体构想，有必要找出列宁的思想轨迹，以便梳理出列宁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从1920年底以后的著作中列宁经常提及到的，并且加以比较从中引出经验和教训的，可以看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列宁毕生大体上有三个构想。

第一个构想，大体产生于十月革命前夕到1918年春。主要的文章有《远方来信》、《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等。

在全国取得政权之前，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的设想，基本上与《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设想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产品经济形态。但是，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饶有兴趣，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全体人民的

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这一新思想，可以看做是列宁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萌芽思想。

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对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的极端革命的主张进行批判，提出要从“夺取俄国”过渡到管理俄国；指出随着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任务大体解决之后，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列宁说服布尔什维克党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他清醒地看到，俄国虽然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但缺乏经济条件，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完整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主体思想。

对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此时对国家资本主义特别重视。鉴于俄国实际存在的宗法式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一种多成分的经济结构，列宁认为必须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环节”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列宁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某种共有的东西，两者都是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和社会化的经济成分，具有社会化大生产的优点，同小生产的自发性、分散性比较，它是一个进步。另一方面，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还可以引进外资，吸收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的物质条件也是十分有益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可以说，列宁是第一个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实践家。

但是，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通向和建设俄国社会主义政策的内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他的第一个构想中，列宁一方面企图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环节，走迂回道路；另一方面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又是和“直接过渡”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是要使小资产者接受无产阶级的监督和计算，建立国家垄断制。就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而言，1918 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指粮食垄断、受监督的小

业主和商人以及为资产阶级控制的合作社，它的使命是禁止商品流转，堵塞私人贸易。这种二重性，或者说内在的矛盾，在后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生长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第二个构想，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是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制定党纲时提出的，并在十四国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得以具体实施。

“战时共产主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政策，起了战争的非常时期应当起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构想，它集中体现了“直接过渡”的思想，即凭借国家强力，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列宁设想，坚定不移地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把全体居民都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去。这一设想的基本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的直接权力，建构一个完全排斥商品市场、实行国家垄断制的产品经济体制。就阶级内容和阶级关系而言，这一政策主要是同农民中存在着“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作斗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充分深思熟虑的产物，它同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探索。后来列宁承认，这一政策是临时的办法，不是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从主观上找原因，这一构想则是来源于社会主义传统的理论模式，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列宁称这是“犯了错误”。

第三个构想是新经济政策初期提出的。这有一个酝酿、讨论、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从1920年7月到12月，列宁接见来访的农民代表，进行农村调查，起草关于直接税的决议草案并获通过，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电气化计划，表明列宁已经确认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来创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大会还特别重视个体农民的作用，提出奖励个体农民。以这次大会为始，列宁开始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变。1921年2月，政治局讨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1921年4月列宁写成《论粮食税》，完成了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变，为新经济政策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证。

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间接过渡”。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日益引起农民的不满。列宁很快觉察到这一点，认识到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如果一意孤行，“就有灭亡的危险”。“直接过渡”为什么行不通？根本的原因是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小农经济占支配地位。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既不能驱逐，也不能剥夺的劳动阶级。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各种措施，使社会主义经济同千百万农民借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这也就是寻找工农业结合的正确形式。鉴于此，列宁认为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逐渐的、审慎迂回”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来说，用新经济政策改正过去的错误，不能摧毁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要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国家的调节。这就是“间接过渡”的思想。

二、列宁新构想的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更富于成熟性。

回顾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构思，可以看出，这些构思的提出和实施，以及相互间的转换，都不是预先设想好的一次性行动，而是每一个不断摸索、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列宁的探索始终蕴涵着一种矛盾：科学社会主义的书本理论与俄国现实国情的矛盾；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矛盾；直接过渡与间接过渡的矛盾。列宁探索在落后俄国如何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逐步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是对俄国国情逐步认识的过程。

列宁的三个构思之间的关系，真正体现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

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新经济政策的第三个构想，初看起来与第一个构想有着一些共同点，如重视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但两个构思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即使拿国家资本主义来说，在第一个构想中它又是与"直接过渡"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而在第三个构想中则是和"间接过渡"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方案包含的二重性，后来在实践中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展开。"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不成功的探索，它的经验和教训，为第三个构想的提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列宁最后书信和文章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构想，是直接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它扬弃了以往传统理论框架中的理想化成分，纠正了社会主义实践中被证明了的错误，它因而成为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飞跃。

第二个特征是更富于整体性。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都是在病中陆续口述的，但却形成一个整体思想，即从战略上凝神思考那些影响长远的战略问题。列宁把自己的最后之作，称之为"我们的工作、政策、策略、战略等等的总计划"[①]。这种总体性表现在：从"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②]出发，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大构想，并把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制定出"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远景蓝图，确定了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虽然列宁的构想还是粗线条的，雏型状态的，却包含着相互支撑的三大理论支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新型文化建设，国家调节下的新型商品经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型民主政治。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在描绘社会的特征时，都曾多次称社会为"活的有机体"，用以指证社会完整的功能系统。从社会构成的要素看，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6页。

建筑等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整体，其中各个因素都不能单独存在，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推动社会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在这种活动中人是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和基本原则之一。列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如何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主动性，这成为列宁提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整体构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回顾人类历史，曾经流行过两种社会发展的战略模式：传统的模式把经济增长作为核心，并且单纯地从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和人口多寡来预测经济增长的潜在可能性；当代流行的则是另一种发展模式，追求“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发展。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际竞争中，决定性的因素已经不再是资源、物力和廉价的劳动力，而是综合国力，是人的综合素质。两种发展模式的更替，从根本上讲，是从小农生产向现代化大生产转移，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需要，列宁的整体构想透析出世界历史的眼光。社会主义必须求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实现以人（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必须充分重视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把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

第三个特征是更富有时代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当欧洲革命屡遭挫折和失败之后，他们把眼光更多转向东方社会，研究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寻找社会主义在东方得以实现的新的生长点。俄国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它介于西方文明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之间。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开拓东方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它的时代性。

列宁毕生对落后东方的崛起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在构思俄国社会主义新蓝图时，表达了如下的观点：“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

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 东方社会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现代社会中矛盾的尖锐、复杂，造就东方国家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在这些国家通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上，都会遇到以下的困难："开始容易完成难"、"革命容易建设难"、"国有化容易社会化难"，注定了要走一条间接的、渐进的、长期的、艰巨的道路。在这方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是一种试验，一种开拓。1921年12月底，列宁因此指出："我们的任务＝世界性的任务：大工业（人口中的少数）和亿万落后的小农。我们一定会解决这项任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2]

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对于列宁十月革命后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越来越予以重视。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 但是，由于时间短暂，即使在列宁的最后著作中也没有完全解决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难题，并且他也明确指出，东方落后国家将会比俄国带有更多的特色。因此，学习列宁的晚年著作，借鉴俄国的经验，一定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第520—52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三、经济建设的构想

列宁认为，俄国当时的现实是：一方面社会经济“还停留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水平上”[1]，另一方面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而提供了“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2]，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是根本任务。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一切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潜力，并昭然若揭地向所有的人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前途的发展阶段。”[3]

列宁十分重视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并把重工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重工业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发展整个国家经济的关键，是巩固苏维埃国家、保障国家独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列宁建议尽一切可能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基础上，而不能通过使小商品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建立重工业。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国营企业的利润、税收、国家机关缩减开支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节约。唯有这样，“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4]

列宁指出，要“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而不能从主观幻想出发，并且警告，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为此他认为，应当在意识形态领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复辟。但是，应当避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理解”，就是说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马上应当实行“纯粹的和狭义的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0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708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92页。

共产主义”政策。[1] 这就从理论上进一步肯定了“间接过渡”的路线，论证了落后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曲折性。他明确告诫全党，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认为，不应当排斥和消灭商品生产，而应有意识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所谓做商人的本领，我指的是做文明商人的本领”，即不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而是“按欧洲方式做买卖”。[2] 这就是国家调节下的自由贸易。在城市应当按商业化的原则办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不是单纯靠政治热情，行政手段，而是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原则和经济责任制，来充分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从“间接过渡”的大思路出发，列宁经济建设构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实践的经验教训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有克服的障碍。列宁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指导思想和具体计划的变化而变化的。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列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4页。

宁曾设想利用消费合作社发展成为统一的消费公社，作为国家对产品实行供应和分配的机构。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合作社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国家对私人商业进行监督、竞赛、改造的形式。在《论合作制》中，列宁把合作社看做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过渡方法。列宁当时所主张的合作社和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所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度并不是一回事。列宁提到的合作社并非生产合作社，而是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参加的范围包括城乡全体居民，二是经营性质属于"买卖机关"，使农民变成"文明商人"。

列宁指出："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 因此，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从理论上肯定了合作社的过渡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指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②] 列宁还阐述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的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

---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4页。

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四、文化建设的构想

列宁的最后五篇论文中，第一篇《日记摘录》就是专门谈文化建设的。他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任务，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科学。如果不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就无法建立。

文化落后是俄国的特殊国情。在写作《日记摘录》时，列宁专门翻阅了刚出版的统计资料《俄国识字状况》。资料把俄国分成欧俄、北高加索、西伯利亚三大区域，统计每一千居民中识字的人数。在最发达的欧俄地区，每千个居民中识字者也只有 422 人；在落后的西伯利亚地区，每千个妇女中识字的只有 134 人，只占八分之一，其余都是缺乏最基本读字能力的文盲。从这一现实列宁看到：“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①]，这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在 1922 年 3 月列宁为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供的材料中，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手段足够了”，“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本领。”“‘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②] 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提出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充分地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提出来”[③]。

对于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凝聚在列宁这样一个判断：“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7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99、404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60 页。

义的国家了。"[①] 反之，如果没有这个文化革命，没有高度的文明，那么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不完全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俄国的革命是在文化不发达的国家里进行的。因此，"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②] 列宁所说的文化革命，狭义地讲指纯粹文化方面的任务，即精神文化的建设；广义地讲包括奠定文明的物质基础。

在列宁晚年的著作中，反复论证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学会文明经商，在农村发展合作社，有赖于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国家机关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样离不开文化和文明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列宁把文化建设放在首位。

为了顺利地进行文化建设，列宁重申必须吸取全人类的文化成果，学习掌握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再次尖锐批评反对文化和科学发展中的继承性，对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态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列宁从俄国文盲充斥的现实出发，认为"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③] 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列宁要求"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抱"怀疑"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

① 《列宁选集》第 43 卷，第 36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68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6 页。

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①] 一些国家干部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来弥补知识的缺陷。然而这是行不通的。"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②]。要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

列宁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指示要努力提高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振奋精神。他认为"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③]"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④] 其次，列宁主张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要尽量压缩其它开支，增加教育投资。他指出，"当然，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⑤] 列宁计划使自己主持的政府机构开支削减 25% 或 50%；他提议将部队从 160 万裁去一半，1922 年 11 月 13 日进一步建议，在两三年内再裁减 20 万军队。他在建议削减海军修理经费时口授说："舰队我们不需要，而增加学校经费却迫切需要。"[⑥]

列宁倡导要尊重专家，极度重视发挥专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提议赋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因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

---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78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8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7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8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57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05 页。

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1] 为了防止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轻率地被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列宁建议采取步骤来扩大计划委员会的职权。在这里夸大行政手段的作用，是有害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专家委员会，应当具有权威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便鼓励专家更好地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工作。

五、政治建设的构想

改善国家机关，健全领导工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是列宁最后几年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1922 年 3 月 27 日），以及《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上的讲话》（1922 年 10 月 31 日）、《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1922 年 9 月 17 日）、《致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922 年 11 月 22 日）等文献中，列宁都大量论述了党政机关工作的问题。他认为应当明确划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职权，党的中央机关应摆脱纯国务性质的事务，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应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要提高苏维埃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各人民委员部应各司其责。列宁指出，改善国家机关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多年的精简没有解决机构的臃肿，反而大大膨胀了。大多数人钻在公文堆里，这“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2]。他提出，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机关和节约经费。

列宁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在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只是沧海一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4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48 页。

渠，“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①] 因此，制定方针、政策和任务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多为群众着想。这就要求领导深入基层，不能浮在上面，整天忙于开会。自从 1921 年任命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之后，列宁强调指出：“鉴于改善和整顿整个机关比主持会议以及同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谈话这类工作更为重要，而这类工作至今占用了各副主席的所有时间，因此必须规定并严格实行：每位副主席每周‘下底层’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亲自对机关上层和基层五花八门的各个部分，而且是最意想不到的部分进行考察。”[②]

列宁特别强调了健全法制、保证法制统一的问题。他坚决反对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对执法机关的干预。1922 年 5 月 15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审议《检察机关的监督条例》，多数与会者反对赋予检察机关以监督法制的执行的权利，主张检察机关受中央机关和省执行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中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反映了地方官僚和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列宁强调法制应当是统一的，不受地方的任何影响和干扰。他指出：“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即使不是最严重的障碍，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③] 地方检察机关应当只受中央机关领导，有权从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地方政权的决定和决议提出异议。这样才能使检察机关顶住地方和私人的干预，从而有可能同各种违法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

列宁病重期间，更加迫切地期望对政治建设的构想留下原则性的意见。他最后口授的书信和文章，最早的一篇是 1922 年 12 月

---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0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2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96 页。

23 日《给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1] 五篇论文的最后两篇是《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其主题也是探讨政治制度的改革。

列宁政治建设构想的战略策略的整个出发点有两个方面：从国际形势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国家已经卷入全世界运动的急漩涡，这就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保证。但是列宁清醒地估计到仍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着困难的危险，因此必须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极其复杂的任务，官僚主义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如果不从党的领导和苏维埃国家机关进行改革，就不可能增强稳定性，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治改革的设想，主要集中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谈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列宁集中考虑的问题是，他一旦逝世，国内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政局，党和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据他看来，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很可能是由于党的主要领袖人物之间的冲突而酿成。对于党的领袖集团中各个成员的个性和品质，列宁是谙熟的。他在世时，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调解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同心协力，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可是他逝世后，领袖集团中因不同的个人性格和品质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就很可能导致党的分裂。列宁提出了保持党的稳定性的问题。他尖锐指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2]。

---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3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38－339 页。

接着，列宁对六个最高领袖人物都逐一作了评述，列宁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是其中最有能力的两个人，但也都存在着弱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托洛茨基“具有杰出的才能”，“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担心：“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信中列宁也指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十月事件”中的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对他们不要过于纠缠历史的旧帐。信中称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至于皮达可夫，他也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①

列宁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对领袖集团中的每一成员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都进行了具体分析。这决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包藏着恶意和忌妒成分”。列宁的信中没有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其中的某一个人，因此也不能认为信中有指定某个人接班的意思或暗示。如果说列宁确实思考接班人问题，他的着眼点并不是放在个人接班上，而是考虑如何防止党的分裂，保持党的集体领导的稳定性。从列宁对六个领袖人物的分别评论中可以看出，列宁实际上提出了党的领导人应具备的条件：要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不能过分自负，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要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340页。

情的行政方面。列宁指明有可能成为未来关键人物的缺点，也为防止正在滋长的个人崇拜提供了清醒剂。总之，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寄希望于集体领导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检察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而不是着眼于指定谁作为他的接班人。这一主旨是不能忽视的。

为了加强党的巩固性，保持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列宁提出的措施有：(1)“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因为“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的危险就愈小”。同时，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还会有助于改善“糟透了”的官僚主义机关。(2)“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以发挥“高度熟练的专家”的作用，以便改善对国家的管理。(3)进一步完善党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巩固党的统一和威信，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和升官发财思想作斗争。

关于苏维埃国家机关改革的设想，列宁集中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提出了重要意见。早在苏维埃建国初期，列宁就感到官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侵蚀。国内战争结束后，这种官僚主义的现象更是日益滋长。列宁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忧虑。认为克服官僚主义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他口授《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建议，就是他为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而作出的重大步骤。

列宁所以特别重视和关心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亦称工农检查院），因为它原本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国家管理机构，其职责是对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工作实行监督和检查。列宁认为，这个部门与其他国家机关不同，应当充分依靠工农群众，成为工农群众学习管理国家的学校，成为检查和改善整个国家管理的机构。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原先专为反对官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机关，在短短的几年内，本身都变成了一个臃肿不堪的、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它拥有12000名职员，只有极少数是工人，工作效

率也极低下。因此，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机关整个说来受旧的精神的束缚和渗透最严重，而工农检查院则尤为严重，“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1]。

按照列宁的设想，改组工农检查院应当“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去寻找“源泉”。一方面要精简原有的人员，另一方面要从工人和农民的优秀分子中间选出一批新的监察委员，以便“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群众联系起来”。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应当有力地维护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有力地维护党的统一和纯洁。它“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2]

列宁认为国家机关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关干部的素质。他认为，干部应当有行政能力，但仅有这点是很不够的，还应该具有科学修养、掌握广泛实际情况和善于吸收人材的能力。在这里片面夸大“行政手段”的作用是有害的，“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应该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不能做好。”[3] 列宁提出应当努力吸收两种人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第一种人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缺陷是受的教育不够。第二种人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在俄国这种人比起其他各国来还少得可笑。

列宁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设想的指导思想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克服官僚主义的滋长。他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6页。

十分强调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尖锐地批评那种对改革所持的“惊人的畏怯”。但是，另一方面列宁又告诫必须“极其谨慎小心”，从事这项工作“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这就需要“无比坚韧的精神”[1]。政治改革应当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同步。

六、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中，倾注了对加强苏维埃各民族的友谊和合作的关注。他批评了斯大林等人在“格鲁吉亚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好各民族人民的关系，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本卷已集中在第二章第三节中的有关部分系统予以阐述。

简短的结论

列宁的晚期思想，是整个列宁主义在当代最具有活力的生长点。但是对其实质的理解，在世界范围内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过三次历史性的论战：第一次发生在本世纪 20、30 年代，争论的焦点是苏维埃俄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当时俄国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从各自不同的观点出发，对列宁晚年著作中包含的“政治遗嘱”，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解释。但从整体上看，都还没有把握住。列宁毕生的最大贡献，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探索了在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的定义客观上助长

①《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381 页。

了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忽视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主体的列宁的经济建设思想，导致后来“左”的错误的滋生和膨胀。第二次争论发生在50、60年代。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一批过去从未发表过的信件和文献首次公布。列宁的晚期著作主要被当作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政治武器。这种批判虽然可以说是必要的，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导致了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的“列宁学”者们，也纷纷认为可以抓住“列宁最后的斗争”这个题目大做文章。第三次争论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侧重从探寻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理论高度，重新提出了列宁最后文献的思想深蕴和现实意义问题，探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区别和联系。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他们大多企图把问题归结为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甚至把列宁的晚期活动和著作，歪曲为“理智的危机”、“悲剧性的宫廷政变。”

在半个多世纪的三次争论中，主要有两种思想倾向：西方学者往往囿于唯心史观的狭隘视野，加上阶级的偏见，一般都不能理解列宁最后思想对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为个人的权力之争；前苏联的领导人和学者多年来往往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借题发挥，缺乏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随着苏联的解体，列宁主义已经被全面抛弃。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实践中，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正在越来越集中到列宁后期思想的深层发掘上来，集中到列宁主义的思想真缔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上来。

列宁病重期间口授的文章和书信，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极为重大。它的主题是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其哲学真缔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

历史观。他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鲜的历史经验，发展了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苏维埃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道路。这些思想构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计划，也开拓了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新的一页。

列宁最后口授的这些书信和文章，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在现时代有着多方面的生长点。但是，列宁一生没有超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他那里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难题，列宁的晚期思想也没有来得及被联共（布）党所完全理解和正确接受。列宁可以说是带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和无限希望，同时也带着许多思想上的困惑和忧虑离开人世的。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晚期著作留给人们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也留给后代许多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列宁开辟的道路，创造性地发挥他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探索和解决。

第五章　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战线的论争

（1924—1936 年）

20 年代和 30 年代，苏联人民面临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斗争，向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24 年，根据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成立了列宁研究院（3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开始研究和出版列宁的思想理论遗产。与此同时，在哲学战线上开展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开展，当然也有不同的哲学立场和观点的分歧。整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哲学领域先后发生过几次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起初气氛是活跃的，对苏联的哲学宣传工作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论战过程中，争论双方的片面性和错误，日益突出，加上后期领导者插手和干预进来，学术争论变成了政治批判，开创了政治干预学术的先例。

第一节　苏联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概况

1924 年 1 月列宁与世长辞。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从 20 年代中期至 30 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等人与党内反对派围绕列宁主义及

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此同时，在哲学领域也发生了德波林学派与机械论者的论战以及米丁、尤金等红色教授学院年轻人与德波林学派的论战。这些论战后来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政治干预。尽管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前进，但是，此后学术讨论的民主气氛逐渐消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受到限制。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普及

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具有重大意义。20年代初，苏联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院长梁赞诺夫的主持下，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并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5年，首次以俄语和德语两种文字出版了恩格斯的名著《自然辩证法》；1932年，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这些书籍的出版，促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宣传和研究。

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撰写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梁赞诺夫著的《马克思主义史概论》一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另外，还出版了梁赞诺夫撰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书。这本书汇集了他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课的讲稿，对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

阿多拉茨基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主持下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年表》。同时，他还撰写了研究《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的著作，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著作的发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促进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研究。

布哈林，曾被列宁称之为“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①]，在20年代初撰写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在2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著作。当时的苏联，迫切需要向干部和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本书的出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文章还有：波波夫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农民和无产阶级革命》（1928年）；阿斯穆斯的《新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史纲》（1929年）；德波林的《马克思和黑格尔》（1931）年；尼古拉耶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1933年）；希特科夫斯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建者》（1936年）；费多谢也夫的《青年恩格斯的哲学思想》（1936年）等。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教材和专题文集，对宣传和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遗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3年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了一次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阿多拉茨基致开幕词，题为《马克思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所做的报告题目有：米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哲学》，马克希莫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尤金的《马克思主义论文化与文化革命》等。会议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点的发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和认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等。这次会议结束以后，由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逝世50周年学术会议资料汇编》。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教学参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3页。

考书、文集①，探讨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问题、唯物辩证法的规律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关系、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尽管还有很多不成熟、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但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发展。

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 1929—1930 年出版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人们在研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基础上，又掀起了新的列宁哲学思想研究热潮。

在 30 年代初的哲学讨论过程中，以及在随后的时期里，苏联哲学家着重提出了关于列宁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作的贡献问题。问题所及已经不是列宁哲学观点的个别方面，而是日趋研究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发展了的全部哲学问题。

1931 年 4 月，战斗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家协会在莫斯科召开全苏会议。会上，M·米丁和 E·雅罗斯拉夫斯基作了题为《从讨论会总结看哲学战线当前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的文件肯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最迫切的问题为：

（1）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

（2） 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过渡时期的辩证法；

---

①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教学参考书、专题文集有：拉祖莫夫斯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莫斯科 1929 年版）；库拉佐夫《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 1929 年版）；斯托里亚罗夫《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论者》（列宁格勒 1930 年版）；《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论文集（莫斯科 1932 年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论文集（列宁格勒 1933 年版）；萨拉比扬诺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 1934 年版）；罗森塔尔《唯物辩证法》（莫斯科 1936 年版），等等。

(3)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

这期间，苏联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阐明列宁哲学遗产的著作以及大量文章，诸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列宁阶段》(文选)，П·普洛特尼科夫编 (1932 年)；《唯物辩证法的阶级基础》，Л·库加罗夫著 (1932 年)；《列宁同马赫主义作斗争的基本路线》(论文集)，П·卢波尔编 (1933 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学术会议资料汇编》(1934 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A·艾栗贝格著 (1934 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是马赫主义者的批评者〉》，E·西特科卡斯基著 (1934 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二十五年》(论文集，1935 年)；《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关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B·波兹纳著 (1936 年)，这些著作和文章，对列宁哲学思想进行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一) 对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一致思想的研究

苏联学者在《哲学笔记》出版后，特别关注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一致的思想。他们强调，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主要在《资本论》中) 关于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这一见解的直接继续。列宁把这些见解视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见解。

列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的、完整的哲学学说。他写道："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

从哲学出版物中可以看出，苏联学者注意到，列宁不止一次地回到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是统一的这个论点上来，这就证明已经讨论过多次并且还在讨论的这个哲学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32—333 页。

苏联哲学家指出，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同一门科学。他们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不是各自独立的科学。关于逻辑学、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一、一致的问题，就是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密不可分、不可分割的问题。

1932—1934 年，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集体出版了一部高等院校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书中具体指出，“作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既是逻辑学，又是认识论，同时也是关于物质的客观现实存在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过去的哲学体系，特别是克服了康德把认识论同存在规律、同实践割裂开来的哲学体系。

苏联学者指出，哲学史上首先提出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一致这个问题的是黑格尔。但是，黑格尔对这种一致，是通过唯心主义地解释思维和存在规律的同一性来加以论证的。30 年代的哲学著作中着重指出，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原则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的。

学者论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本体论和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一门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科学。唯物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用列宁的话来说，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所作的这种解释，最集中地体现了列宁哲学观的特征。列宁不只是科学地评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他还大大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一认识和改造现实的科学理论和哲学方法。列宁肯定，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和用辩证逻辑范畴反映真正的现实过程的认识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辩证法是科学认识的逻辑基础和认识论基础，是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辩证法同时也是逻辑学，因为它还研究外部世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形式，从整体上，从发生、运动和发展中考察逻辑概念和范畴。

（二）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研究

在30年代，苏联哲学工作者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知识的完整体系。在苏联学者的著作中，辩证法的一般性质是通过它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对作为辩证法基本规律具体化的范畴的分析而被揭示的。

出版物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体系的阐述，是同研究和宣传列宁《哲学笔记》中的哲学思想紧密相联的，学者们试探着对辩证逻辑的规律和范畴进行分析。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发展的学说，它通过对辩证法普遍规律的表述，来揭示世界的本质。这些普遍规律是：(1) 对立面统一和斗争的规律；(2) 由量到质和由质到量转化的规律；(3)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30年代出版了一些专门著作，阐述辩证逻辑的一些范畴，如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自由和必然，原因和结果，根据和条件。

列宁写道："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①]

一些著作试图阐明对立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试图从各个方面具体揭示它的内容。研究者首先强调辩证法的客观性，强调在物质现实的任何现象和对象中都存在着矛盾的力量和倾向。这一反映客观辩证法本质的规律，也是我们的认识，即主观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它的正确性已为科学史所证实。研究者很注意批判把矛盾视为外部力量的对抗的机械论观点，其中包括批判所谓的均衡论。

（三）对列宁反映论的研究

20年代和30年代有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领域中的理论研究，首先是同阐明列宁的反映论，发展反映原则并使之具体化同步进行的。苏联哲学家对列宁反映论实质的正确理解，对种种唯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第213页。

心主义歪曲的批判，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

1934 年 6 月 20—23 日，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为纪念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问世二十五周年而召开的学术会议，是研究和探讨列宁哲学遗产、宣传列宁哲学思想的重要界标。苏联一些著名自然科学家同哲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代表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

与会者在分析列宁的反映论时，着重指出了以下一些方面：(1) 在马克思主义中，辩证法和反映论汇合成统一的哲学科学。发言人指出，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在认识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反映实在的相对性和近似性，同时也很注意认识不像照镜子那样是僵死的反映，而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复杂的历史过程。(2) 报告人分析了高级神经活动的生理学、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领域中的最新实验材料，这些材料为证明历史地观察人类认识问题的正确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

曾经反对列宁反映论的 Л·阿克雪里罗得在会上发言。他在评述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意义时声称，此书的意义是巨大的，现在看来，其意义要比 25 年前更加巨大。阿克雪里罗得说："现在，我和列宁没有任何分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写的一切，我全部接受。在审查我的观点时我应当说清，列宁的这本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同形形色色反动哲学，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哲学作斗争的旗帜。"①

与会者认真聆听了 H·K·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她回忆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成书时的思想政治形势，列宁的朋友和战友的生动例证，再次令人信服地表明，列宁赋予哲学理论多么重大的意义，他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

① Л·阿克雪里罗得：《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二十五年》，《哲学研究所学术会议著作》，莫斯科—— 列宁格勒 1935 年版，第 180 页。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这次会议的活跃气氛，促使哲学家随后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那些 20 年代探讨得不够的新问题、新的哲学概念，在 30 年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

T·巴甫洛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于 1936 年发表的著作《反映论》，在苏联哲学出版物中是首批探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著作之一。苏联哲学界广泛讨论了 T·巴甫洛夫的著作，对它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阐述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直接东西和间接东西在认识过程中的统一性、观念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和关于具体真理等问题的那几章，写得最成功。

T·巴甫洛夫在解释列宁关于认识的三个阶段的公式时，特别注意列宁关于实践是从主观观念到客观知识的“环节”和“过渡”的见解。他着重指出了一个主要的理论认识问题，即从我们表象和观念的主观性向事物的客观本质的转化，是通过实践进行的。即使在从观念到对象的运动中，也必须把实践本身视为历史地发展着的因素。

在苏联哲学家的著作中，对于实践在认识中地位的阐述，占有相当的地位。马克思有一个命题：实际地对待外部世界，是人们行动的开始。苏联哲学家据此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类的实际历史经验是理论认识的基础。

(四) 对列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

早在 20 年代，苏联哲学界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问题和一些专门问题开展了研究。当然，其中有很多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进入 30 年代，展开了哲学大讨论，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分析和评介了过去时期这一领域专家的理论工作，指出了今后哲学研究的方向。但总的看，当时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辩证唯物主义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注意得不够。正如 H·卡列夫所说：“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在

我们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幸者的地位。”但从 30 年代初起，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逐渐加强起来。其中Φ·戈罗霍夫的《列宁和历史唯物主义》(1934 年）一书，使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的列宁遗产得到了宣传和解释。作者特别注意考察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中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与以往文化成就的联系等思想。

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居于中心地位。由于苏联进入了党和人民必须解决最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任务的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引起了苏联哲学家的密切关注。30 年代上半期，在出版的书籍、教科书和发表的文章中，把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纳入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苏联研究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理论遗产，发展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只有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结构才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是它的最重要特征。社会经济形态是某种完整物，是活生生的“社会生产机体”。

出版物中指出了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下列典型特征：(1) 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2) 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具有它所特有的作用规律和发展规律；(3) 构成上述活生生的社会生产机体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在统一，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概念所做的探讨，在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中看到了社会进步的阶段，看到了那种合乎规律和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而进行的自然历史过程。

1930 年 5 月至 6 月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以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进步理论的实质为主题召开了讨论会。会上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学说的重要方面，作出了若干一般方法论的结论。无论在哲学研究所的讨论会上，还是

在后来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杂志上，以及一些书籍和教学参考书中，都注意到了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割裂开来，不能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一般生产方式的概念割裂开来。

苏共（布）中央为了改善意识形态机关的活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政治局于1935年8月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任何一种科学一样，是不断发展着和不断完善着的，这个理论是不怕以合乎新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个别陈旧原理和个别陈旧结论的”，这就促进了苏联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三、对黑格尔、斯宾诺莎等哲学思想的研究

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工作者遵循列宁关于从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及辩证法进行研究并对它进行改造的思想，开展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研究。

1931年是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逝世100周年。苏联哲学界举行了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纪念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会议上，由斯杰茨基致开幕词，阿多拉茨基做了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黑格尔》（副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报告。报告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肯定，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同时指出，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世界观体系的深刻矛盾，即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与保守体系之间的矛盾的产物。

在这次纪念黑格尔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还有：米丁的《黑格尔与唯物辩证法》、格罗霍夫的《黑格尔的哲学历史观点》、拉尔采维奇的《黑格尔——资产阶级思想家》等。在这些报告和文章中，有的对黑格尔哲学，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说明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也有人受批判德波

林学派的影响，过多的强调划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界限，强调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不力。在这些报告和文章中，还阐述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法哲学、美学等几个不同哲学领域中的观点。

这次纪念黑格尔的学术活动，推动了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在这次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会议以后，由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收进了阿多拉茨基、格罗霍夫、拉尔采维奇、万德克、季莫斯克、克尔曼和雅诺夫斯卡娅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还出版了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的专号（1931年第11—12期）。

在纪念黑格尔活动前后，苏联出版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哲学史》、《法哲学》、《自然哲学》等著作，这一规模庞大的出版工作，为苏联哲学界提供了大量丰富多采的古典哲学家的原著，为提高苏联人民的素质，作出了历史贡献。

1932年，是17世纪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唯物论的主要代表斯宾诺莎诞生300周年。苏联哲学界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由萨维里也夫致开幕词，卢波尔作题为《斯宾诺莎哲学的历史意义》的报告，米丁作题为《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哲学，对他所建立的完整哲学体系，其中包括实体、属性和样式的学说，唯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无神论，政治学说和伦理学等产生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在这次纪念斯宾诺莎的学术活动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33年第11—12期上发表了一组纪念斯宾诺莎诞辰300周年的文章，并由万德克和季莫斯克编辑出版了《斯宾诺莎通讯集》。

在此期间，苏联还出版了康德、普里斯特利、罗比耐、扎狄亚克、CP·培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克莱次、康帕内拉、霍布斯、笛卡儿、费希特等哲学史上其他思想家的著作。

四、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问题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斯大林继列宁之后掌握苏维埃政权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个人迷信开始滋生和蔓延。加上斯大林对不同学派的争论进行干预，造成了不良后果。

最初，在红色教授学院年轻人与德波林学派发生争论时，斯大林于1930年12月发表谈话，指责德波林学派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要求开展清查，使学术争论变成为政治批判，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后来，斯大林于1931年11月又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写信，抗议该杂志刊登历史学家斯卢茨基的一篇论文《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封信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3卷，名曰《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在这封信中，斯大林指责该杂志"把论坛供给这一类历史学家，以便利他们的走私勾当，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应做的事情"[1]。这封信的发表，实际上终止了社会科学中创造性的讨论。

在斯大林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学术界多次开展对学术领域不同观点的批判，危害很大。

第一，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中，由于不适当的把学术问题同党内路线斗争联系起来，严重地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造成了许多不良的消极后果。在开展对平衡论的批判时，把平衡论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在批判机械论时，把机械论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在批判德波林学派时，又把这个学派同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联系起来，结果，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在3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不仅在哲学领域，而且在各个领域揪孟什维克式唯心主义。在经济学领域，揪所谓鲁宾派的追随者；在法学领域，以苏加尼斯为首的学

---

[1]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页。

派，也被认为是孟什维克代言人；在文学领域，阿维尔巴霍夫学派，也同德波林学派直接联系在一起。后来，这种批判愈演愈烈，在各加盟共和国，也进行了这种斗争。例如在乌克兰共和国，一直到1936年还在揪孟什维克式唯心主义集团，先后揪出了别尔维茨基、米洛斯拉文、什金别尔、列维克、波卢多米、阿德列阿夫等。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把学术争论当做阶级斗争来搞了。

第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由于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连绵不断，加上日益发展的个人迷信，学术领域里的民主空气受到压制，使得教条主义、死啃书本、公式化、注释之风盛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从30年代初开始，苏联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不适当的突出了斯大林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从1932年起，苏联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论述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高阶段的发展"。在《斯大林传略》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表后，斯大林的哲学思想，被捧上天，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

在这一时期里，出版的哲学书籍并不少，但注释性居多，有创造性的著述极为少见。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说："哲学家不分析也不研究活生生的现象和科学资料，而常常只搞那些现成的刻板公式中准备好的实例和例证。"① 到了30年代中期，哲学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研究速度缓慢下来，哲学发展处于僵化状态，批判和揭露代替了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第三，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也横加指责，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恩格斯说过："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

①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下），第859页。

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1] 但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思想理论界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要对自然科学进行改造，要实行"科学社会主义论"。这就开了自然科学领域"左"的错误的先河。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左"的错误愈演愈烈。先后发生了对魏斯曼、摩尔根的遗传学，微尔和细胞学说等一系列批判。这些学说统统被斥之为唯心主义的科学。除此而外，还把控制论、量子化学、天体演化学说、相对论等斥之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这种作法，不仅给哲学的发展，而且也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害，造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之间明显的脱节。

第二节 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列宁逝世后，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苏联党内机会主义者的严重挑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攻击列宁主义。如何对待列宁主义是当时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宣传列宁主义，斯大林在1924年至1926年间先后写了《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为阐发和捍卫列宁主义及其一国胜利理论作出了贡献。

一、围绕列宁主义的定义、思想来源、基本原则的争论

(一) 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

何谓列宁主义？当时出现过几种不同的定义。季诺维也夫1924年11月3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中写道："列宁主义是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

中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中帝国主义大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加米涅夫同年 11 月 26 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中所写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战的学说。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孟什维主义作战的学说。" 斯大林试图作出全面的定义，他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

对于斯大林的这个定义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列宁主义是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斯大林反驳说，列宁主义虽然产生于俄国，但它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而是国际现象。列宁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的特殊情况，但同时列宁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当时世界所面临的新问题。斯大林反问道："难道列宁主义仅仅是根据俄国的条件专为俄国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条件、为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的吗？难道列宁的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只是对于俄国有意义，而不是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意义吗？"[2] 斯大林认为，列宁主义是根源于帝国主义时代，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因而它具有普遍意义。

（二）关于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

列宁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作为新时代条件下世界（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归根到底，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此外，也还由于它"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

---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185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15 页。

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1]

根据意识形态产生、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2] 既然如此，阐述列宁主义，除了首先要阐述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物质条件外，还应阐述它赖以产生、发展的先驱者思想条件。

不过，对于这一点，可谓众说纷纭，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做了任意的解释。有人说，列宁主义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的理论产物。有人说，列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个"民粹党"人，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有人说，列宁主义同"特卡乔夫主义"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有人说，列宁政治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涅恰也夫主义"。还有人说，对列宁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普列汉诺夫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上述种种说法，都没有正确地阐述甚至曲解了列宁主义真正的思想来源。

无庸讳言，俄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列宁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列宁也看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中的小资产阶级性，指出它在经济学上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是乌托邦的，在革命民主主义实践中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也无庸讳言，列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革命民粹主义者的特别是无神论方面的著作感兴趣，但是，他从未当过民粹派。列宁早在他的哥哥亚历山大被杀害时就开始考虑必须探索另一条与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道路，就认识到"这种单枪匹马的斗争虽然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是奋不顾身的英勇斗争，但是收效不大”，并指出：“我们不走这条路。应当走的不是这条路。”

特卡乔夫是俄国19世纪70年代倾向于布朗基主义的民粹主义暴力派的代表人物，他鼓吹通过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和突然起义来实现社会主义。涅恰也夫是巴枯宁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可以用不择手段的恐怖主义活动来推翻专制制度。1903年在俄国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经济派、崩得分子等机会主义者曾极力把列宁主义描绘成特卡乔夫主义和涅恰也夫主义；如今西方有的“列宁学”家则据此说这两个人的“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并无事实依据，不值一驳。

众所周知，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列宁说，他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这就表明了列宁主义与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内在联系。但是，有人硬说：“几乎每一个俄国革命者都受惠于马克思，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马克思的真正信徒……”这就否定了普列汉诺夫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

真实的历史是，列宁在少年时，深受他哥哥那种勇敢精神的感染。1885年和1886年暑假期间，他哥哥从大学里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家，让列宁阅读。从此，列宁开始仇恨沙皇全部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念中学高年级时，就已经怀有革命情绪了。1887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1887年12月4日，由于列宁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学潮被捕。17岁的列宁就因与沙皇当局发生第一次冲突而受到了革命的洗礼。从那时起，列宁就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完全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事业，献给了使劳动者从压迫和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事业。1888年秋，列宁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倦地潜心自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要这样？列宁后来说，当年的革命者中“许多人在开始其革命活动时都是像民意党人那样思想的。几乎所有人们都在幼年时期热烈崇拜过那些从事恐怖的英雄。为要放弃这种英雄传统的动人印

象，就必须进行斗争，就必须和那些无论如何都想始终忠实于民粹派思想而为年轻社会民主党人所十分尊敬的人们决裂。斗争使人不得不学习，使人不得不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作品……”[①] 这样，弗·伊·列宁就成了俄国第一批为数极少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人。

关于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问题，斯大林认为，列宁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其思想资料当然源于马克思主义。他写道：“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三）关于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有强烈的原则性。而机会主义则与此相反，“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②]

斯大林讲：“多数，这是领袖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③]

---

① 《列宁生平事业简史》，联共（布）中央附设马恩列学院编，1950年版，第1—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1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2页。

那么，构成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全面考察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有两点：第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二，为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同反对派进行“毫不犹豫”的斗争。

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补充列宁主义，实质上就是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斯大林写道，“这是反对派首领们最大的罪过，党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宽恕他们的这个罪过。”[1]

那么，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斯大林认为，首先，它的实质在于否认靠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如果近期胜利的世界革命的援助不能及时到来，我们就应该向资产阶级投降，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扫清道路。第二，它的实质在于否认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无力领导农民从个体农民经济转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如果近期世界革命的胜利不能及时到来援助工人阶级，农民就会恢复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最后，它的实质在于否认党内有铁的纪律的必要，认为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认为有成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必要。这就是说，在国内也应当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一句话，“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2]

二、围绕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的争论

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经过列宁的全面论证后，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为夺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准备。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

---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67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310 页。

国党内托洛茨基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结合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进一步捍卫了列宁的这一理论，并且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把列宁的理论变成了光辉的现实，从而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1924 年前对一国胜利理论的争论

19 世纪 40 年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作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发生、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和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 的理论。早在 1924 年以前，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就展开了论战。

1915 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明确提出这个结论之后，托洛茨基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报》上便发表文章，强调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无产阶级应该同时行动，否则，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使托洛茨基一伙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放弃自己的错误理论。

1921 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便解决工人和农民的矛盾，共同建设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托洛茨基于次年一月发表了他的《一九零五年》一书的《序言》，攻击新经济政策，并扬言：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1922 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驳斥了托洛茨基的谬论，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被拖进日常生活中来了，不管这个任务多么困难，多么生疏，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09 页。

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久，托洛茨基在为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所写的《跋》中再一次重弹他的滥调，说什么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俄国社会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列宁从不放过对托洛茨基散布的谬论进行批判，直到1924年1月即列宁逝世前，他在《论合作制》和《论我国革命》两篇札记中又提到了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的问题。他说，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说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难道国家支配着一切重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这些不是我们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保证吗？

到了1924年至1925年间，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则进一步激化。这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局势出现暂时稳定，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缓和下来；国内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实行了某种退却，赶走了武装干涉者，争得了喘息时机。于是，回答俄国是否存在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问题，以及沿着什么方向进行建设的问题，就显得极为迫切。围绕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其焦点主要不在于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在于能不能在苏维埃政权存在于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即用本国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战胜本国资本主义。

（二）1924年以后对“一国胜利论”的争论

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斯大林同党内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展开论战。

季诺维也夫，格里格里·叶夫谢也维奇，1883 年 9 月生于赫尔松省叶利萨维特市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 14 岁起就靠自己的劳动为生。90 年代末参加南方的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1 年遭到第一次迫害，1902 年出国。先在柏林，后到巴黎，然后去瑞士伯尔尼。1904 年考入伯尔尼大学化学系。1905 年革命开始后返俄，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当选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

季诺维也夫，先后担任过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 年以与托洛茨基组成反党联盟为由被清除出党。1934 年被捕，1936 年被处死。

加米涅夫，列夫·波里索维奇，1883 年 7 月生于莫斯科一个小市民阶层的家庭，父亲是火车司机。由于家庭的影响，在中学学习期间，加米涅夫已同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联系，阅读进步书报。1902 年 3 月因参加示威游行被警察逮捕。在狱中关了几个月后被送故乡梯比利斯。1902 年秋，加米涅夫来到巴黎，立即加入“火星派”小组。1903 年，加米涅夫回到俄国。多次遭逮捕。十月革命后，加米涅夫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22 年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27 年以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为由，被清除出党。1934 年被捕，1936 年被处死。

在 1926 年的联共（布）第 15 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说，在俄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全部关键在于不能“撇开国际事务。”他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国际革命上。季诺维也夫认为，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过一个国家是不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加米涅夫认为，没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是不可能的。布哈林则认为，苏联的内部力量结合和内部资源足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同意布哈林的观点。后来论战双方围绕下列问题展开争论。

（1）关于在资本主义走下坡路时期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可能性的问题。

反对派在论战中，多次把马克思恩格斯下面的话引以为据：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年）一书中说："工人阶级的任务在民族范围内是不能完成的。"

马克思于1848年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对我们来说，困难是下面这个问题：大陆上的革命是必不可免的，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由于在广阔无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的革命是不是一定会被镇压下去呢？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一文中说："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答：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①

反对派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

布哈林、斯大林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不是躺在字句上，而是把它与时代条件联系起来加以具体分析。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由于事物发展的进程而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开始走下坡路，那怎么办呢？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根据便消失了。

透过论战双方在"一国胜利理论"上的分歧，可以看出他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存在着极为深刻的对立。一个采取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另一个采取一切从本本出发，主观推断，理论脱离实际的态度。一个采取唯物的辩证的方法；一个采取唯心的机械的方法。

（2）关于区分两种不平衡发展规律问题。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发展不平衡规律具有不同的形式。列宁根据这种区别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思想。反对派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他们看不见或有意回避两个阶段的差别，不懂得或低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决定意义。他们断言：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比较缓和，这是不正确的；这种不平衡在19世纪比在20世纪更厉害。因此他们认为，把一国胜利的思想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联系起来是不可以的。

那么，反对派所谓的不平衡指的是什么呢？从论战中看，指的是资本主义各个国家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斯大林认为，“不能把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水平的差别问题混为一谈。”①

斯大林认为，发展水平的差别和发展不平衡是两个问题。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各国间的发展水平相差是很大的，而发展到垄断时期，这种水平上的差别便日益缩小，趋于均衡。但是，差别的缩小，均衡化的上升，与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强是不矛盾的。正因为落后国家在加速自己的发展，并和先进国家取得均衡，一些国家为超过另一些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才尖锐起来，造成发展上的更大的不平衡，以至于一些国家不惜采取军事手段把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这就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战线，为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突破这条战线创造了前提。因此，斯大林说：“均衡化正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作用可能加强的背景和基础。只有像我们的反对派那样不懂得帝国主义经济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4页。

实质的人，才能把均衡化和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对立起来。"①

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理论做了论证。斯大林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有关社会发展一切阶段的社会学规律不同，是能变化而且必然要变化的。在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具有一种形式，产生一种相应的结果；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则具有另一种形式，因而产生另一种结果。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并且应当说，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旧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平衡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是怎样变化的，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怎样随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受到限制或加强的，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② 反对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抽象地看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因而不懂得这一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的特点。

(3) 关于俄国革命的必然性问题。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年流传一种观点，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工业发达、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列宁研究垄断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指出：由于劳动和资本之间、各财政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加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方面使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以至在工业落后国家得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在论战中，反对派不但反对"一国胜利"理论的正确性，而且还否认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为此，他们从列宁论断的字句中大

①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94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149 页。

作文章，说什么列宁所说的“工业落后国家”、“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明确指出这就是俄国。所以，他们说，列宁说“一国胜利”的理论，与俄国无关。

斯大林认为，当时俄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正是在俄国带有特别丑恶和特别不堪的性质。这就使俄国成为整个资本主义阵线的薄弱环节，成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一国胜利理论的正确性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同时也宣告了反对派无关论的破产。

(4) 关于农民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冲突问题。

在历史上，西方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危急关头通常站在资产阶级方面。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得到法国农民的同情和响应；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了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抗拒；1905年俄国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以考茨基为首的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欧洲革命的这些情况得出结论说：只有在工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是工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中，工人才能取得和保持政权，面俄国是农民国家，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因此工人革命在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随之扬言：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要触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私有制，也就要与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斯大林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与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那里的农民可以说是从资产阶级手中获得土地和自由的；并且，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次尝试，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农民中分化出了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它已经成了连接农民和城市大资产阶级的桥梁，因而巩固了资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

但是，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斯大林指出：和西方相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3月）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地

主、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和西方相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 年 10 月）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半个世纪，而是仅仅相隔六个月到八个月开始的。在这期间农民不可能分化出强大而有组织的农村资产阶级，而且在 1917 年 10 月被推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了，由此，更加巩固了工农联盟。正因为如此，俄国工人虽然占俄国人民的少数，但却做了国家的主人，争得了绝大多数人民首先是农民对自己的同情和支持，争取并保持了政权。

第二，也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农业经济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小商品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因为这种经济很少独立性，需要依赖工业，依赖信贷系统，依赖国家政权。它总是要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跟着城市走，因而城市的性质决定农村的性质。由于西方城市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所以它的农业就必然依赖资本主义的工业、信贷系统和国家政权。在这种条件下，农业经济就不能不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在苏联国家里，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城市里的国民经济全部命脉，即工业、运输业、信贷系统以及国家政权，全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土地国有化是全国通告的法律，所以农民经济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苏维埃国家用各种方式使千百万农户普遍合作化，把散漫的农户团结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周围，起初是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和农户所需要的城市产品供应方面，然后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应用集体原则，从而使农民福利得到满足，并保证广大农民免于分化、贫困和破产。

第三，应全面估价新经济政策，把握它的革命实质。反对派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夸大新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把它当作仅仅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因而，他们面对富农张皇失措，过低估计中农的比重，怀疑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和俄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他们看来，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是资本主义“回复”，其前途

不是将苏联引向社会主义，而是引向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其实，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前者战胜后者的政策。

第四，应从经济条件的变化考察合作社的性质，决不可把它视为孤立的永恒不变的“自在之物”。反对派说，合作社是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对此，斯大林回答说：这样来解释合作社，在1921年是足够的，令人满意的。因为当时俄国还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设想为可能的基本的经济形式，所以把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配合起来进行了考察。可是，这种解释，到1923年以后就不够了，已经被历史所超过了。因为从那时起，情况改变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培植到所预期的那种程度，而现在拥有一千万以上的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和社会主义的工业结合起来。在这场争论中，布哈林和斯大林虽然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结论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在达到目标的方法上，观点却是不同的。布哈林坚持以农业的发展、工农的结合为主，主张把新经济政策执行下去。斯大林则坚持以工业发展为中心，主张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宣布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结束。这种潜在的分歧，导致他们之间后来的分裂。

第三节 布哈林哲学思想及对其平衡论的批判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生于莫斯科的一个教师家庭。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任联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主编等职。1938年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88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消对布哈林的判决，宣布为该案件平反。

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布哈林是苏联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他的著作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文学艺术以及教育等许多领域，主要有：《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8)、《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1919)、《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共产主义ABC》(1920)、《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无产阶级的革命与文化》(1923)、《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1925)、《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信徒卡尔·考茨基》(1926)、《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32)等。其中他的哲学代表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布哈林自己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教材。这是一部正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著作。书中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为主，同时也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内容。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写作背景、风格和特点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著作，它完成于1921年。1918年，俄国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同白卫将军们一起，与英、法、日、波等政府勾结，武装干涉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列宁领导下，苏联的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和白卫匪帮，并取得了胜利。战争结束后，全国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和平建设的年代。在动荡年代刚刚结束的时候，迫切需要向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又非常缺乏，此时，这部著作的出版，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欢迎。它作为向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教材，在2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权威性的理论著作”。

这本书在世界上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日、中等20种文字

的译本，在各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美国的悉尼·海特曼认为，它“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杰出的阐述”[①]；波兰的列·柯拉科夫斯基认为，这部著作是“对党员和干部进行理论训练的一本教材”，“但它极为简单化”。[②]

这部著作，旁征博引、文笔流畅，常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容易被工人和农民接受，具有通俗化的特点。布哈林自己曾说过：“本书是按照《共产主义ABC》一书的样式来写的”、“力求写得通俗”[③]。在这部著作中，布哈林从医学上的精神病分类讲到天文学、地质学和动植物学的发展，从古代的“中国礼仪”讲到现代新的绘画流派。举例之多，涉及面之广，在苏联同时代哲学家的著作中是少见的。192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布哈林》条，在评述这一特点时写道：“布哈林是通俗化的能手，他的风格有如极其灵活的‘键盘’。”[④]国外的学者也认为：“这本书写得生动，引人入胜”。

这部著作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系统的阐述，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家们的回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理论家，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集中火力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捍卫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神圣责任。布哈林自己曾经说过：“论敌们的著作大量增加了。我们有必要进行反击，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理论水平越来越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反击。”在这部著作中，布哈林批驳了“论敌们”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他还揭露了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彼·司徒卢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企图，抨击了资产阶级化的学者威桑巴特的社会躯体说，斥责了奥地利社会

① 《布哈林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13页。
② 《布哈林思想研究》，第27页。
③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1页。
④ 《苏联大百科全书》1927年版，第283页。

民主党右翼理论家卡尔·伦纳的诡辩论等等，同时也批判了那些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目的论、种族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些批判是说理的和有说服力的。

（二）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了较好的发挥

1. 系统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作用及其方法论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哈林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布哈林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一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它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它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①] 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使我们有可能把人类历史当作有其自己规律过程来理解的唯一理论。二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最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是人类思维和认识的最锐利武器。借助于它，无产阶级可以搞清楚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中一些最复杂的问题。借助于它，共产党人曾经正确预言过战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预言过不同政党、集团和阶级在人类经历的伟大变革中的作为。”[②] 三是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他的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说过：“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③]。同时，它也为“各门社会科学提供研究的方法”[④]。他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好的认识工具。

布哈林始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

①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④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0页。

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证。首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不是别的，而是物质生产的运动形态。作为社会历史观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种社会现象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社会学同它相一致。在布哈林看来，社会学研究和回答的问题是："社会是什么？社会发展和衰亡取决于什么？各类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如何？……社会形态的更替原因何在？等等。"[1] 其次，如果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就会上资产阶级的当，因为他们总是企图排除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这一论断，是个有争论的问题。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2. 论证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客观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周围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决不像一锅粥那样无从辨别，而都是服从于一定的规律性。

布哈林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一是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都是客观的，它们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资产阶级哲学家从唯心史观出发，一般都认为科学的作用不在于揭示那种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在于由人类智慧想象出这种规律性。布哈林针对这种观点写道："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这种规则性（规律性），完全不以是否为人们所认识为转移。换句话说，这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规律性。而且，科学的首要步骤也就是揭示这种规律性，并从杂乱一团的现象中理出这种规律性。"[2] 布哈林的论述同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是相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规律的作用叫做铁的必然性，他说规律自身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3]。列宁也说过："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

①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6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页。

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的存在着并起着作用。"[1] 二是指出社会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受因果规律支配。有人承认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不承认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对此，布哈林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即使人们有意识地调整一切，而一切在社会中都按人们的愿望进行，为了解释这种现象，需要的也不是目的论，而是探讨现象的原因，即找出因果规律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毫无差别。"[2] 他认为，只有坚持这种观点，才能摒弃任何神性，摒弃对超自然力量的任何寄托，并为人类真正掌握自然力和本身的社会力量开辟道路。三是系统的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目的论。按照目的论的观点，任何现象、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目的，都有它合乎理性的使命。目的论者把目的看成是存在于某种超现实的精神实体和个别人的主观意志之中，它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因果规律性。目的论者认为，神创造万物是为了造福于人，人之所以长鼻子是为架眼镜，世界上所以有猪是为了人食用，等等。布哈林指出，自从人类社会分成不同集团以来，其中一些集团发号施令，进行统治；而另一些集团则被管理，俯首听命。正如在地上有帝王、法官等，由他们颁布法律、进行审理一样，在整个宇宙间，也有上帝、天上的审判者。这样，宇宙被看作是有创造力的意志的产物。布哈林尖锐地指出："目的论的观点与科学的观点根本对立，它所依赖的是信仰。这种观点不论打扮得怎样美妙，毕竟是僧侣的观点。"[3] 当然，根据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提出正确的目的，是人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标志之一。但是，人的目的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以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为前提的。

3. 提出关于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理论。布哈林在《历史唯物

①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195 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20 页。

③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14 页。

主义理论》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动的平稳”的理论。他写道：“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所看到的那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静的平衡，而是动的平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平衡一经确立，随即就被破坏，又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起来，又再被破坏，如此循环往复。”① 布哈林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三种形式，第一，平衡状态；第二，平衡的破坏；第三，平衡在新的基础上的恢复。他所说的平衡的各种形式，实际上就是对立统一关系的不同形式。

布哈林运用关于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思想，解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运用平衡规律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至关重要。他说：“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怎样能够取得新的平衡：一方面是农业内部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城乡间的平衡。这个问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②

其次，依据平衡规律，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关系必须有恰当的比例。他说：“任何一国执政的无产阶级都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组织问题，即如何安排两种生产形式之间的比例：一种生产形式无产阶级能够使之合理化，加以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管理；另一种生产形式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初期不能使之实现合理化和有计划的进行管理。这是无产阶级将要遇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正确地规定这个比例，就是说它拿到自己手中的东西太多，超过了客观情况所容许的限度，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下列形势：生产力不会得到发展面会受到束缚；无产阶级不可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可能强制地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小农。”③ 他提

①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6页。

②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68页。

③ 《布哈林文选》，第211页。

出，必须慎重考虑，受约束的社会主义经济占多大比例，自由经济占多大比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苏联过去都吃过苦头，有过教训，应当汲取。

再次，按照平衡规律的要求，工业化的速度，必须与农业能够提供的可能性相适应，不能“迷恋超速度”。他反对所谓最大限度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以保证工业发展最大速度的做法，同时也反对用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他说：“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工业才能持续保持最大的速度。”他认为，工农业的发展要保持平衡，要留有后备，不能用“未来的砖头”来建造“现实的工厂”。

4.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整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结晶，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布哈林写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完备的科学理论，是因为它不是教条”，它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远停滞不前，那就未免奇怪了。”[①] 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布哈林说：“既然各国的革命道路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么社会主义建设自然难免有自己的特点。”[②] 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的生搬硬套。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永葆青春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正是从这点出发，布哈林根据实践的发展，多次改变自己的观点。1918 年，苏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时，布哈林撰文积极支持这一政策。1921 年 3 月，苏联实行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时，布哈林从一个战时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转变为一个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他提出

①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序言。

②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150 页。

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平衡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注重价值规律、加强工农联盟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在1921年主张可能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进行统治。到了1929年，他提出了“群众参与”的观点。这些变化说明，布哈林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采取僵化式的教条主义态度。

（三）布哈林在这部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布哈林在阐述关于社会发展平衡理论的时候，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他把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当作任何事物运动的决定因素。他认为，社会是个体系，“这个体系的环境就是外部自然界”[①]，而“体系内部构造（内部平衡）的变化，应当取决于体系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因素。”[②] 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容易产生误解，好像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从属于环境与体系之间的矛盾。体系的发展变化，应当从体系内部去找，而不应当从体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去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批评说：布哈林“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③]。二是布哈林在阐述他的“平衡”理论的时候，不恰当的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力学混同起来。他说：“我们认为把马克思称之为‘神秘的’黑格尔辩证法语言翻译成现代力学的语言是完全可能的。”[④] 布哈林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为了给辩证法赋予更牢固的唯物主义基础，主张把辩证法的语言变成现代力学的语言，结果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当这一观点受到批评之后，他坚持说：“不能把现代力学同辩证法对立起来，如果力学不是辩证的，即整

①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113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81—8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
④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8页。

个运动也不是辩证的，那么在整个辩证法里还剩下什么东西呢？"[1] 在这里，布哈林混淆了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个别形式，低级的简单的位移和高级的内在运动二者之间的界限。力学，即使是现代力学，也不能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所有的质的多样性。

第二，布哈林坚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批判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这是正确的。但他在阐发这一观点的时候，只强调必然性，否认偶然性，这是不正确的。他说："严格说起来，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偶然的"，"社会科学中，应当摒除偶然性这个概念。"[2] 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把事物的相互联系看作是普遍的相互作用，既承认必然性的存在，也不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既承认规律决定人们的行动，又不否认人们对规律的反作用。布哈林在阐述决定论思想时，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只停留在 17、18 世纪唯物主义的水平上。斯宾诺莎曾说："在事物的本性中没有任何偶然性的东西。"[3] 只承认必然性，不承认偶然性，就不能摆脱机械论的束缚。恩格斯说："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4]

第三，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有些概念使用不当。如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经济唯物主义"，这是很不准确的。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根本不同。经济唯物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伯恩施坦和俄国的"经济派"等。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于割裂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把经济的作用绝对化，而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经济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又如他在

①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下同），第 129 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39、42 页。

③ 《斯宾诺莎著作选》，俄文版，第 387 页。

④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97 页。

谈到意识形态问题时，把语言和思维笼统的看作是意识形态。他说："还有极普遍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即语言和思维，也是社会发展的函数。"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它是大脑这一有高级组织的物质的特性。语言则是物质现象，它除包括思想内容外，还有另一方面，即发音、器官、声音、词汇、文字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着的，因此把语言说成是意识形态是不够妥当的。

二、苏联哲学界对布哈林平衡论的批判

早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就提出了平衡论的思想。他在书中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①] 马克思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衡状态是怎样产生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又是怎样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克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同。布哈林强调了一种发展的平衡观点："没有平衡，社会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死亡的。但是这同一社会体系能够在短期内处于'不正常'状态，即不平衡状态。在这种场合，某种相对的平衡是以部分地破坏这一体系本身为代价换取来的。"[②] 布哈林在这里强调了不断破坏的、发展的平衡。这种平衡"整个体系在扩大，在复杂化，在发展，处在不断的运动和摇摆之中。"[③]

后来，他又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平衡论"的思想。该书共计八章，他用三章的篇幅来阐述这一理论。其中第五章《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第六章《社会要素之间的平衡》、第七章《社会平衡的破坏和恢复》，都是运用"平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94 页。

② 《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14 页。

③ 《过渡时期经济学》第 109 页。

论”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这本书出版以后，曾被列为联共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教材之一，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指出，社会和自然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某种“平衡状态”的“体系”中，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由平衡状态到不平衡状态的破坏，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平衡的过程。

学术界在肯定这部著作的成就的同时，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书中的平衡论思想。有的论者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在解释历史现象时陷入了机械论的泥潭。布哈林表示不同意这种批评意见，他说：“把这种表述非难为机械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并于1923年又发表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提法》一文，重申自己的观点。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践中使辩证法摆脱了它的神秘的外壳，也就是把辩证方法唯物地应用于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领域。现在的问题是要在理论上系统地叙述这一方法，并同样在理论上系统地加以论证。平衡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1]他坚持说，只有运用揭示“物质的过程与物质形式的运动”的唯一方法——平衡论，辩证法才能成为唯物辩证法。

20年代初，对平衡论虽然有争论，但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论战。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布哈林由党内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他的理论也受到了种种非议。他的平衡论受到理论界的严厉批判。

苏联出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简明哲学辞典》以及有关的教科书，对这一理论都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在苏联，布哈林的“平衡理论”，被说成是“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否认内部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2]，“为了在理论上制造一个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根据这个理论来断定，说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

---

① 《布哈林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② 《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版，第192页。

成分斗争中获得的成功愈多，阶级斗争也愈缓和，根本用不着实行进攻富农。"[1] 在中国，布哈林的"平衡理论"，被说成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其目的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和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2] 上述这些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在理论上，它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在政治上，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两点指责都是不公允的。

第一，不应把布哈林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理论，说成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布哈林自己曾经对此加以反驳。他说，把这种表述非难为机械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把外因看作是发展的源泉；二是只承认量变，根本否认质变。在这两点上，布哈林的平衡理论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布哈林的平衡理论，并不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而是以矛盾和斗争为前提和基础。他为了把自己的平衡理论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加以区别，他把这一理论称之为"动的平衡"理论。他强调，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静的平衡，而是动的平衡。"在他看来，平衡可区分为三种类型：稳定的平衡；带正号的平衡（体系的发展）；带负号的平衡（体系的破坏）。他说："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运动的过程，它的基础是内在矛盾的发展。"[3] 紧接着，布哈林写道："对社会的科学考察，要求我们从充塞社会的那些矛盾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矛盾的发展。"[4] 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他在讲到社会要素之间的平衡问题时，再一次强调社会平衡规律是动的平衡规律，"他不仅不排斥，反而以对

---

① 《联共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23—324页。

② 《布哈林言论》，第8页。

③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7页。

④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81页。

立、矛盾、不适应、冲突、斗争为前提，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以剧变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为前提。"[①] 请注意，布哈林在这两段话中，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平衡规律是"以内在矛盾为基础"；第二，平衡规律是"以对抗、矛盾、不适应、冲突、斗争为前提"。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片面夸大统一和平衡而否认矛盾和斗争的问题。

其次，布哈林的平衡理论，并没有否认质变，而是把"量转化为质"当作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来阐述的。他认为"在运动的一定阶段上，量变引起质变"，"这种量到质的转化是以飞跃的形式实现的，这时渐进性和连续性一下子就被破坏了。"[②] 他强调，量转化为质，是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这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随时随地都可见到。他举例说，在一根绳子上悬挂重物，然后增加份量，在达到一定限度以前，绳子是"经受得住的"。但只要超过这个限度，绳子就在一刹那间折断。给一个蒸气锅炉加大蒸气在一定时间内一切正常，可是指针一但超过一定界限，锅炉就爆炸了，等等。这说明，质变是量变积累的结果，量变是质变的准备，量变达到一定点（关节点）就引起质变。布哈林不仅承认质变是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且还有所发挥，提出了质变两种形式问题。他写道："社会平衡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恢复：一种是通过社会整体的各种要素缓慢地（以进化方式）相互适应的形式；另一种是通过急剧变革的形式。"[③] 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在激烈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比较强调爆发式飞跃形式，很少谈到渐进式形式。布哈林能够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提出关于质变两种形式的思想，这在理论上是一个贡献。

---

①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284—285 页。

②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83 页。

③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 287 页。

第二，也不应把布哈林关于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理论，说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在布哈林提出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同一部著作中，他用一章篇幅专门讲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前，被压迫阶级的矛头，总是指向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而统治阶级又如何呢？“他们是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布哈林认为，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规律和趋势是，阶级矛盾将通过阶级斗争而得到克服，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逐渐走向缓和、走向熄灭。但是这种斗争将持续很长时间。他在 1925 年说：“阶级斗争不会立即停止和消亡，而是要持续很长时间，直到一般的阶级的划分最终消失为止。”[①] 这怎么能说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呢？还有人指责布哈林否认农村合作化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这也与事实不符。布哈林反对以暴力的方式剥夺富农，主张采取经济手段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否认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存在着阶级斗争。他说：“通过合作社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在最初时期，即在国营工业还无力使全部农业建立在电气化基础之上的时候，将伴随着农民的各个不同集团和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②]

三、关于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几个理论观点的批判

20 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在政策上实行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从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围绕这个转变，党内出现了意见分歧。布哈林、托姆斯基反对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反对消灭富农的政策。

1929 年 4 月，联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斯大林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03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426 页。

从此，布哈林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斯大林从六个方面指责布哈林。

1.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斯大林批判说，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理论是远远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斗争理论，他写道："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①] 这个指责并不符合布哈林的思想实际。布哈林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总趋势是逐步走向缓和。关于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认为，主要涉及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劳动农民，另一部分是富农，前者通过劳动式的合作社长入国家机关体系中去，后者通过富农的合作社长入这个集体中去，最终达到消灭富农的目的。

2. 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斯大林认为，这个理论的害处"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②] 这种指责也不够公正。布哈林认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而且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但是，随着苏维埃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机关一切下属组织的巩固，随着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

3. 关于农民问题。斯大林认为，"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这一切是不言而喻、尽人皆知的。"[③] 斯大林认为，布哈林集团在富农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心慈手软。布哈林对俄国富农的分析并不错，他认为对富农要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

作具体分析，对反抗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无情的镇压。对大多数守法的富农要通过经济改造手段，对他们进行和平改造，反对用"打掉门牙"的办法来对待富农。斯大林对富农不作具体分析，一律对待才是错误的。

4. 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斯大林批评说，布哈林只看到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看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新经济政策"是容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1]，这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实践证明，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具有远见卓识。布哈林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的，新经济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长期实行的政策。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说："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2] 布哈林从未讲述容许私人贸易的完全自由。

5. 关于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斯大林认为，"所谓'剪刀差'，额外税，'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目前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然而是暂时的一种手段。"[3] 斯大林批评说，布哈林关于工农之间的剪刀差对粮食生产不利的论断，实质是对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不满。这种说法是不实之词。布哈林认为，关于粮食危机，"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的专门性问题。"[4] 他分析说农产品比价不合理，谷物价格太低，这种剪刀差，对粮食生产不利，同时，国家税收不当，也影响了谷物生产和粮食收购。当然富农投机行为，也是造成粮食危机的因素之一，但这是次要的。

6. 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势问题。布哈林提出一种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0页。

② 《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上册，第38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7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09页。

方案，要“使市场‘常态化’，相当地减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以使全力发展个体农民经济，不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富农，减低工业发展速度，不然农业就会停滞不前”。斯大林认为，这是降低速度和破坏结合。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关于工业化速度问题，布哈林并不否认社会工业化速度的重要性，但他认为，高速度必须建立在工农商结合的牢固基础上，建立在逐步正常发展和日益高涨的基础之上，他反对“骤然加速”。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布哈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个体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他反对过早的迅速的实现农业集体化，他主张，农业合作化要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

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从以上六个方面批判了布哈林的理论观点，后来被归纳为“三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平衡论”和“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批判是不公正的，应当重新予以评价。

1、关于“阶级斗争熄灭论”

“阶级斗争熄灭论”被认为是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布哈林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究竟是怎样阐述的呢？

第一，布哈林认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存在着三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富农、耐普曼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个动摇的和日趋分化的阶级，但却是一支人数众多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经济地位不同，他们之间也有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个阶级的差别和矛盾归于消失。资产阶级是一个与无产阶级有利害冲突的阶级。它对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和平”改造进行反抗。对于资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要用排挤的方法去战胜之。布哈林写道：“工人阶级的总路线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资产阶级，到一定的时候就战胜它。主要是用经济排挤的方法去战胜它”；“在这里也有镇压，但这不是重点。在这里也有合作，也有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排挤和消灭的基础上将会

战胜阶级敌人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形式。"①

第二，布哈林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渐走向缓和，最后归于消灭。他说："如果就这一时期发展的一般形式而论，那么这将不是矛盾的扩大和加深，而是矛盾的缓和。"② 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布哈林强调两点：一是这个斗争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说："阶级斗争不会一下子停止和消亡，而是要持续很长时间，直到阶级的划分最后终止。"二是这种斗争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尖锐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但是，这决不排斥这些矛盾在一定发展时间内的尖锐化。"③

第三，布哈林认为，对于城市资产阶级，只要他们不反抗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不应采取暴力和剥夺手段，而要通过和平竞赛和经济斗争的手段改造他们。他主张，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尚未完全建立的时候，应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允许私人贸易，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机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样做，我们不仅不吃亏，反而大为得益。他反对用剥夺的方法来对付资产阶级和富农。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来看，把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概括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不准确的，是错误的。

2、关于"平衡论"

关于社会发展的平衡论，被认为是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对这一理论的评价，前面已经作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3、关于"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联共中央指责布哈林执行右倾机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96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02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03页。

会主义的主要罪状之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宣传过“和平长入”这一理论。但它的含义是什么呢？这需要弄清楚。

第一，19世纪末，伯恩施坦曾提出“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目的是美化资产阶级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布哈林提出“长入社会主义”理论与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布哈林说“我们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种长入从何时开始。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要任何革命，他们认为，这个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开始了。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开始的。”[①] 这清楚表明，布哈林所说的“长入社会主义”，不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而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有了政权，不怕资产阶级造反。

布哈林曾说过，“长入”的提法，不是他的杜撰，而是根据列宁的论述。在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曾多次强调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和平的经济建设上来。他说：“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②] 列宁称之为改良主义的方法，布哈林把它叫作“长入”，这是应当允许的。

第二，“长入”社会主义是否意味着取消和否认阶级斗争呢？布哈林作了明确的回答。“不是，完全不是，这种斗争只是大大的改变了自己的形式。从工人阶级方面来说，斗争还在进行；我们的立法，保护工人的事业，保证工会有一定的权利，迫使企业家支付一定的工人保险金等等，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式。”他认为，在无产阶级控制经济命脉之后，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资本主义成分存在，不是允许其自由活动，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大铁棒逐渐把资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6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4页。

本主义成分排挤出去。这种以经济斗争为主的斗争形式，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成分有无取胜的把握呢？布哈林认为，在这种斗争中无产阶级始终占据有利的地位。一是无产阶级可以运用政权力量给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以财力支持。二是发挥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势，生产出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可以保证在竞争中取胜。

第三，布哈林认为，“长入社会主义”主要涉及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劳动农民，他们怎么“长入”社会主义，另一部分是城乡资产阶级，特别是富农如何“长入”。

布哈林在1925年出版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小册子中说：“我们的基本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将会同样通过银行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不过它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异物，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1]

关于劳动农民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发生过争论。问题是富农能不能“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富农也可以组织合作社，从而逐步“长入社会主义体系”。这里，布哈林很谨慎，他所说的“长入”是指富农合作社长入国家经济体系，而不是指富农作为一个阶级长入社会主义。因为富农经济对社会主义来说，它仍然是个“异物”。

布哈林主张，对富农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要一律采取剥夺和消灭的政策。对于仇视社会主义政权的反动富农，必须坚决镇压。他说：“如果富农举行暴动来反对我们，我们将采取恐怖手段对付富农。”[2] 可是对于大多数在生产上有事业心的富农，要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28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87页。

"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鼓励他们发展经济。这样，"到最后，也许富农的孙子还会因为我们这样对待富农而向我们道谢"。[1]

总之，过去在批判布哈林时，所概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平衡论"、"长入社会主义"理论不完全符合原意，应当加以纠正，以还其本来面目。

第四节 苏联20年代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的论争

苏联20年代，是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进行激烈争论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战，是从192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

一、机械论者学派及其哲学观点

机械论者学派是指基本上由国立季米里亚捷夫科学院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学者组成的一个学派。主要成员有：Л·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A·季米里亚捷夫、И·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B·萨拉比扬诺夫、C·佩洛夫等。这个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反对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否认唯物辩证法是科学，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必要性。机械论者断言："科学本身就是哲学"。斯捷潘诺夫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存在与科学相分离的、孤立于科学之外的'哲学学'，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就是自然科学最新的和最一般的结论。"[2] 阿克雪里罗得认为：唯物辩证法只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5页。

② 斯捷潘诺夫：《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莫斯科俄文版，第57页。

能“通过每一个个别场合，作为不同的具体内容的结果，来获得不同的形式”而“如果它采取完全抽象的形态，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空洞的、无内容的烦琐哲学。”① 在机械论者看来，唯物辨证法不能做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存在。他们的口号是“把哲学搁到旁边去”、“丢掉哲学”。他们主张把宗教和哲学一起抛到垃圾堆中去。

马克思主义认为，那种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是应当否定的。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抽象哲学和繁琐哲学相提并论。机械论者主张取消哲学，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流派——实用主义的一个变种。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宣称：“我们认为探索所谓最初原因和终极原因，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和毫无意义的。”这种观点是极其反动的。列宁曾经直截了当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②

其次，以机械运动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他们主张：“要了解任何有机现象，这在近代科学看来，就意味着把它还原为相对简单的化学和物理的过程。”阿克雪里罗得说：“不管唯物主义经历怎样的变化，机械世界观曾经而且一直是唯物主义的基础。”③

20 年代初，在苏联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是机械的，没有飞跃和质变。他们认

① 阿克雪里罗得：《保卫辩证唯物论》，1928 年俄文版，第 79、9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9 页。

③ 阿克雪里罗得：《保卫辩证唯物论》，俄文版，第 212 页。

为高级现象可归结低级现象，万物都可追溯到机械运动，运动质的不同形式和多样性都可还原为简单的、机械的位置移动。这是一种倒退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唯物主义者把机械学看作是包罗万象的科学，在当时来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个时候，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高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 18 世纪，"化学还处在幼稚形态，它还信奉燃素说，生物学尚处在襁褓中；对动植物的有机体还只能做极粗浅的研究，当时人们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按照 18 世纪唯物主义者的意思，人是一架机器，正如笛卡儿心中的动物一样，专门把力学的比例尺用于化学过程和有机界过程，这一点是德国古典唯物主义的第一个特有的、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① 可是，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仍然坚持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便是十分荒谬的了。

机械论者斯捷潘诺夫为了论证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合法性，他在《恩格斯和机械论的自然观》一文中作出了下列分析：恩格斯一生中曾有两个阶段研究自然科学，即 1858——1869 年和 1873——1882 年。斯捷潘诺夫认为，恩格斯在 1882 年"修改"了他在 1878 年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主张自然界是机械的，而不是辩证的。斯捷潘诺夫对恩格斯的观点所做的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斯捷潘诺夫认为恩格斯"修改"了自己对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所谓依据，是下边这段话，尽管引文很长，仍然有必要把它转述出来。恩格斯在 1881——1882 年的札记中写道："化学过程的研究面对着作为研究领域的有机世界，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化学过程虽然按同一规律进行，但却是在不同于化学足以解释清楚的无机世界中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一切有机世界的化学研究，最后都归到这样一种物体上来，这种物体是普通化学过程的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第 18 页。

结果，但由于它是自己实现着的永久的化学过程而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这个物体就是蛋白质。如果化学制造出这种蛋白质，使之具有在发生时就显然具有的确定形态，即所谓原形质的形态，——这种确定形态或（更正确地说）不确定形态，就是表示这种蛋白质潜在地包含着其他一切形态的蛋白质（于是没有必要去假定只存在着一种形态的原形质），那末，辩证的转化也就在实际上被证实了，因而完全和彻底地被证实了。到那时为止，这还只是一个思想，或者说还只是一个假设。当化学产生了蛋白质，化学过程就像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要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它要进入一个内容更丰富的领域——有机生命的领域。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物理学，特别是它的化学，但同时它又不再专门是化学，因为一方面它的活动领域被限制了，另一方面它在这里又升到了更高的阶段。"[①] 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任何机械论的蛛丝马迹，而具有鲜明的自然科学辩证法的特征。恩格斯的话说得很清楚，研究化学过程，会碰到有机界，会涉及蛋白质，如果化学能够制造蛋白质，那么就可以现实地实现向有机界的辩证转化，化学就不再是专门的化学了。不知为什么，斯捷潘诺夫从这段引文中得出了所谓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结论。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机械论者坚持象形文字论。

象形文字论是普列汉诺夫在1892年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泽本所写的一条注释里提出来的。他写道："在黑格尔指明了自在之物的逻辑的起源之后，即使有人还想谈论自在之物，也不能推翻谢切诺夫的这些话，因而也不能谈论什么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是，它们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下同），第215页。

它们之间的关系。"[1] 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表述，虽然不是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但是，他的这个比喻不准确，不科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译本第二版出版时，普列汉诺夫以认真的态度，删去了1892年注释中所作的"象形文字"的比喻。但是，机械论者阿克雪里罗得、萨拉比扬诺夫仍然宣传这个理论。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唯物主义坚持这种看法：由种种形式的物质运动的活动所带来的感觉，并不和使感觉发生的客观过程相类似。"[2]

二、辩证论者和机械论者的争论

辩证论者是指团结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3]杂志周围的以德波林为首的学派，主要成员有：A·德波林、Г·巴美尔、Н·卡列夫、И·卢波尔、Я·斯腾等。

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双方围绕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任务、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意义、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一）论战的发生和发展

20年代初，苏联机械论者集团在意识形态部门有相当大的势力。尽管这个集团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有很多差异，但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机械主义的倾向。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读》第1卷，第560页。

② 转引自西脱考夫斯基：《论机械论和孟什维克的唯心论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年第1期。

③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主办的最早的哲学和社会经济理论杂志。创刊于1922年1月。1926年至1930年末德波林担任这家杂志的主编。1931年二月由米丁任主编。1944年由约夫楚克任主编。列宁曾为该杂志撰写了一篇著名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发表在1922年第三期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4年年末停刊。战后没有再复刊。

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各种不同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派别仍然存在，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一些宣传工具发表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1922年彼得格勒大学校长米宁发表一篇文章，名曰《把哲学抛开》。文章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应用一些旧名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的哲学涵义'等等。这些被列宁和普列诺汉夫应用的名词，只不过是一些笔误，此外一无所有。为了装备和整顿这只大船，我们必须注意不仅把宗教，而且也把整个哲学抛开。"[1]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界里，一些抱有同样观点的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求在苏联取消哲学，用实证科学来代替它。这种观点立即遭到了反对，但在这个时候，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论战。

1924年，斯捷潘诺夫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一篇讲稿。他在该文中反对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科学。后来，他把这篇东西提交季米里亚捷夫国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讨论。该院做出决议，一致表示拥护。从此以后，苏联哲学界中的两派，围绕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了争论。

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在苏联发表。斯捷潘诺夫就该书发表写了《恩格斯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一文。他认为，恩格斯曾经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精密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并且提出这样的论断：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改变了自己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态度。[2] 紧接着，德波林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恩格斯和辩证法的自然观》，反驳斯捷潘诺夫。德波林写道，当机械论世界观在自然科学中独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曾依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要求'，力求克服这种狭隘观点。而现在，当自然科学本身走上新道路的时候，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却

① 米宁：《把哲学抛开》，《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2年第11-12期。

② 斯捷潘诺夫：《恩格斯和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年第8-9期，第44页。

发出恢复机械唯物主义的呼声。但是在整个这场历史悲喜剧中，特别有趣的是，他们现在竟宣称，在自己的全部著述活动中都对机械唯物主义不知疲倦的斗争的恩格斯是他们光荣的战友。[①] 德波林依据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证明恩格斯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同盟者，而是辩证法家。1926 年以后，双方的论战逐步升级。1927 年，德波林写了《恩格斯和生物学中的辩证法》一文，批判生物学家克·阿·季米里亚捷夫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接着，又猛烈的抨击了克·阿·季米里亚捷夫的儿子阿·克、季米里亚捷夫"修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1928 年，斯捷潘诺夫发表一本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德波林学派》。书中指责德波林信奉活力论和唯心主义。斯捷潘诺夫批评德波林学派：否认物质结构的电子核子理论；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定现代自然科学、否认实证科学的一切成就。他写道："我们也看见，学派的首领，这位奢望领导全部科学知识的方法论的研究工作的德波林同志，摊开双手表示对物质结构的核子理论大惑不解，只能说出适合于半世纪以前 的科学状况，但已完全不适合现今的科学状况的不知所措的话语：'即使现今科学朝这一方向发展，也不能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②] 斯捷潘诺夫认为，德波林的辩证法在现代科学最尖锐的问题面前无能为力，它既不是工人的理论，也不是科学的指南，而是空洞的直观。

到了 1929 年，在全苏马克思主义代表大会上，德波林学派开始对机械论者进行了全面反击。德波林作了题为《讨论会总结》的发言。德波林在发言中指责斯捷潘诺夫、季米里亚捷夫和其他机械论者"兴风作浪"，"把许多谬论加到辩证唯物主义者身上"，"是同恩格斯的观点相对立的"，"对辩证法抱有轻视和否定的态度"等等。这次会议以后，德波林学派取得了胜利。其结果，一

---

① 德波林：《恩格斯和辩证法的自然观》，参看《哲学与政治》，第 232 页。

② 斯捷潘诺夫：《辩证唯物主义和德波林学派》，第 62 页。

是德波林派成员控制了国家出版局的哲学部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哲学条目编写组；二是改组了季米里亚捷夫的国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该院领导由德波林派的阿果尔担任。

（二）争论的主要问题

第一，围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展开争论。

德波林维护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正确论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运动总是不言而喻地被认为是和机械运动，和位置移动相等的。这是从化学产生前的18世纪遗留下来的，并且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理解。应用到物质上的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由于同样的误解，还产生了想把一切都归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甚至格罗夫也'强烈地倾向于认为物质的其他状态是运动的变形或者最终归结为这些变形'，这样就把其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杀了。这决不是说，每一个高级的运动形式并非总是必然地与某个现实的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相联系；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作用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把每一次的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① 对于恩格斯的这段话，斯捷潘诺夫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他写道："我们能不能同意这段话呢？我直言不讳地说：这一段话是应当否定的。我们能断言，研究有机体发生的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不能促进我们理解生命的本质吗？"② 德波林认为，必须坚决否定斯捷潘诺夫硬加在恩格斯身上的说法，似乎恩格斯说过，研究有机体中发生的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不能理解

① 《自然辩证法》，第225—226页。

②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5年第8—9期，第49页。

生命的本质。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恩格斯仅仅是说“次要形式”没有把主要形式的本质包括无遗。

第二，围绕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的口号展开争论。

德波林反对把哲学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反对对哲学持否定态度。德波林引述恩格斯的话，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被迫地要考察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正如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不论他们愿意与否，也被迫地要去考察一般理论结论一样。如果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方面一知半解，那末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领域，在直到现在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事实上也是同样的一知半解，并依此得出结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联盟”。

事实上，苏联的自然科学家，在不同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都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分不开。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十月革命以后，从事高级神经活动生物学的研究，提出了两个信号系统的思想，认为人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对外部世界直接影响反映）外，还有第二信号系统，即引起人的高级神经系统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言，从而建立了高级神经活动的新学说。这一学说，对医学、生理学有巨大影响，同时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具体科学的结果。巴甫洛夫学说是在抛弃唯心主义者关于灵魂不死的无稽之谈，并揭示了生理现象的物质基础之后，才使大脑生理学和心理学成了真正的科学。

苏联著名植物育种科学家米丘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先后培育出三百多种果树新品种，创造出人工杂交（有性杂交、无性杂交、种内杂交、远缘杂交），有机体定向培育，人工选择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对发展植物学理论作出了贡献。唯物辩证法是米丘林学说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对辩证法来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揭露出一切都有必然消灭的迹象；除了不间断地形成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止境的由低级

上升到高级的过程，任何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原则一直是我工作的基本原则，它极为明确地贯穿在我改良浆果植物的现有品种和培养新品种时所作的一切实验中。”①

关于机械论者“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的口号，德波林认为，首先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使人们能够制定出比现代自然科学单靠“自己力量”所制定的更妥善更完整的“概念体系”。其次，它在我们现代条件下是反动的，因为它要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理论和阶级意识形态不去影响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多数还受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自然科学家。

第三，围绕辩证法的理论作用、质和量的关系、偶然性和必然性等问题展开争论。

德波林针对“辩证法就是经院哲学”的口号，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对自然界、历史和人类思维的一般普遍的认识方法”，否定唯物辩证法，“会使马克思主义解除武装”，“会使无产阶级在理论领域里投降于资产阶级哲学”。关于质和量的关系问题，机械论者把“质的多样性归结为纯粹量的差别”。德波林认为，这种片面的数学的量的观点将不得不走向不可知论或者甚至比不可知论更坏的结局。质这个范畴是不可能靠一纸符咒就从自然界中消除掉的，它要求的是阐述明白。关于偶然性问题，德波林针对季米里亚捷夫把偶然性归结为我们所未知的东西的这种错误看法，提出了下列三点：第一，偶然的东西之所以是偶然的，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原因未为我们所知；第二，偶然现象本身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的，它不是无因的；第三，偶然现象是客观的。

总之，在与机械论者的论战中，德波林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了机械论者取消哲学、反对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自然科学中去的错误观点，对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论战中，德波林也暴露出许多错误观点。

① 米丘林：《工作的原理和方法》，俄文第3版序言。

一是德波林在论战中表现出严重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倾向，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区别，有时竟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相提并论。1925年，德波林在《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一文中写道：“‘哲学’总括在方法中。这一点黑格尔早就指出过。马克思主义也采取同样的观点。”[①] 1926年，德波林在《我们的分歧》中也处处把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等同起来。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站在所谓具体概念的基础上。”在谈到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时，德波林说：“我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一方面依据恩格斯，另一方面依据黑格尔。大家知道，恩格斯在阐述这个问题时，也是依据黑格尔的。”[②] 在量变质变问题上，他写道：“大家知道，最先阐明这个问题的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方面完全采纳了黑格尔的学说。”[③] 德波林不是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哲学，而是把它理想化。德波林写道：“如果剔除我们指出的黑格尔逻辑的基本缺点，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整个说来，即使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也应当承认黑格尔的体系是正确的。”德波林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当作他自己的方法，把一切争论的问题都套进黑格尔的范畴，甚至认为连黑格尔唯心论体系也不需要做根本的改造。他在《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一文中承认，德波林学派是以黑格尔为中心，他的辩证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基础上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德波林大量地不加批判地照抄照转黑格尔的话，导致了理论上的错误。

二是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概念的解释上，有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德波林写道：“马克思主义就其一般的哲学世界观来说，属于斯宾诺莎学说，按照普列

① 《战斗的唯物主义者》1925年第5期。

②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339页。

③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350页。

汉诺夫的说法，它来源于斯宾诺莎的学说。"[1]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来源于斯宾诺莎，属于斯宾诺莎学说，这就是抹煞了马克思主义与先前哲学理论的原则区别。关于矛盾普遍性问题，德波林写道："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无区别的同一是一种纯朴状态，一切存在物都应当从'纯朴'状态中，即从无区别的抽象的同一中摆脱出来。同一转化为差别，差别又转化为对立，而后又转化为矛盾。"他又说："在绝对同一的环境中，当其中由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对立面没有形成以前，就不可能有发展。"照此说法，发展的开端，只是绝对的同一，不包含矛盾，这意味着矛盾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后来才形成的。这种见解实际上就是否认事物内部矛盾的普遍性。关于范畴问题，德波林写道："作为一般辩证法的对象的同一抽象范畴，也因情况不同而采取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看它出现在或运用在什么地方；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他又说："必须了解清楚，具有范畴性质的基本概念，才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它们同样是为存在和思维所固有。"人所共知，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所谓"抽象范畴"、"采取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以及"具有范畴性质的基本概念""是为存在和思维所固有"的提法，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而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

除此而外，德波林派在论战中对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也存在着错误的观点。在论战中，德波林强加给机械论者许多帽子，诸如"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取消派之间存在着联系"等等。这不利于问题的争论，反而影响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解决。

（三）结局：1929 年 4 月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机关全苏会议的决议

---

① 德波林：《斯宾诺莎学说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年鉴》1927 年第 3 期，第 11 页。

1929年4月，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机关第二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列宁研究院副院长B·阿多拉茨基做了《论列宁的哲学著作》的报告，他强调了辩证法理论是我们工作的指南，机械论是典型的庸俗经验主义。B·阿多拉茨基说："我们需要有辩证法理论。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和认识论，这种辩证法，当然是剔除了唯心主义的、反映物质世界的永恒运动的辩证法。要知道，在尤连涅茨同志许诺的那位将为我们写出辩证法理论的新莱布尼茨出现以前，遵照列宁的笔记而进行研究的、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就是关于这种辩证法理论的最主要的指南。"[①]

总的来说，对学术问题的争论采取全苏会议决议的形式来解决，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决议中又给机械论者扣了一些帽子，如"以庸俗进化论偷换革命的辩证法"，"以实证论偷换唯物主义"等等，这种做法更是错误的。

机械论者对过去的辩证法遗产，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固然错误，但把机械论者的错误简单地宣布为20年代苏联哲学中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其成员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比如，И·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是党的著名活动家，列宁研究院的组织者，对于宣传无神论作了许多工作，把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说成是"修正主义活动"，把他说成是修正主义分子是不合适的，况且，И·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肯定"唯物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的最新的和最一般的结论"[②]。当时，有的学者就反对这种作法。E·雅罗斯拉夫斯基认为，随便扣修正主义帽子，后患无穷。他写道："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提法（既然你是机械论者，你就一定右倾）是对辩证唯

① B. 阿多拉茨基：《论列宁的哲学著作》，《共产主义学院通报》1929年第32期第210页。

② 斯捷潘诺夫：《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莫斯科1924年版，第67页。

物主义的讽刺画。"[1] 在反对机械论的斗争中，开了这样一个危险的先例，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后来，把机械论者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把德波林学派定为左倾机会主义，在许多学术领域开展政治斗争，使苏联学术界，由活跃变为沉闷，极大的影响了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三、批判机械论者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从 1924 年到 1929 年发生在"辩证论者"和"机械论者"之间的哲学论战，在苏联国内有着深远影响。这场哲学争论，在苏联各种杂志和报刊上都有反映，双方的论点尖锐对立，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起了促进的作用，对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这场哲学战线上的论争，对克服那种否定和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倾向有积极意义。

机械论者并不是清一色的，它由各种成分拼凑起来，但机械论者的基本特性是否定辩证法，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世界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全是剥削者臆造出来的，这一理论必将陷入毁灭。米宁写道："哲学，这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社会观、认识观的特有的、极其确定的概念。一切哲学，正像一切宗教一样，是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2] 恩契曼写道："某种称之谓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必将陷于毁灭，因为凭生物学的训练，逻辑的必要性就没有了，知识和思维也必将归于灭亡，只有哈哈大笑这种生理反映才会使人回想起愚弄过先进革命工人的无辜头脑的剥削者的辩证唯物主义。"[3] 当时，机械论者否

---

① 《争取哲学战线的转变》，莫斯科 1931 年版，第 11 页。

② 转引自《哲学与政治》，第 9 页。

③ 恩契曼：《新生物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莫斯科 1923 年版，第 48 页。

定辩证唯物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气焰十分嚣张。季米里亚捷夫曾建议，不要向恩格斯、列宁、黑格尔学习辩证法，而要向物理学家约翰·汤姆生学习。

德波林针锋相对，他写道："我们必须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辩证方法；掌握这一方法，我们才能更好地、更深入地和全面地了解新的形势。我们必须磨快我们从我们导师那里得到的随身武器，这一武器也能帮助我们赢得同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的思想斗争。"①

在同机械论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了"战斗的唯物辩证论者协会"。参加这个协会的，除了哲学家之外，还包括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医学家、法学家等。协会广泛开展了对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宣传和研究。这个协会于1928年在致全体会员的信中指出："在那些把唯物辩证法的研究贬低为繁琐哲学、把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次要的非本质部分的人们面前，在那些力图复活早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批判掉的机械论世界观、不顾自然科学成就的辩证性质而死抓住机械论对现代科学偏见不放的人们面前，在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世界观和一切知识部门的方法的人们面前，战斗唯物辩证论者协会谨宣布，协会目前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捍卫唯物辩证法、反对与之敌对的修正主义的斗争。"② 在反对机械论斗争之后，确立了唯物辩证法在一切科学领域里的指导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普遍接受。

第二，这场哲学战线上的论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相结合有积极意义。

机械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资格指导自然科学。其理由，萨莫伊洛夫教授说的直截了当。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

①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375页。

②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8年第12期，第217页。

在唯心主义家里诞生的，是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出发点的。因此，"自然科学根本不需要辩证法。"[①] 对此，德波林驳斥道："要知道，辩证唯物主义之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原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不能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因为他们沾染了唯心主义。萨莫伊洛夫教授没有充分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他就不会说辩证唯物主义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出发点，他就不会把辩证唯物主义简单地归结为黑格尔的辩证法。"[②] 德波林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并不矛盾。相反，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愈向前发展，就愈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恩格斯和列宁都主张必须在自然科学中应用唯物辩证法。恩格斯说："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或者从无批判地或杂乱地读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哲学的奴隶。"[③] 恩格斯清楚地说明了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意义。列宁也说过："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④]

通过反机械论的斗争，自然科学工作者普遍认为，把唯物辩

① 萨莫伊洛夫：《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6 年第 4－5 期，第 69 页。
②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356 页。
③ 《自然辩证法》，第 178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276 页。

证法贯彻到自然科学中去，这不仅是自然科学本身的需要，而且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所必需的。他们自觉地接受了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在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与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家之间，逐步结成紧密而巩固的联盟。

第三，这场哲学战线上的论争，对促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首先，在反对机械论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反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双方论战过程中，著名的总主教威金斯基出来支持机械论者。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现代力学是同基督教教义完全吻合的"，"这是关于统一的上帝、全能者和造物主的学说，它今天正为科学材料所证实。"[①] 德波林认为，机械论集团同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之间的联盟在客观上建立起来了。辩证论者为了有效的粉碎神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进攻，编辑出版了《唯物主义丛书》和《无神论丛书》。唯物主义丛书包括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托兰德选集》、《拉美特利选集》、《狄德罗选集》、《霍布斯作品集》和《费尔巴哈作品集》。无神论丛书包括霍尔巴赫的《被揭穿的基督教》、梅叶的《遗书》、耐戎的《无神论士兵》、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辞典》等。这些丛书在同哲学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在反对机械论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辩证论者和机械论者论战过程中，修正主义思潮有所抬头。在国外，德国前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德曼写了名曰《社会主义心理学》一书。这本书的任务，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使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摆脱马克思主义。"[②] 德曼攻击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同黑格尔主义没有多大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繁琐哲学，是黑

---

① 《俄国东正教及议会通报》，1926年第1号。

② 转引自《哲学与政治》，第306页。

格尔精神的残余。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其实是玩弄概念的游戏。他写道："同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或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相适应的现实是没有的。社会主义仅仅是假说，是关于可能的社会制度的观念，更确切地说，仅仅是关于还未存在而且没有存在过的制度的各种原则的想象。"①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外部世界的客观事实，仅仅是范畴、概念，是抽象的产物。德曼要求用伦理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论者则要求用自然科学的最新结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不谋而合，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国内，马赫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和经验论者也一齐上阵，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弗洛伊德主义搀合在一起，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相结合，以此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同国内外各种修正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苏联广大哲学工作者，撰写了大量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马克思主义年鉴》等杂志和文集上，以反对各种修正和取消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企图，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五节　30 年代米丁、尤金等与德波林学派的论争

30 年代初，在辩证论者与机械论者争论之后，紧接着发生了米丁、尤金等苏联年轻一代哲学家与德波林学派之间的哲学论战。这场争论从 1930 年上半年开始，双方多次进行辩论，直到 1930 年 10 月举行的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会议，学院主席米柳京作了主要报告，德波林作了补充报告。在会议进行中，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了严肃的思想论战。这场论战的转折点是 1930 年 12 月 29 日斯大林同红色教授学院联共（布）支部委员会

① 德曼：《社会主义心理学》，1926 年德文版，第 78 页。

的谈话。谈话之后，联共（布）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公开支持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接着联共（布）中央就德波林主编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作出决定，以后，哲学争论变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一、德波林及其哲学思想

著名哲学家德波林，阿布拉姆·莫伊谢也维奇生于1881年。1898年以前在科甫诺城当学徒，1899年到乌克兰的克尔森任政府职员，因与秘密团体有联系而被解除职务，1902年被沙俄警察逮捕。1903年侨居瑞士，并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脱离布尔什维克，参加孟什维克派。在侨居瑞士期间，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哲学系，于1908年大学毕业，在此期间，德波林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该书直到1916年才在俄国出版，普列汉诺夫曾为此书写了长篇序言。

德波林从1907年到1917年2月是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他脱离孟什维克派，直到1928年，他一直是无党派人士。1928年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在此期间，他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研究院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1926年到1930年，他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责任编辑，192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是《思想家列宁》，它从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历史观方面评价了列宁的哲学思想。1925年到1929年德波林领导了对在苏联被称之为机械论派别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战胜了机械论者。德波林在20年代发表的著作有：《哲学的对象与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我们的分歧》等。

1935年11月，德波林当选为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书记，1939年被选为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3年10月19—24日，苏联科学院选举院士和通讯院士，德波林被选为历史学部院士，同时参加经济、哲学和法学部的工

作。1958 年出版了《近代和现代社会政治学说》第一卷。1961 年德波林将他 1905—1960 年的论文共 33 篇编辑出版，取名《哲学与政治》，1963 年德波林去世。

下面我们概述一下德波林的哲学思想。

1、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在与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德波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以下几个论点："（1）只有自然界是实在的。（2）自然界的存在不依赖于主体。（3）主体是同一自然界的一部分。（4）一切认识产生于经验，即产生于主体由外界所获得的知觉。（5）因此，外界即存在决定着我们的意识。（6）既然现实是认识的唯一对象，我们的认识就只有在它与现实、与存在一致的时候才是合乎真理的、客观的。"① 这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内容的概述表明，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是站在唯物主义路线和反映论路线上的。他主张自然界是不依赖主体的实在，它决定着意识，是经验、知觉的唯一对象，认识是由外界，即自然界获得的。

2、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对象

德波林在与机械论的斗争中，驳斥了取消哲学的口号，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有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即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规律。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规律，都服从这些规律，但它们又不研究这些规律。德波林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说明这些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从内容方面来说，"广义的辩证法是一门把自然界、思维和人类历史共同具有的最一般的运动发展规律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科学。"② 从形式方面来说，辩证法同时就是逻辑，因而它涉及思维及其形式，因此"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人类历史和思维方面的联系形式或联系规律的科学。"③ "而辩证法

①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43—44 页。

②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182 页。

③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183 页。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非是一般的方法论，同时也是科学理论，即一般科学认识的理论。”他指出，唯物辩证法研究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发展的最普遍规律有“量转化为质的规律，飞跃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①。我们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德波林强调唯物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强调哲学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非具体科学所能代替。他对唯物辩证法规律的这些理解，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他的表达也有片面性，他把质量互变规律表达为从量到质规律，而忽视了从质到量的方面。

3、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作用

德波林说：“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表达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所具有的运动规律。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同时也一般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现象的某些具体的方面，我们就能揭示某种内容的真正原因和联系，把内容置于形式之下，这就意味着在具体的内容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中把握内容。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如此。”② 德波林主张，唯物辩证法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唯物辩证法不是公式，而是具体研究发展事物规律的方法。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体系提出了设想，即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他说：“一般的辩证法理论，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综合为统一整体，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世界观或‘体系’。”③ 他认为，辩证法作为一般方法论与认识论是一致的。

4、关于物质定义

1924 年德波林在《思想家列宁》一书中给物质概念下了一个

①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329--330 页。

②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577 页。

③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206 页。

定义："比较全面详尽的关于物质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表达如下：物质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并在我们的感觉中反映出来的客观实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物质是所有无限的、具体的'中介'的总和，即关系和联系的总和。而各门具体的科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是研究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和'中介'即那同一个物质的过程、关系和联系的诸阶段的。"[①] 德波林认为，物质是客观实在，且可以在人的感觉中反映出来。这一点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和科学发展相一致的。德波林在定义中特别指出物质与时空的关系，这表明他坚持时空的客观性，时空与物质不可分。反对将时空与物质脱离的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德波林承认物质的无限性，但又说物质是各种关系和联系的总和。这一点不够确切。因为各种关系和联系中，既有各种物质形态运动的关系和联系，也有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和联系，还有意识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如各种感觉之间、各种知觉之间、各种概念、判断、推理之间，以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等等，既然德波林说，物质是各种关系和联系的总和，自然也应包括意识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联系在内。这与唯物主义路线相悖。

德波林在1961年出版《哲学与政治》时，对1924年的物质概念的定义作了如下修改："物质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并在我们的感觉中反映出来的客观实在。而各门具体的科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是研究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的。"[②] 这个定义，将1924年定义中的一句话去掉了，即将物质是无限的中介，即关系和联系的总和一语删掉了。

5、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

---

①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818页。

②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440页。

针对机械论否定对立统一规律作用，德波林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乃是理论自然科学的基础，“量转化为质的规律，飞跃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等等仅仅是对立面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① 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出发点，把各个范畴统一起来。

但是德波林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作用时，对这一规律的表述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他夸大矛盾统一性的意义，对矛盾的斗争性重视不够。他说：“对立面的同一是世界和人类认识的真正基本的规律。列宁把这个规律公正地看作是辩证法的基本实质，即：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过程中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的和对立的趋向。”② 德波林把对立统一规律定义为对立面的同一规律，表明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

6、关于分析和综合

德波林说：“一般地说，自然界活动的方式有二——破坏和创造，它进行着分解和综合。与这两个自然过程相适应，人的认识也以分析和综合作为工具。在历史上，人的认识是从分析进到综合的；人在学会创造之前不得不先进行破坏。当然，这一点不应该作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理解。”③

这段话表明，德波林从整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和社会，论述了分析和综合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论证了分析和综合的一致性。这完全是正确的。

但他认为，分析是破坏，综合是创造，这就割裂了二者的关系。分析和综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分析可以从旧事物中分解出新事物来，综合可以是诸旧事物的组合。因此，不能说分析都是消极，综合都是积极。

德波林在苏联哲学发展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编辑

①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329—330 页。

②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820 页。

③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 273 页。

过霍尔巴赫、爱尔维修、拉美特利、托兰德、狄德罗、霍布士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在探讨唯物主义史方面是有成绩的。在批判机械论者的斗争中，写了《恩格斯和辩证法的自然观》、《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我们的分歧》等许多文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德波林及其同事在1924年建立起来的"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协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他的哲学观点也有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对列宁及其哲学思想的评价

德波林学派在其著作中对列宁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对列宁主义的评价，存在着一些错误观点。德波林在《思想家列宁》一书中写道："他主要是一个哲学实践家。"① 德波林学派成员卡列夫在给列宁主义下定义时写道："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革命实践在马克思的国际中还没有足够的物质前提。如果有谁对列宁说，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列宁也会感到十分惊奇。"② 德波林在给列宁主义下定义时还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而把列宁主义仅仅称作是政策和策略。德波林写道："不应该把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列宁的政策和策略是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这个定义的错误在于，第一，他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把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同政策和策略割裂开来；第二，他把列宁主义仅仅看作是政策和策略；这是低估列宁主义的表现。当然，列宁主义包括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可是列宁发展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2、关于辩证唯物主义

德波林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阐述中，也存在一些错误观

---

① 《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②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4年第4—5期，第241页。

点。德波林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综合。"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就其一般哲学世界观来说属于斯宾诺莎的学说，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它来源于斯宾诺莎的学说。"[①]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起源看作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集合体"，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这种机械的"综合"、"集合"，所得到的结果，不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只能是黑格尔主义或费尔巴哈主义。至于德波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来源于斯宾诺莎，属于斯宾诺莎的学说，这也不是偶然的。这种观点出自于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斯宾诺莎学说混同起来，这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与先前哲学理论的原则区别。

德波林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把发展过程划分为同一、差别、对立、矛盾几个不同阶段。他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说："当一切必然的发展阶段——从单纯的同一——，经过差别和对立，到达极端的矛盾——都经过之后，解决矛盾的时期就到来了。"他还说："在绝对同一的环境中，当其中由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对立没有形成之前，就不可能发展。"德波林虽然正确阐述过黑格尔的矛盾学说，但他也错误的割裂了同一和矛盾之间的关系。

3、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德波林认为："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实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要求，是取消理论。"德波林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看作是"纯粹方法论"的学问，他们不是应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是与革命实践相脱离。德波林虽然有时也在著作中说几句联系实际的话，但实际上并没有那样去做。德波林后来在检讨中自己也承认："我们的根本错误，如已被确认者，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① 德波林：《斯宾诺莎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年鉴》1927 年第 3 期，第 11 页。

我必须承认，我在很长的期间，对这种非难未能理解。难道我不是时常说，实践是理论的标准吗？我这样说过。然而到后来，我才明白了，问题之核心并不在此。问题之核心在于我们未能把我们理论的方法论的观点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课题联系起来，我们的理论与活的生活脱了节，并且由于我们停留在纯粹的逻辑的范围之内的缘故，——有人较多，有人较少——而远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在二者之间筑起了障壁。"①

二、米丁、尤金等与德波林学派的论战

1929年4月，德波林学派取得了批判机械论学派的决定性胜利。半年之后，即1929年年底至30年代初，便发生了M·米丁等红色教授学院的年轻人（成员有：M·米丁、Ф·康斯坦丁诺夫、П·尤金、В·拉尔采维奇、A·塔克谢尔、Л·切列姆内等）与德波林学派之间的哲学争论，这场争论，后来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论战的起因

1929年12月29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他在演说中说：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击破富农，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是值得自豪的，但是，"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②。

在斯大林的演说发表以后，1930年2月，召开了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战斗唯物主义者与辩证法家协会的扩大会议，德波林发表了题为《哲学战线的总结和任务》的报告。会上围绕着哲学战线理论是否脱离实际的问题展开了辩论。有两种意见尖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第36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页。

对立。一种意见以米丁为代表，对哲学界的领导人德波林等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在大转变的年代，现哲学领导不了解社会形势，没有感到哲学战线任务的严重，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哲学领导人不是以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为中心，而是忙于解释哲学史，从而哲学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脱了节。另一种意见是以卡列夫、斯腾为代表。他们认为哲学战线的形势是好的，反对机械论的斗争成绩是巨大的，斯大林的指示不适用于哲学领域。双方争论不休。会后，继续在报刊上进行了辩论。

1930年6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M·米丁、B·拉尔采维奇、П·尤金三人合写的文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任务》。文章在肯定了同机械论斗争伟大意义的同时，认为理论斗争中的哲学战线例外论是没有根据的。文章写道："理论比实践落后的这种现象，可以在整整一系列的问题上感触到。应当承认，过渡时期辩证法的极重要问题，阶级和阶级相互关系问题，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问题，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问题等等，几乎完全没有研究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理论落后的现象，由于过渡到改造时期和进入新经济政策阶段而表现得特别明显。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做得非常不够，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①] 文章的基本论点与联共中央对进一步发展苏联哲学科学的要求是一致的。

德波林学派成员立即出来批驳米丁等人的文章。1930年7月出版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五期上发表了A·德波林、И·卢波尔、Я·斯腾、Н·卡列夫等十人合写的文章，题为《关于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对米丁等人进行反批评。文章说，米丁、拉尔采维奇、尤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现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面临的任务，并没提出正确的阐述"，"就其观点而论，这是一篇折衷主义的文章。文中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规定当代哲学任务的列宁主义的主要文件——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

① 1930年6月7日《真理报》。

义》一文。”德波林等十人在文章中不同意把哲学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他们写道：“努力于唯物辩证法理论，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于哲学的主要任务。”

针对德波林等十人的文章，米丁在1930年8月8日《真理报》上发表了《真实地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一文，文章认为德波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形式主义的歪曲，指责他对列宁、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而有意抬高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的作用。与此同时，拉尔采维奇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14期上发表文章，批评德波林等十人的文章是企图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和现今哲学领导的哲学路线对立起来，猛烈抨击了德波林派成员以高傲的、老爷式的轻蔑态度，对待敢于在哲学问题上进行改革的人们。

在论战进行的过程中，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也先后于7月和10月作出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名曰《哲学战线的状况》，发表于1930年8月2日的《真理报》上。决议认为，经过五年多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机械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的作用一个是保卫了唯物辩证法，另一个是为揭露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创立了一定的前提条件，特别是有助于揭露右倾理论的基础。决议指出，哲学战线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1）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并没有摆脱理论思想落后于革命实践那种状况。没有全力以赴的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问题。（2）哲学战线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工作同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充分密切结合起来，忽视了揭露托洛茨基主义及托季反对派的方法论根源。（3）某些个别同志提出了实质上是托洛茨基性质的某些反党论点，这些论点出现在哲学宣言的最初草案中。（4）哲学战线的自我批评开展的非常不够。（5）列宁给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对广大群众宣传战斗的无神论，然而，哲学战线对这项工作却加以忽

视。[1]

第二个决议名曰《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问题》，刊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19至20期上，决议认为，自哲学辩论以来，意见分歧进一步尖锐和深刻化了。哲学界的领导在对待意见分歧的任何一个基本问题上，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相反，哲学界垄断地利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竭尽自己的权威力量来攻击任何敢于在党的报刊上提出自己意见的同志。第二个决议比第一个决议较为详细论述了德波林派的错误。这些错误是：(1) 根本缺陷是对发展中的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估计不足，不懂得列宁的哲学著作是这一发展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哲学界领导掩饰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错误。(2) 在对待黑格尔遗产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这些错误的实质在于：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同起来（卡列夫）；认为黑格尔提供了"一切运动形式的详尽无遗的现实图景"（德波林）；对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批判得非常不够。(3) 德波林同志过高地评价了费尔巴哈，把费尔巴哈渲染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作出了"费尔巴哈的时代还将到来"、"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主义的继续"，至于实践的问题，已由费尔巴哈解决了等论断。(4) 德波林、卡列夫、戈尼克曼等同志在研究唯物辩证法时所产生的显著的形式主义和繁琐的哲学倾向，首先在他们几乎完全忽视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研究这个事实中反映出来。(5) 完全忽视了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问题，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问题，等等。(6) 哲学界的领导人不仅没有同党内机会主义流派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作斗争，而且有一些个别领导人（例如卡列夫）在他们的著作中，进行了非常积极和长期的反党斗争。[2] 这里

---

① 《真理报》，1930年8月2日。

② 参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97页。

应当指出的是，学术领域不同观点的争论，采取党组织作决议的办法，不利于解决问题，也是不正确的。

从1929年末到1930年末，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米丁、尤金同德波林、卡列夫之间，你来我往，展开论战。在辩论中，米丁等人并不占优势，而德波林却仍然以"哲学领导"自居，在辩论会上常常质问对方。在1930年10月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德波林对该院领导人B·米柳亭的报告进行驳斥说："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最光辉的榜样就是米柳亭同志的报告。"[1] 从论战的起因和进行的方式看，这种辩论开始阶段是自发的，在这个期间，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虽然批评了德波林派的"形式主义倾向"，但仍然肯定了过去苏联"哲学界领导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二）重要的转折

在双方论战达到高潮时，斯大林于1930年12月9日对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成员发表了谈话。斯大林这次谈话的内容没有公开发表。后来，尤金在纪念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发表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如下的转述：

斯大林指示我们，把德波林集团叫做"形式主义倾向"，这是一种学院式、教授式的说法，斯大林给德波林集团下一个定义，即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因为这个集团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宣传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歪曲，孟什维克的特点是，在宣传唯心主义观点时，总是引证马克思的话作掩饰。他们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践，撇开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们不想研究这些问题，即使研究也曲解这些问题，他们拒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

斯大林接着说，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用黑格尔主义而且是

①《苏联30年代哲学争论材料》，转引自《哲学译丛》1992年第3期，第61页。

用歪曲了的黑格尔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斯大林对列宁作了评述。斯大林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领域都做出了新的贡献。在一切方面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对于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作用，对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相互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斯大林指出，不能粗暴地、简单地批评普列汉诺夫，需要历史地对待普列汉诺夫，不能不看到普列汉诺夫确实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不能闭着眼睛不看到，普列汉诺夫是个孟什维克，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哲学上反对列宁。

斯大林接着指出，必须彻底地审查机械论者、德波林分子和其他修正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审查他们的全部著作，批判他们所写的、所做的、所说的一切。如果这样做了，我们的任务，我们应当在哪个方面进行工作，应当朝哪个方向前进，也就清楚了。[①]

从以上内容看，斯大林对德波林的批判，可归结为下列几个问题：（1）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歪曲，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2）理论脱离实际，回避社会主义建设；（3）低估和否认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贡献；（4）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总的来说，定性不准，不符合实际。

德波林学派确有错误。德波林曾把辩证唯物主义看做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集合体”。德波林的学生卡列夫则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发展和延伸”。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德波林学派混淆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之间的区别，也是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年第2期，第149页。

明显的。德波林曾说过，即使从唯物主义观点看，也应当承认黑格尔的体系是正确的。卡列夫则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朴素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他们都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不仅包括其辩证方法，而且也包括其体系。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做这种唯物主义的发挥，就抹杀了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辩证法之间的本质的区别。

但是，斯大林把德波林学派说成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德波林在与马赫主义斗争中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以下六点：(1) 只有自然界是实在的。(2) 自然界的存在不依赖于主体。(3) 主体乃是同一自然界的一部分。(4) 一切认识产生于经验，即产生于主体由外界所获得的知觉。(5) 因此，外界即存在决定着我们的意识。(6) 既然现实是认识的唯一对象，那么，我们的认识就只有在它与现实、与存在一致的时候，才是合乎真理的、客观的。[①]德波林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概述，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德波林及其学派的哲学观点属于唯物主义，是毫无疑义的。

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学术领域的争论，直接插手和干预产生了消极后果。在这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哲学战线上的论战迅速转变为对德波林学派大规模的批判。过去，在辩论中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评，还都是一分为二的，既肯定他们的成绩，又指出他们的错误。在这以后，对德波林的批判升级了，采取十分粗暴的做法，许多人被不公正的解除了职务或遭镇压。

在斯大林谈话以后，共产主义学院于1931年1月初召开了主席团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当代任务》的决议，对德波林的错误做出了重新的估计。这个决议与前两个决议比较，在提法上有很大的变化。

① 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43－44页。

前两个决议认为，在过去的发展阶段上，哲学界领导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向着列宁所指出的方向前进的。后一个决议则认为"由于反对哲学上的列宁主义，并且反对哲学战线上的转变，德波林、卡列夫、斯腾及其一派，就走上了直接而公然地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①]

前两个决议认为，德波林派的错误是"形式主义的倾向"，后一个决议则认为，德波林等哲学领导的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对列宁主义错误的体系，实质上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这是一种特殊的、庸俗化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名词术语掩盖起来的、对辩证唯物论的唯心主义修正。[②]

（三）1931 年以后的发展

1931 年 1 月 25 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随着而来的是苏联哲学领导机构和《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的先后改组。新的编辑部组成如下：M·波克罗夫斯基、B·阿多拉斯基、M·米丁、П·尤金、A·马克西莫夫、A·德波林、A·季米里亚捷夫。此后，哲学战线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哲学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步。1931 年 4 月召开了全苏哲学战线积极工作者会议，会议要求哲学工作者向具体的知识，特别是而向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会议提出了哲学机关工作的重心，以及战斗唯物主义者协会工作的重心、各杂志工作的重心，都要转移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种任务。会议以后，哲学工作者把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写出了一批有质量的论著，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1931 年以后，德波林学派解体了。但对德波林学派的评价，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升降、起落。

---

① 《共产主义学院通报》1931 年第 1 期，第 18—19 页。

② 《共产主义学院通报》1931 年第 1 期，第 18—19 页。

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1936年以后，苏联进行了大规模肃反。同时，对德波林派的提法也就跟着升级了。在1937年《苏联小百科辞典》第六卷“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条目中说：“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是哲学领域内的反革命托洛茨基的直接代理人，是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代理人的反革命活动的直接的思想掩护”。在1938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8卷“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条中说：“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是德波林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胜利、对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激烈抵抗的反映，是哲学战线上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间谍、叛徒和托洛茨基代理人的思想掩护”。到了1941年，对德波林派政治估计更加尖锐了。尤金于1941年2月纪念联共（布）中央关于哲学杂志决议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谈到德波林派时，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把机械论同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相提并论。报告中说：“只要仔细地深入地考察一下机械论者和孟什维克式唯心主义者之间打架的真正内容，就可以发现，这原来是两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①。二是改变了过去关于德波林派是“阶级敌人的思想掩护”的提法，而直接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报告中说：“政治上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实质上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派别。孟什维克式唯心主义派别的大部分参加者是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是后来揭露出来的人民的敌人。”②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4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7卷的“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条中说：“孟什维克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是阶级敌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行反抗，是托洛茨基主义、资本主义右翼复辟分子的思想掩护”。从而又恢复了1936年以前的提法。

进入6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的评论，既有肯定的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年第2期，第145页。

②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年第2期，第148页。

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1960年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中关于“德波林”的条目中说，在20年代，德波林曾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保卫了唯物辩证法。20年代至30年代，德波林的许多著作的特点是：哲学理论脱离实践，低估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完成革命转变的意义，低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在《思想家列宁》一书中，德波林在描述列宁是伟大思想家的同时，说列宁在哲学上是普列汉诺夫的门徒。在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中，批评当时领导这个杂志的德波林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滚到了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立场”①。

对于批判德波林学派，1969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一书，作过这样的评论：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广泛开展的理论大辩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大辩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深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复杂过程，并且是同我国思想领域的一般过程，同反对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的思想残余的斗争以及党内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在大辩论中反映了社会科学向紧密联系实际、联系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的转变（其积极意义也在此）。然而应当指出，过于尖锐的辩论语调，派别主义表现有时毫无意义无根据地从政治上指责某一参加讨论的人，把理论上的错误直接同反党倾向联系一起，这就常常妨碍深入研究那些有争论的问题。②

七、八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对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评价，比较客观公正。1978年出版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纲要》书中认为：“经过严肃的思想论争和不同立场的冲突，哲学中列宁主义课题日益明显地成熟了。我们的科学干部都行动起来，论述并阐明哲学中列宁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这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

---

① 《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第439页。

② 参看《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第100—101页。

哲学讨论的无可争辩的积极因素。"[1] 书中认为，德波林错误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综合"，这种观点根本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学变革的革命性质。[2]

三、30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的积极意义及消极后果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哲学论争，在苏联哲学科学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后来发展成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则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这也是事实，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场论战，是非常必要的。

列宁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3] 因此，我们估价批判德波林学派这场运动，应当以事实为根据，分析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教训。

要正确评价这场运动，就应当回到苏联30年代初那个历史条件下去做具体的分析，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环境中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国内和国际各种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党和苏维埃人民在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中，要求哲学理论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德波林学派理论活动的主要缺点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任务"[4]。

第一、经过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克服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的倾向，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从而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理论不

---

① 《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纲要》，求实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② 《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纲要》，求实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5页。

④ 《共产主义学院通报》1930年第42期，第75页。

能脱离实践，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哲学能不能脱离政治呢？列宁说：哲学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毛泽东同志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①]。哲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哲学史上看，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为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服务的。在阶级社会中，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同无产阶级的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的精神武器，必须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马克思说：“哲学要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的，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②]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不能搞“纯粹理论”的研究，理论要为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服务。但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任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这种服务表现为不同的特定任务。在30年代的苏联，要求哲学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做出贡献，是理所当然的。

德波林学派把哲学研究同政治、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脱离开来，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看作是“纯粹方法论”的学问。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德波林主办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对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对无产阶级的战略及阶级斗争问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理论性的说明，杂志的工作，既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又脱离了国际革命运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气勃勃的发展学说，可是，在德波林那里，由于理论脱离实际，结果变成了抽象的僵化的毫无生气的教条。经过批判德波林学派，克服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1931年4月召开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全苏哲学战线积极工作者会议，决定使哲学家面向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向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此后，在苏联产生了一批用哲学观点阐述自然科学紧迫问题的报告和论文，并且对农业集体化问题、农民问题、社会主义劳动形式问题、斯达哈诺夫运动问题，都十分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阐述和指导。这表明，哲学研究工作，走上了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第二、经过反德波林派斗争，克服了那种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倾向，坚持了哲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原则。哲学的党性是阶级性的表现，各种哲学学说，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反映它们的利益和要求。哲学派别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般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代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掩盖他们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实质，总是掩盖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把他们的哲学思想说成是"全人类"的、"超阶级"的、"无党性"的，借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实际上，哲学做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的阶级性和党性是无法抹杀的。列宁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关于哲学无党性的虚伪性，并且坚决地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做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德波林学派把战斗的唯物主义当作教授式的书斋哲学，这就从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在反对德波林学派以后，苏联哲学界加强了对各种修正主义理论、社会民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27—128页。

主主义理论，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批判德波林学派，特别是后来形成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造成许多严重后果。

第一、把学术领域的问题同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不适当的联系起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学术与阶级斗争有没有联系呢？当然有联系。任何思想、观点、理论，总是反映某个阶级、某个政治集团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说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各种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对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允许它们自由泛滥。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地估计学术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正确处理学术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德波林学派在理论上的错误，通过辩论，通过批判，是可以克服和澄清的。然而应当指出，30年代的苏联，受“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种观点的影响，在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把学术领域里的斗争形势看过头了，不适当地把某些人理论上的错误，同反党倾向和党内路线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使得批判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大，先后在不同领域揪孟什维克式的反党集团。

除了各学科开展了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之外，各加盟共和国也进行了这种斗争。例如乌克兰共和国，一直到1936年还在反孟什维克式唯心主义。H·舍尔克坡良斯在《乌克兰哲学战线斗争的总结》一文中说：“在哲学战线上，过去五年间充满了在哲学中为捍卫列宁主义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在理论战线的一系列地方和一系列方面，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思想，其中包括机械唯物主义和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之所以还不能像其他地区那样被迅速粉碎，就是因为敌视我们党的反革命分子掌握了乌克兰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和宣传工作部门的领导权，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词句的掩盖下干着有害的勾当。"[1] 基于这种认识，乌克兰的辩证唯物主义协会，乌克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和乌克兰科学院基辅分院的领导权，被认为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敌人、哲学领域的危险分子集团的手中。据透露，在乌克兰先后揪出了别尔维茨基、什金别尔、列维克、波卢多夫、阿德列阿诺夫、别不尔契克、米洛斯拉文、伊格纳丢克、路申克及其一派组成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集团。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把学术领域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来搞了。

第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导致"左"的错误。

苏联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中存在形而上学倾向，主要有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对被批判的对象，逐步升级，一棍子打死；二是对批判问题，缺乏辩证的分析，一概否定。

1931年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改组了。当时，德波林仍然是该杂志的领导成员。联共（布）中央和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关于德波林学派的两个决议中，都还称德波林等人为同志。但后来，特别是1936年以后，对德波林派的提法升了级，愈来愈尖锐。《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36年第八期的一篇社论中说："原来，不仅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的领导人，而且几乎他们所有的信徒，都是反革命分子和叛徒。"对德波林派的某些成员加了许多头衔，如"托洛茨基在哲学战线的代言人"、"死硬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反革命的恐怖分子"等等。对德波林等人由同志也改称为德波林分子了。例如维·别列斯特涅夫在《论哲学上状况和红色教授学院的任务》中写道："这样，德波林分子在其反对党的哲学路线斗争中，就滚入公开地庇

---

[1] Н. 舍尔克坡良斯：《乌克兰哲学战线斗争的总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6年第1期。

护托洛茨基观点的泥沼，走上了反党的道路。"[1] 到了 1941 年，在一些文章中，则把德波林学派叫做"托派匪帮、暗杀犯和间谍进行复辟活动的掩饰品和后盾"，"必须给以新的更坚决的打击"。

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最初阶段，对德波林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一分为二的。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 1930 年 8 月 2 日的决议中说："在最近五年多期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中，对它的深入研究和保卫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 在红色教授学院党组织 10 月 14 日的决议中说："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的直接的哲学工作在一系列领域里一般是按照列宁所指出的方向进行的。"[3] 米丁也说："应该说，在反对机械论者的斗争初期，德波林同志等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摸到了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面临的任务。"[4] 后来，这些提法不见了，甚至连德波林同机械论者的斗争也被否定了，把德波林学派同机械论者相提并论。

第三、在批判运动中不适当的抬高斯大林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从 30 年代起，苏联理论战线尤其是哲学界，特别突出了斯大林在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斯大林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不应过分的夸大。但是在批判德波林学派以后，特别是从 1932 年起，苏联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论述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高阶段的发展"。斯大林于 1938 年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被评价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中划时代的创作"[5]。1949 年斯大林七十诞辰时，《哲学问题》以整整一期共 344 页的篇幅刊载论斯

① 《论哲学战线状况和红色教授学院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6 年第 10 期。
② 1930 年 8 月 2 日《真理报》。
③ 《布尔什维克》1930 年第 19—20 期。
④ 《唯物辩证法的迫切问题》，1934 年俄文版第 39 页。
⑤ 《布尔什维克》1949 年第 1 期第 12 页。

大林哲学思想的文章。有的文章为了突出斯大林，竟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说，马克思曾经打算写出唯物辩证法的专著，遗憾的是他没来得及写就去世了；恩格斯也未能完成《自然辩证法》一书，仅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草稿；列宁的《哲学笔记》，虽然包含丰富的理论材料，但也没有提供完整的系统的思想形式。只有斯大林才第一次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论述和发展。这些不适当的评价，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

简短的结论

1924年到1936年，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苏联人民面临层出不穷的种种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苏联哲学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24年列宁逝世。苏联哲学界围绕捍卫列宁哲学思想遗产、捍卫哲学中的列宁主义，争取在苏联哲学中确立列宁方法论的思想和原则，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时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关于布哈林的平衡论的争论，从20年代开始，一直到30年代，从论战转为批判，这种批判导致后来苏联共产党的严重左倾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关于辩证论者和机械论者的论战，发生在1924年，持续了6年。在哲学战线上，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械论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关于米丁、尤金等年轻一代哲学家与德波林学派的争论，从20年代末到1933年德波林作出自我批评时为止，历时3年半。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虽有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苏联国内学术气氛由活跃变为沉闷，由积极探索变为注释经典作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哲学科学的健康发展。

在这一时期，苏联哲学家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

原理方面，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经验并使之系统化方面，在同马克思主义思想敌人的斗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全盘否定这一时期在思想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没有道理的，是错误的。

第六章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苏联哲学

（1936—1945年）

1936年，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接近实现，随即向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过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第三个五年计划照样顺利实现，那么，苏联将会更加昌盛。

可惜，此时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突然复杂化起来，从1941年开始，又被迫投入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直至1945年以前，苏联社会一直处在顺利与受挫、内忧与外患之中。

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人们的意识中，反映到哲学战线上，与其它历史时期相比，自然要显现为若干特点。

对于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不同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于50年代中期以前，有人认为，苏联这一时期的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极盛时期；而于5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人认为，苏联这一时期的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中断、停滞，甚至倒退。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

正确的结论应是：苏联这一时期的哲学，一方面越来越被政治化，成为培植个人迷信的工具，相当程度上束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力

量所决定，尽管经历许多曲折，它毕竟还在发展着。

第一节 联共（布）中央对哲学研究的不适当干预

苏联哲学界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最高不过涉及哲学路线的性质问题，而整个争论，基本上还是在学术领域内展开的。

但是，进入30年代以后，随着联共（布）中央提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政治任务，哲学争论便直接被看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超阶级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首先因为它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

可是这时，对于哲学不是强调它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而是片面强调它的"阶级性"、"政治性质"。

这样，经过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哲学活动的干预，使本来相对独立性比较强的一门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物。

一、批判德波林学派一再升级

1936年底，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成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除根本上反映了苏联经济方面的变化外，也反映了苏联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这后一方面的变化，自然也应当反映到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中去。

按照新宪法的要求，在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组织领导下所开展的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斗争，应该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单就这一学派所犯错误自身而言，纯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队伍内部的问题，理应坚持民主、辩论、说理的方式，而不可相反，对他们进行专政。遗憾的是，到了30年代后期，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一再升级，对其中一些人已经不再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成员，而看成是“人民公敌”。

当初，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所进行的批判，由“形式主义倾向”改定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主要根据是，他们作为当时哲学界的领导核心，没有担负起时代赋予哲学和社会科学界的重任。

可是，这一重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实上，在斯大林谈话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发表5年甚至10年以后，红色教授学院德波林学派以外的科学工作者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依然存在”①。

可见，理论和实践脱离，不单是德波林学派的问题，就连批判德波林学派的那些人，也同样存在。这本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队伍内部要经常提醒、不断解决的学风问题，不该直接而简单地将它上升到党的政治路线上予以对待。如此断定德波林学派“复活了第二国际极有害的传统和教条”，因而滚到“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当然是不对的。

如果说时至1931年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算第一次升级的话，那么，于5年后即1936年开始的批判，便算第二次升级。这次升级批判表现为，对德波林学派错误性质的认定，由“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改为“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在理论战线各个领域的反映”②。

米丁在纪念斯大林同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局发表谈话和联共（布）中央公布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

---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6年，第1期。

②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6年，第1期。

的决议5周年时，在题为《哲学战线的初步总结与工作任务》文章中，首先认为，对上述两件大事，不能只从关于杂志工作狭隘的实践意义上加以理解，而应认识到，它涉及广泛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重大战斗”的问题，是列宁主义“捍卫革命理论纯洁性”的优良传统的体现。

接着米丁透露，上述两件大事是“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继续向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线进攻”的战略部署。米丁阐述：1930年当时，不只从苏联内部发展上看是一个转折时期，而且从国际范围上看，也是一个转折时期。斯大林在他为纪念十月革命12周年而写的文章中说：这个转变的实质和意义，就是向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坚决进攻，并继续前进。米丁认为，与此相配合，党也应该在理论战线上展开全面进攻，也应该在这里给各种有害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以“迎头痛击”。

为了进一步揭露德波林学派“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的“敌对”性质，1936年晚些时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发表以《苏联人民的意志》为题的社论。社论首先叙述了谢·米·基洛夫被杀事件；接着断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是凶杀集团首领，充当了“德国盖世太保的别动队”；最后，借口“德波林集团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哲学中的布尔什维克党性，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便作出结论：“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原来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哲学战线上的直接代言人，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直接思想掩护”，不仅他们的领导人，而且几乎他们所有的信徒，“都是反革命分子和叛徒”。[①]

既然如此，对待他们就不再是一般的政治批判了，而是进行政治迫害。于是，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与判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同时，就有几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6年，第8期。

十名苏联哲学家被捕。其中有 А·И·瓦利亚什、И·К·卢波尔、Ф·В·米柳宁、И·拉祖莫夫斯基、Н·卡列夫、В·鲁达什、С·波丘金、Г·蒂米扬斯基、А·Р·麦德维杰夫、М·富尔希克、Г·德米特里也夫和其他许多人。

第三次升级批判，发生于斯大林有关谈话和联共（布）中央有关决议实施 10 年以后，即 1941 年。这次升级表现为，对于一切“敌对”的理论以及这种理论的“各种倾向与苗头”、“一切残余”作彻底、无情的斗争。

1941 年 2 月 5 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和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同理论界、教育界的积极分子，一起举行庆祝会，纪念斯大林有关谈话和联共（布）中央有关决议 10 周年。出席会议的有宣传工作者、讲演者、高等学校的教员和研究生以及文化和理论工作者约 600 人。

在这次会议上，米丁和尤金等人，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直接插手哲学领域乃至整个理论战线反对两股“修正主义”（机械论和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潮流以来，长达 10 年的斗争，进行了总结。总结中，对政治批判、人身迫害、“最终根除”哲学家的残暴行为，作了进一步维护和辩解。尤金以“两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成员或被捕或被杀为既定前提，说“这些派别的参加者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都同反革命集团，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紧紧联系着的。”

紧张的会议气氛表明，构成新一轮升级的标志是，在“科学领域”和“实践领域”，除对既已成型的“敌对”理论进行“坚决彻底”斗争外，还要对这种理论的“各种倾向与苗头”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

会议结束时，与会人员在“致敬信”中向斯大林发誓，我们将仍然同哲学和其他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的“一切残余”作无情的斗争，为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学说，为反

对其“一切敌人”而“斗争到底”。[①]

与批判一再升级的同时，对斯大林的颂扬也一再升级。每逢会议，都充满赞词。诸如，把联共（布）中央的有关决议，赞颂为哲学和其他理论战线一切工作的“斯大林纲领”，以其“全部斯大林式的深刻性和明确性”规定了很长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每天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们提供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教条主义的典范”；

事后，果然很快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批有关颂扬斯大林的著作和论文。

从“根除”机械论和孟什维克化唯心论的一切“残余”、“倾向”和“苗头”，导致树立斯大林的理论权威，是三次升级批判的自然趋势。[②]

二、下令改写《哲学史》第3卷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亚历山大洛夫、贝霍夫斯基、米丁和尤金主编的《哲学史》(1—3卷）于1940—1943年在莫斯科出版。这是第一部属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哲学史教程。它的出版，是苏联哲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中某些章节，反映了该领域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比如，许多有关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哲学等章节，就是如此；对于17—18世纪的英国、法国唯物主义和近代哲学中的辩证法，也给予了深刻的阐述。

但是，《哲学史》第3卷却基本上被否定了。批评首先来自于联共（布）中央。然后，《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在1944年第7、8期上，以论文的形式，转述了1944年5月1日联共（布）中央“关于哲学方面的科学工作中的缺点”的决议。

---

① 参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年，第2期。

② 本节资料参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张念丰 郭燕顺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决议指出，该卷很大一部分专门叙述和评价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正是在这一方面，犯了以下几点“严重错误”：

第一，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即他的辩证方法）与保守方面（即他的独断论体系）之间的矛盾被抹杀了，其保守方面被掩饰了。

第二，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终极的和包罗万象的，把实际上并不属于黑格尔的功绩（把辩证法不仅推广到自然界，而且推广到社会生活方面）硬加在他的身上。

第三，对于黑格尔鼓吹战争、论证日尔曼民族负有统治其他民族的使命、鄙视斯拉夫民族、颂扬普鲁士国家、强调皇权等等，“都默然不作声地放过去了”。

应该说，以上这些错误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着，像后来《西欧哲学史》（亚历山大洛夫主编）存在若干错误一样。但是，这既然是第一部哲学史教程，属于撰写上的初步尝试，就不能要求它绝对正确；而对于某些错误，理应首先交给学术界通过讨论加以纠正，没有必要由联共（布）中央进行干预，甚至连已经获得的斯大林奖金，也予撤销。

联共（布）中央对于《哲学史》第3卷的评价，是基于斯大林于40年代所作的下面这一论断，即：“德国古典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很显然，这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全面否定。

然而，历史的真实状况如何？

1、法国由于现代经济关系以及先进资产阶级的形成，于18世纪后期爆发了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这一空前伟大的政治革命，反映在理论上，就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发展。而同一时期的德国，在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上，都落后于法国。那时德国基本上还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大量存在的，是城乡小资产阶级，而先进的工业刚刚萌芽，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这一

新兴阶级，一方面由于受到本国封建势力的严重束缚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影响，对于政治革命抱有强烈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软弱和看到法国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威胁，便只能在思想领域首先发起革命。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并且以赞扬的口吻具体指出："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①] 这就是说，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对法国革命所作出的德国式的配合。

2、单看黑格尔哲学（包括他的唯心主义）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关系，那更是一种配合，而不是什么"反动"。在历史上，法国的唯物主义是法国革命的信条；而黑格尔并未用自己的唯心主义学说去攻击法国革命，恰恰相反，他以自己的"自由思想"、"自由概念"，对法国革命作了论证。他说：法国革命"按其内容来说，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而"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他认为，像法国革命这类事件再次发生，"起初似乎只是偶然的和可能的东西，由于重演就会成为某种现实的和确证了的东西"[②]。正因为如此，"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才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有教养的人所必需具备的条件"，法国唯物主义也才取得了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支持"[③]。

3. 虽然黑格尔由于他过分埋头于抽象问题，而未设法摆脱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589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12月版，第558页。见《列宁全集》第1版第38卷，第3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6页。

那旧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复辟时代的偏见，因而依然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带有“庸人的气味”，但由于他基本上是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便能够比任何人都更辛辣地嘲笑“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①。

由此可见，只要把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放在历史链条上加以评价，无论如何不该视为“对于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而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联共（布）中央，恰恰没能对于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做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竟一味地揭露和批判其保守方面。

联共（布）中央在《决议》中指责《哲学史》第3卷作者，说他们“毫无根据地把推广辩证法到社会生活这一功绩硬加在黑格尔身上”。理由是：“运用辩证法去分析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将使黑格尔对当代的德国现状作出革命的结论来，但是大家知道，他并没有这样做。辩证法要求在变动中、在发展中考察社会生活，而对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每一阶段，不把它看作社会进步的最后结果，而把它看作社会下一发展阶段必要的出发点。然而黑格尔认为当代的德国国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而普鲁士君主政体则是绝对精神的体现。”②

黑格尔本来的历史观是这样的：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即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黑格尔不仅对这种过程第一次作出描写，而且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思想和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肯定：“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228页。

② 《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5页。

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

诚然，《哲学史》第 3 卷作者认为黑格尔已经解决了上述任务，那是评价过高了。

但是，根据黑格尔没有指出德国国家制度的暂时性质，没能作出关于德国革命的结论，就否认他提出上述任务这一“划时代的功绩”，否认他对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否认他“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①]，也不算是恰当的评价。

在苏联，从 30 年代到 40 年代，从对待德波林学派到对待亚历山大洛夫《哲学史》第 3 卷，始终贯穿着一条线，就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于黑格尔哲学，只能讲批判，不能谈继承。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是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实际上，这是把党性与科学性对立了起来，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之所以如此干预学术研究，原因不在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自身的内容和性质，也主要不在于理论界的倾向，而根本在于斯大林以及联共（布）中央向资本主义残余（包括其思想残余）发起全面进攻的需要。与这样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在理论上，自然要搞斗争哲学。

第二节 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俄国和苏联哲学史上，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虽然党的领袖或中央领导人，同学者一样，也亲自著书立说，要求哲学为政治服务，但从未靠党中央的决议来保证其著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地位。而到 1938 年，斯大林主编《联共（布）党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3 页（及注①）。

简明教程》和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问世后，便出现了反常现象。

在这种状况下，学者中不少人由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转向单纯颂扬和注释斯大林的哲学著述；对于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往往借助颂扬、注释这种形式加以发挥。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撰写、发表和反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初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一并发表于1938年9月。

1938年，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新的五年计划规定：此期间工业品产量增长92%，年均增速为14%；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1倍以上；消费品生产增长72%；机器制造产品、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生产，以及电力生产、煤和石油开采的增长速度尤其高；实现农业综合机械化，农产品产量增长50%；在加强农业生产、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基础上，国民消费增长50—100%；基本建设投资为1，920亿卢布，相当于前两个五年计划基建投资的总和。

制定如此艰巨的计划，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苏联不仅在发展速度方面要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人均经济水平方面也要超过他们；第二，法西斯国家德、意、日已经先后发起侵略战争，苏联必须提高自己的军事经济水平，加强国家的防御实力。①

实现如此艰巨的计划，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对此，联共（布）中央强调："我们的干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不通晓布尔什维主义，不克服自己的理论落后性，那他们

① 见《苏联经济史》（B·T·琼图洛夫等编 郑 彪等译），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87—188页。

就会寸步难行。因为，为要执行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有各部门工作的任务，就要求实际工作者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就要求在解决实际活动问题时善于以理论为指南。”[1]

随后，斯大林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随时认清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末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2]

很显然，斯大林主持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但是，斯大林亲自撰写《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两个紧密相联更为具体的目的，那就是：第一，为了认识列宁所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联共（布）历史中的伟大意义，为了了解列宁在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流行的一切修正派和变节分子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巨大的“理论财富”；第二，为了使联共（布）每个积极活动家都认识和领会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3]。这“理论财富”、“理论基础”不是别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斯大林看来，他所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列宁所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精华的反映，就是每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员用以统一思

① 《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1-422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7页。

③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53年中文版，第132—133页。

想、统一行动的准绳。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一节同时大量印发，成为“自马克思主义存在以来传播得最广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书籍”[1]。但由于它被认为具有深层次的相对独立的意义，所以，在《教程》于1938年开始发行不久，便从中抽出印成单行本加以传播。从1938至1949年11月，单行本先后再版234次，被译成66种文字，总发行量在3570多万册以上。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任弼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于1938年组织翻译工作者译成中文。这本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于1939年由博古译成中文单行本，重庆新华日报社印刷。1940和1944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唯真翻译的中文单行本，1949年解放社再次出版。1953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1962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文选》。1979年收入《斯大林选集》。

回顾斯大林主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含撰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说，一开始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性著作。

据史料记载，早于1931年，斯大林便特别注意对布尔什维克历史及理论基础的解释。那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0年第6期）编辑部把斯鲁茨基以《布尔什维克战前遭受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标题的文章，为了讨论加以刊载而引起的。

这篇文章（以及瓦洛色维奇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雅罗拉夫斯基主编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等），涉及到布尔什维克的一系列问题。在斯大林看来，这些问题已成“定理”，无须继续阐明，编辑部硬要讨论、阐明，那就是“实行腐败的自由主义”，于是指示编辑部，“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问题提到应

① 见苏联马恩列学院编：《斯大林传略》，1949年5月版，第117页。

有的高度，把我党历史研究工作放在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轨道上，叫大家加强注意力去反对……一切伪造我党历史的人，有系统地揭破他们的假面具。"[①]

当1938年9月由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亲自撰写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后，于同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制定决议。该《决议》强调："必须给党以关于党史的统一指南，这个指南是正式的、由联共（布）中央审查过的、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而不容许有任何随意的解释。由于联共（布）中央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出版，于是就使在从前出版的许多党史教科书中所含有的、在党史叙述方面的随意态度和紊乱现象，使对于党理论和党史最重要问题的庞杂的歧异观点和随意解释，从此终止。"[②]

实际上，在1931年11月斯大林写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那封信，就"终止了社会科学中创造性的讨论"[③]。事后，历史研究所负责人被免职，《联共（布）党史》（多卷集）的一些作者被开除党籍，雅罗斯拉夫斯基受到批评[④]。

1935年8月，联共（布）中央为了"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指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警觉地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保证最大限度准确而又原原本本地传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原文，不容许对原文有一点偏离和歪曲。给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者的原著作任何修改和增补

① 《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2页。

② 《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3、419页。

③ 〔苏〕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六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1页。

④ 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27页。

的编者以最严厉地追究党内责任的惩处。”[①] 而1938年联共（布）中央关于宣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决议，不过是这一“指令”的延续。所不同的，只是不再一般强调要如此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者的原著，而是专门强调要如此对待斯大林主编和撰写的书籍。

斯大林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问世以前，理论界的注意力，多放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上；而于该书问世以后，理论界注意的中心，便急速转到斯大林身上，认为这部著作“真正是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底顶峰”[②]。

对于斯大林这本书最高的评价，出自于米丁笔下。他这样写道：“这一著作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著作，如恩格斯底《反杜林论》，列宁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齐名。”

米丁在重申《斯大林传略》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所作的“顶峰”评价之后，具体指出三点：

第一，“斯大林同志第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发展史中，以简洁明了的形式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组成部分：辩证法、哲学唯物论及其统一的历史唯物论”，创造性地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这些方面“所作的一切贡献”。

第二，“布尔什维克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经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新的历史时代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这一切都在斯大林同志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得到了哲学上的概括。”

第三，“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最新的成就，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的不断发生的革命，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米丘林生物学、巴甫洛夫唯物论的生理学和医学的成就，苏

① 转引自〔苏〕维·尼·科洛斯科夫著：《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纲要（三十年代）》，求实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02—103页。

② 苏联马恩列学院编：《斯大林传略》，1949年6月版，第118页。

维埃科学在各个方面的成就，都在斯大林同志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得到了哲学上的概括。"①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历史地位

斯大林撰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的出发点是侧重于完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但并不影响人们从学术角度评价它。

首先要肯定，斯大林在书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说明，确实是简略的。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近则几百年、远则几千年，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所凝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一切优秀文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头脑，上升为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物质变精神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后来，列宁继承了他们的事业。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由于他们首先是革命家，又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那时他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还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从理论上奠定基础，同这方面的一切敌人进行论战。这样，虽然曾设想撰写普及读物，却都没有实现。

时至1936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获得了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著作成为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渴望进步的普遍需要。

在这种状况下，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只

① 米丁等著，君达等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1953年10月版，第48—49页。

以2万多字叙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了便于领导干部、广大党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要领，斯大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部分，对它们的“基本特征”，分别加以归纳、概括、解释，并指出其实际意义。正是在这一方面，斯大林作了一件有益的工作。对此，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就斯大林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内容而言，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

斯大林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党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浓缩成上面那一句话，告诉人们，只要理解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和行动上，势必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致；而要作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员，又必须理解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可以称为全书的总纲。当然，在表述上是不完整的。既然全书始终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就不应只讲“辩证唯物主义”，而应一并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下面将阐述，这与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误解有关系。

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表述得很清晰，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一面，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们的革命变革一面。这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突然自生的，它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到现代的产物。所不足的是，斯大林这样表述，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只与德国古典哲学有关。其实，它与英国哲学、法国哲学也有关；除哲学外，还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有关。这一不足，表明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厚源泉的理解，比较狭窄。

书中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特别重视，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在斯大林看来，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毫无疑义，这是对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①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② 斯大林重视唯物辩证法，也是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哲学遗产的继承。列宁在总结一些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理论上失足的教训时指出：“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③ 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具体阐述，反映了哲学史上的某些成就和局限性，也概括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由表及里的认识秩序。当然，这里的阐述有种种不足之处，但不能由此怀疑斯大林特别重视辩证法的这一事实。

书中围绕“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④，以及对比哲学家们对它的回答，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一个基本特征，告诉人们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二个基本特征，告诉人们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唯物主义与一般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第三个基本特征，告诉人们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学的可知论与一切形式的不可知论的根本区别。前两条是从回答哲学最高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世界本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角度来阐述的；而最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77—378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1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9—220 页。

一条，是从回答哲学最高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产生后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这一角度来阐述的。同样，这些阐述并非都那么透彻；尤其第三条，没有把“实践”范畴纳入认识论，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是，不可否认，把辩证唯物主义放在一切非辩证唯物主义之中，通过比较，寻找自身的基本特征，使人容易理解。

书中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揭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内容，及其各自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其中对“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长，居民密度的大小”于社会发展进程所起作用的分析，比较新颖。斯大林讲，这两个条件能够“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社会发展“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而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条件，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些论断，颇有说服力。不过，斯大林对于自然环境和人口状况的作用，是就社会革命的意义而言的。如果在和平建设时期，“自然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是否丰富，地理位置是否便于交往，生态条件是否平衡，以及人口的综合素质是否高，却直接制约着一个国家总的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所发生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诚然，斯大林没有触及这些。但他能把这两个条件的作用问题提出来，就是很有价值的。

该书在概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特征过程中，两次强调新社会思想、新理论观点、新政治设施、新政权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社会历史，表现出巨大的作用。这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的，也是辩证的；当然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形式的旧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斯大林在书中，每叙述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个方面的若干特征后，都把对于党、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要求，落实到认

识社会、指导工作上。这体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体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被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所掌握，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才能真正发挥它认识世界、尤其是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

这部著作的主要问题是：

1．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些原有的结论有所误解

首先，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阐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

书中对于“自然界”与“社会”两大概念是严格分明的，而对于“世界”与“自然界”两个概念是混淆着的。斯大林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说是由于它研究、认识的是“自然界现象”；而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他说：“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把这一连串的阐述综合到一起，不难看出，在斯大林的头脑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虽说是党的“世界观”，却仅指关于“自然界”的观点和方法，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这一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

这里有两个问题：

（1）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研究对象是否仅为自然界，而不包括人类社会？

（2）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自然界的系统研究，是否先于对人类社会的系统研究？

对此，斯大林的表述是模糊的。

历史已经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的结果。

黑格尔的巨大功绩，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

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而其哲学最大的弊病是，把事物及其发展看作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在黑格尔那里，虽然有了辩证的自然观、辩证的历史观和反映辩证思维的逻辑学，但却都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是被颠倒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进行的革命变革是，把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当作出发点保留下来，与唯物主义相协调，创立辩证的唯物主义，并“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①]，从而使之成为开放的哲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务之急是首先发现外部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现实的联系，一方面“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把辩证的但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改造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另方面，概括“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把辩证的但是唯心主义的自然观，改造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②]

恩格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③]。列宁把这一“本质上辩证的”“现代唯物主义”，径直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

由此可见，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被列宁所称为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基本原则上，除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外，还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并非仅指“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不错，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时确实说过，马克思恩格斯拯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了黑格尔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1]。但要知道，恩格斯的原话是：“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2] 可见，列宁没有把原文引至“历史观”。

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否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形成？

实际的历史过程是这样的：“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这一系列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导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3]

不错，列宁还讲过：“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4]

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一段论述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全部内容，再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全部内容联系起来理解的话，就会明了，列宁只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停止于“18 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没有停止于费尔巴哈的“下半截唯物主义”，而是把唯物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并非说，先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然后将它推广和应用于社会历史，才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历史过程的回顾，也不是这样的。[5]

---

① ④《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3、44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5- 66 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1 页。

这主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原理之后，进一步具体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虽然稍早一些，但总的进程则与进一步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相互交错着的。还要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虽然相对后于其历史观而完备，并不意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19世纪前期的自然科学为基础。因为，这是两个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斯大林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还有一个问题，既没有提出，更没有予以回答，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特别强调自己的历史观？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力图对列宁所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所保持的"巨大的理论财富"加以简略说明。可正是列宁的这一著作讲得最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①] 由于斯大林在"简略说明"中"略"掉了这一重要内容，使他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阐述，又增加一个模糊点。

其次，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揭示其客观性质，也没有阐明它全部基本内容。

斯大林在书中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叫"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

非常明显，对什么的"看法"、"研究方法"、"认识方法"，把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

什么"看作"或不"看作"什么，统统属于人的主观过程。

可以说，斯大林在书中所介绍的，古代人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从而求得真理，属于这样的主观过程；现代人把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从而认识自然界，属于这样的主观过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斯大林并不指出它所发生的革命变革，依然认为只属于这样的主观过程。所以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过程中，只讲辩证的"思维方式"，而不讲自然界（应该扩及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本质自身的辩证性质；虽然讲"矛盾"时，说它为"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所"含有"，但由于斯大林只把矛盾问题作为辩证法的诸特征之"出发点"，而不作为辩证法的"实质"、"核心"，所以，它也就不能制约整个辩证法随之而成为客观规律；当讲到社会生活、社会历史的时候，自然又回转过来，好像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推广"、"运用"、外加到它们身上，它们才是辩证的。

这表明，斯大林对"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对客观辩证法由于"存在于现实之中"[①]而属于他所谓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于是在"简略说明"过程中，就将"方法"与"理论"割裂开来，就不能充分体现以下原理："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②]。就是说，斯大林在自己的书里，只注意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认识方法"、"思维方式"上"根本相反"，而没有完全体现出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没有表明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摈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达到透彻的理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那么，斯大林对自己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这一正确论断，具体怎样“简略说明”的呢？

首先要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所采取的“合理的内核”，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早就确证了的，其内容就是众所周知的三大规律，即“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这些规律，不仅直接属于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三部分中加以阐述和体现的内容，而且也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加以唯物主义改造、体现于他们一系列著作中，又为列宁深入探索并要求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加以继承的珍贵遗产。

斯大林在书中对上述“合理的内核”确实作了“简略说明”，比如扼要叙述了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原理、发展变化的原理、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对立面斗争的规律等等。但是，斯大林在书中确也“略”掉了“合理的内核”中许多不该“略”掉的部分。

（1）对于“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只讲了“量转化为质”一面，没讲“质转化为量”一面。

斯大林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三个“基本特征”时，揭示了两点含义：一是量变引起质变；二是量变逐渐发生，质变突然发生。接着他引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论证。

但是沿着这种思路，人们会发现，恩格斯向来都既讲“量转化为质”，也讲“质转化为量”，① 或讲“量和质的转化”。在所举事例中，固然属于“量转化为质”的居多，而“质转化为量”的居少。退一步讲，即使后一方面的例子没举，也不能否认恩格斯对于“质转化为量”或“量和质的转化”的确认。何况恩格斯明确叙述：“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五卷)13反13

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①]。

为什么斯大林对“质转化为量”不予承认？在斯大林看来，

“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很显然，斯大林认为在量转化为质之后，质又转化为量，那是“循环式的运动”，认为前者是“前进”、“上升”，而后者是“倒退”、“下降”。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还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文中的一大段话即“……自然界不是在永远一样的、始终重复的圆圈里运动……”引来作为佐证。殊不知，质与量不能分开，在旧质基础上所发生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会产生新质；而在新质基础上所发生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可能返归旧质，也可能产生更新的质。按事物发展总的趋势产生更新的质，属于“前进”、“上升”的运动，而不是“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至于恩格斯所否定的“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②]，那是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提出以前的一种反辩证法的观点，而不是后来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客观世界的螺旋上升式的发展。

斯大林说“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也有些简单化。他不了解，从局部质变到全局质变，也有像单纯量变达到质变那样的情形。

(2) 对于“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只讲了对立面斗争的一面，没讲对立面统一的一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斯大林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四个"基本特征"时，指出两个要点：其一，之所以说自然界对象、现象都含"内在的矛盾"，是因为都有其"反面和正面"、"过去和将来"、"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其二，这种对立面的、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的、衰亡着的东西与产生着的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下面，斯大林为了说明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从列宁《哲学笔记》中所引的两句话，也是一句讲"矛盾"的，一句讲"斗争"的。所告诉人们的，就是所谓矛盾，即两个对立面；所谓发展，即对立面的斗争。

列宁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作出这样一段摘要："矛盾是在其本质规定中的否定的东西，……肯定的东西由于在自身中就具有否定性，所以它超出自身，并引起自己的变化。"列宁在这一段话旁边，加上二条粗杠，表示注意和赞同。[①]

列宁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摘录一段后作出这样的笔记："在对象的本质中发现它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随后，重复记下："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②]

列宁的这一思想，可以说，贯穿于整个笔记。从中可以领会，事物中构成内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不是任意的两个方面，而是一个肯定现存事物的方面（或因素或倾向），另一个否定现存事物的方面（或因素或倾向），并且两个方面同处于统一体中，构成统一物的两个方面，或对立面的统一。所以列宁概括地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③]

---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第116—1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55卷，第212—213页。
③ 《列宁全集》第55卷，第192页。

列宁对自己提出了要求，紧接着就写出《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文中一开始就提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的论断。接着讲“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下面既讲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也讲了“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①

斯大林在“说明和发挥”“辩证法的出发点”时，虽然提到了若干矛盾着的方面，但都没有从他们对于事物本质是肯定还是否定方面去加以揭示，就是说，只讲到了一些矛盾的具体表现，而没有指出矛盾自身的本来意义。正因为如此，他不能引导人们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去对待现实生活和理论中一系列关系问题。

看来，斯大林并不了解“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② 也就是不了解“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③，不了解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规律。

（3）对于“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斯大林没有把它列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特征”之一。

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并没有否定“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只是把它纳入“量变转化为质变”规律的表述中了。证据是：斯大林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5—3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指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

但这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否定的否定是“由矛盾引起的”“发展的螺旋形式”①。它当然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式矛盾转化，不是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直线式的上升运动，而是包括曲折性、反复性在内的前进发展。

诚然，辩证法的规律，包括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曾由黑格尔详尽论证过。对此，当年杜林先生说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是从宗教领域抄袭来的、按照原罪和赎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类比。恩格斯对此很不满意。他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发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如果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那末他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件事，那末请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②。

对于“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斯大林实际上把它看作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遗迹，所以在讲辩证法“基本特征”时，有意不提它。

斯大林对于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不是没有阅读过，对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也不是没有阅读过。这些著作中，除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外，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关于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的思想，关于辩证法范畴的思想，等等，都留下了很珍贵的遗产。可惜斯大林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2—183页。

斯大林最为注意的是辩证法，包括普遍联系和变化运动的思想。当然这不是古代希腊哲学的那种初级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是在现代科学和历史学基础上加以丰富和检验过的属于现代辩证法的思想。但是，从现代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中概括出来的辩证法思想，除了世界总体上的联系和变化外，最根本的是三大规律，如果对于这三大规律在理解上有片面性，甚至排除某个规律，漏掉其它辩证法的内容，那就不能不说他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特征”向人们所作的贡献，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2. 对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不准确的概括

首先，斯大林给“生产力”下了一个狭义的定义。他写道：“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要生产，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对于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分析它的性质，它的决定性作用，而很少用定义式的语言表明它的形态，因为他们把科学包括在生产力之内，而科学又不止是力学、机械学，此外还有物理学（光、热、电、磁、……）、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所有这些科学和不断开拓的新科学，都将先后转化为生产力。就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讲，社会智慧才是“一般生产力”[①]。

如果就一方面是物的因素，另方面是人的因素，这两方面构成“生产力”的内容而言，可以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0页。

但是，就体现物因素的只是生产工具，体现人因素的只是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就把马克思主义开放的“生产力”理论，给局限住了。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生产工具”，也无论生产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属于历史上手工业工场时代生产力的因素，是落后于大机器工业时代要求的。不用说三、四十年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民经济要害产业系统，已经普及了机械化生产，即使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苏联，在主要工业、农业、国防部门，也都用现代化机械武装起来了。况且，马克思用极其简略的语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列宁则进一步说，在苏联“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②

因此，透过斯大林给“生产力”所下的定义，看出它没有站在社会发展前沿来对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进行哲学概括，没有把生产力与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联系起来，没有把哲学意义上的“生产力”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区别开来，没有考察生产力的历史形态，更没有展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因而，无助于带领广大科技知识分子和工农劳动群众，开拓更高形态的社会生产力，也就很难适应苏联以后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其次，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做出了不合实际的论断。

斯大林根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之后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又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49页。

斯大林通过两种制度对比的方式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所得结论，自然具有相对的性质；而如果就两种制度各个自身而言，这样的结论，就太绝对了。

他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业已“不可调和”。这一结论，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20至3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几次发生经济危机，但也都经过调整生产关系，一次一次摆脱危机而稳定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他讲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这一结论同样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生产关系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基础外，还包括存在利益差别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包括商品交换的范围以及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等等。当时这些方面的状况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业已发展了的生产力，并不是“完全适合”。

退一步讲，由于生产“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即使生产关系与之“完全适合”，那也是极为暂短的。确切讲，这种“完全适合”中同时就包含着“不适合”，如果不及时调整，也会破坏经济秩序，破坏生产力。

斯大林把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说得完美无缺，这就难以遵循恩格斯的教导，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斯大林把当时的资本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也难以实现列宁的宏愿。列宁教诲苏维埃工作人员，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98页。

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

斯大林的要么"不可调和"，要么"完全适合"的论断，是他割裂矛盾统一性与斗争性的又一个表现。这种思想方法，用以指导苏联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那就很难制定出适应发展的理论和路线。

3. 对于本世纪30年代末以前自然科学成就没有作出哲学概括

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全面奠定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上世纪30—50年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主要成就（细胞、能量转化、进化论等等的新发现）进行哲学概括，验证并丰富了哲学唯物主义。

列宁为了捍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自然科学发展的主要成就（物质的新物理形式；电子、光子、原子核及其运动的新形式，特别是同放射过程相联系的运动形式的发现）进行哲学概括，批驳了"经验批判主义"，推动了辩证法、认识论的发展。列宁在他去世的前两年，还嘱咐："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3]。

到了本世纪30年代前后，量子力学的创立，量子相对论观念的发展，以及核物理学的一些成就，特别是核裂变的发现，为哲学的进一步概括提供了新依据。我们知道，新实证主义学派对自

① 《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日报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页。

然科学的这些新成就，抢先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对此，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里没有做出相应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所涉及的自然科学成就，多是由恩格斯反复引证过的；甚至对列宁所关注的自然科学成就，也几乎没有涉及。至于对此期间有关巴甫洛夫学说、现代生物学、土壤科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放射性物理学等等新成就更未给予哲学概括。

这就是说，斯大林既没有对历史上的自然科学成就做出新的概括，也没有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加以足够的重视。这与苏联共产党（布）面临领导苏联人民向大自然开战的根本要求，是不适应的。

4.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没有作出合乎现实需要的引导

斯大林提倡哲学的实际应用，对此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他关于应用对象和应用任务的引导，是有问题的。

首先，关于哲学应用的对象。

斯大林在讲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或每一组）基本特征后，都有意指出应用的方向。但都是这样的："既然世界"如何如何，"既然自然界"如何如何，"那就很显然，社会"如何如何。

几乎用不着思考就会明白，斯大林这是把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界当作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理论前提，只把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当作哲学应用的对象。如果面对旧社会，面对剥削制度，面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盲目力量，为了给革命提供思想武器，这是可以的；但是，业已进入新社会，业已消灭了阶级剥削，业已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团结互助的关系，虽然仍有继续征服社会盲目力量的任务，这时就已不再是单纯地征服社会了，而是要伴随着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伴随着征服自然力，并且要把新社会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放在对自然的认识、改造或征服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讲哲学应用，却把社会与自然分开，只提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只字不提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就不合时宜了。当然，斯大林极为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但要知道，物

质生产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斯大林所重视的是它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它的自然属性，所以斯大林讲生产规律，只讲经济规律，不讲其中人们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可以说，这是与斯大林不重视自然科学相关的。

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仅仅指向社会，用这种思想指导共产党的实际活动，是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的。

其次，关于哲学应用的任务。

斯大林对于哲学应用的任务和对于哲学应用的对象、方向，是放在一起叙述的。因此，所用的句式完全是一个，即“既然”世界、自然界是什么，“那就很明显”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就是什么，“既然”世界、自然界怎么样，“那就很明显”，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就怎么样。换成最抽象的辩证法范畴讲，即“一般”是什么、怎么样，“个别”就是什么、怎么样。这一思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本来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恩格斯批评当年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时说，他们把“唯物主义”这个词当作一个“套语”，当作“标签”，然后“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①]

斯大林在书中对哲学应用任务的阐述，有简单化的倾向，没有把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者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②]的要求，明确地纳入哲学应用的任务中。

特别是苏联于1938年，即已开始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如何总结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经验教训，如何认清新时期苏联的国内外环境，如何把理论水平再提高一步，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96—497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适应指导后来国民经济的发展，等等，有许多问题需要引导党和人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深人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的领导人讲哲学应用，除了讲革命多、讲建设少外，还讲历史多、讲现实少；讲一般规律多，讲特殊规律少，不能不说是一大不足。

总而言之，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同任何庄重的著作一样，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它存在价值一面，也有它局限性一面；既非“每个原理都是专门巨著的指路明灯”①，亦非整部著作毫无意义。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问世前后的苏联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于1938年9月问世，前至1936年，后至卫国战争爆发，即1941年，这段期间，苏联哲学发生了前后大为不同的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列宁阶段问题，在30年代初期分散研究的基础上，苏联学者从总体上继续探讨了如下一些基本问题：(1)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新阶段的时代条件；(2)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挥和应用；(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列宁阶段的实质。

首先，苏联学者从历史背景上继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列宁阶段。他们指出，这一背景是：

第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从经济到政治直至意识形态，全面趋向反动。

第二，全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由于电子、量子过程等等的新发现，几乎以前所有关于物质结构、空间和时间、物质与运动、因果性原理等等观念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向哲学理论提

①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年，第2期。

出了许多新课题。

第三，新康德主义的扩散、现代自然科学的“数学化”、经验批判论著作的发表、直观主义和现象论的兴盛，所有这些思潮都对唯物主义哲学进行责难。

第四，与社会上反动的、错误的哲学思潮相呼应，在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内部许多人发生动摇，跟着叫嚷什么：马克思主义中缺乏“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呀，必须替马克思主义建立“新的认识论基础”呀，唯物论早已陈旧啦等等，企图以各种非（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修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苏联学者指出，面对这一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不能不根据世界历史的新事实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新发现，一方面彻底揭露各种形式“新理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实质，另一方面作出新结论，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苏联学者从理论内容上探讨了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他们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反映论。学者们指出，反映论对于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攻击唯物主义，便集中火力攻击列宁所阐述的反映论。

学者们以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麦克斯·亚德勒所著《唯物史观教本》为例。该书有两章是专门针对列宁的反映论而写的。作者说，现代的自然科学不但不需要以“上帝”作假设，也不需要以“物质”作假说，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屡次称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那种理论，即反映论，“才真是事实上的废屑”。

苏联学者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继续斗争的事实，论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在列宁哲学中的地位，回击了敌人的进攻，并进一步阐述了反映论与唯物辩证法、社会实践以及全部认识史之间密不可

分的有机联系，之后得出结论：谁要把反映论孤立起来，谁就不了解列宁在这些方面所贡献的新东西。

第二，对立统一学说。苏联学者指出，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其中的对立统一学说，在列宁的哲学思想中居于中心的地位。

他们研究列宁所著《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书中的哲学思想，指出，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新表现的分析，对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分析，都是他应用唯物辩证法解决新时代问题的典范。而且，列宁在为撰写《帝国主义论》所作的准备工作和所加的附注中，一再强调对立统一学说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构思《国家与革命》一书时，就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社会斗争不可调和之产物的观点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调和之产物的观点相对立。可见，对立统一学说，是列宁思想方法的基本内容。

苏联学者特别关注列宁对于社会矛盾类型的分析，指出，在列宁的思想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有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还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后工人与农民的矛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等等。正是对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形态从总体上，从现实和未来发展上进行探讨和解决，展示了列宁哲学的时代特征。

同时，苏联学者当时注意到了列宁关于对立面斗争是绝对的，它们的一致、统一、融合是相对的，就是说既排斥又吸引而不是只排斥不吸引的全面性观点；还注意到了列宁不限于研究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此外也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的其他一些范畴、这些范畴之间以及它们与对立统一规律之间的关系。

第三，哲学的党性原则。苏联学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不是超然自存的，而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利益。揭示这一点，并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特征在它发展到列宁阶段的突出体现。

学者们对这一点，从时代条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等方面加以阐述，指出，列宁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公开、积极和彻底地为本党的总路线而奋斗；而德波林学派则强调，哲学应当为找出"每一时代"的方法论锁钥而工作，这就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再次，苏联学者从学说实质上探讨了哲学发展上的列宁阶段。学者们着重指出列宁的哲学贡献与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它是各项基本原理的统一，既不可将它们中的哪一项从中割裂出来，也不能将它们中的哪一项融入另一项之中。

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看。这些人虽然正确地认定，列宁主义中最为主要的，是他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可他们竟把列宁主义的一切组成部分包括列宁的哲学在内，都溶解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中，说什么，哲学上的列宁阶段，实质在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发展了。

苏联学者分析，这些人以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掩护，实质是要否定列宁哲学在列宁主义中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意义，要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们根本没有理解，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不是当作哪一部分具体原理来发展的。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把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其它政治学说，进一步牢牢实实地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是列宁哲学阶段的实质。①

① 据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六卷)和维·尼·科洛斯科夫著《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纲要（三十年代）》提供，反映上述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主要有：

B·波兹纳：《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莫斯科，1936年版。

T·巴甫洛夫：《反映论》，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版。

C·列兹尼科夫：《反映论和"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7年，第7期。

当年苏联学者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列宁阶段问题诸多著述中，具有代表意义的，要属米丁等人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及其补正增订版《新哲学大纲》。在这两本书中，除通篇注意体现列宁哲学思想外，还都开辟专章论述列宁哲学阶段。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把列宁在“自己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仅仅归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①]，对于《哲学笔记》、《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等，则避而不谈。

在这一影响下，哲学家们对于列宁的哲学思想，主要围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进行发挥，并且往往借助阐述列宁的贡献来发挥斯大林的哲学思想。

以上，是1936—1938年间，苏联学者对哲学上列宁阶段的研究和叙述。而于1938年9月以后，情形显然不同了。最突出的一点，是叙述“哲学上的列宁阶段”时，不再只称“列宁”阶段，而把斯大林与列宁并列，径直称“哲学上的列宁斯大林阶段”，甚至把斯大林提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②]。

Л·列兹尼科夫：《论感性知觉在认识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7年，第8期。

Л·列兹尼科夫：《反映论和“生理学”唯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8年，第3期。

Ф·哈斯哈契赫：《反映论的若干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7年，第11—12期。

Ф·哈斯哈契赫：《谈谈从物质过渡到感觉的问题》，《科学和技术战线》1938年第6期。

Л·伊和切夫、И·希罗科夫、Ф·切尔诺夫、А·伊万诺夫：《辩证唯物主义》，《小百科全书》第6卷，莫斯科，1937年版。

米丁：《唯物辩证法的战斗问题》，莫斯科，1936年版。

罗森塔尔：《唯物辩证法》，莫斯科，1937年版。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0—81页。

② 参见米丁等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1953年10月版，第177、186页。

这时苏联学者指出，仅就斯大林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来阐述“哲学上的列宁斯大林阶段”已经不够了。因为标志列宁阶段开始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发表于 1908 年；而斯大林的早期哲学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竟发表于 1906—1907 年。

米丁依据俄国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资料和 1905 年革命前后斯大林的理论活动，特别注意《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写作和发表的时间。他说：“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问世以前，斯大林同志的这些内容空前丰富的早期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问题作了阐述”[①]。

薛格洛夫对斯大林的早期哲学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与“哲学上的列宁斯大林阶段”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他反复强调：“哲学上的列宁——斯大林阶段是不可分地与全部联共（布）党史，与布尔什维克反对国际的和俄国的机会主义的斗争联系着的。”“若不与共产党的历史相联系，便不能理解哲学上列宁斯大林阶段的实质。”薛格洛夫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才把斯大林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与列宁相提并论，甚至超过列宁。他几乎重复米丁的言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写于 1906 年，就是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出现以前，斯大林同志就已对唯心论和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作了彻底的批判。”[②]

斯大林实际上，关于《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自己曾说过，应该把这些著作看做一个“年轻”、“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

① 米丁：《哲学战线的初步报告与工作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6 年，第 1 期。

② 薛格洛夫主编：《西洋哲学史简编》，新华书店发行，1949 年 9 月版，第 410、416、422 页。

事实表明，斯大林"没有完全成熟"，不仅表现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不准确和错误的论述上，而且表现在后来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不准确和错误的论述上。尽管列宁所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并非十全十美，但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阐述、发挥，是比较完整、准确的，并赋予时代生机，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而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却不能与之相比。如果人为地将斯大林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列宁阶段相提并列，那与其说是对斯大林的颂扬，莫如说是对列宁以及哲学上列宁阶段的贬低。

与这样的一褒一贬相适应，此间苏联哲学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内容，也不再以发挥马列的精辟论断为重点，而以发挥斯大林带有种种片面性的见解为重点了。

但是，1938 年以后，在对斯大林及其著作的一片颂扬声中，也伴有不同的曲调。一些学者继续探讨哲学上名副其实的"列宁阶段"[①] 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的途径[②]，探讨现代自然科

---

① 敦尼克和科洛斯科夫列出如下著述：

Б·恰金：《90 年代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 年版。

A·沃斯特里科夫：《列宁反对俄国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8 期。

Ф·卡洛申：《唯物辩证法论可能性和现实》，《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8 年，第 10 期。

Э·舒尔：《真理的具体性》，《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1 期。

M·纳乌莫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3—4 期。

П·米罗什钦娜，《反映论和关于客观真理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9 期。

② 参见费多谢耶夫：《青年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11 期。

亚历山大罗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先驱》，莫斯科，1940 年版。

伊利切夫：《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莫斯科，1940 年版。

伊利切夫：《论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莫斯科 1940 年版。

学中的哲学问题；[①]还有一些学者不顾联共（布）中央决议的约束，不怕有人指责，公开发表文章论证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提法是错误的，有害的。[②]

关于批判德波林学派后，对于哲学研究克服脱离实际，面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此间不再是一般的强调，而是有所行动。哲学工作者写出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苏联新宪法，有关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的消灭，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阶级、政党、群众以及个人的能动作用，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规律等等的著作和论文。[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成果无论数量也无论质量，都非越来越令人满意。在纪念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决议十周年（1941 年 2 月 5 日）会议上，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尤金指出这一点。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罗夫，以《论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文章、关于论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文章、关于论述国际关系的文章为例，作了具

① 参见：德波林：《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 年版。
库尔萨诺夫：《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6 期。
韦杰夫：《因果性和规律性》，《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 年第 5 期。

② 参见：弗拉索夫《谈谈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3—4 期；以及杂志其它支持者的一些文章。

③ 参见斯捷茨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苏联新宪法》莫斯科，1936 年版。
德沃尔金：《城乡对立和城乡对立的消灭》，莫斯科 1939 年版。
保科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及其消灭的途径》，莫斯科 1940 年版。
加尼切夫：《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8 期。
德沃尔金：《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 年第 6 期。
卡罗里：《资本主义条件下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7 年第 3 期。
康斯坦丁诺夫：《个人的能力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意义》，莫斯科 1938 年版。

体分析。亚历山大罗夫指出，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对于斯大林提出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要求，都阐述得不够，执行得不够。有些人回避许多属于现在国内生活及其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他们著书立说，局限于寻章摘句，抓住引文就感到自己牢靠，一旦离开了引文，就张皇失措。

亚历山大罗夫说："对于那大量的事实材料以及我国正在开展的宏伟建设工作，从理论上予以领会的过程为什么会如此差劲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所和社会政治杂志的理论工作还有一定的弱点，理论工作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①

亚历山大罗夫的所谓回答，是同义反复，没有触及要害。要害是，10多年前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头上的阴云，没有驱散。他们不是没有创造性，而是怕犯"政治错误"。

第三节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哲学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苏联哲学，主要有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和阐述；第二条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和平建设和反侵略战争）中哲学问题的研究和阐述。

1936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对新宪法的批准，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转折点。不过，新宪法虽然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但是，哲学界并没有马上作出反映。诚然，斯大林在他所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现实理论问题有所论及，但除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问题比较具体外，多是一般原则性论述。直至1939年3月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1941年反侵略卫国战争的爆发，

① 参见《纪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十周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年第2期。

才有些较为具体的理论问题被明确提出来，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也才渐渐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学说在新时期的方法论意义

“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有的，而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于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概括的产物。

应该说，列宁的下述结论，就已经孕育着这两种矛盾的思想。这结论是：“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这就不仅要引起摩擦，而且要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然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①]

后来，斯大林运用这条基本原理，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内外环境，经过思索，明确提出了这“两种矛盾”的概念。他在《俄共（布）第14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5月9日）中解释：“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②]

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表明，对于“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虽然是经常联系在一起加以提出的，但从解决方面看，1936年以前还是侧重于“内部的矛盾”；1936年以后，则侧重于“外部的矛盾”，这时即使对待“内部的矛盾”，也往往把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并非属于阶级矛盾的那一部分）混到“外部的矛盾”中，作为“外部的矛盾”在内部的反映加以处理。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1页。

在苏联现实的政治理论活动中，关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等提法，都是“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的同义词，具有同样的方法论意义。

(一) 根据“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区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问题的两个方面

时至1936、1937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业已取得巨大成就，不仅可以宣告社会主义在苏联“基本完成”了，而且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可以对付周围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有些党员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就是说，不仅解决了“内部的矛盾”，而且解决了“外部的矛盾”；另有一些党员干部，则不同意“已经取得最终胜利”的观点。双方曾展开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虽然发生于个别地方，但提出的问题，却有普遍意义。

正是鉴于这一点，斯大林针对一封来信所反映的观点，在回信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两个方面的区别。

斯大林讲，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指我国各个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内部关系的问题。”我国工人阶级能不能克服同我国农民的矛盾，并同他们结成联盟和进行合作？我国工人阶级依靠这一联盟和合作，能不能粉碎我国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土地、工厂、矿山等等，并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没有阶级即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同这第一个方面有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过去的年代里，列宁主义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这些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

斯大林于1938年2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因为我国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斯大林解释，是苏联同其他国家，即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苏联工人阶级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对外关系即国际关系的问题。"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摆脱武装进攻的危险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就是同第二个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

对于这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列宁主义者的回答，就不是肯定的，而是否定的了。并且，尽管回答得非常明确，历史的进程仍远没有达到这一步。

斯大林于1938年2月说：假如我国是在一个孤岛上，假如在它的周围没有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胜利是最终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而是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并存在制造武装干涉和复辟的危险，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二个问题暂时还没有解决，还必须在今后加以解决。[①]

但是，斯大林本人并非一开始就搞清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上这两个方面的区别。比如，他1924年5月，在撰写《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时，竟把由本国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当成了"国际任务"，提出要靠"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来完成。事过半年多，斯大林发觉了自己的错误，在他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书中，立刻作了纠正，把靠国际力量"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改为靠国际力量"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②]

此后，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是基于"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对其"基本胜利"和"最后胜利"两个方面的进

① 参见《斯大林文选》（上），第166—17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313页。

程加以清醒分析，作出具体决策。在 1937 年 3 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是这样，在 1939 年 3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 18 次代表大会上，同样是这样。区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上的两个方面，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较为一贯的指导思想。

（二）透过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认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国情

对于苏联的特殊国情，列宁最熟悉。若不是这种特殊的国情，俄国不会构成帝国主义阵线中的薄弱环节，不会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若不是这种特殊的国情，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也不会那么艰巨。那还是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提出了继政治制度赶上先进国家之后，"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1]的任务。

可是，十月革命成功，国内战争结束，在真正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时，每个共产党员要考虑的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

对此，斯大林首先提出的，不是经济建设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而是一条从国情出发的思想路线。他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些工业不大发达而小商品生产者阶级（农民）人数众多的国家里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专政在一些工业比较发达而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里还存在着。忽视这个事实是不明智的、轻率的。"[2]

1928 年 11 月 19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在阐述"迅速发展工业"的方针时，再次强调苏联特殊的国情。他说："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里工作的都是一些清醒而冷静的人。如果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抽象地来讲，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不能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第二、如果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出发，那就不能不承认，正是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69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73 页。

这个环境促使我们迅速发展我国工业。"[①]

关于内部环境，斯大林解释道，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还占绝对优势，和这种生产比较起来，社会主义大工业就像大海中的孤岛，虽然这个岛的基础在一天天扩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的孤岛。

关于外部环境，斯大林解释道，我们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政权的，除少数大工业单位多少有些新的技术基础外，千百个工厂的技术是根本不能拿现代技术成就来衡量的。可是，周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比我国发达得多的和现代化的工业技术，那里的技术不仅在前进，而且简直是突飞猛进。正是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着我国的独立发展。

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建设，苏联已经拥有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拥有了成为普遍现象的集体农庄，拥有了旧的和新的国营农场，拥有了稠密的和发达的合作社网，拥有了为农民经济服务的农具租赁站，拥有了可以逐步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的许多新形式的杠杆。

斯大林肯定地说："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小农国家，这也是事实。而这一点却是主要的。只要这个主要之点还存在，列宁关于'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比共产主义有更稳固的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非空话这一论点就还是有效的。"[②]

斯大林如此"清醒而冷静"地确认自己稍有改变的特殊国情，是他领导制定和实施苏联五年计划的思想前提。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即到1938年末，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现代新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的改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20页。

造。可以说，在生产的技术装备和增长速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这就是说，1938年的苏联，在克服自身落后性方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当然还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加以克服。

但是，苏维埃政权毕竟"只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胜利，而其余六分之五还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并"包围苏联，等待时机来进攻它，粉碎它，或者至少破坏它的实力和削弱它。"在斯大林看来，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的基本事实。"要知道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①]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始终是从"自身状况"和"资本主义包围"两个方面加以考虑的，而且，衡量自身状况所用的尺度，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制定苏维埃基本内政和外交政策，所凭的依据，是资本主义的威胁。

（三）从境内境外两个范围分析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1936年，是苏联阶级关系大变化的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阶级、阶级结构、阶级斗争有它的形成时期，有它的演变时期，也有它的消灭、消亡时期。同样，苏联阶级、阶级结构、阶级斗争此时的变化，不是历史上一般性的演变，而是在国内消灭了人剥削人现象后所发生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斯大林和学者们所作的分析，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足甚至错误之处。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指出，从1924—1936年间苏联社会生活，首先是经济方面发生了若干变化，与此相适应，阶级和阶级结构方面也发生了若干变化。

经济方面最根本的变化是："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作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奠定了。"

阶级和阶级结构方面的根本变化是，地主、资本家、富农、商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116页。

人和投机者，“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也是“摆脱了剥削”的、“集体农庄”的、“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也变成了“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①

由上可见，斯大林是把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紧紧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但是，斯大林却仅从经济基础上，而没有深入一步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去分析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

恩格斯曾论证，阶级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他具体指出：“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②

这就是说，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他们对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又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讲得更为明白。他在《致约·魏德迈》信中说：“我的新贡献”首先一点是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③。

正是由于斯大林把认识停止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所以他们便不能准确地分析苏联新的阶级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84—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4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斯大林接着上面的分析之后断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中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距离正在日益缩小”，“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一些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都重述斯大林的这些话。

这首先是说，新的阶级结构内在的矛盾，是随着人剥削人现象的被铲除和消灭面缩小、消失的。怎样评价这一系列论断？如果就绝对意义而言，受阶级对抗的影响，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肯定是比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前在缩小，在消失；但就相对意义而言，当阶级对立、对抗消除后，三方面之间的矛盾作为有待克服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便突出了，面解决这些矛盾，不能局限于生产关系范围，不能就所有制差别来缩小所有制差别，归根到底，还是要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

斯大林虽然重视发展生产力，但他没能从理论上，将发展生产力与消除“三大差别”联系起来。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在“18大”报告里，在一系列著作和报告中，抛开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决定性作用，强调靠阶级斗争，强调采取行政手段解决阶级关系问题，是个严重的失误。由于这样，他也就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正确认识和对待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好像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苏维埃政权物质基础上的坚固、强大，对于抑制阶级敌人的反抗，不发生任何作用。

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作为理论问题，是由布哈林于1925年提出来的。布哈林在他所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书中认为，阶级斗争采取尖锐的表现形式，固然与剥削者的阶级本性有关系，但苏维埃机关的政策、措施如果得当，也有可能避免对抗。布哈林总结了城市阶级斗争的经验。他说，在城市中我们根本不封闭私商的店铺，而是容许他们“工作”。这些商人向我们的国营工业和我们的国营批发商业购买商品，又在全国各个角落销售我们的商品。当然，他们从中发一笔财。但是，不论他们

的意愿如何，由于商品流转的全面活跃，促进了我国国营工业的增长、我国国营商业的增长以及国内全部资本的迅速周转。因此，生产本身这部机器运转得更快了，积累过程进行得更快了，国营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基础、根本基石）的实力也就增加得更快了。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资产阶级阶层的征税，获得了补充的资金来充实国库。我们用这些增加的物质价值可以兴办劳动阶级的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各种企业。“这种政策的目的是支持劳动者去反对剥削世界的残余。”

布哈林就此建议：“现在我们可以把这种政策推行到农村去，使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对农村中的比较富裕的阶层不采用简单的行政‘强迫’、‘压制’措施。”布哈林申明，这不是意味着放弃对农业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改变斗争的形式”。①

本来，布哈林对阶级斗争这种新形式的分析，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但是，斯大林不仅不加以肯定，相反指责说：这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②

透过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辩可以看出，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那时（1929年）寻找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都认为主要在苏联国内，主要在于内部矛盾，并且，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1936年。

可是，到1936年以后，斯大林改变了观点，认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主要不在国内，而主要在国外了。

对此，斯大林在1937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是这样阐述的：“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

① 《布哈林文选》（上），东方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432—43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

扎。”“应该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末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①

斯大林以上对新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根源的分析有一定道理。这道理就在于，无论国内“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无论国外“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由于都是剥削阶级，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便有可能勾结起来，加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但是，斯大林头脑中缺少两个观念：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实力、党的正确政策及其巨大改造作用的观念；另一个是，关于阶级敌人数量的观念。

1937 年，是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业已实现的一年。这时，苏联劳动人民经过 10 多年的艰苦奋斗，已经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把整个旧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都改造了，整个剥削阶级在全国人口中始终是少数，而“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就更是少数了。

斯大林由于对这些问题没作冷静思索，基于自己对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有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不容人，而且在实践上导致他所谓“结合内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与“结合外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的严重混淆，导致肃反扩大化。

斯大林虽然正确地提出了关于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这两种矛盾的学说，但由于他把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内外根源的观点当成肃反扩大化的理论根据，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苏联 30 年代中后期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 129 页。

哲学史上的教训。

（四）运用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学说阐明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和前途

斯大林将“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学说，用于观察社会主义国家问题，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首先分析了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一般公式，指出他“完全撇开了像国际条件、国际环境这样的因素”，所以它不适于现在苏联，有待进一步具体化。接着，斯大林陈述了列宁撰写《国家与革命》本想在第二部分里根据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深入探讨和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很可惜，他的逝世使他未能完成这一任务。

斯大林在报告中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他指出，从十月革命起到各个剥削阶级被消灭（1932年）为止，这一时期苏联国家执行着三个基本职能：一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二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三是“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1936年）以后，这些方面的职能有了新的变化：

第一，“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

第二，“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被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逮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那些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只是“矛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

第三，“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斯大林指出，1936年以后的苏联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

国家。但是，发展过程不能就此停止。“那末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存下来呢？”他作了有条件的回答：“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尚未消灭，假如那时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尚未消除的话”，“是的，要保存下来”；“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已经消灭，假如那时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的话”，“不，不被保存下来而要消亡下去”。[①]

斯大林的这份报告作出后，在理论界同样发生很大反响。学者们大加赞美，例如：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形式和职能“作了光辉的辩证法的分析”，“创立了严密完备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说”[②]。

诚然，斯大林能够把社会主义国家放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中，放在苏联的特殊国情及其变化中加以考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辩证法精神。但是，说他“创立了严密完备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说”，根据并不足。

(1）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

列宁在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曾说无产阶级需要“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③] 这就是说，“暴力组织”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质。

两年之后，即1919年，列宁的认识便更加准确了。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伟大的创举》等一系列文章和报告中，屡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255—256页。

② 苏联马恩列学院编：《斯大林传略》，莫斯科1949年6月版，第122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

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①] 这就是说"暴力组织"以及"暴力"，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质。

斯大林于1924—1927年间，在《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问题和答复》、《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和报告中所阐述的正是列宁关于"暴力"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质的观点。

但是，到1939年，即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却不再重申甚至回避这一观点。报告中虽然也把"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列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职能，但并不阐述它在全部职能中作为"实质"的地位和意义。

(2)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问题

应该说，在这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最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12月3日—1918年2月23日），有苏维埃政府与德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的和平谈判。之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1934年末，苏联加入英、法、美国际联盟；1935年5月，有苏联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互助条约；1936年3月、1937年8月，苏联先后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缔结了互助、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苏德再次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所有这些，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职能"的范围。

在1925年5月和1925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14次代表会议和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曾经提出需要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各国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关系"问题；并就"苏维埃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在发展的矛盾"，阐述了关于"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世界间的某种均势和一个'和平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另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858页。

共处'时期"的论断。[①]

这就是说，与国外工人农民互相帮助，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无论在实践上，也无论在理论上，早已列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职能"范围了。

(3)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消亡"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根本分歧。马克思恩格斯总结 1871 年法国巴黎公社的经验、列宁总结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既主张无产阶级为了自身解放，必须打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又主张不是立即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而是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建立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条件，使之自行消亡。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绝大多数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工农劳动者对极少数地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抗实行镇压；无产阶级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剥削阶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并监督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人们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数千年来形成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②]。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专政、民主与国家消亡具有怎样的变化关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

①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80、218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0 页。

就愈迅速。"[①]

列宁认为："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劳动日，发动群众去建设新生活，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无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②]

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行消亡"的前提，而且，"民主扩展"就意味着"国家消亡"，"民主扩展"的过程就是"国家消亡"的过程。固然，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内部剥削阶级、外部资本主义侵略威胁都解除了，就是说，所有要专政的对象都不存在了，可以说国家在消亡，甚或已经消亡；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另一个对立物——官僚制，如果没有根除，也谈不到"国家完全消亡"。

早在1925、1926年间，斯大林一再强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③]。但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他回答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国家是否保存下来的问题时，却只注意外部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包围威胁的状况，而不考虑苏维埃国家"扩大民主和根除官僚制"这一内部的根本状况，不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贯穿于国家学说中。

二、关于苏联社会发展动力

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在哲学上属于历史观的根本问题。旧唯物主义从来提不出、也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唯心主义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而是到人们的意识，到某种哲学中去寻找，然后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近代开明的资产阶级历史

---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8、25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73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3—134页。

学家指出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以及两大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看不清楚。在人类历史上，唯有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结论。

但是，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主要阐述的是有剥削和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而对于此后的人类发展史，只作了原则上的论述，并没有具体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斯大林在党的第 18 次代表大会上叙述："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①]

斯大林在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这样一些动力"从理论上之所以能够提出来的历史前提；另方面指出了促进苏联社会向前发展的"这样一些动力"的内容。

这一历史前提，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后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变化。

在经济方面，技术、设备、所有制结构等等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在政治方面，受经济上革命性变革所制约，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文化方面，各种设施和组织机构有了巨大改善，城乡各族人民在知识、技术、心理素质水平上大为提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思想感情日益融洽。

但要知道，苏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这些变化即"共同性的基础"，是于 1936 年以前就已发生和奠定下来的，为什么在作新宪法草案报告时斯大林不提出"这样一些动力"，而于 1939 年 3 月才提出来？那是因为，在斯大林看来，1936 至 1939 年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 237 页。

之间，在苏维埃机关和联共（布）党内还存在着所谓暗害分子、外国间谍、人民公敌等等。直至1938年把他们基本清除后，“这样一些动力”才完全形成了。

这就是说，构成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些动力”问题的“共同性的基础”并非只如他所列举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那些成就，此外还有党政内部斗争的形势。

关于斯大林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些动力”，大体含义是：

“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就整个新的阶级关系而言的，因而它反映着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面貌。

“各族人民的友谊”，是“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间民族关系上的反映。

“苏维埃爱国主义”，是苏联各个劳动阶级、各阶层各族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威胁所具有的真诚情感。

（二）肤浅的阐述

斯大林在提出“这样一些动力”问题的同一报告中，特意重申1937年联共（布）中央关于《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和1938年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的宣传工作》两份决议精神，这就使理论界不能不谨慎。他们除对“18大”报告中的“每一句话”[①]都笼统地加以赞颂外，对于斯大林有关“动力”问题的论断一时间没有人提及，只是后来才有一些著述逐渐发表出来。其中，从内容上看具有代表性的，是葛列席尔曼、米丁等人的著作和论文。

葛列席尔曼在《苏联怎样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一书第三章专列一节[②]，对斯大林有关“动力”问题的论断进行阐述：

（1）“道义上和政治上一致”的最高表现，是“全体人民团结

① 参见苏联马恩列学院编：《斯大林传略》，1949年版，第125页。

② 葛列席尔曼著：《苏联怎样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第446—479页。

在一个党——布尔什维克党——周围”。作者回顾，首先，胜利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样，资产阶级的政党作为反革命和恢复资本主义的组织者，还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就已被粉碎而迅速地灭亡了。其次，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些政党，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变成了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十月革命后，由于他们帮助白卫将军和外国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斗争，组织反革命暴动，因而遭到灭亡。实际上，联共（布）成为苏联唯一的政党。第三，尽管联共（布）内几次出现路线分歧和斗争，最后还是形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唯一的核心地位。

（2）“道义上的一致”与“政治上的一致”紧密相联。作者指出，苏联人民，就其精神面貌而言，就苏维埃人在自己的行为上所遵循的道德原则来说，是统一的；所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最先进、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统一的。苏联人民对这种利害一致性的认识，最鲜明地表现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精神，即社会主义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道德标准。

（3）“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紧密相联。首先，苏维埃爱国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反对外国干涉、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产生、发展并加强起来的。但是，正是在社会主义胜利和社会道义、政治的一致基础上，它才变成了把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团结成为一个友爱家庭般的真正全民的意识形态。其次，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表现着团结在伟大俄罗斯人民周围，像一个友爱家庭一样，各族人民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其基础，就是各族人民对自己的苏维埃祖国的热心、忠诚和爱戴。第三，如果说，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劳动者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合作和互助的反映，那么，苏联各族人民友谊，便是住在伟大苏联国内一切民族间同样合作、互

助的反映。以上三方面，在共同的基础上，以共同的意志，使苏联社会主义的加速发展由可能变成现实。

（4）“目标的一致”。作者对比着阶级社会进行阐述。在阶级社会里，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们的志向和利益彼此矛盾，社会也就在无数人不同的志向和利益沿着不同的方向互相冲突中向前发展。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共同的劳动把人们联合起来，产生着他们意志和志向的一致性，社会发展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苏维埃人可以按照绝大多数人民的希望预先提出的共同目标，自觉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当然，在这过程中，也会产生与社会发展一般方向相抵触的比如“私有主义”倾向，但经过党的政治、组织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能够把全体人民联合起来的这种目标一致性，使社会主义社会有信心提出资本主义所不敢提出的任务，并且保证顺利完成。几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就是例子。目标的一致性，加速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以上第（2）、（3）两点，基本属于作者对斯大林关于“动力”问题论断的注释；而从第（1）、（4）两点中可以看出，作者有注释有发挥。

米丁在他所撰写的《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底大师》一文中，同样设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这一小题目。在这一小题目下，作者叙述了斯大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学说中“具有头等意义的发现”。

米丁文中大部分思想和文字，是重复斯大林已作过的阐述，只是在谈到“各族人民的团结及其友谊，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底规律”时，强调一下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文化繁荣的社会作用。如果说有新补充的话，那就是在斯大林所谈“这样一些动力”范围以外，提出了“自我批评”问题。他借助斯大林在1928年一次报告中的几段文字加以发挥说，斯大林“把自我批评看作苏维埃社会底领导和指导力量，布尔什维克党底前进运动的基础，看作暴露和解决苏联底各种矛盾的方法，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

主义残余的重要教育手段，发挥群众积极性的手段，吸引群众参加领导国家底事业的方法。"①

马克思恩格斯（继而列宁）提出并论证了人类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以后的发展动力问题，在理论上作出了莫大的贡献。斯大林能够首次提出有关人类发展到今天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发展动力问题，也具有新的意义。

我们知道，提出问题、关注问题，与回答问题、探讨问题，毕竟是两码事。对于斯大林对问题的提出，以及斯大林和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应该给予肯定；至于对他们所做的回答、探讨，就要具体分析了。

（1）只强调苏联社会所呈现的"共同性"、"一致"、"友谊"、"友爱"、"合作"等等，即事物及关系"同一性"种种表现的巨大意义，值得考虑。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由对立面统一性和对立面斗争性两个方面的客观作用所构成的。当然，统一性对事物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② 但是，运动、不平衡、分化等等，即斗争性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则是绝对的，连斯大林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就曾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行的。"③

为什么斯大林没能从理论上把"和谐"与"斗争"联结起来？

---

① 米丁等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31—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3页。

③ 《斯大林文选》（上），第182页。

是否在斯大林看来，所谓“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只包括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而不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认为社会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在历史过程中是断开的？斯大林深知上述那些“同一性”表现来之不易，但是，怎样才能巩固，又怎样才能扩大和发展？对于这一系列问题，斯大林在报告和学者们在注释性阐述中，没予回答。他们一味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际之间和谐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揭示“和谐”与“不和谐”相互依存关系，更不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自身的矛盾运动，这不能认为是深刻的。

（2）强调“自我批评”的作用，在理论上没有达到“社会发展动力”的深度。

苏联学者在阐述斯大林所讲“这样一些动力”时，把“自我批评”补列进去，主要依据是，斯大林曾于1928年4月在一次会上的那一大节讲话。当然，还可以依据他于半年前即1927年12月在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的有关讲话，也还可以依据他于9年后即1937年3月所写《党的工作缺点》中的有关文字。的确，斯大林这样讲过：“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我们如果不以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态度坦白地诚恳地指出和揭发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那我们就会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①]“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末，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除了我们以外，再不会有人来揭露和纠正这些错误”，“自我批评应当成为推动我们向前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②]。应该认为，这些说法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页。

但是，斯大林在1939年3月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讲“这样一些动力”时并没有讲“自我批评”。退一步说，即使他把“自我批评”作为诸“动力”之一讲了，也不像学者们所解释的那样，认为他的观点是准确而深刻的。因为，斯大林在这里讲辩证法，讲对立面的斗争，不是用以揭示苏联社会向前发展的普遍性的动力，而仅仅是用以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内自我批评的哲学根据。正如斯大林自己所阐述的那样："自我批评口号不能认为是一个新口号。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①]"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②] 因此，不应该把对立统一规律在党的建设上的应用，直接解释为在整个苏联社会发展上的应用；也不应该把党组织的发展动力直接解释为整个苏联社会的发展动力。

苏联社会之作为社会的发展动力，在形态上，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动力，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发展动力，不同于十月革命、剥削制度消灭以前的发展动力，也不同于本国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发展动力。这种特定的发展动力，必然源于苏联社会物质生活基础。

(3)“这样一些动力”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

斯大林以及学者们关于苏联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其一，涉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道义上、政治上的关系；其二，涉及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其三，涉及苏联人民对待自己祖国的情感和行为；其四，涉及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自身建设。把所有这些集中起来，就是一个领域，即苏联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自上层建筑领域的动力再大也不是第一性的，非最终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样一些动力的作用就是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3页。

很有限的。

那么，构成苏联社会第一性即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动力是什么？有哪些？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原则上反复向我们指明，那就是现存"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语），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列宁语）。

其实，斯大林对制约着苏联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经济条件和物质生活因素于30年代后期，业已有所分析。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指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分别属于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既然说"这些社会集团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那就是说，这样的矛盾还存在，还待克服；既然说，苏联社会只是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那就是说，客观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农民阶级内部，而且更存在于各个种族和民族之间；宪法明文规定，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这一点正是以"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的。这"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有待克服的事实上的矛盾，只是斯大林不把它们作为苏联社会发展动力去考虑。

综合分析，影响斯大林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深处，从经济领域，发掘和概括苏联社会发展动力的因素，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过高估计了苏联当年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他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①；甚至说，"我国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今后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前进"。② 第二，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苏联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他断定苏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巩固着生产过程的社会性，生产关系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90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上），第256页。

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没有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力有加速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①。以上两点，足以使斯大林在阐述苏联社会发展动力时，忘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的著名论断，无视实际存在着的阶级差别、所有制差别、民族差别以及潜在于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中深层次的矛盾，当然也就要浮在“友爱合作”的图景上，只看到“道义上和政治上一致”等等上层建筑因素的能动作用上。

（三）中途夭折的实质性讨论

日丹诺夫以他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对30年代后期哲学界关于苏联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进行批评。他说，如果发展过程的内容是像辩证法所说的就是两个对立面的斗争，那末，我们苏维埃哲学家就应当证明这个辩证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生作用，运用这个规律的特点怎样。这就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但我们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领域进行过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存在的，可是我们的哲学家“因为胆怯而不敢提到它们”②。

日丹诺夫断言“没有一个”哲学家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辩证法规律，这不符合实际。如果说有些哲学家“因为胆怯而不敢提到它们”，那却属实。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他没有明确指出，也不可能明确指出。

实际上，1940年初，《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曾发表一些文章，就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展开了讨论。有的学者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的命题，指出这种观点明显地与辩证法相矛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202页。

② 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5页。

中是有害的。H·弗拉索夫在《谈谈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引用列宁的话说，“完全适合的东西甚至在自然界最简单的事物里也是没有的……”①。他写道：“社会生产的可能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将是表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具体形式。”

Ф·戈罗霍夫、И·德沃尔金、A·扎尔金及其他人在后来的文章中，维护“完全适合”的命题，认为“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矛盾”，即使发生了矛盾，也带有“隶属性”，没有自己的“普遍性”，不过是一些“暂时的因素”。

另有一些作者支持H·弗拉索夫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绝对性”的观点。

如果这一富有创造性的探讨能够与关于“这样一些动力”问题的阐述结合起来，肯定会加深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遗憾的是，这一带有实质性的讨论，刚刚开始就停止了。② 查其原因，就是由于“完全适合”的命题，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性，哲学家们不能再自找苦吃。

对于这一点，日丹诺夫也是非常清楚的。他批评哲学家们如此尖锐，可是他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发展动力的深层次的矛盾状况并不触及，自称放开胆子，充其量不过提出一个“自我批评”的作用问题。

三、关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总思路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3，1933—1937）的建设，于1936年，联共中央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如果单就苏维埃经济体制而言，经过15年的探索、总结，到1936年，该说基本定型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51页。

② 参见维·尼·科洛斯科夫著：《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纲要（二十年代）》，求实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24—125页。

了。但是，就苏维埃政治体制而言，则要算定型于 1939 年。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从开拓到定型，始终伴随着列宁以及他以后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思想指导，体现着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

（一）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

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不是指日常经济工作的一种方式，而是指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斯大林看来，这种经济制度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建立和实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建立和实行的。

斯大林关于实行计划经济的思路，最初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时至 30 年代中期，斯大林一直延续着这种传统观点。这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于 1934 年 7 月 23 日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中。[1] 当威尔斯说“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时，斯大林反问：“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在他的回答中，几乎完全重复《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的思想。不过，有所明确的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排斥利润原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或市场经济）的。

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一思路，才把列宁和专家们于 1921 年所拟定、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新经济政策”，放在“计划经济”范畴之外，因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方式问题上，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的观点。

诚然，列宁于 1919 年修改《俄共（布）党纲草案》和规定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时，曾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与贸易、货币的存在对立起来，诸如“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力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 2—3 页。

求尽量最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1] 等等。

但是，到 1921 年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列宁便转变了认识。他认为，计划经济"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列宁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自己向资产阶级学习，并且使资产阶级走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什么时候就能管理这种经济"[2]。

斯大林虽然也曾讲"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3]。但在实际行动上，他直到 1936 年宣布"新经济政策终结"以前，即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在直接向资本家、私商进攻，不管是非法经营者还是合法经营者，一律加以限制和取缔，不给他们留有任何活动余地。斯大林为了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思想，竟曲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好像列宁教导我们"排除私商，排除私人资本家并学习经商"[4]，而不是教导我们，先与他们长期"共事"，从中学习真正本领，最后战胜他们。

其次，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高度统一的指令性的经济。斯大林对于这一点，早在 1927 年就明确说，我们的计划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5]。

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度统一、强行指令的计划，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它反映领导者的主观意志。

苏联，最初由 1922 年底的几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后增加到 15 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不是偶然的。它们先是为了保卫生存、摆脱外国资本主义武力威胁的军事方面的联合；后是一致抵挡西方列强"和平"攻势的外交方面的联合；再后是，当各个共和国认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749—75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39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28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56 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80 页。

真着手解决经济问题时，深感孤单作战困难重重以后，在已有军事、外交的联合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的经济方面的联合。

苏联的经济区域是这样的：西部主产机械和工场手工业产品；东部主产棉花；南部主产石油和煤炭等。这种产业分工，加上铁路和水路交通网络，造成了各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必须合作、统一。

与各个共和国这种统一的经济联盟相适应，斯大林强调，“必须建立一些能够沿着一条确定的道路指导这些共和国的经济生活的相当的常设联盟机关。”① 这些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把各个共和国以及每个共和国各个经济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纳人统一的计划体系，拟定出各种指标，然后下达执行。国家为了约束下属经济单位，层层发出的指令性计划指标越来越多。各个共和国、地方和基层单位无论什么事情，诸如供求关系、资金利润率、技术改造等等，都由上级决定。

高度统一、强行指令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有上面的一个积极性，没有上下结合的两个积极性，主观上想推动生产力发展，实际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苏联的计划经济，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斯大林在直接把计划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联系在一起之后，说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有计划，也是“一种臆测的”，“想当然的”；相反，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才“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在这种认识掩饰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恰恰常使自己的计划带上主观的随意性。

比如，发展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始终占据优先的地位，要保证实现的。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虽然工业化总水平在提高，可是，煤矿工业、采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等项目，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32 年都比 1929 年呈现下降趋势。面对事实，连斯大林自己都承认，“钢铁工

①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115 页。

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它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度内也没有完成计划。"[①] 至于建立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新基地、发展日用品和地方工业、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组织劳动和工资等任务，斯大林也承认完成得很不好。但是，斯大林把原因完全归罪于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机关中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好像计划本身和制定这些计划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任何责任。

（二）制定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

斯大林认为，计划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顾及社会的需要，"加强产品为人民群众的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②]。在苏联，这样的工业部门就是重工业。

苏联建国初期，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它在历史上，首先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后又遭到三年国内战争的损失。在这个国家里，居民近于赤贫，识字者不多，文化水平很低；工业机器落后，农业和运输业根本没有机器。当时，连对国家进行工业改造所绝对必需的起码的技术基础都没有。

这种状况摆在苏联党和人民面前，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在最短期间把这个国家从中世纪和愚昧无知的轨道转到现代化工业和机械化的轨道上，并把社会主义在苏联巩固起来；或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

当时，在联共（布）党内，有些人说："你们的工业化、集体化、机器、钢铁、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倒不如多给一些布匹，多买一些生产日用品的原料，多给人们一些美化日常生活的零星物件更好些。……"斯大林认为，把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80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七），第3页。

我们厉行节约获得的、准备花在建立苏联工业上的30亿金卢布，拿去进口原料，增加日用品生产，这也是一种“计划”。可是如果采用了这种“计划”，苏联就不会有冶金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和汽车、飞机和坦克了。那样，在外来敌人面前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人，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俘虏。[①]

当然，联共（布）中央没有选择这样的“计划”，而选择了把“农业国”变成能够自力生产必需装备的“工业国”的计划。

建成“工业国”的计划，首先是列宁于1918、1921年明确提出的。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讲，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根本任务提到首位，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就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②]不过，三年后，他在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把“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解释为“电力”、“电气化”。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的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大工业的基础”，“更正确更具体地说”，就是“电气化的基础”[③]。

斯大林于1921年，对于列宁提出的“电气化计划”完全赞同。后来，在五年计划实践中，他逐渐以“机器制造业”，尤其“钢铁工业”取代了“电力工业”的基础地位。[④]这与列宁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根本精神并不矛盾，只是对其结构的重点即计划中的基本环节，作了调整而已。

优先发展重工业，亦即要求它达到非常高的增长速度。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鉴于国际形势复杂，“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32-3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1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399、549、558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0、163页。

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1]，于是决定以最高速度发展工业，具体就是：要求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为2—4%的速度，达到15—20%；其中重工业的发展，还要高于这一速度。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把重点放在投资计划的制定和贯彻上。他们决定，把整个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大约75%用于发展重工业，计划兴建1500多个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国防工业企业）。当时有人提出投入一年比一年减少的"递减曲线"论。斯大林坚持一年比一年投入增多的"上升曲线"论。按照这后一种理论，1926—1927年度投入10.65亿卢布，到1929—1930年度要投入47.75亿卢布。

那么，这些资金从哪来？1931年6月，重工业本身通过经济核算、不断降低成本开始有所积累以前，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完全来自内部（主要是）农业的积累。然而，农业的积累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一点，斯大林直言不讳："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斯大林说，这是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现有速度"，工业和国家暂时向农民征收的额外税或称"贡赋"。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了"。[2]

人们还应知道，这种农民额外税，是在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远远低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基础上提交的。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工业总产值将年均增长15%，到1932年比战前增加1倍；预计农业总产值将年均增长4.8%，到1932年比战前增加28—30%。实际完成状况却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2%，到1932年比战前增加了两倍；而农业，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总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页。

结》中，不作正面公布，他除介绍集体化的成就、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粮可能收购额的增加以外，对于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只字没提。可见，其增长不是什么“比较缓慢”，而是很缓慢了。一方面农业产值增长缓慢，另一方面，为保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总产值成倍增长而向农民征收额外税，那么，这种额外税，肯定要挤占农民的生活基金。

由于苏联执行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关于最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由于不能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即第Ⅰ部类产业与第Ⅰ部类产业）的关系，严重存在着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引起农民“很大的不满”[①]，出现了“商品荒”[②]。当然，斯大林也思考这些问题，设法缓解这些矛盾，但从根本上他却始终认为，要保证高速发展重工业，就不能不如此。

这一思路与列宁有一致点，更有不一致点。

一致点在于：无论列宁，也无论斯大林，都注意到了周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都同意优先发展重工业，也都探讨过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胜利后，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巩固和发展自己物质基础的援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列宁说：“我们不能指望富有国家的贷款”[③]。斯大林说：“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借而且不愿意借奴役性的外债。”[④]

不一致处，主要在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资金的来源方式上。列宁主张，在同农民经济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商业，精减国家机关，厉行节约，铲除浪费，在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协调发展过程中保证重工业的发展。[⑤]

然而，斯大林却主张，在相对压抑农业、轻工业发展速度，牺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7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5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5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页。

⑤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66、711页。

牲农民和城市居民利益的基础上，从事"积累"。

按照列宁的思路发展重工业，"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①

与列宁的思路不同，斯大林领导发展重工业，一起步就"实行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结果到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不得不把速度降下来，"必须采取较慢的增长速度"②，即由19.2%降为17.1%；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又降为14%。③

（三）实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

在建立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过程中，斯大林反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权威的观点。

列宁早在1922年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思想，他说，必须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权。斯大林对这一原则口头上赞同，但实际上却强调以党代政。他强调"没有党的指示，苏维埃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并说这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1936年通过的苏联新宪法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然而，事实上在斯大林上述思想指导下，30年代中期以后，最高苏维埃的权力日益萎缩，直至对党政的决议和提案只起表决作用。④

列宁早在1923年还提出过，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容许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只是要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2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9页。

③ 参见B·T·琼图洛夫等编：《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81、187页。

④ 参见齐问等编著：《苏联解体内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4页。

密切注视和预防他们分裂这个共和国。[1] 这样的思想在斯大林的头脑里，是从来没有的。所以，在他那里，既没有“文明资本家”的概念，更没有与之合作的实例。

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阐述：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在苏联既已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敌对阶级了，自然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2]

列宁在世时，一再强调党和苏维埃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要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的广大群众联系起来。他说：“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愈坚决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纯粹执行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制，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3] 鉴于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为了作到名副其实，列宁曾建议，中央全会要每两月开会一次，同时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而中央监察委员会还要和工农检查院结合起来。[4] 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便开始限制党的监察机关的权力，并在17大报告（1934年1月）中，实际把党中央监委改作为党中央的下属单位，同时撤销了工农检查院，把它的职能交给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1956年，米高扬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说，“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这就是最终形成的，由联共（布）总书记即斯大林个人独揽大权的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体制。正是在这一体制下，苏联发生了一系列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恶性事件，给联共（布）、苏维埃联盟，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7页。

② 参见《斯大林文选》（上），第79、100、153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7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3—694页。

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综观苏联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直至30、40年代最后确立的政治经济体制，按原初的总思路，对于改变苏联的落后面貌和国际处境，即一方面给整个国民经济打下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为抗御外敌侵略准备实力，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斯大林把它加以绝对化，不能不同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事实上，它的若干弊端，在这一时期里，已经出现了。实践证明，当时形成后来一直延续的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四、从思想理论上反对法西斯主义

苏联人民在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强大武器，继“剥夺剥夺者”之后，大规模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始终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

法西斯主义，首先于1922年在意大利兴起，10年后即1933年在德国兴起，同时波及日本等国家。他们结成反动联盟，先后进犯邻国。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主义悍然攻击苏联，终于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被迫展开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一）对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及其理论来源的揭露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1941—1945年），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一方面用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红军指战员和全体劳动群众，阐述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源泉和道义因素的巨大作用；一方面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以及它们仇视人类的意识形态，剖析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反动思想与尼采学说、新黑格尔主义、马尔萨斯主义、施本格勒学说等等唯心主义理论的血缘关系。

苏联哲学家在一系列著述① 中指出，法西斯主义往往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强盗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他们不是什么为了保护本国的完整和独立，也不是为了保护工农民众的利益，而是把铁蹄踏进别国领土、奴役欧亚各民族工农群众，同时也奴役本民族、本国工农群众，最终是为了德国等少数银行家和财阀发财致富。格·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公开的恐怖专政。”② 斯大林在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讲话和发布“国防人民委员命令”③ 中也反复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阶级实质，以革命的舆论抵制反革命的舆论。

苏联学者指出，尼采的哲学就是唯意志论。尼采否认客观规律性，认为“意志”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性的意义。他宣称，“权力意志”是发生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过程的动力。他重新审查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唯理论哲学、传统伦理学和基督教教义，认为这一切都只会削弱斗志，而不能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

---

① M·阿尔让诺夫：《为德国法西斯服务的黑格尔主义》，莫斯科，1933年版。
Б·别尔纳季涅尔：《尼采哲学和法西斯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
С·Я·沃尔夫松：《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版。
И·德沃尔金主编：《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势力和蛊惑行径》，莫斯科，1936年版。
Б·斯穆列维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人口理论的批判》，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版。
Г·亚历山大罗夫：《法西斯主义——人类的凶恶敌人》，莫斯科，1941年版。
П·尤金：《击溃法西斯恶棍》，莫斯科，1941年版。
А·托尔斯泰：《我们保卫什么》，莫斯科，1941年版。
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莫斯科，1941年版。
В·弗格拉希：《德国法西斯主义是文化的敌人》，莫斯科，1942年版。

② 《格·季米特洛夫选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376页。

③ 《斯大林文选》（上），第276—277、297—298页。

运动。尼采的全部世界观都渗透着对革命精神、人民群众、社会进步的仇恨。尼采本人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尼采的哲学被希特勒分子广泛加以利用。苏联哲学家指出，马尔萨斯主义和施本格勒学说，都是帝国主义者叫嚣扩张领土、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

苏联学者在批判法西斯主义者奉行种族主义时，对于新黑格尔主义给以特别的注意。学者指出，新黑格尔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紧密相联，后者依据前者，力图从“理论”上论证自己仇视人类的思想。新黑格尔主义是19世纪至20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发展。它专门发挥黑格尔《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中的反动方面，成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战争性质及法西斯主义失败根源的分析

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1929年下半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情况，对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如果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偶然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那就不正确了。虽然，错误无疑是犯了的。其实，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①

斯大林回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止一次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向前发展。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通常经过一段时期，便要引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均势的猛烈破坏，而那些自认为没有足够原料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因而，

---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441页。

资本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且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

事实正是这样，德、意、日首先结成“轴心国”。为了实现侵略野心，日本于1931年以前就把本国经济按照战时方式进行了改造。接着意大利和德国，也把自己的国民经济转上了战时经济的轨道。由于德、意、日业已挑起第二次侵略战争，先后在中国、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区开始改变旧式势力范围，这就引起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也都按战时方式改造自己的经济，一方面极力缩减本国居民消费品的生产，加剧了国内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在外拼命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加剧了列强之间的斗争。

由此斯大林作出结论：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次危机，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第二次危机，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性质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斯大林之所以这样说，那是由于他注意到，德、意、日在侵犯他国之前，把本国最后一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残余彻底消灭了，在本国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践踏了他国的主权和自由发展的原则，把侵占他国国土规定为它们自己的政策，并大肆叫嚣，要把这种法西斯制度推行于全世界，用这种制度统治全世界。这样，由德、意、日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超出单纯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范围，而涉及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针对德、意、日结成的“轴心国”，美、英、法等结成了反“轴心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恢复民主自由和解放战争的性质；而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除加强并确实加强了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外，还有捍卫十月革命和25年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成就的性质。

德国法西斯分子本来以为，鼓吹兽性的民族主义可以给德国侵略者统治被奴役的民族造成某种前提，可是，适得其反，实际却成了他们国内虚弱和国际上孤立的根源。斯大林指出：“种族仇

视的思想和政策，是希特勒强盗联盟瓦解的因素之一。”①

客观进程不出所料，起来反对德帝国主义者的，不仅有被奴役的法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等国人民，而且还有从前希特勒的附庸国——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希特勒匪帮实行吃人生番的政策，使得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德国，而所谓“优等德意志种族”却遭到了举世的憎恨。在战争进程中，希特勒分子不仅遭到军事的失败，而且遭到政治上道义上的失败，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经济的必然归宿。

（三）对敌、我、友之间关系及其变化的论述

苏联卫国战争从1941年6月起，红军当时被迫进行防御战，到1945年5月9日，德军大批缴械投降。在短短几年内发生决定性转变，其重要条件之一，是红军在苏德和美英盟国在欧洲两个战场对德国军队的夹攻。

对于这一点，斯大林辩证地指出：“无可怀疑，如果没有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牵制住德军达75个师的话，我军是不能在那样短的时期内击破德军的抵抗并把他们驱逐出苏联国境。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红军今年夏季的强大进攻战役牵制住德军达200个师的话，我们的盟军是不能如此迅速地打退德军并把他们驱逐出意大利中部、法国和比利时国境。”②

但是，反德联盟并非于战争一开始就如此巩固，而欧洲第二战场也并非于战争一开始就开辟了的。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它们也充满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可以说，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这矛盾运动的展开和克服。

矛盾的一方，即侵略者，以德国为代表，有意大利、日本以及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等的联合力量。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396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下），第393页。

矛盾的另一方，即被侵略者，以苏联为代表，在最初只有中国、西班牙、阿比西尼亚等。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是这双方，那一切就都比较简单了。实际上，在这双方之间，还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英国、法国以及波兰等等。

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的分析，实质是对这敌、我、友三方关系变化的分析。

在战争的头两年即敌强我弱时，面对侵略国的进攻，一些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法国、美国的利益也受到损害的局势，英国、法国、美国却一再后退，接连向侵略者让步，不但没有一点反抗的企图，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讨好侵略者”。

这不是由于非侵略国力量薄弱，因为，非侵略的民主国家加在一起，无论在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无疑都比法西斯国家强大。

既然如此，究竟为什么这些国家一再地向侵略者让步呢？斯大林分析，这种情况可以用害怕革命的心理来解释。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知道，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革命在最大的国家之一取得了胜利。他们害怕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会使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里取得胜利。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幻想让所有交战国都深陷战争漩涡，相互削弱，然后，当他们相当疲惫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出台活动，并迫使那些精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①]

这是美英法等国采取“中立”立场的如意算盘。

可是，德国人并非完全听任纵容，他们不是继续东进反苏，却转过头来向西方索取殖民地，用行动预示着“不干涉政策”最终

① 《斯大林文选》（上），第216页。

会遭到严重破产。

斯大林面对德国人凶猛的气势，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说："决定战争命运的将不是突然性这种附带的因素，而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军队的士气，师团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① 又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这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处于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毫无疑问，德国的这个暂时的军事优势，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的巨大的政治优势，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因此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②

当然，军事上突然性因素的减弱和政治上长久性因素的增长，是有过程的。但苏联及其红军的力量，在国内各族人民，所有欧洲、亚洲、美洲，以及德国所有的优秀人士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下，经过党的教育，坚决放弃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放弃和平建设的情绪，立即按战时轨道改造全部工作，到 1942 年 5 月，红军终于由防御转入进攻，相反，德军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退却。

正是由于出现这种形势，美英代表才到莫斯科参加会议，改变自己的"中立"立场，不久便与苏联结成反希特勒同盟。1944 年 11 月，盟军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法国、比利时等地对希特勒德国发动攻势，开辟了真正的欧洲第二战场。

在东、西两个战场的夹击下，法西斯同盟开始土崩瓦解。此间，尽管希特勒分子拼命离间苏美英联盟，但是，这三国中没有一国中计，相反，联盟更加坚固起来。

对于这一事实，斯大林说："这就表明，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③

---

① ② 《斯大林文选》（上），第 291、264 页。

③ 《斯大林文选》（下），第 398 页。

当然，三大国之间肯定存在分歧，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在社会制度上存在分歧，在开辟第二战场上存在分歧，在战后安全上也存在分歧。斯大林指出："问题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这些分歧没有越出三大国一致的利益所容许的范围，以及归根到底都是根据这种一致的利益来解决的。"①

斯大林根据利益原则，深入揭示德意日侵略战争爆发和失败的必然性，又根据利益原则，透彻分析敌、我、友三方之间的斗争及其力量的消涨，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地位的转化，是他在战争中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生动应用。

（四）对红军力量源泉的论证

这次战争，是俄国和苏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次战争中最残酷和最艰苦的战争。

红军为什么能够很快由防御转向反攻？美英等国为什么能由"中立"的立场转向配合作战？最后，德意日同盟为什么能土崩瓦解？当然，制约这一系列变化的因素有许许多多，不过，苏联红军的英勇作战，却是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红军日益增大的战斗力又来自哪里？同样，来自多方。但除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援外，根本上还是来自苏联后方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对此，斯大林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和二十七周年的《报告》以及在莫斯科市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作了详细阐述。

首先，红军的力量源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斯大林讲，我们这次对敌人所取得的胜利，从我国内部力量的状况和发展来看，首先是苏维埃社会制度和苏维埃国家制度获得了胜利。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从人民中间生长起来并且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拥护的真正人民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有充分生命力和十分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苏维埃基础上培植了"我国各族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 397 页。

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的合作情感”，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典范”，“在那里，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都好。”

苏联的武装力量，苏联红军的力量在战争中源源不断，从政治方面说，根本上是由于社会主义一系列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红军的力量源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讲，取得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除了我国军队的无比英勇精神以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数量充足的武装，有很好的而且也是数量充足的供给。可是为此就必须具备下面这样一些起码的而且数量充足的东西：供制造武器装备以及企业设备用的金属；供维持企业工作和运输业用的燃料；供生产军服用的棉花以及供给军队的粮食。而要保证供给这些东西，必须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正是规模宏伟的三个五年计划帮助苏维埃创造了这些物质条件。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即 1940 年，苏联在这方面的情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即比 1913 年的俄国，要好 3—5 倍。

再次，红军的力量源于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援。

斯大林讲，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如果没有苏联人在工厂、矿山、运输业和农业中忘我的劳动，红军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苏联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奋起保卫祖国，正确地把当前的卫国战争看成是不分民族和信仰的全体劳动者的共同事业。

1945 年 6 月 25 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胜利阅兵式上，举杯祝贺那些普通的、平凡的、质朴的人们，祝贺那些使我们的伟大国家机器在科学、经济和军事各个部门都能积极活动起来的“螺丝钉”，赞颂他们“像基础支持住顶端那样支持着我们”。他深情地表示，“我为这些人，我们的可敬的同志们的健康干杯！”[1]

最后，红军的力量源于列宁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 432 页。

导。

斯大林讲，布尔什维克领导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卫国战争时期，党把苏联人的一切努力联合在一起，指向一个共同目标，使一切人力和物力都服从于粉碎敌人的事业。

斯大林对卫国战争的总结，对红军和苏联力量源泉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军事与民众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应该承认，斯大林在军事上也有失误。首先，他在战争爆发前过分信赖希特勒对苏德和约的承诺，尽管有关情报从各个渠道频频传来，斯大林仍不做战术防范，致使德军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长驱直达莫斯科城下。

后来，斯大林为此辩解，说侵略国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更有作战准备”，这是“历史规律性”[①]。不难看出，他把“备战”与“先发制人”混为一谈。他还说，“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下，退却是和进攻同样合理的斗争形式。”[②] 在这里，他有意对“消极退却”（溃败）与“积极退却”（准备更大进攻）不加区别。

总之，斯大林在预防法西斯主义进攻的战术上，没能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

此外，即使在战略上，斯大林也存在严重失误。准备反侵略战争，同经济建设一样，物质技术固然重要，但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指战员，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一方面，他违背了自己关于“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在战前的大恐怖中，相当多的优秀的指挥员被处决了。战争的头几个月，对上至将军，下至连排级干部，以及对军事学院教师的补充，均是微乎其微的。

斯大林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坚强战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① 《斯大林文选》（下），第400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下），第456页。

作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总司令，直接领导了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在这些军事斗争中，斯大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军事理论和实践中去，同苏联一代军事家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战略和策略，对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的贡献是第一位的，他的失算和错断是第二位的。

简短的结论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截至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36—1945)，共历时10年。在这10年间，斯大林和苏联哲学工作者，继续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一定程度上开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遗产的研究，揭示并论证了苏联社会自身和所处国际环境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必须承认，正是这个期间，在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众中进行了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教育。

这十年间，苏联国内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苏联，建成了强大的工业国，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种条件下，理应从哲学的高度作出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可是，毋庸讳言，这十年，也正是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形成和巩固的时期。由于政治干预，由于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致使理论界对待斯大林的思想言行，没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结果，个人迷信泛滥，教条主义盛行，严重影响了哲学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哲学界充斥了对斯大林著作的诠释和反复论述，任何不一致的观点见解都受到排斥打击。

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仍有一些哲学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面对苏联经济政治领域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坚持严肃认真的思考、探索。就这方面说，应该期待苏联哲学未来的发展。

第七章　战后时期的苏联哲学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英勇、顽强地抗击了法西斯的侵略，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彻底失败，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在经济、政治、思想（包括哲学）各领域都揭开新的一页。

第一节　1945—1953年苏联哲学发展概况

1945—1953年是苏联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时期。苏联党和人民很快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用较短的时间，使苏联工业总产值超过了战前水平，社会主义建设再度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这个时期，从经济到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回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成片的出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的发展，使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格局。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结束了，一场新的战争——“冷战”又开始了。在两大营垒之间，不仅政治、经济、外交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也比以前更为激烈。

战后苏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利用当时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形势，加速推进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事实表明，前一项任务初期解决得比较顺利，而在解决另一项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战后，苏联哲学正是在上述情况下，经过最初的恢复阶段而逐渐发展的。在卫国战争期间，哲学研究工作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并未完全中断，只是工作的重心转向为战争服务的轨道。哲学家们除了撰写揭露和批判法西斯主义及其理论基础的文章之外，还进行世界哲学史及俄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亚历山大洛夫等人主编的《哲学史》，1941年出版了第一、二卷。该书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集体著作，原计划出七卷。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哲学史的著作。

1943年出版了《哲学史》第三卷，这一卷以叙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为主要内容。该书出版后不久即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评。1944年5月1日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哲学方面的科学工作的缺点》的决议。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1944年7—8期发表了社论《论在解释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史方面的缺点和错误》。该书被指责为“在叙述与估计德国哲学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夸大了它的意义，抹杀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没有批判德国哲学家们的反动社会政治观点，例如，对德国哲学颂扬普鲁士君主政体国家、宣扬德国人为“特选”民族、蔑视斯拉夫民族、为战争和殖民地侵略战争政策辩护等等，默不作声，不进行批判。[①] 苏共中央在对《哲学史》第三卷作了批判之后，宣布了两条决定，即撤消1943年决定授予该书的

① 参看《苏联哲学问题》，新华书店1950年版（下同），第99—113页。

斯大林奖金；该书必须重写。

二次大战后，苏共中央一再强调开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开展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斗争。1946 年 8 月苏共中央接连发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关于话剧剧院剧目的决议，批判宣传工作的无思想性、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倾向和种种表现，不断强化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

从 1947 年至 1952 年在苏联社会科学领域中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 1947 年就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而召开的苏联哲学讨论会；二是 1950 年就马尔的语言学观点开展的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三是 1951 年就苏联经济学家集体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召开的经济学问题讨论会。斯大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上述几次重大的讨论，并写了论文和复信，后汇集成斯大林最后的两部重要著作，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尽管这两部著作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有很大部分是谈哲学问题的，尤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结合社会主义的实践作出了一定的发挥，有一定的贡献。当然，受历史条件和其他方面的局限，有些问题并未谈清楚，甚至有不少错误，但斯大林的一些思想理论观点，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将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和著作作为这段时期哲学史的主要内容来加以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还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有颇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他的理论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他在理论上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教条主义，但由于他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导致思想僵化、教条化。在他的理论中有相当浓厚的形而上学思想，缺乏从实际出发的历史感和辩证法的灵活性。他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思想影响广泛。在取得伟大卫国战

争胜利之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其结果，一是把斯大林神化，说他如何如何发展了列宁主义，而且只有他有权“发展”，他的一切理论著作和观点都被奉为绝对真理。二是在党内和人民中间造成思想僵化，“注释哲学”盛行，人们只能解释和鼓吹斯大林的思想和言论，这就窒息了理论工作者的生气勃勃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严重地束缚和阻碍了苏联理论思想的发展。这种情况的典型事例，就是在1947年哲学讨论会之后，在苏共中央的直接干预下，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本教科书。它们深受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影响，轻视对列宁哲学思想遗产的研究和阐发，教条主义气息极为严重。尤其是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完全按照斯大林的哲学体系、基本观点和风格来编写，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斯大林的哲学观点加上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实例的简单罗列。

本来，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支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传播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由于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不健全，由于党和政府往往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甚至科学研究中心学术问题，由于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盛行，理论工作者不敢触及和联系现实问题，不敢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敢进行自由讨论，否则就会被视为离经叛道。其结果，在这一时期，苏联哲学界对一些本该研究的哲学问题根本不敢涉及，更谈不上认真研究，如当时欧美各国已研究很多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的问题、“异化”问题等等。苏联哲学界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把现代西方哲学都一概视为反动的、颓废的，只是一味批判，简单否定，而未能科学地加以研究和分析。总之，在当时的形势下，哲学家们不可能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研究，致使在哲学领域，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都未能展开真正的科学研究。

然而，在这一段时期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还是有

一定进展的。苏联哲学家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全部出齐。50年代，又开始出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哲学著作出了更新、更好的译本。他们的各种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陆续问世。35卷本的《列宁全集》第四版也于1946—1950年出版。与此同时，苏联理论工作者们在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普及性哲学原理著作。在1950—1952年间还进行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关系问题的大讨论。一些哲学史学者对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史进行了研究，还特别集中研究了17—19世纪西欧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理论工作者们的大量实际工作，也为1953年后在哲学各个领域展开全面深入研究，为新时期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下面将比较详细地介绍、分析和评论这个时期哲学方面的三件大事：《西欧哲学史》的讨论、语言学讨论和政治经济学讨论。

第二节　1947年苏联哲学讨论会

1947年6月就格·费·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一书而召开的讨论会，是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也是苏联当代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一、哲学讨论会的概况

《西欧哲学史》一书的作者，格·费·亚历山大洛夫是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博士、科学院院士，是当时苏联哲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亚历山大洛夫1908年3月生于列宁格勒，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历史哲学文学学院，同年开始在莫

斯科史哲文学院从事哲学史教学工作，1936年担任教授，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1947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47—1954年担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他的重要著作有：《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观点》、《亚里士多德》、《西方近代哲学史概论》、《西欧哲学史》等。亚历山大洛夫是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等多种荣誉的获得者。

1945年出版的《西欧哲学史》是亚历山大洛夫根据他1932—1944年先后在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史哲文学院和高级党校讲授西欧哲学史时的讲稿编写而成的，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哲学史著作。该书于1946年又出了经过补充的第二版，并被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为大学和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系的教科书，它在当时是一部在理论界颇有影响的著作。《西欧哲学史》发表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赞扬，许多报刊发表文章和评论，称赞它是"一部卓越的西欧哲学史著作"，"是一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阐述西欧哲学史的、有严格体系的著作"，具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内容深刻，叙述清楚"，"运用具体材料描述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并对哲学史的分期和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问题，进行了深人的研究等等。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以哲学家集体的名义，建议给《西欧哲学史》颁发斯大林奖金。

然而，当时苏共中央不同意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评价，并责令研究所对《西欧哲学史》进行讨论。1947年1月哲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有15人参加的哲学讨论会。会上《西欧哲学史》几乎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扬，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可是苏共中央审查了讨论会的总结，认为这次会议未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无论是讨论会本身的组织工作，还是它进行总结的方式，都是不能令人满

意的”。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组织一次新的讨论会”。[①]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按照党中央和斯大林的指示，于1947年6月亲自主持召开了举世闻名的全苏哲学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苏联各个地区的哲学工作者90余人。这次会议的基调与1月召开的哲学讨论会截然相反，《西欧哲学史》由一本好书突然变成了一本坏书，而且讨论已不只局限于对这一著作的评价，而变成关于哲学一般原则性问题及整个哲学界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讨论。看来，召开这次讨论会的真正原因，并非像日丹诺夫所说的，是中央委员会对1月哲学所召开的讨论会的组织和讨论方式不满，而是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在讨论会上共有47人发言，另有36人写了书面发言稿。与会者认为《西欧哲学史》一书存在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无产阶级党性，对马克思以前的旧的哲学体系和流派，只作了客观主义的叙述，对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等。他们还对哲学界存在的教条主义、书呆子习气、回避现实问题等缺点和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批评。日丹诺夫在最后做了长篇总结发言，他的发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论亚历山大洛夫所著教科书中的缺点”，所列的主要缺点有：

第一，作者始终没有给哲学史下一个总的确切的定义，书中所说“哲学史就是人类对于周围宇宙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不正确的。

第二，作者将哲学发展过程描写成由于数量变化而发展的平稳进化过程，当作是各种哲学派别的逐渐更替，只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哲学的联系，而未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重大革命，使哲学变成科学。

第三，书中没有包括俄国哲学发展史，客观上降低了俄国哲

① 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开幕词，参见《哲学问题》杂志1947年第1期。

学的作用，这是原则性错误。

第四，作者背离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把客观主义的观点贯穿《西欧哲学史》全书，“在批评某个资产阶级哲学家以前，总是‘颂扬’他们的功绩，向他们焚香顶礼”[①]，这是美化剥削阶级思想家，为资产阶级学院派的哲学传统效劳。

第五，作者在叙述各种哲学体系时，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具体历史环境和社会阶级根源相脱节，滑到“哲学思想发展具有独立性和超历史性的观点上去了，而这样的观点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具有的特别标志”[②]。

日丹诺夫的最后结论是“这本教科书很坏，需要根本改造。”[③]

日丹诺夫在其题为“论我国哲学战线的状况”的第二部分发言中，对整个哲学战线的工作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他说：“如果亚历山大洛夫这本教科书得到了我国大多数负领导责任的哲学工作人员的赞扬，把它提交给了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希望获得斯大林奖金，把它推荐为教科书，并且获得了无数赞扬的评论，那么其他的哲学工作人员也显然都同意亚历山大洛夫的错误观点，这就表明我国理论战线上有了严重的病态。”[④]可见，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评是针对整个哲学理论战线的。

日丹诺夫最主要的是批评苏联哲学界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未能向国外敌对的思想及苏联人的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进行全面的进攻，在哲学工作中表现出无原则性，奴颜婢膝地崇拜资产阶级哲学。他批评哲学界没有形成由许多战斗哲学家组成的队伍，根本不成其为“一条真正的战线”，“它也

① 《苏联哲学问题》，第 17 页。
② 《苏联哲学问题》，第 22 页。
③ 《苏联哲学问题》，第 32 页。
④ 《苏联哲学问题》，第 36 页。

许更像一潭死水或者是一个离开战场很远的安静的宿营地。"[1]

围绕这一主要错误，日丹诺夫还批评哲学界不敢大胆创造，不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害怕在许多新问题上，现实问题上试试自己的力量，害怕在解决实践中每天对哲学家提出的，而哲学家也必须回答的那些问题中试试自己的力量。"[2]

日丹诺夫认为造成哲学战线落后的原因，完全不在客观方面，而在主观方面，具体地说，即在亚历山大洛夫等哲学界的领导人物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任人唯亲，不能广泛团结、依靠广大哲学工作者，哲学活动为少数哲学家集团所垄断，致使整个哲学战线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他号召哲学家们揭发并克服哲学界存在的错误，提高战斗力，向资产阶级思想展开进攻。

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作为较早的一部系统阐述哲学史的著作，固然存在着某些缺点和错误，但作者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西欧哲学史的各种问题的。而日丹诺夫说它是一部"很坏"的教科书，则未免言过其实，有失公正。当然，日丹诺夫和其他与会者的发言，对《西欧哲学史》所提出的批评，有些是有道理的，确实是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不足之处，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根本性革命变革重视不够，论述不充分等。然而，也有些意见是明显不符合实际和牵强附会的，如指责该书只对西欧哲学史进行片面的论述，"没有包括俄国哲学发展史"，这样做"客观上降低了俄国哲学的作用"。这是"人为地把哲学史分成西欧哲学史和俄国哲学史"，"肯定了资产阶级把文化划分为'西欧'和'东方'文化的观点"，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西欧'的地方性思潮"[3]。其实，亚历山大洛夫在该书的序

① 《苏联哲学问题》，第 36 页。

② 《苏联哲学问题》，第 40 页。

③ 《苏联哲学问题》，第 13 页。

言中早已说明，当时苏联大学文科各系讲授哲学史是按西欧哲学史和俄国哲学史两大部分来进行的，西欧哲学史是整个哲学史课程的第一部分。不顾这种分工而责怪“西欧哲学史”没有讲俄国哲学史，显然是不公正的。批评者还认为它没有“叙述最近一百多年的哲学历史，当然不能算做教科书”[1]，这是一种求全责备，作为西欧哲学史只叙述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无可非议，这也是一个学科分工问题，而非思想内容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日丹诺夫在发言中，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原则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对苏联以及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发展，都发生了巨大影响，并带来许多消极后果。对这些问题应该作出科学的评论。

二、关于哲学史的对象

一门学科首要问题是它的对象问题，对象决定它的内容。自然，哲学史也是如此。日丹诺夫认为，哲学史教科书的第一个起码条件就是给这门科学下一个确切的完整的科学定义，而亚历山大洛夫却没有这样做。实际情况是，亚历山大洛夫在《西欧哲学史》一书的导言中，就给哲学史下了如下的定义：“哲学史是世界文化史的重要部分”；“它的对象是哲学思维的历史”；“哲学史是人们的世界观的历史”；“哲学史——这是人们社会思想活动的特殊领域的历史”；“哲学史就是人对于其周围宇宙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哲学也是许多现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且他还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史，是在历史的必然发展中，在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研究认识史的”，它“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人们的经济和

---

① 《苏联哲学问题》，第13页。

政治生活的反映”，等等。[①]

日丹诺夫从上述定义中取其两个定义，进行了批判，一是“哲学史就是人对于其周围宇宙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二是“哲学史也是许多现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日丹诺夫认为第一个定义实质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把哲学史的对象说成是与一般科学史相符合，而使哲学变成了科学的科学，“这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老早已经驳斥过了的”。他认为，就第二个定义而言，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把“现代”这一名词的概念与“科学”这一名词的概念混为一谈。

的确，亚历山大洛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哲学史下了许多定义，显得有些零碎，有的过于宽泛、笼统，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对象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无原则性的错误。

单就哲学史是“人对周围宇宙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这一提法本身来说，过于宽泛，是不确切的。但亚历山大洛夫同时又讲了哲学史是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作为特殊的知识部门，它是研究哲学思维的历史，是人们世界观的历史。这又把哲学史的对象作了较为明确的限定，指出了这门科学的特殊性，即它是整个认识史的特殊组成部分。而这些提法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提出的，哲学史、各门科学史、儿童智力发展史、语言史等等，构成整个认识史，[②]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的说法，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③]也是一致的。同时，亚历山大洛夫也指出哲学史是从唯

① 《西欧哲学史》，第3—18页。

② 参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3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研究认识的历史，并且"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人们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因此，总的来说，他的许多说法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日丹诺夫从批判亚历山大洛夫的定义出发，给哲学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①] 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突出了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定义有其合理性，对改变以往哲学史研究中贬低甚至否定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使人们划清与资产阶级哲学史观的界限，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这个定义仅仅将哲学史归结为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规定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却不足以概括哲学思想发展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有些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在哲学史上不仅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而且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它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一样，是哲学认识中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在哲学认识的发展中它们总是交织在一起，并存在于哲学认识的一切方面，贯彻于哲学发展史的始终。而且，从认识史的广阔视角来考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不仅有斗争的一面，还有统一的一面，二者之间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它们的关系是极为微妙复杂的。

再者，在哲学发展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很少以赤裸裸的单纯形式出现，它们往往是潜藏在其他问题的内部，或以与其他问题密切相联系的方式出现的，或者说，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的哲学体系，有着不

---

① 《苏联哲学问题》，第5页。

同的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哲学认识的发展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在哲学史上不仅有唯物与唯心的矛盾，而且还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矛盾。不仅存在“世界本源是物质还是精神”的争论，同时还存在着“本源是一还是多”，“一般和个别何者更实在”，“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还是来自人心固有的天赋观念”，“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人的认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等等问题的争论，从而形成各种哲学派别和倾向。当然，这些问题的争论不可能离开哲学基本矛盾而独立进行，它们归根到底也是哲学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但是，种种不同的哲学派别和倾向之所以在这些问题的争论中产生，又各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认识根源。这种情况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存在，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乃至未来时期仍将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可见，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仅仅把哲学史说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既不能全面地科学地反映哲学发展史的本质内容，也不能概括围绕哲学基本矛盾而展开的，无比生动、无比丰富的矛盾运动，显然是片面的。

实际上，日丹诺夫的定义在苏联并未被完全遵循过，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界便对这一定义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并重新探讨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问题。

1956年6月底，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苏哲学研究工作协调会议上，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便是哲学史的对象问题。恰洛扬在发言中指出，日丹诺夫的定义“把哲学史归结为唯物主义史，从而从哲学史中删去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但是如果不通晓唯心主义的历史，就不会有完整的哲学史，也不会对唯物主义有正确的认识。”①

1957年，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提出：“科学哲学史的对象

① 参看《哲学问题》1956年第4，6期，转引自《苏联当代哲学》，第487页。

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上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史，首先是哲学的基本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斗争的历史"，而且"也包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孕育、形成、发展以及它们相互间斗争的历史。"①

1959年约夫楚克在《哲学史的若干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批评了日丹诺夫的定义，强调哲学史的对象是有关存在和认识的一般规律的各种哲学概念的发展的历史。包括各个不同哲学体系的思维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哲学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

7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界对于哲学史的对象仍在进一步探讨，试图作出新的解释。例如，1973年，格里高里扬在《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一书中认为，哲学史不仅是两个基本哲学派别形成和斗争的历史，还应被看作是人对世界和自身存在的理论认识的历史。哲学史同时也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应用于整个世界、人和社会中不同解决的历史"②。

总之，苏联学者在批评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的同时，他们或者从本体论的角度，或者从逻辑和认识论的方面，或者从综合的观点重新探讨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其中也有许多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是哲学认识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内容。关于哲学史研究对象问题，至今仍是学者们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三、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

日丹诺夫批评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固有的哲学中的党性原则"，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然而，他基于对哲学党性原则的错误理解所提出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

① 《哲学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页。

② 《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26页。

的，是简单化的。

哲学党性原则是列宁提出来的。早在 1894 年，列宁在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时，曾谈到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后来，在批判马赫主义的过程中，列宁于 1908 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明确表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它的首先和基本的含义是指哲学的派别性，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其次，才指它的阶级性，即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又进一步肯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对立和斗争，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转化，并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中，分析了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注意批判地吸取唯心主义体系中所包含的某些合理因素。这就把对唯心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斗争艺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学说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可以说，这是列宁提出哲学党性原则的大概历史过程，也是其本来含义之所在。

坚持哲学党性原则，坚持唯物主义，并非对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只是一昧的单纯批判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从而恰如其分地给它以应有历史地位。亚历山大洛夫大体是这样做的，他并未忽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而只是对历史上出现的众多的哲学体系进行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和分析。其中，尽管某些分析和评价不一定都很准确、恰当，但这样做可以使人们看清每位哲学家思想的本来面目，对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中有什么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应该说，这种客观的实事实是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绝不是什么客观主义，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表现。

---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65 页。

日丹诺夫指责亚历山大洛夫“把客观主义的观点一贯到底地贯串全书的内容”，“在批评某个资产阶级哲学家以前，总是‘颂扬’他们的功绩，向他们焚香顶礼”，“对所有一切旧哲学都找到了机会说几句恭维话，对于名声越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就恭维得越厉害”，成为“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俘虏”，对资产阶级献媚，夸大他们的功劳，剥夺我们哲学家的战斗进攻精神，脱离了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①] 日丹诺夫甚至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统统归之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范畴，把《西欧哲学史》中傅立叶关于人类发展的学说是社会哲学中的最大成就的论断作为客观主义的典型，斥之为“连一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影子都没有”。[②] 其实，亚历山大洛夫不仅指出，关于人类发展的学说是傅立叶社会哲学的最大成就，“就当时那个时代来说，这一理论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发展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又指出了傅立叶学说的不彻底和空想性质，并引证列宁的言论论证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③] 而且这些说法同恩格斯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断是一致的，如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的“理论表现”；“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象未来的”。可见，日丹诺夫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

在当时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哲学的党性和战斗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然而，日丹诺夫所坚持的党性原则却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化，否定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把唯物主义和唯心

① 参见《苏联哲学问题》，第 17，19 页。

② 同上书，第 18 页。

③ 《西欧哲学史》，第 332－333 页。

主义之间的对立直接地、简单地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把哲学的党性原则和哲学的阶级性混为一谈。在讨论会上，有的人（如加克）甚至提出了一个公式：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唯物主义是进步的。这种对哲学党性原则简单化、绝对化的歪曲理解，显然是错误的。

在阶级社会中，哲学作为整个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要反映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并为一定阶级服务。哲学要完全摆脱阶级斗争的旋涡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唯物主义反映、适合进步阶级的根本利益，唯心主义反映、适合反动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哲学作为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同社会经济、阶级利益的关系又往往是间接又间接的。列宁说："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所谓"归根到底"，就表明哲学与阶级关系的联系是间接的、曲折的。哲学与阶级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但它们又是发生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并不就是一回事。因此，哲学的党性包含阶级性，但不等同于阶级性，或直接归结为阶级性。简单地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同政治的进步与反动划等号，认为凡是唯物主义都是进步的，凡是唯心主义都是反动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着许多复杂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历史上的进步力量不一定都是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也不一定都起反动作用。欧洲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不是唯物主义思想，但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同样，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竟成为德国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宗教唯心主义在开始时，曾成为农民革命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就以宗教唯心主义作为它的思想武器。同一个阶级在上升时期可以站在唯物主义

的立场上，赞同、宣传唯物主义，而在没落时期却倾向唯心主义。而且就是一个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或集团，是主张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也往往是各不相同的。至于说到个人，情况则更为复杂。对一个人来说，除了阶级的影响之外，也还有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政治立场与世界观有时并不都是一致的，这是完全可能的。在俄国的革命历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当时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倾向于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而在哲学上却坚持着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却是俄国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一种哲学代表哪一个阶级，是进步还是反动的，不能仅仅靠推论，而应该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地位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的历史评价。

日丹诺夫对哲学党性原则的歪曲解释，曾在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消极的影响，造成哲学史研究中的公式化、简单化毛病，有的人把哲学党性原则作为僵死的公式到处乱套，甚至以“贴标签”的方法代替具体的科学分析。这种简单化的“左”的倾向，曾一度严重妨碍了哲学本身的发展，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当然，我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对简单化的“左”的倾向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本否定哲学党性原则。

四、关于批判与继承问题

关于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这是日丹诺夫批评《西欧哲学史》的又一重要问题。

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的确比较注重哲学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力图把每一哲学体系都放在整个人类认识发展史的链条中，放在一定的历史地位上，借以阐述它的形成和发展，力图表述欧洲哲学的有连续性的、有规律性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种发展中形成的，没有继承也就无所谓变革。这样，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的联系中，就会看到它

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就更易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亚历山大洛夫在书中，确实偏重于继承性的方面，较多地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立的新的世界观“是他们对世界科学和哲学成就进行批判的研究和利用的结果”，“是在总结了所有知识领域的大量科学资料的基础上产生的”。[①] 相对地说，亚历山大洛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变革，以及这个变革是如何实现的，却阐述得不够深入、具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日丹诺夫在批评《西欧哲学史》的这一缺点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中的革命，似乎无可非议。但他对待批判与继承问题上，如同对待哲学党性原则一样，陷入了片面性。尽管他也提到“否定并不是简单说个‘不’字，否定的本身包含有继承性”。而实际强调的却只是否定、批判。日丹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就是旧哲学的终结”加以绝对化，认为，“旧时期的哲学只是个别人们的事情，只是少数哲学家及其门徒所组成的哲学学派专有的财产。这般人都是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与人民毫不相干的”，它们“决不能成为实践上影响世界的工具，也决不能成为认识的工具。”[②] 那些早已被推翻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用不着多去注意它”。

日丹诺夫的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各种哲学都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意识的理论表现，它们绝不只是个别人的、少数哲学家的事情，也不是彼此孤立，毫无联系的。哲学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每一重要的哲学思想对后世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每一代人都是“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③]，每一代的哲学，不论它反映的社会条件、阶

① 《西欧哲学史》，第 444 页。

② 《苏联哲学问题》，第 11、1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1 页。

级基础如何，都同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有着密切联系，都体现人类认识进程的一个阶段。固然，以往的哲学都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苛求于前人，正如列宁所说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 那种坚持认为过去的哲学都是个别人的、属于少数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认定只有唯物主义才是好的，值得继承，而一切唯心主义都是坏的、反动的，必须抛弃的观点，不是什么批判继承，而是一概否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然而它的产生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它是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恩格斯曾说："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大有力，是因为它没有否定（抛弃），而是直接继承了人类认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任何形式的宗派学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它永远不把自身封闭在一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体系中，而是开放的。即使在同敌对观点的斗争中，它也从不忽视吸收和借鉴敌对营垒中的每一有价值的成就，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继承是批判的继承，剔除其糟粕，吸收其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并不是不分精华与糟粕的兼容并包。日丹诺夫为了强调革命性、战斗性，往往只讲批判而很少注意继承。实际上，日丹诺夫的批判继承具有全盘否定文化遗产的性质，他的这种观点导致苏联理论界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对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造成了苏联哲学的贫乏。

与继承问题直接有关并更为突出的是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2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8页。

学的评价问题，这也是这次讨论会上批评的重点之一。

亚历山大洛夫在《西欧哲学史》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评价作出的。他在分析几位古典哲学家的主要观点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进步方面，指出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进步作用。但是，作者在分析他们的学说的某些保守方面时，却常常言过其实，甚至加上“反动”“反动特征”之类的评语。例如，亚历山大洛夫说，“康德学说中的反动特征在他的世界观中占据愈来愈大的地位”[①]，康德的道德观是反映了“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和伦理要求”[②]。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进步的和保守的、反动的两个方面”，“经常是互相渗透着的，其中保守方面占据优势”，等等。显然，这是由于受到当时苏联流行的“左”的观点影响所致。

尽管如此，《西欧哲学史》仍然受到日丹诺夫的指责，特别是在对黑格尔的评价问题上。他认为亚历山大洛夫“把敌对哲学斗争描写成黑格尔本身内在的反动原则与进步原则的斗争，这种证明方法不仅是客观主义的折衷论而且显然是替黑格尔粉饰。因为这样就是证明在黑格尔哲学中的进步方面和反动方面是一样多的。”日丹诺夫当时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要反对经典作家对黑格尔的一些正确评价。他用以指责亚历山大洛夫的唯一根据便是斯大林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的反动’”的论断，并据此宣称，“关于黑格尔的问题是早已解决了的，重新把它提出来，没有任何根据。”[③] 而根据斯大林的论断不可避免地得出全盘否定德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的结论。正是为斯大林观点所左右，在这次讨论会上，除少数与会者坚持要正确地对待德国古典哲学之外，大多数人对德国古典哲学持全面

① 《苏联哲学问题》，第 20 页。

② 敦尼克主编《哲学史》第 6 卷，第 466 页。

③ 《苏联哲学问题》，第 35 页。

批判、全面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不存在什么继承性问题。这在米丁和斯维特洛夫等人的发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米丁看来，肯定资产阶级哲学中有某些合理和进步的东西，都是卑躬屈膝的行为。他们认为，既然斯大林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确定为贵族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那么只简单地断言德国哲学家有保守方面是不够的。埃姆金甚至提出，不仅德国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而且德国唯心主义的方法也是反动的。还有人说，不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具有保守的性质，就连他的辩证法也是被用来保卫当时德国的反动现实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德国资产阶级中一部分反动分子的世界观。从阶级根源上说，黑格尔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其利益是同贵族阶级相一致的，是同世界反动势力反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的。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是普鲁士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贵族的意识形态。斯维特洛夫认为，法国革命及其思想并未引起黑格尔的兴趣，"黑格尔从青年时起直至逝世都始终不渝地是对德国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制度表示最恭敬的忠臣"①，黑格尔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反动的，无继承性可言。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等人的观点，既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正确评价。

第一，就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同法国唯物主义的关系而言，从在哲学的发展中以唯心主义取代唯物主义的地位来看，或许可以说，这是一次唯心主义的复辟，或视为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但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乃是一次富有内容的复辟。德国古典哲学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系统发挥了辩证法思想，把辩证法引人认识论，发挥了能动性等等，这样，它又为哲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增添了丰富的新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更是欧洲两千年来辩证法思想的总汇，是

① 转引自《苏联当代哲学》，第498页。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积极的成果，对人类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其次，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德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哲学革命，它同法国哲学革命的差别，主要是形式上的，不是实质性的，就其反封建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实质而言，两者是一致的。和英法哲学相比，德国古典哲学在形式上较为保守，但在内容上则较为丰富和深刻。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同法国唯物主义的对立，从阶级根源上看，并不是两个阶级的对立，而是同一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发展和成熟程度不同的反映。它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两个国家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造成的。和法国唯物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准备一样，这次德国哲学革命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乃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言。显然，用法国唯物主义来贬低、否定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保守方面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他迂腐晦涩的言词背后又隐藏着革命的因素。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到处都充满着矛盾，单就他的政治思想来说，他一方面为君主制作了大量的辩护，另一方面又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会极端反感，对它们一贯采取批评的态度。他一方面支持现存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论证现状是必然要改变的。黑格尔对法国革命采取热烈同情的态度，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是德国式的。他曾深刻意识到法国革命好似“光辉灿烂的黎明”，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降生”，但到后来，只是抽象地肯定法国革命的原则，实际上成为落后德国状况下要求改变社会的改良派。

黑格尔哲学中的矛盾，正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矛盾性格的反映，他的保守方面也正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反之，正是德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才使得黑格尔这个“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也无法完全脱去德国的

庸人气味，才使得他这个法国革命的拥护者，竟会提出君主立宪制这样一种极其温和的政治主张。在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中，黑格尔总是站在新兴资产阶级一边，他的思想始终都表达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愿望。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可说是黑格尔哲学中最富于保守性的著作，恩格斯却曾这样说过："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了资产阶级方面去。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黑格尔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是要通过有限的温和的改良道路来实现资产阶级的间接统治，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这是非常典型的"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在政治上黑格尔虽有其保守性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来则是革命的、进步的。以当时被看作为普鲁士王朝辩护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来说，本身就包含了两重性，一方面是对现状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现状的否定。看来是保守的，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本身就包含着革命的意义。应该说，黑格尔的保守性只在于他不敢把他的真正意图公开表示出来，而只是偷偷地向世人暗示，在公开场合却往往为普鲁士王朝的合理性作辩护。所以，黑格尔并不是一个代表容克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分子，更不能说他是一个反动分子。他的哲学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一样，决不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

日丹诺夫等人对亚历山大洛夫的批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全盘否定的作法，从根本上否认了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他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完全采取反历史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曾给苏联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五、哲学讨论会的影响及其后果

1947 年哲学讨论会由于是在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受到了苏联全国的关注，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其影响不限于哲学界，而且波及到文学艺术及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

讨论会实际上是以《西欧哲学史》为靶子而展开的，这是对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主动的全面进攻的开始，极大地改变了苏联哲学发展的方向。在哲学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性被过分夸大的情况下，哲学领域的真正的科学研究就更加困难了。哲学讨论会后苏联哲学界的境况，从《哲学问题》杂志及其第一主编凯德洛夫的遭遇可见一斑。凯德洛夫曾在哲学讨论会上提出创办哲学杂志的建议；后经党中央批准，哲学家们在会后创办了一份专门哲学杂志——《哲学问题》。然而，杂志刚刚出了第二期便遭到厄运，主编凯德洛夫受到围攻和批判。原因是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有争议的文章。杂志编辑部因“没有贯彻正确路线，没有把物理学家们和哲学家们引向日丹诺夫同志在讨论亚历山大洛夫的书时所指出的道路”，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哲学问题》第二期被禁止发行，凯德洛夫被撤销职务。其后不久，不仅凯德洛夫在《哲学问题》上发表的文章，而且他在 1947 年和 1948 年发表的几部著作:《论自然界的质量变化》、《恩格斯和自然科学》、《论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和《化学元素概念从门捷列耶夫到今天的发展》，都受到了批判。他被指责忽视了科学斗争、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社会集团斗争之间的联系，忘记了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斗争，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甚至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因没有及时对凯德洛夫展开批评而受到责备。正是在这种日益紧张的气氛下，1949 年 7 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马列主义与哲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大会一致通过的给斯大林的致敬电表示:“我们将不断地以您的伟大指示为指南……严格

遵守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的统一，要严格遵守理论的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保证要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反动学说的斗争中起主导的作用……对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任何表现，抱有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与不容忍的态度。我们要经常地不倦地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反动思想而斗争。"①

1948年召开了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发表讽刺作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作品进行批评。日丹诺夫指责他们犯了鼓吹和崇拜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形式主义而贬低俄国文化传统的错误。日丹诺夫把这种错误称为"世界主义"。会议之后，随即在苏联掀起了批判"世界主义"的运动。先是在戏剧、文学、电影、音乐和美术各领域进行批判，紧接着就是批判哲学中的"世界主义"。米丁于1949年3月在《文学报》上发表了《论苏联哲学中的世界主义"理论"》一文，认为哲学界也有一个"欺宗灭祖的世界主义者"集团，其代表人物就是凯德洛夫及其追随者。米丁批评说，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的发言中已指出哲学家们没有看到奴颜婢膝地崇拜外国资产阶级哲学的事实，然而凯德洛夫等人仍然"忽视阶级斗争的国际性和阶级斗争在哲学中的反映"，强调"世界哲学是全人类的思想"，而"抛弃俄罗斯社会思想发展的一切民族性和独创性"，"对俄罗斯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等等。日丹诺夫发动的批判"世界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哲学上，否定一切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而不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把自已完全封闭起来。从而使得当时的苏联哲学界不仅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且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哲学流派都一律视为颓废的、反动的，斥之为"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哲学"，"科学和进步坏透了的敌人"，而一概加以否定。这就把哲学研究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狭窄的范围之内，加之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注释哲

① 《苏联哲学问题》，第94页。

学”盛行，哲学家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注释、解释、重复斯大林著作中的一些观点。这就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简单化。

1947 年哲学讨论会还带来一个危害和影响，那就是它开了一个用最高行政命令这种方式解决理论学术是非的恶劣先例。早在 30 年代初，批判德波林学派时，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况，而现在情况则越发严重了。

1947 年哲学讨论会的影响也波及到许多自然科学。日丹诺夫在讨论会的发言中，在罗列了“资产阶级科学”的种种表现之后，立即指出，“这里是哲学家活动的巨大领域”，这实际就是向哲学家们发出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批判斗争的动员令。

列宁于 1922 年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名著中，提出的关于“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联盟”的思想，得到了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的赞同。因此，早在 20 和 30 年代，苏联哲学界即开始重视同自然科学联盟，注意现代自然科学中哲学问题的研究。一些自然科学家也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错误地开展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哲学批判，否定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甚至用行政手段压制反对派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在哲学讨论会的影响下，这种错误倾向便愈演愈烈。生物遗传学可以说是最早受到粗暴批判的学科之一，这个事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早在 20 年代，苏联就存在生物遗传学的两个派别——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1935 年米丘林去世后，李森科成为米丘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两派从 30 年代起开始学术上的争论。虽然李森科凭借行政干预的支持，完全否定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基因遗传理论，给它扣上“不可知论”和“烦琐哲学”的帽子，但直到卫国战争结束，摩尔根派仍可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里也还可以公开讲授摩尔根生物遗传学，尽管受到种种压力。到了 1948 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48年7月，李森科在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总结生物学领域米丘林派与摩尔根学派之间的斗争，向摩尔根主义展开新的进攻。他说这一天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的"伟大节日"。这次大会得到苏共中央的有力支持，斯大林会前亲自修改了李森科报告的草稿。会议期间《真理报》几乎刊登了会议的全部文件，并发表社论公开支持米丘林学派，哲学家米丁也在大会上作了支持李森科的发言。

李森科在报告中提出有两种对立的生物学，即所谓唯物主义的、苏维埃的、米丘林主义者的生物学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的生物学。他宣布摩尔根主义这种"现代反动遗传学是烦琐哲学"。这次会议使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苏联生物学界取得了垄断地位。而一大批摩尔根学派生物遗传学家则被打成反动的、反科学的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摩尔根遗传学被宣布为"伪科学"，"为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服务"的"优生学"。大会之后，持摩尔根派观点的研究所被撤销，有关细胞遗传学的实验室被关闭，有关文献和教科书被销毁，教师被赶出了学校。摩尔根遗传学在苏联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这次会议在当时被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会议刚一结束，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立即发表了《为争取进步生物科学的繁荣而斗争》的社论，说，得到党中央赞同的李森科的报告不仅对生物学家十分重要，而且对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提出，所有的学者、科学家都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即为争取进步科学的发展、争取苏联科学的繁荣和领先地位、争取克服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的敌对影响和克服在资产阶级文化面前的奴颜婢膝而斗争。在当时那种批判"世界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气氛之下，一场扫除"反动资产阶级影响"的批判运动便很快在物理学、化学、控制论、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广泛开展起来，从而严重地阻碍了苏联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在一些现代自然科学领域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这次对摩尔根派遗传学的批判和处理，对苏联遗传学来说是一场灾难，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给人们留下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一，不适当地强调、夸大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本来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即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给人以总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对具体自然科学研究有指导作用，并没有错。但如果把哲学放到不适当的位置上，夸大它的作用，使哲学成为裁决自然科学领域中学术争论是非的标准，按照哲学党性原则去简单地裁决不同观点、不同学派，断定哪个是唯物主义的、正确的、进步的，哪个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错误的、反动的，那是危险的。（当然，所谓哲学指导更不是某些哲学家个人去指导。）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不仅会阻碍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且会败坏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威信。其二，对具体自然科学问题采取行政干预，以行政手段、政治批判取代学术争论，甚至由党中央来宣布自然科学中学术争论的是非，甚至断定哪一方是进步或是反动的，这是完全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具体自然科学的成果、结论正确与否，根本上说来，是要靠科学实验，靠实践来检验，而不是靠哪一级行政组织、甚至靠某个人来裁决。这种做法是完全反科学的，错误的，它给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第三节 1950 年语言学问题讨论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一、关于语言学问题讨论的一般情况

1950 年 5 月至 7 月初，苏联《真理报》组织了一次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其目的在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此之前

很长一个时期里，苏联当时最有名的语言学家尼·雅·马尔和他的学生们宣传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语言学理论，却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唯物主义”的科学。这次讨论就是针对马尔的语言学理论，并涉及到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

尼·雅·马尔（1854—1934）是苏联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00年起任彼得堡大学教授，1912年起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主要从事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语言及高加索地区其他语言的研究。马尔从十月革命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语言学理论。苏联理论界一直把他看作是苏联语言学派的创立者，苏联语言学权威。马尔的个别优秀著作是有价值的，值得研究和吸取。但是，有些基本观点却是错误的，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把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塞进了语言学。马尔及其拥护者否认语言是人们共同的交际工具，认为语言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尔认为，把语言“当作全体居民群众性的本族语言是不科学的和非现实的；非等级的、非阶级的民族语言现实是一种虚构”；他们否认语言发展的继承性，认为语言的发展是通过周期性爆发的形式实现的；他们还把语言同思维割裂开来，认为思维可以离开语言而存在，交际可以不用语言，只借助于那种完全摆脱语言的“自然物质”的思维本身即可办到。对这样一种学说，苏联理论界却认为是“真正创造性的和唯物主义的，是苏联语言学的基础”。1950年1月，为马尔逝世十五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称赞马尔是“苏联的天才学者，创造了唯物主义语言学”。马尔的理论被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在语言学界一直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5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批评马尔的文章，开始了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每周定期出版两整版的讨论专刊，历时两个月。这次讨论引起了苏联语言学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响。

斯大林非常重视并亲自参加了这次讨论。他应一些青年同志的要求，写了一篇短文《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在 6 月 20 日的讨论专刊上。随后，为答复一些同志的来信，他又写了《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和《答同志们》，分别发表在 7 月 4 日的讨论专刊上和 8 月 2 日的《真理报》上。上述这些短文和复信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于 1950 年 8 月出版。斯大林本人也承认他并不是语言学家，他在文章和书信中，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对语言学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然而，在当时个人迷信盛行的气氛下，这部著作一发表，许多学者和专家都争相发表文章，盛赞斯大林这一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总纲领”，“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典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一个杰出的贡献”，“一份无可估价的贡献”，“它对一切社会科学都有极大的意义”等等。把斯大林的全部论点奉为绝对正确的真理，固然是错误的，但是他确实纠正了一些理论上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还是有其一定的贡献的，当然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二、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针对尼·雅·马尔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提出：“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①]它是人们在交际中的一种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为人们所注意，斯大林提出这一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整个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并非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归入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非此即彼。语言、自然科学、教育中的某些方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25 页。

面（某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以及家庭等等，都是既非基础也非上层建筑的社会现象。这就告诉我们研究社会现象时不能简单化，这对于具体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有其指导意义的。

至于语言为什么不是上层建筑，它与上层建筑有什么根本不同的特点，斯大林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证，即（1）二者的产生；（2）与经济基础的关系；（3）存在寿命的长短；（4）同人的生产活动的关系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活动范围的广泛程度等。他指出语言既不是上层建筑，不能与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也不是某一个阶级创造的，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是整个社会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创造的，是为整个社会，为各阶级服务的，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

斯大林在论述语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时，首先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关于什么是经济基础，斯大林说："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① 其后，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又做了进一步的表述，指出："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在内，都有自己的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②斯大林对经济基础的规定，是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相一致的。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 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科学规定。后来列宁也明确指出，"经济形态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

① 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1、5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①]

对于经济基础的概念的这种理解，是否应该坚持呢？对此，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应当把生产力包括在内；二是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存在于该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三是认为经济基础是指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经济一词含义比较广泛，一般指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或生产领域，其中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有时也专指生产关系）。然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专门范畴的经济基础，按马克思、列宁以及斯大林所作的规定，是指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显然是不包括生产力在内的。这主要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范畴应该从不同方面把握社会有机体，每个范畴都应该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含义，借以揭示社会生活的特定方面。假如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在内，那就会与生产方式概念相重合、混同。在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中，确实存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相互区别的层次。把生产关系从生产方式这一更为宽泛的范畴中抽取出来，确定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对于揭示上层建筑及社会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就生产力、生产关系同上层建筑的联系来说，又有直接和间接之别。生产力对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无疑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但是，直接决定和说明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的不是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是生产关系的性质。纵观在以往阶级社会的发展中，究竟哪一个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占统治地位，并不能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直接说明，而只能由哪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来说明。因此，即便是同一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其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也可能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基础显然不包括生产力。因此，我们认为对经济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基础的传统的理解还是应该坚持的。

那么，经济基础是指特定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还是指特定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呢？斯大林作过明确的说明。

在现实社会中生产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个特定的社会往往不是单一的，只有一种生产关系，而是多种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是客观事实。然而，同任何复杂的事物一样，在特定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中，总有主要的、本质的、占统治地位的和次要的、非本质的、处于残余或萌芽状态的不占统治地位的之分。当我们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时，首先必须抓住主要的本质的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而不是由各种生产关系共同决定的。否则，就不可能确定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也就不可能确定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因此，经济基础只能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而不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所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斯大林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把它明确规定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等三个方面。

那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否就不属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就没有任何作用和影响呢？不是的，它们只是对上层建筑不起决定作用而已。如果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属于经济基础，那它又是什么呢？当我们具体考察和分析某一社会形态的具体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再现它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时，就必须精细地考察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影响，尽管它们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否则就会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把丰富多采的社会有机体看成单调的、没有生气的。

同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的范畴，斯大林作了这样的规定："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

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① 也即是说，上层建筑有两个部分，一是客观实在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一是观念的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

有的学者曾对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的表述提出质疑，认为它和马克思的说法不相一致。马克思是说政治上层建筑和"各种观点"或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斯大林却说政治法律设施"同这些观点相适应"，这就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有坠入唯心史观的危险。

的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后来，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他又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②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和观念的上层建筑，都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其实，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问题》中也曾明确指出："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③ 这里所说的上层建筑，既包括政治法律设施，也包括意识形态，它们都是首先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同马克思的说法是一致的，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前提下，斯大林又明确揭示了上层建筑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说政治法律设施与"这些观点相适应"，那就很难说有唯心主义之嫌。

纵观社会的发展及其社会制度的变迁，总是先有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观点，然后才相应地建立起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列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0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42 页，第 629 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01，504 页。

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是把整个上层建筑归结为"思想关系"，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它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但也不能忽视反映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人的意识的作用。政治上层建筑是根据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通过人们的意识，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例如，在欧洲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正是由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觉察到社会发展提出的任务，才提出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即社会观点和政治理想，并在这种政治、法律观点的指导下，经过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则更是如此。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当然，就其最终来源上说，归根到底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的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相对于基础而言，它们都是第二性的。

在斯大林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政治法律制度根据什么，怎样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问题，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斯大林在上层建筑的定义中，明确指出政治法律设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政治法律等观点建立起来的，"设施"与意识形态相适应。这就对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另一方面作了明确、具体的回答，这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总结，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斯大林把上层建筑这一概念更加明确、具体化了，这并不是什么唯心主义，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贡献。

当然，在上层建筑两个组成部分的关系问题上，还应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当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之后，又会成为一种强大的、既定的现实力量，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观念的上层建筑。在这个意义上，观念又要与制度相适应。在

上层建筑的诸要素中，政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上层建筑中反映经济基础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部分。意识形态不仅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反映基础的要求，而且往往受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它通过政治反映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还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亦即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他指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任何经济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① 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② 斯大林在这里所说的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上层建筑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的形成和巩固，这是因为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它为自己服务，积极帮助自己的形成和巩固。二是新的上层建筑要为消灭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它既"保护自己"，又"排除异己"，不废除旧的，新的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就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如果上层建筑拒绝这样做，保持中立，不为基础服务，那么，它就会丧失自己存在的理由，不再成其为上层建筑了。

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巨大的，但它毕竟是在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前提下的反作用，是第二位的。因而这种反作用并不是无限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01—502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02 页。

的、决定一切的，不能把这种反作用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更不能任意夸大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斯大林在论述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规律时所提出的，关于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论点是不确切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的发生变革"，而不是"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这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在全部上层建筑中，除了政治上层建筑之外，还有各种意识形态，而这些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它们除去受经济基础决定外，还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继承关系，以及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在新的上层建筑代替旧的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它们并不是同时随着基础的变化或消灭而立即变化或消灭的，亦步亦趋，而是有快有慢，有早有迟，参差不齐的。斯大林的不确切的提法，包含着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否定，这也是当时苏联流行的对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根源。对此，后来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六卷提出了批评，指出：斯大林"只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机构包括在对抗性社会的上层建筑中，提出随着旧基础的消灭就会发生全部旧上层建筑迅速消灭的论点。对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及其发展特点的这种非辩证法的解释，造成了混乱。关于全部旧上层建筑消灭的论点，使人们指望用强制的办法干涉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把上层建筑解释为一个阶级的上层建筑，就会产生对于精神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① 苏联哲学家们的这一批评还是很有道理的。

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斯大林在阐述上层建筑与语言根本区别的重要特点时，还曾

① 敦尼克等著《哲学史》第6卷，第271页。

指出："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①] 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并不直接同生产力发生联系，而是通过经济基础的中介，即通过生产关系这一中间环节发生间接的联系。这样，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以生产关系为中间环节构成两对矛盾，它们决定着社会性质、面貌及其发展。这实际上包含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斯大林却没有用相应的哲学概念加以概括，并把它完整、明确地表达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斯大林于 1938 年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曾着重阐述了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决定社会性质，推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变。这中间他已涉及到上层建筑（先进思想、政权的作用等），但是却没有把它作为专门问题展开论述。而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他在集中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时，又仅仅是针对语言学中的错误观点，因而他始终没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矛盾的关系，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由于十月革命后，苏联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威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激发人民群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热忱和坚定必胜的信心，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05 页。

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斯大林却在思想上偏离了辩证法，存在着对社会主义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观点。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他曾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是完全适应的，不存在任何矛盾。虽然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对其矛盾仍缺乏更具体地分析，也没有作出更明确的理论概括。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一著作中，他只是指出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而没有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方面，更谈不到具体分析。事实上，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二者之间也仍然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新的上层建筑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刚刚建立之时，不可能尽善尽美，它的某些不完善部分（如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制度等）以及旧的意识形态影响的存在，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一定的矛盾。再者，当经济基础向前发展了，上层建筑不能立即随之而变化，也必然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

总之，尽管斯大林在不同的场合分别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问题，但由于他思想上的形而上学，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矛盾的存在，而未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未能对社会基本矛盾作出明确的理论概括。我们如果不是孤立地看问题，而是把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提出，看作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对这一理论学说的创造，还是作出了他一定的贡献的。

四、关于质变的两种形式

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即质变是十分重视的，因为只有飞跃，才有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列宁就曾讲过："辩证的转化与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就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

断，……"[①]

关于飞跃的不同方式，即质变形式的多样性问题，又是质量互变规律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过多次论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曾指出："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②]恩格斯认为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以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在谈到社会的飞跃形式问题，恩格斯提出了"暴力"的与"和平"的两种形式，他说："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更多的历史实践经验可供总结，所以他们只是一般原则地提出这一问题，特别是"和平"的代替，还只能是一种科学的预见，不可能讲得十分具体，也不可能明确提出事物质变的渐进形式问题。相反，在激烈阶级斗争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条件下，相对地说，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比较强调暴力，强调爆发式的飞跃形式。列宁就曾多次强调指出，"发展是飞跃的、剧变的、革命的进程，'渐进过程的中断'"[④]，革命是最根本的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尽可能少破坏地、审慎地、缓慢地来改造旧事物。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初期，列宁认为对小生产者的改造是另一种性质的"特殊的斗争"，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页。

能做到。"[1] 同时，列宁也曾设想过用"赎买"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虽然他的这一设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但也说明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对抗性矛盾的可能，而列宁这种想法却没有来得及从哲学上加以概括。

斯大林所处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已有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供总结和概括。诚然，斯大林起初也把质变只归结为爆发式飞跃，但在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事物发展的不同特点之后，明确提出了质变的两种形式的新见解，肯定了质变过程的非爆发形式。当时在苏联有不少人认为，事物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爆发形式。有的人甚至认为语言的发展也是如此，是靠什么"突然的语言革命"来实现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批评这种观点时，阐述了质变的两种形式——爆发式和非爆发式。

斯大林这里所说的爆发和恩格斯所说的暴力是同一类概念，是从不同方面表达同一个过程。不同在于，爆发是就一般事物质变的一种形式而言，暴力则是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手段。而斯大林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是非爆发性的飞跃形式的作用和意义，他的贡献也主要在这一方面。

所谓爆发形式，主要表现为"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具有突然性，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这一特点。而非爆发式则表现为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飞跃的，具有逐渐性和长期性——相对来说，时间较长。非爆发形式本身也具有多样性。

首先，斯大林认为，语言的发展不是经过突然的爆发或者"突然的语言革命"来实现的。他认为拉法格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即"1789—1794年间发生突然的语言革命"，是不正确的。在这五、六年间，只是增加了许多新的法语词汇，消失了一些陈旧的词汇，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

或者改变了一些旧词汇的含义。但是，基本词汇、语法构造并未改变，并没有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因此，谈不上什么语言的突然革命。语言的发展是非爆发式的，是经过新质要素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的基本要素的方法，逐渐代替旧要素。语言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其次，斯大林由此进一步指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① 他具体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造旧的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变革，但由于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倡导和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它是经过"逐渐过渡"的形式、即非爆发形式来实现的。推而广之，将来从集体所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也会采用逐步过渡的非爆发形式。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时，也应采取逐步充实内容，改进形式，不断加以改革、调整，提高到新的水平和阶段，使之逐步完善，转化为新的质。这也是逐步过渡的一种形式。

最后，他认为对某些旧东西，还可以使新东西渗透到旧东西中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从而实现质的飞跃。这也属于逐渐过渡的一种形式。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总之，斯大林所说的飞跃的非爆发形式是客观存在的，例如，生物的进化，物种的变异，由旧物种到新物种的飞跃；以及当今一些国家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它们都是属于非爆发式的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9页。

飞跃。为什么飞跃形式是多样的？因为事物的质是多样的，正是事物的质的多样性决定了飞跃形式的多样性。归根到底，飞跃形式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具体的外部条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关于飞跃形式，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飞跃形式问题，是我们研究事物发展规律，尤其是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斯大林关于飞跃的两种形式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飞跃形式多样性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尽管有些问题不一定都已说得很清楚，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论述，在理论上是一个贡献，在实践上，对于处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第四节　1951 年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关于经济学问题讨论的一般情况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至 1936 年，“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已取得了完全胜利。”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他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成。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如何继续向前发展呢？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此外，这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遇到许多有待解决的迫切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1939 年，斯大林在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党的宣传、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要求所有部门中的干部都要研究、掌握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要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

就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言，十月革命胜利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苏联国内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在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无组织社会中，才有支配人们经济活动、在人们背后自发起作

用的经济规律，而社会主义是有组织的社会，人们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在计划经济中经济规律就完全消失了。这就否认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1929 年发表了列宁于 1920 年撰写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书中列宁对布哈林所谓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以及在有组织的社会经济中“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基本‘问题’都消失了”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列宁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一些人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是在最后增加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简单论述。整个说来，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缺乏系统的研究和阐述。

斯大林对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工作极为重视，认为一本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1940 年前后，苏共中央指令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编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求在教科书中不仅应当把社会主义部分包括在内，而且应当占有重要位置。1941 年，斯大林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编写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政治经济学。编写工作后因卫国战争而中断。战后，从 1949 年起，又继续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对书稿进行反复加工和修改。直到 1951 年 4 月写出了《政治经济学》未定稿，并在科学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中间广泛征求意见。1951 年 11 月 10 日——12 月 18 日，苏共中央组织了一次有 240 位学者参加的经济学问题讨论会。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对《未定稿》进行评定和广泛的讨论。除全体会议外，还用了近十天时间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分别进行了专门讨论。

这次讨论会是苏联建立三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理论问题讨论会，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探讨的第一次尝试。这次讨论会涉及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

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一种意见坚持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占第一位的观点，认为这些经济规律是由国家的政策形成和决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否则难以解释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仍然保留着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范畴仍然在起作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规律是社会的物质生活自然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人的意识臆造的，任何人都既不可能创造，也不可能取消这些规律。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经济规律不是自发发挥作用的力量，而是已知的必然性，这些规律只有靠群众的自觉活动和国家的组织作用才能实现。又如，关于苏联仍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特点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国民经济中之所以存在商品和价值是因为存在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两种形式的所有制。另一种意见认为，价值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下调节各经济部门间劳动分配比例的永恒规律，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规律也应起到调整交换比例和生产比例的作用。与此相反，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在苏联各部门间的社会劳动分配主要靠国民经济计划来实现，这样，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价值规律的问题就自然而然被排除了。价值范畴的意义仅仅是为了通过计算价值来确定各种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消耗。然而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教科书作者的看法，即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经过改造的。商品和价值是历史范畴，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将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经过彻底的改造。保留这些历史范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仍然是衡量苏联人民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相互关系的一种尺度。

斯大林对这次讨论会非常重视，始终注意这些重要理论问题

的讨论，仔细阅读了会议的文件。针对讨论的问题，斯大林于1952年2—9月间，陆续写了《对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经济问题的意见》、《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并在通信中回答了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即《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答阿·弗·萨宁娜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这些意见和回答汇集成斯大林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0月最初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上。

通过这次讨论，苏联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进步，这表现在纠正了苏联经济学界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客观经济规律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纠正了长期把商品生产看作是异己的东西，否认其存在的必然性的理论，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纠正了否认价值规律存在的错误，承认价值规律在一定的范围内的作用。同时，也应当指出，这种进步是在肯定原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取得的，因而是极其有限和不彻底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出版，在当时被视为苏联理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苏联国内的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该书被普遍认为集中总结了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也曾结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反复学习和钻研了这部理论著作。

然而，从现在看来，苏联是在一个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度里、非常的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它所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实行的发展战略，它的许多做法，是适应当时特殊情况的要求的，因而具有其特殊性。不可否认，这种体制在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也有不少缺点和弊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病就愈加暴露出来，失去其存在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之后，便是一个进行改革和调整的大好时机。而就在此时，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人却将在特殊形势下建立起来的经济体

制视为不可改变的普遍适用的模式，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使其固定下来，并且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普遍适用的，应为其他国家所仿效。因此，斯大林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国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①。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搞了 30 多年，积累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迫切需要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作出总结。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作了总结，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重要思想和正确观点，斯大林本人的思想也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因而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部著作的许多观点后来的实践证明是片面的和错误的，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成为“左”的倾向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来源。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第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关于规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规律的客观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就已作了充分的论证。后来，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著述《资本论》，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恩格斯在其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对于社会规律的客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73 页。

观性问题，又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进一步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决不是按长官意志（或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而改变的。他们关于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的论述，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自然也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这个早已为马克思所解决了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些人却产生了模糊认识，甚至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苏联就曾流行这样一种观点，经济规律只存在于无组织的社会中，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经济规律只有自发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才起作用，而在计划经济中经济规律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社会主义是有组织的社会，整个社会生产是按人们的意志来组织的。这种观点受到批评以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到了 30 年代，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货币很快就会消亡，或者虽然承认商品货币的存在，却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由于卫国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些经济学家不能正确估价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出现否认经济规律客观性的观点。他们虽然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经济规律存在，但其内容却是经济政策一类的主观的东西。有人提出国家计划就是经济规律，"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是间接由法律制定的"，"国家方面的有计划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有的人甚至把苏联当时提出的基本经济任务——按人口平均计算在工业产值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说成是经济规律。一些经济学家颠倒了政策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认为研究党和国家政策的作用，"是科学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国家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最主要的内容，它是这些规律的自觉的基础"。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是可以改造过的，它是以改造过的形态在苏维埃经济中起作用。总之，当时流行的这样一些

观点，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误解了恩格斯关于公有制实现之后，人们将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进入自由王国的理论，从而对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产生了模糊和混乱的认识。历史上生产方式的更替是通过有意识的人们自觉活动来实现的，本来这种情况就容易给人以假象，加上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加自觉，问题就出来了。而这种片面夸大人的自觉活动的作用，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对经济规律客观性的怀疑和否定，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必然导致实践中的主观主义。

斯大林正是针对上述情况，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客观性问题，摆到了突出的地位。他直接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客观性，在这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作了具体的发挥。这就比他的同时代人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贡献。同时，这一科学结论的得出，也是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认识到它是不容易的，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不承认价值规律的客观性，认为可以随意创造规律，甚至创造出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即把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克扣农民的错误政策，说成是科学规律，结果是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轻工业发展缓慢，大吃了苦头。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首先针对苏维埃国家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规律，能“制定”、“创造”新的规律的错误观点，明确区分了法律和科学规律。他认为科学规律是客观过程的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则是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制定出来的，带有强制性的东西，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二者不是一个东西，决不能混为一谈。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把依据人们的意志制定出来的法律（包括方针政策）和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混同起来了，于是以为人们可以按主观意志

来“制定”和“创造”规律。

斯大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规律的客观性质，不仅表现为它们仍然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且还表现为它既不能被“改造”、“废除”，也不能被“制造”和“创造”。这样，斯大林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对规律的客观性质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斯大林还具体指出，不能把苏维埃国家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也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区分规律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斯大林的看法不完全准确。首先，把“有计划”作为规律的内容之一是不妥当的，易引起思想混乱。其次，把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看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现象，也是不确切的，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并不一定需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它可以是现代化大生产共有的特点。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次大战前后，都陆续放弃了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转而采取国家以各种方式（包括计划）从宏观上干预经济活动，有的借助于国家计划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自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计划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手段。

斯大林还着重指出了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导致严重的后果。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也就否认了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在实践上就会听凭冒险主义者的任意摆布。

其次，斯大林进一步论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般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有过明确的阐述，并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在摆脱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之后，“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就将

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1] 斯大林援引恩格斯的论述之后，强调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决不能达到废除、创造规律的地步，它仅仅是在认识和善于运用客观规律中体现出来。同时，他又指出，不应"把规律偶像化"，"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规律是客观的，但"人们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这个命题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并在书中多次提到，他把"如何运用"规律的问题更进一步具体化了（当然，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已解决很好了）。从斯大林的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出有这样两层含义：

其一，规律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客观条件是规律发生作用的基础，同样，经济规律也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人们的活动可以改变客观存在的经济条件，从而使一些经济规律因失去条件而不起作用，使另外一些规律发生作用。但是人们创造经济条件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不能随心所欲地按主观要求去创造。某种经济条件和经济规律的对应关系也是客观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什么条件就有什么规律起作用，条件的改变，并不等于规律的消灭。不能把消灭、创造条件与消灭、创造规律二者混为一谈。

还有一种情况，条件改变了，规律的作用并未消失，但条件的制约作用改变了规律发生作用的后果。这是指人们运用自己所掌握、发动的物质手段，改变物质条件，使某些其它规律共同起作用，从而获得有利于自己，而避免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变有害为有利。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后果？因为不同的条件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存在，也有自己的规律，不同的规律发生不同的作用，自然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后果正是因为诸种不同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如斯大林所举的用修筑堤坝来治理江河，既可以防止洪水泛滥，又可以发电，就是诸种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3 页。

总之，这里条件是很重要的，因此，认识、运用规律时，要把各种规律性和它们赖以发生作用的条件联结起来进行研究．只有正确把握规律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发生作用的情况，才能正确地创造条件，运用规律，争取达到预期的结果。

其二，人们可以“限制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这一观点是首先由斯大林提出来的。他说：在人们能够影响自然过程的一切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①。又说：“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②。他以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作为例证，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某一规律作用的范围诚然是可以限制的，但是否应限制，在什么范围内限制，却不能随意决定，而要根据其他规律、实际条件和人民的利益来决定，否则就会犯唯意志论的错误，造成工作上的失误。众所周知，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所固有的基本规律，其作用范围同商品存在的范围是一致的。凡是有商品生产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有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这一点斯大林是承认的。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斯大林只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品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因而价值规律只在商品流通中起调节作用，对生产不起作用，这一观点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的，超越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斯大林显然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因素，是一种“左”的思想，给苏联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而这种错误观点却又是在反对唯意志论的过程中产生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0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2页。

的，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斯大林还论述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特点以及认识、运用它们的不同特点，从而揭示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比在旧社会中能更自觉、更顺利地认识、利用社会规律。

社会科学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的区别之一，在于社会科学规律的历史性。斯大林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规律不是长久存在的，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规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作用，退出舞台。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社会科学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的区别之二，在于对社会规律的发现和应用，比发现和应用自然规律要困难得多，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社会规律总是有阶级背景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①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也会有落后的惰性力量，但与旧社会反动腐朽阶级阻力相比，要小得多，性质上也根本不同，是不难克服的。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更能顺利地发现、应用社会规律的社会根源之一。

人们的阶级地位对于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固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可是，能否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掌握、运用社会规律，而其他阶级都不可能做到呢？总的来说，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也曾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资产阶级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是它有特殊本领，而是因为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② 但斯大林只讲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能利用经济规律，是不够全面、客观的。资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3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5页。

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资产阶级亲自或通过其代理人过问经济管理，借助国家计划进行宏观调控等事实都说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利用经济规律，以取得经济效果，促进经济发展。而且统治者、管理者的本领大小，对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本领大一些，利用的情况就会好一些。事实并非如斯大林所说，与本领无关，只是“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它这样做”。不能简单地把资产阶级说成眼光狭隘，只能盲目陷入必然性的支配之下。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总趋势相一致，掌握、运用经济规律就那么容易，不需要什么本领。

同自然规律相比，社会规律无疑还有其他明显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特点。例如，在自然界，起作用的都是一些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而在社会领域里进行活动的，都是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社会规律不仅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并且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表现出来，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根本无社会规律可言。正因如此，有些人则往往容易夸大人的主观因素，而否认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但斯大林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总之，斯大林在规律问题上作了较为集中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要求人们按照客观规律来组织、安排社会主义建设，并阐述了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明的原理，进一步具体化了，恩格斯提出了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斯大林则更具体地论述了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也是苏联 30 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尽管他的某些提法不够正确，有些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是，斯大林毕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一些新的补充和发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胜利，胜利后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商品生产也将随之消失。在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将直接走向完全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见解，也曾设想用产品的直接分配代替商品交换，取消贸易自由。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到1921年列宁在实践的挫折中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掌权后的俄国，既不存在发达的商品生产，也不存在全国统一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完全归全社会所有的“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因而还有必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保持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小生产者之 间的联系，实现工农、城乡之间的结合。不是取消商品生产，抑制商品流通，而是要积极发展商品生产，疏通流通渠道，活跃国内商品市场。

30年代之后，苏联经济学界出现了以为“取得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就应当消除商品生产”；或者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货币很快就会消亡”；“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等一些错误观点。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根据，指出：“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①] 斯大林还进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0页。

一步论证了商品生产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早已被消灭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并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斯大林的这些观点是比较正确的，他明确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澄清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混乱认识和错误观点。但是斯大林的这种承认是极为有限的，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认识是片面的，他的立足点在于限制、缩小商品生产和流通，直到用“产品交换”来代替商品交换。他认为，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的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除对外贸易领域外，不能作为商品进入交换市场。第二，必须将集体农庄的剩余产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使之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第三，不能把基本生产工具、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归其所有，否则就会扩大商品流通的范围，阻碍集体农庄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

斯大林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限制、一步一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活动的范围，扩大产品交换活动的范围。而且他的着重点在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其根源在于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恰当的估计，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正是在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左”的思想支配下，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与向共产主义过渡对立起来，认为商品流通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是不相容的。在他看来，只有全民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如果扩大商品流通的范围，就会阻碍把集体农庄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唯有一步一步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扩大产品交换活动的范围，才能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①]。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真正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而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611页。

是强调要限制商品交换，尽快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作的结果，一是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加凝固化、僵化，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否认市场经济的作用，排除市场调节。二是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造成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失调，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均衡地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斯大林在理论上坚持、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而在实践上却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对价值规律，斯大林同样是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仍然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又竭力限制它起作用的范围。他强调社会主义企业应该考虑价值规律，经济工作人员要学习、研究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然而，斯大林对价值规律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他人为的将价值规律的作用仅仅限制在个人消费品的范围，只在商品流通领域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而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实质上，斯大林是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了，认为前者是社会主义，后者是资本主义。他说：“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以及根据这一规律的要求制定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国家的整个经济政策。“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①] 他认为，如果依据价值规律调节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那就不得不把生产资料生产的首要地位让位给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就意味着消灭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可能性。此外，

①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6—557页。

在具体谈到价值规律对于农业原料价格的影响时，斯大林认为农业原料的价格是固定的，由计划规定的；农业原料的生产规模也是由计划来决定的；生产农业原料所必需的工具也是集中在国家手中。因此，价值规律只是影响农业原料价格的因素之一，“但是尤其不能否认，这种影响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调节的影响。”①

斯大林的上述观点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只有消费品是商品，能进入市场，受价值规律作用的调节，而生产资料不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价值规律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那就很难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消费品也不可能真正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这样，实际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为消费品的生产是按国家的直接计划规定来进行的，各企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由国家商业部门统一收购，实行包销，这实际上成了变相的“产品交换”，仍然是把一切死死地统一在国家计划之下。事实上，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起调节作用，它不仅表现在消费品的交换方面，而且表现在整个生产领域，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并不是唯一的，但如果用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计划来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商品的生产，那是难以做到合理生产的。否认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是必然会受到惩罚的。长期以来，苏联在斯大林上述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造成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经济效益低下，价格对价值的严重背离，商品匮乏，极大地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总之，在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问题上，斯大林既有正确的方面，又有片面、错误的方面。如果说，这种思想曾经推动苏联社会生产迅速发展的话，那么，后来它的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0页。

消极作用和弊端就愈来愈暴露了。

四、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最初，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在论述生产发展的三个特点时，曾经指出，“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但是它迟早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规律”的概念，但是，已经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来加以阐述。到了5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便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很多论述，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把它明确地作为一条客观经济规律提出来，应该说是一个贡献。

有的学者认为，生产力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状况、发展程度等等意思都是相同的。因此，所谓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就是指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质的规定性和这种质的规定性的量的表现。这在道理上讲是对的，因为一定的质总具有一定的量，有其量的表现。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一规律的表述上，还是应当把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明确表述出来为好，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使人们更易于把握。因为同是大机器生产，也还有个水平高低问题，自动化程度也有高低之分。发展水平不同，生产效率不同，生产量也就不同。至于农业生产，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复杂了。

从现在看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至少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必须适时地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当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要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巩固这种生

产关系的时期，集中主要精力来发展生产力。

第三，如果生产关系的改造、变革“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时，同样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人为地使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甚至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

这最后第三点正是斯大林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太快，走在生产力的前面，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许多问题往往出在这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一再片面强调苏联的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改革生产关系。总想尽快把集体农庄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甚至设想开始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陷入了空想主义。斯大林在书中写道：集体农庄所有制和商品流通“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怎么办？斯大林提出，“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制——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①

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其主要错误还不仅在于得出集体农庄所有制和商品流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个结论，更重要的在于他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教条主义的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出发，认为惟有纯粹的单一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把全部国民经济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问题恰恰在于判断一种经济制度的优劣，只能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在于它的公有水平的高低。脱离或“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主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页。

观主义地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这种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的"左"的观点，实质上也是对生产力的最后决定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规律的一种否定。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斯大林在1938年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曾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在批评经济学家雅罗申科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错误观点时，对"完全适合"作了新的说明，开始承认并初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他指出："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①]他又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的现象"。而"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②]的地步。

斯大林实际上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观点，从只讲"完全适合"到承认矛盾的存在，批评了否认矛盾的说法，这在认识上是一种进步，也说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但是，斯大林既明确承认矛盾的存在，又坚持不放弃"完全适合"的提法，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明这种修正是不彻底的。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7页。

简短的结论

在战后的苏联，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威信空前提高。这种条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迅速发展是有利的，但由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后时期的苏联只能在曲折中缓慢前进。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片面夸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意识形态性，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斗争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多次主持召开重大理论讨论会，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对学术问题进行粗暴干涉，严重混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挫伤了人们创造性地进行哲学研究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尽管这些会议在纠正思想理论界的某些错误偏向方面也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斯大林的两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集中反映了斯大林晚年的哲学思想。这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而作出的重要的哲学总结。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根据社会主义的特点，更明确、具体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规律的客观性；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己过去的失误），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形态的共有的普遍经济规律；明确提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定义和相互作用的理论；首次提出并论述了“逐渐过渡”这种非爆发的质变形式，等等。同时，斯大林晚年思想的僵化也使他不能彻底贯彻唯物论和辩证法，因而他的哲学思想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明显错误。

苏联哲学工作者，在战后开展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由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在苏联哲学界教条主义流行，思想僵化的现象相当普遍。

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以斯大林的哲学思想为主要特征的时期结束了，苏联哲学发展的新时期来临了，与此同时，历史也就开始了对斯大林哲学思想是非得失的检验和评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五卷）
作者＝
页数＝５３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十月革命后社会历史概况和哲学发展线索（１９１７—１９５３年）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二、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的胜利
三、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道路是永存的
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一、社会历史状况及其对哲学提出的要求
二、新时期哲学发展的分期和基本特征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
一、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方法论
简短的结论
第二章　　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９２０年１２月）
第一节　　列宁总结历史新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
一、列宁从实际出发对过渡时期学说的发展
二、列宁对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科学分析
三、批判考茨基，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四、指出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开拓社会主义运动辩证法研究的新篇章
第二节　　列宁从哲学高度对“左倾”错误的批判
一、围绕布列斯特和约争论中列宁阐述的哲学思想
二、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
三、提出两种制度和平相处的思想
四、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第三节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评价
二、列宁对“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哲学批判
三、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第四节　　由战争向和平转折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一、实现转折的客观依据
二、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
三、工会问题的争议中列宁的哲学思想
简短的结论
第三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底）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思想轨迹
一、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
二、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轨迹
第二节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
一、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
二、过渡时期所有制的复杂结构

三、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四、小农经济及其改造问题
第三节　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与商品、市场的关系
一、从《哥达纲领批判》到“战时共产主义”
二、伟大的转折：列宁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联系
三、列宁论社会主义计划与商品、市场的辩证关系
第四节　列宁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
一、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努力争取自身生存的条件
二、要善于将苏维埃政权和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结合起来
三、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
第五节　列宁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辩证法
一、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生活的公式高于书本的公式
二、探索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创造性
三、前进与后退、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辩证法
简短的结论
第四章　列宁晚期著作中的哲学思想（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１月）
第一节　列宁的哲学遗嘱：在经济转轨时期战斗唯物主义的迫切意义
一、《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的历史背景
二、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共产党外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
三、战斗唯物主义必须与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科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
五、注意概括当代科学成就和新的历史经验，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研究
六、重视新道德的建设，培养、造就一代新人
第二节　列宁病中口授文章和书信中的哲学思想
一、对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反思
二、反思的主题和指导思想
第三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
一、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构想的思想轨迹
二、列宁新构想的基本特征
三、经济建设的构想
四、文化建设的构想
五、政治建设的构想
六、正确处理民族问题
简短的结论
第五章　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战线的论争（１９２４—１９３６年）
第一节　苏联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概况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普及
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
三、对黑格尔、斯宾诺莎等哲学思想的研究
四、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问题
第二节　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一、围绕列宁主义的定义、思想来源、基本原则的争论
二、围绕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的争论

第三节　　布哈林哲学思想及对其平衡论的批判
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二、苏联哲学界对布哈林平衡论的批判
三、关于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几个理论观点的批判
第四节　　苏联２０年代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的论争
一、机械论者学派及其哲学观点
二、辩证论者和机械论者的争论
三、批判机械论者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第五节　　３０年代米丁、尤金等与德波林学派的论争
一、德波林及其哲学思想
二、米丁、尤金等与德波林学派的论战
三、３０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的积极意义及消极后果
简短的结论
第六章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苏联哲学（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
第一节　　联共（布）中央对哲学研究的不适当干预
一、批判德波林学派一再升级
二、下令改写《哲学史》第３卷
第二节　　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撰写、发表和反映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历史地位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问世前后的苏联哲学
第三节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哲学问题
一、关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学说在新时期的方法论意义
二、关于苏联社会发展动力
三、关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总思路
四、从思想理论上反对法西斯主义
简短的结论
第七章　　战后时期的苏联哲学
第一节　　１９４５—１９５３年苏联哲学发展概况
第二节　　１９４７年苏联哲学讨论会
一、哲学讨论会的概况
二、关于哲学史的对象
三、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
四、关于批判与继承问题
五、哲学讨论会的影响及其后果
第三节　　１９５０年语言学问题讨论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一、关于语言学问题讨论的一般情况
二、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
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四、关于质变的两种形式
第四节　　１９５１年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关于经济学问题讨论的一般情况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四、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简短的结论
附录页